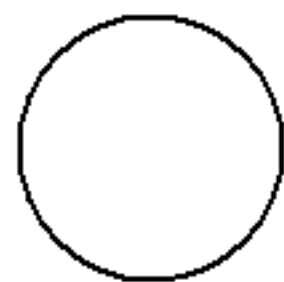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8·9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八、九期 ★

目 录

危机四伏的美国经济 孟用潜 (1)

鲍威先生的责难和美国国务院的苦恼 张振亚 (20)

肯尼迪与产业后备军 陈 原 (23)

论考茨基主义 理 夫 李思温 王福如 (28)

充分地发挥技术人员的力量 石克俭 (42)

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 王宪钧 (46)

草原上的拓荒者 乌兰巴干 (53)

漫画：遗产税 江 帆 (27)

★ 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



危机四伏的美国经济

孟用潜

今年一至三月，肯尼迪向美国国会连续提出国情、预算、经济、贸易、农业、对外“援助”、国际收支等一系列咨文和报告，大谈其对内对外的施政方针。关于美国的经济情况，他说他为一九六一年规定的扭转经济下降趋势的目标已经实现，“在国内年初时我们陷于经济衰退的深谷，年终时我们走上了复苏和经济增长的康庄大道”。他并且说，只要美国国会批准这些咨文，通过他所提出的法案，并且给“总统以随时备用的权力”，就可以“防止未来的衰退”，“取得全面和持久的繁荣”。

应该指出，以肯尼迪为代表的美国反动统治集团，事实上是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危机四伏的趋势，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肯尼迪在上述咨文中所提出的都是加深和加剧美国国内外矛盾的反动的政策措施。对于肯尼迪的咨文，可以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拟从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特别是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的危机和危机以后的形势，对美国垄断资本目前所处的困境和肯尼迪政策的实质，作一个初步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发生过五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连续不断地发生，表明美国经济经常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最近的一次危机，是从一九六〇年一月工业生产指数达到一一一（以一九五七年为一百）以后开始的。一九六一年二月生产下降到一〇二，三月生产开始回升。肯尼迪上台，恰好赶上经济回升，因此，不能说是由他“扭转”了经济下降的趋势。一九六一年七月，生产回升到一一二，即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点。到去年十二月，工业生产指数仅增加到一一五，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像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所预言的“繁荣”，而是陷于踏步不前的停滞状态，甚至美国官方最近对今年的经济前景也已经感觉有些暗淡了。

一九六一年美国生产回升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就全年来说，还没有超过一九六〇年的水平，其中最重要的工业设备甚至还只是停留在一九五七年的水平；超过一九五七年水平的只是商业设备的生产。具体情况如下（以一九五七年为一百）：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八、九期 ★

目 录

危机四伏的美国经济 孟用潜 (1)

鲍威先生的责难和美国国务院的苦惱 ... 張振亚 (20)

肯尼迪与产业后备軍 陈 原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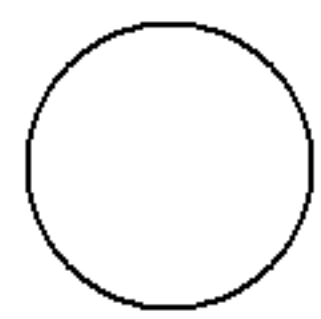
論考茨基主义 理 夫 李恩瀛 王福如 (28)

充分地发挥技术人员的力量 石克儉 (42)

数理邏輯和形式邏輯 王宪鈞 (46)

草原上的拓荒者 烏兰巴干 (53)

漫画: 遗产稅 江 帆 (27)



☆ 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



两个方面，一是失业日益严重，二是壟断資本集中的趋势有新的发展。

根据美国官方統計，去年二月失业人数是五百七十一万人，失业比率（即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百分比）是百分之六点九；十二月失业人数减少到四百零九万人，失业比率减为百分之六。全国十二个大城市中，黑人工人失业的比率则高达平均失业比率的三倍。今年三月份，失业人数增加到四百四十万人。从战后历次經濟危机之后的情况来看，失业的比率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危机之前，失业比率不到百分之三，危机之后增加到百分之四，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之后又增加到百分之五，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之后則增加到百分之六。每次危机之后，失业比率不是降低，而是增加，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根据官方統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期間，美国一百五十个工业中心有八十九个被划为严重失业区或蕭条区*。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期間則有一百零一个工业中心被划为蕭条区，其中七十一个区的失业比率为百分之六至九，十七个区为百分之九至十二，十三个区为百分之十二以上，有的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到今年一月，工业生产已經恢复到危机前生产最高点之后，仍然有六十一个区是蕭条区。由此可見，美国的工业中心正在一个一个地烂下去，失业已經成为长期无法解决的問題。

其实，美国官方的統計还远不能說明失业情况的严重。他們在編制失业統計的时

候，經常弄虛作假，方法之一是一方面把劳动力总人数扩大，另方面又把失业人数压小，这样一加、一减、一除，就把失业比率显著地縮小了。那么，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美国資产階級劳工經濟专家、参議員道格拉斯认为，在劳动力总人数的統計中，約有一千一百万小业主和不受工資报酬的家庭劳动者不应計算在內。这样，劳动力总人数就不应当是七千一百万人，而应当是六千万人。他还认为，在失业人数的計算上，除全失业外，应把半失业折成全失业（約一百二十五万至一百五十万人）一并計算在內。按照道格拉斯的算法，失业比率不是官方所說的百分之六，而是百分之十以上。美国进步經濟学家佩洛在一月份的《政治月刊》上又作过一次計算。他认为，有相当大量的失业工人，由于长期失业已經絕望而不再登記找工作，官方就认为不符合失业定义，不再列入官方的失业統計。如若把这些以及其他未列入統計的失业工人計算在內，失业比率就不是百分之十，而应当是百分之十四，差不多七个工人中就有一人失业。

在美国，半失业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根据美国劳工部統計，一九五七年半失业工人是一千一百六十万人，一九五八年增加到

- * 严重失业区或蕭条区，即凡失业人数达到当地劳动力总人数百分之六，而且失业人数在四年中連續有三年超过全国平均失业率百分之五十，或在三年中連續有两年超过平均失业率百分之七十五，或在两年中有一年失业人数超过平均失业率一倍以上的地区即划为严重失业区。



一千四百一十万人，一九五九年曾减少到一千二百二十万人，但据佩洛估计，一九六一年可能已经超过一千五百万人。

美国在历次危机之后，失业比率不断增高，就业比率则不断下降，而且下降得相当严重。美国进步刊物《经济札记》最近根据官方出版的《劳工月报》，对于战后几次经济危机生产下降到最低点的十一个月以后的就业增长情况，作了一次比较，如下表：

危机后就业增长百分比

(生产下降到最低点的十一个月之后)

	1950	1955	1959	1962
	9月	7月	3月	1月
非农业就业	8.1	4.5	3.8	1.8
其中：				
制造业	13.1	5.8	5.3	3.1
耐用品	22.3	8.1	7.4	4.8
非耐用品	4.0	3.0	2.8	0.9
建筑、运输、矿业	13.3	5.1	2.8	-3.0
贸易	3.1	3.4	2.6	0.9
金融、服务业	2.8	4.4	3.5	2.1

从上表可以看出美国非农业的就业增长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八点一逐次下降到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一点八，在制造业的耐用品生产部门就业的增长率则从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下降到百分之四点八，在建筑、运输和矿业部门到今年则不仅没有增加，而是在绝对地减少。

由于长期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大批的农场不断破产或者被兼并，也加剧了失业的严重程度。根据美国官方统计，从一九五四

到一九五九年，美国农场由四百七十八万个减少到三百七十七万个，五年之间共减少一百零八万个。其中有二十三万个，根据官方解释是由于农场“定义”的改变不再列入农场统计之内。即使把这二十三万个扣除，五年之间也减少了八十五万个，即每年减少十七万个，每天减少四百六十六个，每小时减少二十个，每三分钟减少一个。同时美国农业人口也在不断下降，一九五〇年是二千五百零五万人，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六点六，一九六〇年下降到二千零五十四万人，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四。农民和农业工人大批流亡到城市，变成城市的产业后备军。

失业和半失业日益严重，表明美国工人阶级相对以至绝对贫困化的趋势都是在日益加深。这也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考察一下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积累问题。

美国垄断资本积累的增长是十分显著的。美国公司纳税前的利润，在一九五三年是三百八十三亿美元，一九六一年增长到四百六十一亿美元。固定资本投资在一九五三年是二百八十三亿美元，一九六一年增长到三百四十四亿美元。除去固定资产之外，美国公司流动资金的净额也在不断增加，一九五三年是九百一十八亿美元，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已增加到一千三百七十九亿美元。尽管在这期间，连续发生过三次经济危机，但是，由于美国垄断资本把在危机中遭到的损失，



首先而且主要地是轉嫁給美国工人階級，因而資本积累还是不断增长。

馬克思曾經指出，竞争和信用是資本集中的两个最有力的杠杆。美国壟断資本由于这两个杠杆的作用一向就十分集中。近年来，集中的趋势則更加加劇。根据美国联邦貿易委员会的材料，从战后到現在，美国的企业已經发生过三次合并的浪潮。第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那次制造业的合并有四百多起。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五年前后，每年合并五百多起。最近这次合并浪潮从一九五九年开始，連續三年，年达六百余起。在一百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年銷貨額从将近四亿到一百二十七亿美元的公司）中，有六十多家至少进行过一次大合并。一九六一年的合并，如果把工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也包括在內，共計一千二百三十四起；其中工矿企业的合并六百七十一起。

企业合并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导弹、电子、石油、化学、建筑、铁路、航空、造船以及家庭用具、化妆品、食品、飲料等各种工业部門，也包括拥有几百家以至两千家商店的联銷商店，还包括掌握金融命脉的大銀行的合并。企业的合并，有的是在同一部門的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之內进行，有的是在不同部門的企业之間进行。在同一部門由于竞争激烈，有两个以上的大公司一經合并，其他公司也便相率效尤，跟着实行合并，否則就会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这种竞争和合并，在一些已經进入衰落

阶段的部門显得特別严重。最近美国最大的两个铁路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紐約中央铁路公司，正在进行合并。这两个公司的貨运量占全国铁路貨运量的百分之十八，雇佣工人十二万，占全国铁路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六。铁路运输在美国是一个日趋衰落的部門。从一九五三年以来，铁路工人减少四十五万人，現在还有七十五万人。美国铁路办事員工会主席、肯尼迪的劳資顧問委员会委員哈里森估計，铁路方面已經提出的一系列合并計劃一旦实现，还会有二十万铁路工人要失业。这种情况表明，衰落部門的大規模合并对于工人階級的打击特別严重。

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合并和兼并，主要是因为有些部門之內生产和市場的矛盾已經极端尖銳，因而就需要另寻出路，通过合并或兼并把資本轉移到新兴的、有大利可图的特别是与軍事生产有关的部門。美国壟断資本爭夺軍事訂貨，对于这种超部門的合并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特别是由于按武器系統承包現在已經成为大壟断集团爭夺軍事訂貨的重要方式。举例來說，美国一瑪利艾塔公司是一个大建筑材料公司，去年二月合并了两个建筑公司之后，八月又被在五角大樓的軍事訂貨中占第六位的馬丁公司所合并，成为馬丁一瑪利艾塔公司。这样它就可以按照武器系統从导弹的設計、发展、生产到发射基地，一攬子承包下来。不久以前福特汽車公司兼并从事电子工业生产的腓尔科公司，显然也是为了爭夺軍事訂貨。这一类的合并今后还会繼續发生。



这些年来，銀行也在大量地合并。从一九五二到一九六一年被合并或兼并的銀行有一千五百三十家。最近两三年，摩根財团的摩根公司和保证信托公司合并，洛克菲勒財团的大通銀行和哈姆斯塔德銀行合并，以及化学銀行和紐約信托公司合并、制造商銀行和哈諾佛銀行合并等，表明美国各大財团之間在金融战綫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資本的急剧集中不能不引起中小企业的大量破产。一九四七年美国倒閉的企业有三千五百家，一九六〇年有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五家，一九六一年有一万七千零七十五家（今年一月份繼續倒閉一千四百四十七家，比去年十二月份增加百分之十三）。一九六一年是二十八年以来企业倒閉最多的一年，倒閉企业的負債約十一亿美元，相当于一九五五年的二点四倍，一九四八年的四点六倍。中小企业的大量破产，也是造成工人大量失业的原因之一。

經過合并之后，資本更加集中，竞争更加激烈，生产設備就更需要現代化和自动化。据美国劳工部估計，按照目前生产設備現代化和自动化的規模和速度，每年大約有一百八十万在业职工要被机器所代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失业情况就将更为严重。

企业大規模合并和資本大量集中，实际还可能引起更深刻的变化。美国《商业周刊》最近有一篇文章談到在美国經济发展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合并浪潮：第一次是一八九八到一九〇二年，第二次是一九二六到一九三〇年，第三次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到现在。这篇文章把一九六一年看做是战后合并浪潮的最高峰。合并的浪潮是否已到頂峰，目前尚难断定。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合并浪潮同經济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个浪潮之后，在一九〇三年和一九〇七年爆发了經济危机。在第二个浪潮中，經過更大規模的合并与集中，爆发了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严重的經济危机。从战后到现在，美国还没有爆发过像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那样严重的危机，但是許多迹象表明，美国經济正在向着那个方向发展，壟断資本竞争的加剧和企业大規模合并的浪潮，就是在为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准备条件。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方面，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在美国国内所引起的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它加深了美国工人阶级和壟断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加深了壟断資本集团之間的矛盾，导致中小企业的大量破产，在經济方面所带来的后果異常严重。

（三）周期縮短是战后美国經济危机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根据美国资产阶级經济学家自己的計算，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危机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危机相隔四十五个月，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危机与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相隔三十五个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与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相隔仅二十五个月。同时，每次危机之后，生产回升超过危机前生产最高点的幅度也在逐次减低。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危机之后生产增长百分



之三十四，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危机之后生产增长百分之十，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之后生产仅增长百分之八。这些情况表明，目前美国经济是处在严重动荡不定的状态。

事实上，美国有些重要生产部门显然已经进入衰落阶段。钢的最高产量是一九五五年的一亿零六百万吨(公吨，下同)，现在已经下降到八千五百万至九千万吨，而炼钢的设备能力则高达一亿四千二百万吨。汽车的最高产量是一九五五年的七百九十二万辆，现在已经下降到五百五十四万辆，而汽车的生产设备能力则高达一千万辆以上。煤的最高产量是一九四七年的六亿二千万吨，现在已经下降到三亿五千九百万吨。其他如铁路运输、纺织、家庭电气用具等部门也早已进入衰落阶段。美国许多萧条区之所以萧条，原因之一是那里的主要工业就是属于上述进入衰落阶段的工业部门。美国目前也还有少数工业部门在发展，例如电机制造、电力、工业化学等部门，现在比一九五七年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十四、百分之三十一和百分之三十七。但是仅仅依靠这些部门生产的增长，并不足以扭转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基本趋势。

(四)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在显著下降。从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增长的速度来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一九五三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工业生产增长	出口贸易增长	
		出口值	出口量
美国	20%	33%	19%
英国	28%	45%	32%
西德	91%	189%	169%
法国	84%	91%	104%
意大利	100%	178%	237%
日本	217%	232%	246%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占比重，从战前、战后初期到最近发生变化如下：

	1938	1948	1961
美国	37.0%	53.4%	43.3%
英国	13.7%	11.2%	9.0%
西德	—	3.6%	9.0%
法国	5.5%	3.9%	5.0%
意大利	3.3%	2.6%	4.1%
日本	3.6%	1.0%	4.8%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从战前、战后初期到最近发生变化如下：

	1937	1947	1961
美国	14.2%	32.5%	17.7%
英国	11.2%	9.8%	9.1%
西德	—	0.5%	10.7%
法国	4.1%	4.0%	6.1%
意大利	2.4%	1.4%	3.5%
日本	5.1%	0.4%	3.6%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品出口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德所占比重在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赶上了美国，具体情况如下：



	1937	1950	1961
美国	19.6%	27.3%	20.3%
英国	22.4%	25.5%	15.9%
西德	—	7.3%	20.3%
法国	6.4%	9.9%	9.6%
日本	7.2%	3.4%	6.8%

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表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遭遇着严重的竞争，而且处在日益不利的地位。

但是从资本输出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根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一九五〇年约为一百二十亿美元，一九六一年增加到三百五十亿美元。美国报刊自己估计，由于隐瞒不报的情况相当严重以及资产的账面价值远低于实际价值，实际的对外投资可能比官方的统计多一倍。美国通过对外投资在海外直接占领的市场，实际早已超过商品出口所占有的市场。今后美国垄断资本还会继续增加资本输出，扩大它在海外的阵地。但是由于竞争者的增加，市场是在相对地缩小，有些重要工业部门的市场甚至在绝对地缩小。这种竞争的发展，将使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日益尖锐。

最后还要指出，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期间爆发的美元危机，是美国国际地位削弱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纽约一直是国际金融的中心，美元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货币。这是美国金融帝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美国是个贸易出超的国家，但是由于资本的

大量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的不断增长，近年来国际收支出现了严重的逆差。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每年平均逆差达三十七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的出现，促使美国的黄金不断外流，黄金储备显著减少。美元发生了危机，法郎、马克、英镑实行自由兑换，美元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唯一占统治地位的货币。从国际短期资金的流动来看，美国的债权到去年年底截止是四十七亿一千万美元，债务则高达二百二十五亿六千万美元。美国黄金储备已经下降到一百六十九亿四千七百万美元（今年三月底下降到一百六十六亿一千万美元，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以来最低的黄金储备），再扣除联邦储备银行为保证银行券发行和活期存款所必需的法定百分之二十五的准备金一百一十八亿美元，可见国际金融中心的美在短期资金往来上，实际已经陷入入不抵债的地位。继美元危机之后，一九六一年又发生英镑危机，马克和法郎的地位相对增强。于是在国际货币和金融战线上，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美元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同时还加深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

二

如上所述，从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各方面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但是为了说明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对于美国国内外的矛盾还需要作进一步的



分析。

从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来说，当前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国内市场还有没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应该说这种可能很小。就消费品市场来说，战后十几年来美国垄断资本的确用尽心机，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刺激国内市场。它们一方面利用新技术制造了许多种类的新产品，利用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每年在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利用大量的五花八门的广告（广告费年达一百二十亿美元）等各种办法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还利用与年俱增的消费者信贷和房屋抵押贷款来“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其实这是“寅吃卯粮”预支购买力的措施。现在消费者信贷已经从一九四五年的五十六亿美元增长到五百七十一亿美元，房地产抵押贷款从三百五十五亿美元增长到二千一百九十三亿美元。广大消费者负债累累，实际上变成高利贷款的奴隶。因此，依靠这类贷款来“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少。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固定投资的新高涨，来扩大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的国内市场呢？这种可能也很小。从战后美国固定投资增长的趋势来看，以一九五四年价格计算，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各投资三百二十亿美元，是战后的最高水平，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平均每年投资仅二百七十亿美元。由于生产设备能力严重过剩，目前很难出现一次投资的新高涨，因而扩大第一部类商品市场的可能性也在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垄断资本就更加需

要利用国家机器，采取各种措施为垄断资本企业服务。在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是更多地通过国家预算，增加政府财政开支。增加的财政开支主要是用于增加军事订货，同时也用于修建公共工程、收购和出口剩余农产品等等。依靠国家财政加紧军事生产，对于垄断资本来说，这种办法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订单特别大，战略原料可以由国家代为囤购，资本可以由国家财政垫支，产品可以通过财政开支实现，甚至大量的研究费用也可以由国家开支。这是美国垄断资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最廉价的手段。美国垄断资本必须加倍地利用国家机器，更多地依靠国家各种财政措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垄断资本自身无能为力的时候，它必然要乞灵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财政措施是美国统治集团所一贯采取的防止“经济衰退”的手段，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就曾经采取过这种办法。在那个时期，艾森豪威尔还不断吹嘘美国经济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强调通过货币、金融措施来“调节”经济，就是用提高和降低利率、抽紧和放松银根的一套办法，对经济进行所谓“调节”。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足以防止经济“衰退”，在他当政的八年，美国连续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肯尼迪上台以后，更加突出地强调采取财政措施。在今年的经济咨文中，他提出为了“加强对付衰退的防御措施”，主要的是加强“财政系统”、“赋税系统”和增加“总统的备用权力”。因此，肯尼迪最近就提出了高达九百二十五亿美元的预算开支，高达九



百九十三亿美元的承担义务权和高达一千一百四十八亿美元的现金预算开支。*

肯尼迪提出的预算是美国战后最大的预算，比一九五三年侵朝战争时期的预算还高出一百八十四亿美元。肯尼迪的预算咨文说，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九百二十五亿美元的预算开支中，“几乎有五分之四是与我们目前国家安全和过去的战争有关的费用。用于国防、国际和空间计划方面的开支估计为五百八十一亿美元（占百分之六十三）；用于与过去的战争有关的退伍军福利费和利息预计总数为一百四十七亿美元（占百分之十六）。所有其他开支估计为一百九十七亿美元，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肯尼迪本人不仅公开承认和宣扬预算的五分之四是与战争有关的费用，而且在预算中把美国国务院“国际活动”的全部经费公然列入间接军事开支。这个预算是根据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所决定的一个军事预算。预算的目的性是这样明显，美国参加日内瓦十七国裁军会议到底有多少“诚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美国能不能在这样大规模扩军备战的基础上达到肯尼迪所说的“全面和持久的经济繁荣”呢？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

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三年，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空前地发展了它的军事生产。四年之间，直接军事开支从十三亿美元猛增到八百一十九亿美元，工业生产增加了一点二倍。大战结束后，由于军事生产下降，工业生产也随之下落。侵朝战争爆发，再度大规模发展军事生产，工业生产总指数又有较大的回升，到一九五二年才

恢复到战时一九四三年的水平。这说明，军事生产的增长确实超过增加美国工业生产的作用。

但是军事生产发展到现在，它作为促进生产上升的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军事生产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那样是一个临时发生作用的因素，而是一个经常性的因素，因而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已经大大减弱。把已经成为经常的直接军事开支，从一九六一财政年度的四百七十五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三财政年度的五百二十七亿美元，即增加五十二亿美元，与大战初期把军费猛增八百零六亿美元，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它们在经济上所能发生的作用，显然有很大的差别。第二，军事生产本身的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侵朝战争，在军事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常规武器，侵朝战争以后是飞机和导弹，最近则是核武器和导弹等。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这期间，与军事生产直接有关的工业部门也先后发生了和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首先获得重大发展的是钢铁工业、汽车（坦克）工业，这两个部门以后衰落了。继钢铁和汽车之后获得重大发展的是飞机工业，这个部门以后也开始衰落了。继飞机之后，获得重大发展的是电机、电子、化学工业，现在这些部门的生产设备能力也相当严重地过剩了。因

* 根据美国预算程序的规定，预算开支是政府向国会提出的开支估计，承担义务权是政府向国会提出的拨款等要求，现金预算则除一般预算外，还包括失业救济、老年救济、公路等基金的收支。



此，从总的方面看，由于军事技术不断向尖端发展，军事生产所直接影响的工业的范围在缩小。在尖端武器的生产中，技术的性能和精密的程度大为提高，生产所需要的工时大为增加，而所需用的原材料则实际是在减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对于钢、铝等许多基本工业部门所能发生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尽管军事开支不断增加，但各种武器的订货价格也不断提高。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B-17轰炸机是二十多万美元一架，现在的B-70轰炸机则为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美元。潜艇原来是五百万美元一艘，现在原子潜艇是四千五百万美元，装设北极星导弹的潜艇则要九千万美元。阿特拉斯导弹也要三千五百万美元一枚。军事工业的物质生产并不是与军费的增加而相应按比例地增加。第三，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二十四年来长期的、片面的经济军事化，实际是美国许多工业部门陷于停滞以至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庞大的财政开支和大规模扩军备战，只能是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打强心针，并不能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全面和持久的繁荣，相反地会使经济的畸形发展更为严重。

肯尼迪最近提出的预算比艾森豪威尔一九六一财政年度预算实绩，在开支方面增加了一百一十亿美元，在收入方面增加了一百五十三亿美元，而预算收入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劳动人民的税收。这就是说，庞大的军事预算最后要完全由美国人民来承担。这是“苛政猛于虎”的、吃人的财政。肯尼迪预算收入增加的主要根据，是预测从现在到明年六月

美国会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这种指望一旦落空(显然要落空)，庞大的预算开支就会带来财政赤字。本年度的现金预算赤字，据美国官方估计将达八十五亿美元，下年度财政发生赤字也势所难免。为了弥补赤字，就需要发行公债。截至今年二月，美国联邦政府负债已达二千九百七十四亿美元，公债发行限额原定为一千八百五十亿美元，不久以前暂时提高到二千九百八十亿美元。最近，美国国会已经批准肯尼迪的要求，把国债的原定限额增加到三千亿美元。财政赤字的不断出现，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财政开支的增长。因此，增加政府开支这条路子实际也是越走越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呢？肯尼迪的经济咨文说：“一方面是发生通货膨胀，而另一方面是陷入经济衰退，灵活的和保持警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使我们能够保持狭隘的中间的道路。”这里必须指出，美国的通货在战后一直是处在慢性膨胀的过程中，物价也不断上涨，但膨胀更主要的表现是信用膨胀。美国的信用膨胀，无论在国家财政上(特别在公债发行上)、在工商业贷款上、在证券市场投机上、在消费者信贷和房屋抵押贷款上、在国际财政金融上，都是十分严重的。美国垄断资本一向把信用膨胀作为招财进宝的一张王牌。但事物总是向反面转化，由于信用过度膨胀，现在实际正在孕育着一次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美国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十分尖锐，无论扩大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市场的可能性都很小，增加军事开



支作为刺激生产的作用也甚为有限。肯尼迪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变本加厉的經濟軍事化的措施，这些措施不是在緩和而是在扩大和加深这种矛盾，酝酿着一次新的更严重的經濟危机。

三

美国壟断資本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就必然要加紧对外扩张。但是，由于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已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不能不在帝国主义陣营内部引起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商品輸出、資本輸出、国际货币金融等各个战綫上同时展开，斗争的場所目前主要集中在西欧。

战后西欧的經濟是在美帝国主义扶持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发展到現在，西欧在資本主义世界已經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勁敌。一九六一年西欧的鋼产量共計一亿零七百七十六万吨，已經超过了美国。就工业生产中最关键的工作母机的生产來說，西欧也已經超过美国；工作母机的出口則超过美国将近四倍。具体情况如下：

工作母机的生产和出口

	生产比重	出口吨数 (单位：万吨)
美国	38%	4.69
西德	27%	12.36
英国	13%	3.94
法国	8%	1.57
西欧其他国家	—	5.00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西欧在資本主义世界的进口貿易中占百分之四十七，美国仅占

百分之十三；西欧在出口貿易中占百分之四十四，美国仅占百分之十八。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业品出口方面，如前所述，西德在一九六一年已經赶上美国。这几个重要事实可以說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市場。就資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來說，西欧是联結和控制亚非地区的一个重要樞紐。西欧对于社会主义陣营則是帝国主义实行战略包围的前沿陣地。因此，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西欧是势在必爭。

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圍繞着西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簽訂羅馬条約、一九五八年成立共同市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欧六国(西德、法、意、荷、比、卢)之間逐年降低关税，对外逐步实行統一关税，实行货币自由兌換，取消对資本流动的限制，規定到其他国家設厂投資的自由权利，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并且企图把六国工人的工資待遇向下拉平。这一切都是为西欧壟断集团服务的措施。几年来这些措施为壟断資本扩大了商品市場，扩大了投資的势力范围，而且扩大了劳动力市場，为进一步榨取西欧工人阶级創造了条件，对于一九五七年以后西欧工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

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之間，这场斗争首先是在以西德和法国为轴心的六国和以英国为首的七国(英、挪、瑞典、丹、奥、瑞士、葡)，即共同市場和小自由貿易区之間展开的。形势的发展显然是有利于西德和法国，而不利于英国。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就工业生产、进口和出口貿易量的增长來說，“六国”都大大超过“七国”，如下表：



西欧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工业生产增长	进口增长	出口增长
六国	30%	48%	49%
七国	14%	27%	16%

在“六国”“七国”的斗争中，共同市场压倒了小自由贸易区，最后迫使英国在去年八月正式申请加入共同市场。这一斗争还正在继续进行。目前的形势仍然有利于以西德、法国为轴心的共同市场。

美国在这场斗争中，最初企图分而治之，坐收渔翁之利。但是，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特别是美元危机，显著地削弱了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美国不仅已经失去战后初期对西欧的绝对优势，现在连相对优势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为什么大喊大叫西欧的发展是对美国“最大的挑战”的原因。

为了继续控制西欧，为了解脱自己的经济困境，美国统治集团正在极力争夺西欧的市场，扩大出口。肯尼迪向国会提出的“扩大贸易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认为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很可能在今后的一代或几代的时期里影响西方的团结、冷战的进程和我国的发展”。可见事关重大，因为这表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将进一步激化。

要扩大出口，美国面对着一个重要事实是西欧的关税壁垒已经建成。要突破这个壁垒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不仅直接关系到美国本身，而且影响到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日本工业品以及农

产品对西欧的出口。肯尼迪企图“通过谈判降低共同市场对外的关税壁垒”，并且要求国会“授予总的权力，以便在互惠谈判中把现有关税降低百分之五十”，以至完全免除“美国和西欧经济集团共占世界贸易百分之八十以上那些类产品的关税”。这就是要冲破西欧的关税保护，开放西欧市场，因而直接威胁到西欧垄断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既然必须有所互惠，美国垄断资本也就会被迫作一定程度的让步，容许西欧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这又会直接威胁到美国一部分工商业的利益，并会减少工人就业的机会，而且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日本。因此，围绕西欧共同市场的斗争，实际是国际垄断资本争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斗争。

这一斗争的发展决定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前景的变化。美国国会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席赫斯曾经做过这样一种估计，他说，只要西欧共同市场的经济还继续发展，还有很大的出口顺差，在谈判中它可能做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如若它的经济陷于停滞，谈判的整个前景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西欧生产高涨的阶段已经过去，有些国家已经陷于停滞，有些国家的生产增长速度已经显著降低，经济危机的阴影正在笼罩着西欧。在这种情况下，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将更加尖锐，美国垄断资本扩大出口贸易的前景也会更加暗淡。

美国出口不能增加，国际收支逆差就会进一步恶化，国际货币和金融战线上的斗争也会随之激化。美国一九六一年国际收支逆差，如果不包括外国偿还的借款，按年率



計算，第一季是十四亿美元，第二季二十三亿美元，第三季二十八亿美元，第四季三十九亿美元，发展趋势是逆差逐季增加。如果包括外国偿还的債款，則全年实际逆差二十五亿美元，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了十五亿美元。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貿易出超稍有增长，另一方面而且更主要的是向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催討了欠債。如若去年沒有討回将近七亿美元的还款，逆差会更为严重。当美国必須靠“催討租稅銀子”来解决国际收支逆差問題的时候，情况显然是并不太妙了。

肯尼迪最近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五三到一九六〇年美国制成品輸出价格比其他工业国家多上漲了百分之十四。这就使美国在出口竞争上处于愈益不利的地位，因而依靠扩大商品輸出来解决国际收支逆差的可能性很小。于是他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跟我們的某些盟国談判，設法增加它們向美国购买的軍事装备和劳务的数额”。肯尼迪在这个报告中是把最现代化的軍事装备輸出做为“解决我們的国际收支逆差办法中的第一道防綫”的第一条办法提出的，情况的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际收支逆差之所以关系重大，是因为它在动搖着美国壟断寡头統治資本主义世界的金融支柱。美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弱点是短期債務負債过多。各国政府和私人在美国存款和购买美国短期证券达一百八十八亿美元，其中各国政府占一百一十亿美元，私人占七十八亿美元。当美元在資本主义世界占統治地位的时期，这是国际金融中心財力雄厚的表现。現在美元的国际地位

根本动搖，負債过多便成为极大的負担，平时可以風平浪靜，一旦国际金融市場上有什么風吹草动，就有可能掀起一場金融風潮，資金大量外逃，黄金大量外流。而資金外逃，还不限于外国資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美国資本，美国資本家們自己对于美元也在失掉信心。

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資本主义世界两种主要貨幣，美元和英鎊相继发生危机。为了防止美元危机再度发生，美国力图通过和利用国际貨幣基金組織，支持它的国际金融地位。它几次提出方案，要有关国家出錢，增加国际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能力。从去年九月国际貨幣基金組織維也納會議，到十二月北大西洋公約国財政部長的巴黎會議，美国代表作了不少让步，提出不少諾言，共同市場国家最后才同意用备用貸款的形式，由十个国家筹措六十亿美元的备用貸款（美国二十亿美元，英国十亿美元，西欧共同市場五国二十四亿五千万美元，日本、加拿大、瑞典五亿五千万美元），另設一个对国际貨幣基金組織进行貸款的机构。由該机构的参加国貸款給国际貨幣基金組織，再轉貸給貨幣发生危机的参加国（实即美国或英国），作为临时解救美元或英鎊危机之用。但是貸款条件十分苛刻，遇有危机发生，是否貸款，貸款多少，須經十国审核，三分之二的参加国同意，而申請国（即美国或英国）无表决权，这实际上等于貸款須經共同市場国家审核批准。同时还規定，貸款到期須用放款国貨幣或黄金还款（按国际貨幣基金組織过去的規定，貸款須用美元或黄金偿还），这就是要美国黄金



出籠。另外还規定放款国遇有需要时,可以随时收回貸款,国际货币基金組織必須立即执行。西欧六国在巴黎財政部长會議上是儼然以債权国的身份向美国提条件,号称金融帝国的美国在會議上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这很可以說明美国今天在国际货币金融方面是处在如何困窘的地位。

美国壟断資本集团为了增强在西欧的競争地位,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越过共同市場的关税壁垒,增加在西欧的直接投資。单就制造业來說,美国在国外的厂房設備投資情况如下(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投資總額	对共同市場投資	对西欧其他国家投資
1959	1,147	214	236
1960	1,337	328	280
1961	1,755	504	398

美国最近几年对西欧的投資是逐年增长,一九六一年对西欧投資占全部对外投資的百分之五十一;其中对共同市場的投資比对西欧其他国家的投資增长更快。但是西欧的壟断資本已經羽毛丰满,美国無論单独投資設厂或与西欧資本合营,在談判条件上都遇到比过去更多的困难。因而从一九六一年在西欧的投資总数來說,九亿美元并不特別可观。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之間,在經濟战綫的各个方面,美国正遇到西欧强烈的競争,这对于美国确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目前这种斗争比較突出地表现在經濟方面,对于美国对外擴張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但是,西欧共同市場并不是一个純經濟組織,它是以西德、法国为軸心的西欧壟断資本組成的一个“超国家組織”。它有一

套常設机构,如六国委员会、六国部长會議、六国議會等等。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六国首腦會議决定,要使共同市場根据羅馬条約进一步实行政治統一,經常召开首腦例会交換意見,协调政策,以促进“欧洲的政治統一”,并且决定各常設委员会在最短期間提出实现統一的条約性质的建議。欧洲是統一不起来的,但是,共同市場的成立和发展,确实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走向分裂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則竭尽全力維持它对西欧的控制。因此,在帝国主义陣营內就展开了一场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当然,美国統治集团和西欧主要資本主义国家还有互相勾結利用的一面,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同西德(以及日本)統治集团正紧密地勾結在一起,共同策划肯尼迪的所謂“本世紀的最大冒險事业”。在这方面,美帝国主义是西德侵略势力和法西斯势力的积极扶持者,西德則仍然是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擴張的主要支柱。

四

美国壟断資本在西欧遇到了日益尖銳的競争,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日益高漲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它們能找到什么出路呢?

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出口国的办法之一是压低原料价格。从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底,資本主义世界原料出口价格平均下降百分之十二点六。按地区來說,拉丁美洲地区下降百分之十七,英镑区下降百分之十。在美国控制下的拉丁美洲下降最为严重。按具体商品來說,与一九五四年比較,咖啡下降百



分之五十七，可可下降百分之五十六，茶叶下降百分之三十七。与一九五一年比较，糖下降百分之五十一，小麦下降百分之十九，棉花下降百分之十五，橡胶下降百分之五十四。与一九五五年比较，铜下降百分之三十六。资本主义世界原料价格的下降，正在严重地影响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原料出口，影响着这些地区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原料出口国家的对外贸易，除少数石油出口国家之外，基本上都是入超，外汇极端困难，因而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十分贫乏。美国过剩的生产力面对着这个日趋缩小的市场，是找不到什么出路的。

美国对原料出口国家的贸易，拉丁美洲占第一位，亚洲第二位，非洲第三位。根据一九六〇年美国进出口统计，情况如下（单位：亿美元）：

	对美出口	对美进口
拉丁美洲	35.29	34.55
（委内瑞拉除外）	25.80	29.05
亚洲（日本除外）	15.72	22.91
非洲	5.35	7.60

在这三个地区，由于原料价格下降，受打击最重的是拉丁美洲。举例来说，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有十一个国家出口咖啡。美国在一九五四年用十四亿八千六百万美元，进口二十二亿六千万磅咖啡，一九六〇年仅用十亿美元就进口了二十九亿磅咖啡。如若按一九五四年价格计算，美国在一九六〇年需要付出二十二亿九千九百万美元，这就是说，咖啡出口国的实际收入减少了十二亿九千五百万美元，即减少百分之五十六。美国进口咖啡

的绝大部分是来自拉丁美洲十一个国家。这十一个国家对美国出口一种商品，在一年之内就遭受到如此巨大的损失！美国从一九五五到一九六〇年，共进口咖啡一百六十八亿磅，按一九五四年价格计算，咖啡出口国共损失五十亿零五千万美元，其中拉丁美洲损失四十六亿美元，仅此一项，就远远超过肯尼迪提出的通过所谓“争取进步联盟”，在今后四年对拉丁美洲提供的三十亿美元“援助”。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材料，到一九六〇年为止共计三百二十七亿美元，对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投资一百九十五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百分之六十，西欧占第三位，亚洲占第四位，非洲占第六位。但是最近几年投资的情况有变化。从一九五七到一九六〇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共增加七十三亿五千万美元，对加拿大和西欧投资增加四十九亿美元，占百分之六十七，拉丁美洲第三位，亚洲第四位，非洲第六位；如果把美国对日本的投资除外，则非洲占第五位，亚洲占第六位。具体情况如下：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单位：亿美元）

	1957年	1960年	1960年比1957年增加
投资总额	253.94	327.44	73.50
加拿大	87.69	111.98	24.29
西欧	41.51	66.45	24.94
拉丁美洲	74.34	83.65	9.31
亚洲	20.19	23.15	2.96
非洲	6.64	9.25	2.61
澳大利亚等	6.98	9.94	2.96
国际组织	10.41	14.18	3.77

美国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投资没有显著增加，并不是由于它没有对这些地区扩大



資本輸出的野心，主要是害怕在這些地區投資不安全。儘管美國政府對於私人對外投資規定了許多保本的措施，儘管美國政府對外簽訂有關條約都有保證投資安全的明文規定，但是美國壟斷資本對於廣大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資（個別國家除外）還是有些裹足不前。在這個時期，給美國壟斷資本打擊最大的是古巴。在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投資中，古巴占第二位，僅次於委內瑞拉。古巴革命政府把美國在古巴的投資全部收歸國有，這筆資產比美國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對拉丁美洲其他十九個國家投資的總額還多。應當指出，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實際也是阻止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堤防，它限制了壟斷資本，特別是美國壟斷資本發生作用的範圍。戰後這些年來，爭取民族獨立鬥爭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應當給以足夠的估計。

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運動高漲的形勢下，肯尼迪政府裝作“同情”這些地區的革命的樣子，妄圖通過所謂“援助”的手段，來防止和撲滅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運動，並為美國壟斷資本擴大商品和資本輸出打開出路。肯尼迪最近提出一個四十九億美元的“對外援助”計劃，其目的據說是“要幫助世界上新興的和發展中的國家在政治獨立、經濟福利和社會正義方面得到發展”。關於美國的所謂“對外援助”，需要指出：（一）“對外援助”，包括軍事和所謂經濟“援助”，有百分之七十七首先用在美國，買美國貨，因此首先得到“援助”的是美國壟斷資本，“受援國”則是推銷美國商品的市場。（二）從一九五〇到一九六一年度在二百五十二億美

元的“軍事援助”中有一百五十八億美元，即百分之六十三，是用于北大西洋公約國家，有七十億美元，即百分之二十七，是用于蔣介石、朴正熙、吳庭艷之類的傀儡和另外一些參加軍事集團的亞洲仆從國家。由此可見，搞反動的侵略軍事集團是它“對外援助”的重點所在。（三）至於所謂“經濟援助”也主要是用于修建港口、碼頭、公路等軍事工程。此外，還有一些“經濟援助”，就像洛克菲勒給艾森豪威爾的信所說的，則是釣魚的“魚餌”。（四）“對外援助”是戰後美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爭奪霸權，奴役各國人民和鎮壓各國革命運動的工具。肯尼迪最近對於這種工具的作用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針對當前日益高漲的民族民主運動，他在“對外援助”的咨文中宣稱：“歷史已經使各國政府不再有和平革命和暴力革命之間的安全界線。現在再也沒有一段悠閑的間隔時間了”。因此，他提出對外“援助”要“把重點放在改進（受援國）國內保安部隊方面”，即放在對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鎮壓上，同時還要求撥款四億美元，來“對付這些急變和緊急事件”。肯尼迪非常擔心拉丁美洲、亞洲、非洲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高漲。他說，“如果這些國家垮台”（即這些國家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美國的“全部軍隊和原子彈合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用處”。他從這裡得到的結論是，為了美帝國主義的“安全”，在“對外援助”方面多花一些錢，同美國“支付的軍事開支比較起來是代價很小的”。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肯尼迪所謂“對外援助”的真實目的。

美國壟斷資本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



广大地区，正陷在日益加深的矛盾之中，而肯尼迪的一切反动措施都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相反地，是在促使这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五

肯尼迪一再强调必须加强美国经济的竞争性。他在经济咨文中说，“如果我们不能使我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性，我们的出口运动就会失败”。对垄断资本来说，要使价格具有竞争性，就必须降低成本，也就必须一方面使生产设备现代化和自动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在目前特别重要的则是“冻结”工资工时、加紧对工人阶级的进攻。

美国垄断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不能不激起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据美国官方统计，去年美国一共发生较大的所谓劳资争议（即工人罢工和资本家停工关厂）三千二百七十次，每月最少一百次，最多四百三十次，共损失工作日一千六百七十六万个。今年钢、铝、煤、建筑、飞机、造船、运输、电话等许多部门的劳资合同将要期满，或者需要重新谈判。任何一次谈判破裂都有引起罢工的

可能。今年一月已经爆发了纽约电气安装工人的罢工，他们经过一场激烈斗争，获得每周工作二十五小时的胜利。

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工人的斗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对他们的严重威胁。因此他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加紧实行露骨的高压政策。他们公开威胁要进一步修改塔夫脱—哈特莱反劳工法，完全剥夺工人的罢工权利。他们强制执行“麦卡伦法”和“史密斯法”，迫害美国共产党，是加紧实行法西斯化的一个严重步骤，是对美国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猖狂进攻。与此同时，肯尼迪还在财政预算中拨款五千七百万美元，扩充联邦政府的监狱，实际是修建集中营。肯尼迪采取这些反动措施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但结果必然会适得其反。

肯尼迪在咨文中大谈所谓美国的“福利”措施。但是拿危机期间工人在工资上所受的损失和他们所领到的失业救济与垄断资本家所榨取的纳税前利润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工资损失极为严重，失业救济甚为有限，垄断资本的利润却极为可观（见下表）。

危机期间工人失业的工资损失、失业救济和公司利润对比

经济危机年份	官方统计的全失业人数 (万人)	平均每人每周工资 (1美元)	全失业工资损失 (亿美元)	失业救济 (亿美元)	公司纳税前利润 (亿美元)
1953	190	70.47	70	9.6	383
1954	360	70.49	132	20.3	341
1957	294	81.59	125	17.7	432
1958	468	82.71	201	35.8	374
1960	393	89.72	183	27.3	450
1961	481	92.45	231	33.9*	461*
合 计			942	144.6	2441

• 估计数字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的六个危机年份中，工人的工资损失高达九百四十二亿美元，而工人所得到的失业救济只有一百四十四亿美元，相差六倍半。在同一时期垄断资本集团所榨取的公司纳税前利润则高达二千四百四十一亿美元。这些损失和利润都是根据官方统计计算的，虽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部真相，但是可以看出，美国工人阶级创造的价值是巨大的，垄断资本榨取的剩余价值是大量的，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不断发生，垄断资本在危机中转嫁给工人阶级的负担是异常严重的。肯尼迪用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来宣传所谓美国的福利措施，其实这不过是美国垄断资本家企图软化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一个大骗局。

肯尼迪在咨文中，还提到一项发放救济粮的所谓福利措施。他说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领救济粮的人数就从三百七十万人增加到六百二十万人（美国报纸报道为七百一十万人），情况的严重可见一斑。

在资本主义世界最富有的美国，每年领取救济金的约三千万人，占美国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见，对于美国广大人民来说，所谓全民福利国家的“福利”，实际是贫民救济。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的时候曾经指出：“工人阶级的求乞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办的贫民救济也就越多”。这真是一语道破。美国官办的社会救济越来越多，并不是由于美国出现了什么“全面持久的繁荣”，而是因为美国垄

断资本主义积累越来越多，产业后备军越来越大，劳动人民贫困化日益严重。

* * *

美国从战后到现在已经发生过五次经济危机（包括大战结束时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危机在内）。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危机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次危机开始，美国就转入一个衰落的过程。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日益加深，阶级矛盾也随之日趋尖锐。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逐步下降，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不断扩大，美帝国主义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之后，各种矛盾是在进一步深化和激化。目前美国和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面临着一次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虽然各国危机成熟的条件各有不同，但形势是越逼越紧。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将引起深刻的变化。

面对着这种危机四伏的局势，肯尼迪最近提出的各项咨文表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正在加紧对美国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进攻，加紧实行法西斯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则加紧扩张，加紧侵略，积极扩军备战。这就是在美国号称自由派的肯尼迪的全部政策的实质。这样的政策不可能使美国垄断资本摆脱困境，也不可能挽救衰落中的美国经济；相反地，他们的日子将越来越不好过，困难将日益严重，今后的形势必将发生不利于他们的更多更大的变化。



鮑威先生的責難和 美国国务院的苦惱

· 張 振 亞 ·

今年三月九日，《紐約時報》发表了一封署名威廉·鮑威的讀者來信。信中这样写道：

“一月六日我給肯尼迪總統写了一封信，試圖使他認識門羅主义對我們……的生存是太重要了。决不能把它的執行權交托到拉丁美洲国家政客手中……如果美洲国家組織不采取必要步驟來清除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共产党政府，我們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就要執行門羅主义。”

这位投信人显然是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复，因为他接着又写道：“一月三十日總統特別助理肯尼斯·奧唐尼爾給了我回信。他說，我的意見‘很正确’……但是，他又說，‘本政府認為本半球抵禦外來侵略的防務必須大家共同承擔’。”

写信者生氣地說：“我想問一問肯尼迪總統，不擁有軍事力量的美洲国家組織又怎能將外國列強驅逐出本半球……難道我們除了派軍隊去干涉古巴以外還能有其他辦法嗎？”

这位威廉·鮑威先生要肯尼迪不必去重視那些無足輕重的南鄰，他認為由美国直接派兵侵入古巴是刻不容緩的事。焦急之情，躍然紙上。這一切都表明，這是一位有着滿腦子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頑固人物。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愚蠢也同樣十分驚人。他竟当真相信肯尼迪已把所謂

“門羅主义”的執行大權交給了拉丁美洲国家，并以為肯尼迪已完全忘記了對古巴采取軍事行動；他似乎并不了解，這不過是肯尼迪在玩弄政治手腕，想借用拉丁美洲国家組織的招牌來掩蓋他準備對古巴發動的軍事侵略，就像美国利用联合國的招牌來掩蓋它对朝鮮和剛果的侵略那样。

事实上，對古巴革命感到芒刺在背的肯尼迪政府，一分鐘也沒有放棄過武装干涉古巴的計劃。这点从美国統治当局的言論和行动中就可以看出。去年四月，美国雇佣軍在古巴的吉隆灘登陸失敗之后，肯尼迪当时就咬牙切齒地表示：“事情還沒有最后結束”。到十月，腊斯克又再次聲明，美国决不能同古巴革命政府“和平共處”，并宣布肯尼迪說過的“在必要時”美国將對古巴采取单独行動的話仍然有效。十二月，腊斯克又在一次電視節目中叫嚷：整個南半球必須非常認真地考慮打倒卡斯特羅政權。今年二月初，美国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組織西半球防務”“免遭来自古巴的威脅”的借口下，更派出大批美国的海軍和空軍不斷對古巴進行挑釁性的“海空監視”。同時，肯尼迪政府在美国的邁阿密、新澤西、路易斯安那等地和危地馬拉、委內瑞拉、多米尼加等国家中，對古巴的反革命分子正在加緊進行作戰訓練。



显然，在如此紧张的准备下，这位鲍威先生还要对肯尼迪政府进行指责，未免太“冤枉”了。不过，比较一下华盛顿当局对古巴的刻毒咒骂和它的实际行动，鲍威之流自然觉得是不够“过瘾”的。几年以来，叫喊古巴是“共产党进入拉丁美洲的跳板”的是美国，宣传它“威胁了美国和西半球安全”的也是美国。可是华盛顿的负责人士直到今天还是一味在焦急拉丁美洲国家来“共同行动”，并没有像鲍威之流所主张的那样贸然派出美国军队，这就难怪要引起鲍威之流的不满，也难怪要被《纽约时报》的记者赖斯顿讥讽为“言论像丘吉尔，行动像张伯伦”了。

富于“新边疆”冒险精神的肯尼迪政府对古巴革命恨入骨髓，但是对于这个只有七百万人口的革命的古巴却无可奈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家李普曼在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向那些主张对古巴采取冒险行动的狂热分子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由美国占领古巴，推翻卡斯特罗、建立一个我们喜欢的古巴政府”的政策，“将会带来巨大和深远的后果。……全世界的轰动将是巨大的。泛美体系将崩溃。不管卡斯特罗本人在古巴会遭到什么，同反美主义相结合的卡斯特罗主义将在本半球泛滥。”

卡斯特罗不是被肯尼迪宣布为十恶不赦的魔王吗？清除魔王应当是“大快人心”，怎样反而会使美国操纵下的“泛美体系瓦解”，并使世界为之震动呢？

显然，美国统治当局对古巴革命的各种造谣和中伤，在这里完全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泥坑。

事情其实是极明白的。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大庄园主制度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同拉丁美洲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保卫古巴革命也就是保卫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拉丁美洲人民之不允许多美帝国主义向古巴伸出它的血手，从这样一件事就能看出，即美帝国主义每采取一项敌视古巴的新行动，就必然要激起更剧烈的反美风暴。去年四月十七日美国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今年一月底美国在埃斯特角会议上孤立古巴的行动，都引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游行示威，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的美国大使馆遭到群众的袭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浪潮更加汹涌而无法阻挡。

革命的古巴这样普遍地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爱戴，甚至连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报刊也不能否认。加拿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环球邮报》早在去年就承认：“任何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只要公开反对卡斯特罗总理，就不仅会在今后的选举中招致自己的失败，而且还会冒……爆发骚乱的风险。”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新闻周刊》不久前也说：“千百万拉丁美洲人现在感到不满”。它还说，在一九六二年，他们中间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注视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希望从他那里找到摆脱绝望的贫困处境的出路。

美国统治集团并不是不想直接出兵对古巴进行军事冒险，但是，七百万英雄的古巴人民同仇敌愾、团结一致的大无畏气概，使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实行一点“自我克制”。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曾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历次破坏和侵略活动，它无疑会使踏上古巴



領土的美国侵略軍陷入受人民包围的草木皆兵、四面楚歌的困境中，最后碰得头破血流。李普曼似乎已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已經在預言，美国如果派兵侵入古巴，就会陷入在古巴的游击战中，“类似英国在馬來亚的战争，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还說，“沒有任何理由认为，干涉古巴只要进行一次短暂的、迅速的和干脆的作战就可以了。不可能是这样，这將是一场持續的糾纏。”

显然，肯尼迪政府所以对派出美国軍隊进攻古巴心存疑惧，就是憐于古巴人民力量的不可侮，同时害怕进一步触发拉丁美洲沸騰的革命形势，害怕进一步触发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地区的革命形势，害怕更加激起世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怒火。因为这些都构成了它在政治上的孤立和軟弱，是它最害怕承认的。但这一切偏偏为那位威廉·鮑威先生所不解。他的愚蠢而坦率的問題恰好触及了肯尼迪政策的痛处，又怎能不受到白宫的冷冰冰的对待呢？

肯尼迪政府因对古巴政策的失敗而在他們自己人中間受到埋怨，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以《紐約时报》的讀者来信栏而論，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例如，二月十七日，一位署名勞倫斯·貝爾斯的讀者，就对肯尼迪政府在美洲国家外长會議上孤立古巴結果反而出丑的愚蠢行动憤怒地說：“人們一定应当問一問，美国代表团不久前在埃斯特角外长會議上所采取的立場是不是一种最好地为我们国家利益服务……的立場”。这位讀者列举了会后的不愉快事实：“（美国）各大使館破裂的窗口，遍及拉丁美洲各国首都街头的騷动，甚至死亡……美洲国家組織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分国家甚至拒不同意一項（对付古巴的）折衷

的解决方案”，然后問道：“难道紙面上的胜利能够同这类激烈的后果相适应嗎？”“难道古巴真的比以往更加大大孤立了嗎？現在拉丁美洲国家对于外来的有害主义的傳播难道真的更有了免疫性嗎？”最后写信者說：“冷靜的反省会表明，我們的国务院仍然缺乏一項有力的古巴政策。”

这位勞倫斯·貝爾斯先生虽然没有明显地要肯尼迪立刻出兵占领古巴，可是他同样认为，美国在埃斯特角會議上发表对古巴的強硬声明和孤立古巴的政策十分不中用。

直接出兵古巴將带来不可預測的巨大灾难，孤立古巴又无济于事。正是这种进退維谷的处境，使肯尼迪政府手足无措。

不过，“可詛咒的古巴革命”为华盛顿带来的苦恼还不限于此。由于要急切寻求一項“有力的古巴政策”，来达到扑灭古巴革命的目的，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决定以资本主义世界盟主的身份，动员整个西方世界来对古巴实行經濟封鎖，这就是国务卿腊斯克今年二月初所宣布的“半球以外的国家应该考虑調整它們对古巴的政策”并“重新檢查它們与古巴的交往”。

但是这一“新政策”也只是招来更多的耻笑。英国《每日電訊报》对这一政策的評論是：“古巴問題在許多方面已成了美国专心对付的一个問題”。“自由世界其他国家应该設法不要牽連在內”。《泰晤士报》則嘲弄地指出，这个号召直接違反了美国自己宣布的門罗主义，因为这个主义原規定不許欧洲干預美洲的事務。一直拒絕执行美国所提出的經濟封鎖的建議的加拿大，更是乘机进行了冷嘲热諷。加拿大《環球郵报》二月二十八日的社論說：“在上月份的埃斯特角會議上，因美



国施加重重压力……来安排把古巴驅逐出美洲国家組織。但是这一行动远沒有吓倒古巴，却暴露了在美洲国家組織中的严重分歧。現在，美国派了国务院政策計劃机构負責人华尔特·罗斯托去巴黎，以說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来支持美国对古巴的政策——特别是与古巴断絕一切貿易。这样，美国似乎断然要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重犯在对待美洲国家組織上的錯誤。而这一次的賭注代价更高了，联盟的成員也不那么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了。”加拿大《环球邮报》的分析并没有錯，因为負責去說服西欧国家对古巴实行禁运的专使华尔特·罗斯托，由于看到風色不对，只在巴黎勾留了一天多，就灰溜溜地轉回了华盛顿。

在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問題上一再躑躅的情况下，《紐約时报》的記者馬克思·弗兰克尔不久前在一篇論及美国对古巴政策的文章中

不得不牢騷滿腹地說，卡斯特罗“已經成功地扮演了大卫的角色来反对北方的歌利亚”。

按照聖經《旧約全书》的《撒母耳記》，歌利亚是一个“身高丈余，头戴銅盔，身穿鎧甲，甲重二百磅，腿上有銅护膝，两肩之中背負銅戟，枪杆粗如織布的机軸，铁枪头重二十五磅”的无敌巨人。而大卫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童。但是这个牧羊童竟用几顆石子就击斃了歌利亚。

看来，無論是这位記者先生，还是那两个《紐約时报》的投信人都不明白，古巴能够抵抗得住強大的美帝国主义的真正原因是：前者的事业是正义的，它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而后者代表历史的黑暗面，因此，为全世界人民所唾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种情况是美国国务院的任何“有力政策”所不能改变的。

肯尼迪与产业后备军

陈 原

幻象乎？现实乎？

去年七月，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一篇妙文，其中說到，美国的失业大軍，纯粹是外国人头脑中的“幻象”，那样的美国其实是“非真实的美国”云云。轉述恐怕失真，下面是这篇妙文中的一段：

“在美国，另外一个討論得很多的题目就是失业。人們常常发表許多数字，这些数字又被外国报刊所引用……；还有一层，讀者

們竟以为‘失业’和‘失业者’或‘无业者’这几个詞儿，跟法文的 chômage（失业）或 chômeur（失业者），……意义完全一样。而且并非所有美国人，更不必說会有多少欧洲人——如果有的話——能够知道，凡是連續两周沒有工作而又自願工作的人，都被当作‘失业者’被編入美国的統計里，尽管这人很年青，先前从不曾工作过，也不論他的性別、年齡、結婚与否等等。”

这段话虽然說得抑揚起伏、轉弯抹角，



还夹杂了一串外国字，但究其实不过想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失业问题在美国只不过是“非真实的”统计问题；问题之所以显得严重，是统计学出了毛病，是语言学出了毛病。于是，腐烂到骨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所永远不能彻底解决的社会矛盾之一的失业问题，就这样轻轻地给几句花言巧语所冲淡，淡得似乎连影子都没有了。

这篇妙文发表后两个月，所谓“世界销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也抱怨起发表那日益增长的失业数字的机关来了，说它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居心不良，“给共产党活动提供良好的饲料”，而其动机不过想为联邦预算增加几文钱，或者想要政府对经济实行新的管制而已。

被抱怨的对象是劳工统计局。这个机关的负责人也出来说话了，那便是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记者与局长的对话录。在这一问一答当中，局长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赶紧说明自己所提供的“饲料”完全是无足轻重的。有对话录中的一段为证：

“问：这样看来，美国的失业问题实际上不如世界传闻那么糟糕吧——

“答：不，并不那么糟糕。我们发表的数字之所以出问题……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全日失业者数字，比方说，百分之七，其实包括很多分量很轻的失业者，……他们对于家计或对于经济都没有什么重要性。有些人是新找工作的，他们从来没有被包括在劳动力里面。有些是间歇性或偶然做做工的工人……还有些是季节性的农业工人。”

局长先生和《外交季刊》于是分别到达了这样的结论，即：失业统计里面算不了失业的数目太多，所以看上去显得很令人不安，

其实是没有什么的。失业大军在美国，不过是人们的“幻象”而已。

于是，劳工统计局便像往昔一样，继续每月发表它的失业数字。例如，不久前发表了二月份全日失业的人数是四百五十四万三千人。不料这个数字却依然引起好些美国报刊的焦虑，它们发表了不少忧心忡忡的评论，因而再一次提醒世人：原来这个国家的失业问题并不是“幻象”，却是如美国报刊所谓的真正存在的“不愉快的事实”；“仍然是个紧急的问题”。

在这当中，《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宾夕法尼亚州生产钢材和无烟煤的城镇里，失业人数自一九六〇年秋天以来不曾有所减少。新英格兰的纺织区、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城镇、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中心、俄亥俄州的钢铁城市和明尼苏达州的铁矿区的情况也是一样。”

这就是被称为“幻象”的**四百五十四万三千**这个数目字的不完全的具体描写。只有“全能的上帝”才有本领在这当中分辨出多少是“失业者”，多少是“无业者”。这个数字既包括了由大约七十万入构成的美国俗语所说的“硬核”（官方的定义是指连续失业在二十六周即半年以上的人），也包括所谓“对家计对经济”都无足轻重的新劳动力——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这批新踏入劳动力市场去寻求维持生活饭碗的人每年都有一百多万，可是社会却对他们紧紧关闭了大门，连美国的劳工部长也不能不表示，这部分新生力量找不到维持生命的道路，实在是“失业中最威胁的一个方面”了。

但是，美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知道官方每月公布的失业数字，并不能真正代



表真实的美国。

首先，这个数目故意漏列了许多因为对工作已经绝望而不再去申请工作的人们。许多领完微薄的救济金（许多州规定只发十几周），因而不再去申报的大批失业者，也没有被统计在内。去年六月号《经济札记》揭露说，“政府调查员询问失业工人他是否在积极找工作。如果那工人说否，那么调查员就将他计算为‘不在劳动力之内’，除非那工人主动声明，因为无工可找所以不找。调查员奉到特别指示，不要询问工人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像这样的实际上失业而又故意被漏列的，据美国有些经济学家估计，约有一百五十万人，他们是在“失业”统计里面找不到的。

其次，那些自愿整日工作而又只能找到几个钟头工可做的半失业者，也并没有被编入官方每月公布的失业统计数字里。这就如半个世纪以前列宁所早已指出过的，“美国的统计表明，在所有的工人中，几乎有一半不是整日工作的”。美国劳工研究会和别的团体，常常把这些被迫半失业的人数折算成全日失业人数，据保守的算法，这个数字有一百二十万，计算得稍宽则有一百五十万。

另外，官方公布的失业统计也没有将那些“名义上有职业但实际上没有作工”的人计算在内。比方说，因气候恶劣而停工的工人，一般是不发工资的，但是统计里不把他們算做失业；有些行业的工人，生病一周以上就不发工资，“停薪留职”了，当然也不算失业。据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这类人也近一百万。至于在外面流浪的大批农业工人，有时找到可怜的临时工做做的，自然更没有计算在失业数字里了。

光是上面举出的三部分在饥饿线上挣扎

而不被列为“失业”统计的，就有四百万人上下。这样，不列入统计的实际失业人数就几乎等于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可见官方数字远不能反映这个国家失业的真实情况。美国的统治集团当然是懂得这内幕的，所以他们的焦虑心情，有时不免在报刊上略为透露一二，那倒是比一些替主人搽脂抹粉的谎话更能反映“真实的美国”。

“充分就业”的秘密

去年这个时候，美国有一个自称为“独立的、非政治性的、非赢利性的”，并且“相信通过有效的私人计划便能够避免实行‘计划经济’（1）的”团体——“全国计划协会”，发表了由六十九个“著名”企业家和“工会领袖”联合署名的关于失业问题的“声明”。这个“声明”作了种种建议，以便肯尼迪上台以后十二个月中将失业数字“迅速地减低到一个可以容忍的水平”。

什么叫做失业的“可以容忍的水平”呢？它不是别的东西，正是美国资产阶级所常常宣传的“充分就业”。例如，上面这个团体建议，在十二个月中将失业率（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的百分比）压到百分之四，这就叫做“可以容忍的水平”了。

大约差不多同时，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其中也说道，“以百分之四的失业率作为合理的目标，可以充分利用资源而保持合理的物价稳定。”

肯尼迪总统于是拍了板：要将失业率稳定在百分之四！

虽则将拥有百分之四的失业人数——如果以全国劳动力为七千万计，那就是二百八十万失业大军——叫做“充分就业”，这是很



可笑的（而且在十多年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推荐的还不过是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但是，一年很快过去了，到今年二月，失业率仍然没有被压到百分之四，而是比百分之四高出很多的百分之五点六。看来，连将失业率压到百分之四也很不容易，所以，今年肯尼迪只好又下决心，要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面达到这个目标了。

为什么资产阶级要定下一个“合理的”失业率，而把它宣布为令人满意的“充分就业”呢？《纽约时报》去年八月发表的一篇伦敦通讯揭穿了秘密：

“最近的记录无疑地表明，英国失业为百分之二点五时，比起百分之一点五以下时，薪金增加得慢些。……因此要让英国货的价钱下降到能在外国市场竞争，要达到这个最重要的目标，那就只有保持若干失业。……”

原来如此！这位记者讲的虽是英国，但美国要保持一定数量的产业后备军，其理由也许比英国还要多一些，比方《经济札记》就指出，美国资产阶级认为，“如果没有庞大的永远失业的大军，劳工的谈判力量就会‘太高’了。”

其实资本主义要保持相当的产业后备军这一点，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已经看透了。他当年写道：

“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

有了这样的产业后备军，资本家就会对罢工的工人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

在美国，这种后备军多到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劳工情况中的黑点”，这黑点太大，威胁到资本家的安宁，所以华尔街大老板们有时也不免为此心焦。但是归根到底，资本家只愿意将这失业大军减低到一个“可以容忍”的水平，而不愿意（当然也不可能）将它彻底“裁”掉。

这就是所谓“充分就业”的秘密。

大炮、火箭和产业后备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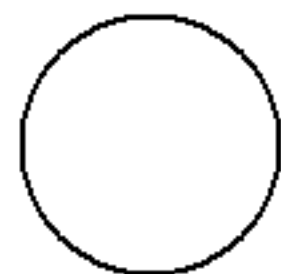
大炮和火箭能够减少产业后备军吗？

美国的好战经济学家回答说，能！哈佛大学的汉森教授——这位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五年前分析了战后时期美国经济状况以后，在一本著作里喜形于色地夸口道：

“军事开支给了我们就业机会，而充分就业给了美国企业以空前的消费品市场和资本财货市场。”

这位教授去年又在另一本新著里大声疾呼地说，“国防（这就是军事开支的代名词——引用者）当然是我们面对着的最高无上的论题。”教授的意思是说，军事开支既然是“最高无上”，别的开支就应该让路，不过不要紧，按照这位教授的“理论”，大炮和火箭是能够“扩大就业”的。

这些年来，美国的军事开支真正是“最高无上”的了，它乘着喷气飞机年年高升。远的不说，肯尼迪上台第一年就将军事开支比上年度提高了六十亿美元，第二年又提高了三十亿美元，而据克利夫兰信托公司的《商情汇刊》说，“战前一九三九年国防开支只不过略高于十亿美元”。也是这家公司指出，当今的美国“所生产的货物和劳务每一百元里面约



莫有十元”拿去用于“国防”了。

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加，那位教授所断定的减少产业后备军的情况并未出现，相反，产业后备军倒亦步亦趋，不断地往上增长着。根据美国官方历年公布的失业统计——人人都知道这些数字是大加压缩了的，从战后到侵朝战争时期（一九四六——一九五三）这八年間，美国平均每年失业人数是二百五十多万人；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到肯尼迪上台之前（一九五四——一九六〇）这七年里，军事开支还是不断地上升，但是，这个期间平均每年失业人数却没有维持在二百五十多万的水平，反而涨到三百五十多万了。

至于肯尼迪政府上台的第一年，如上面所说，军事开支大幅度地往上提，可是“就业”情况却并不那样可喜，失业大军在去年二月份曾高达五百七十多万人，以后虽然稍为降下来，但到年终还保持四百零九万，比之上举的两段时期的平均数，显然是增加了。

今年年初，白宫大约觉得欢度圣诞节时“仅仅”有四百多万失业者，是很值得高兴的了。所以肯尼迪在一月的《国情咨文》中告诉人们，美国经济如今已经走出了“衰退的深谷”，多谢上帝，它居然走上“复苏”的“康庄大道”了。原来这个阶段叫做经济的“复苏”。也许这“复苏”会给就业带来什么“奇迹”吧？不識相的《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却对这美丽的想像泼了一盆冷水。这个报纸最近列举了战后美国的三次“复苏”时期十



遗产税

江帆

——这是杰克的“遗产”

——有遗产，好呀，那就请交遗产税吧！

一个月里面所能增加的就业机会，发现从一九四八年到今天，每一次“复苏”所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比上一次减少。不过，以前三次“复苏”中就业的数目倒还可观：第一次三百四十六万，第二次两百一十七万，第三次几乎到两百万。可是这一回走出“衰退的深谷”，却只有九十五万五千个就业机会等待着多于它几倍的产业后备军……。

这本来就是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大炮和火箭是创造不出牛油来的——由于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所造成的虚假的“繁荣”，并没有也决不能够缓和资本主义本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矛盾。这样，在两百七十多万“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国侵略军后面，紧紧跟着四、五百万饥寒交迫的产业后备军及其妻儿；这就活灵活现地显露出一只纸老虎的形象来。



論考茨基主義

理夫 李思溫 王福如

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必然結果。考茨基主义作为当时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如列宁所指出的：“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腐化解体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整个生活环境的影响下被資产階級偏見和民主偏見所俘虏的小資产者思想的必然产物。”^③

第二国际是在一八八九年建立的。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第二国际則是給工人运动在許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紀末，欧洲工人运动向横广方面迅速发展，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傳播，西欧各国相继建立了工人階級社会主义政党。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資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西方的資产階級革命已經結束，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这个时期的西方工人运动，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工人階級在当时的任务，不是立即实行决战，而是尽可能利用各种合法斗争

恩格斯曾經說过：“誰要是稍微詳細地研究現代社会主义，誰也就應該研究运动中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研究不仅仅保有历史性的趣味，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当社会上产生这种观点的基本条件还存在的时候，这种观点或者它的各种倾向总会一再地表现出来。“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較为稳定的形式和較为明确的輪廓，……那末它为了規定自己的綱領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輩人物那里去”^①。

現在，我們回顾一下早被历史所駁倒并为工人階級所唾棄的考茨基主义，对于了解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的各种反馬克思主义观点，是很有益处的。

卡尔·考茨基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过很大影响的人物，他是第二国际的一个以“中派”形式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是一个曾經做过馬克思主义者的无产阶级叛徒。列宁說：考茨基是这样一种人的最鮮明的典型，“他們用明显的詭辯閹割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們承认馬克思主义的一切，但是把使用革命的斗争手段、宣傳和准备革命斗争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除外”^②。考茨基主义是第二国际矛盾

①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529、530頁。

②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1頁。

③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頁。



的机会，組織和积蓄力量，为未来的革命搏斗作好准备。

在恩格斯指导下，第二国际在它活动的初期，曾經不断地进行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玩弄“左”的革命詞句，拒絕进行組織群众、积蓄革命力量的工作，要求立即实行毫无准备的总罢工，反对利用资产階級議會民主，否认任何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右傾机会主义者則反对革命的階級斗争，宣揚所謂社会和平和階級合作，他們把議會合法斗争看成是无产階級唯一的斗争形式，把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稍許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状况的經濟斗争說成是工人階級的最終目的，他們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恩格斯不懈地斗争，第二国际在一八九六年倫敦大会以前对机会主义的批判，使工人运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經驗。

十九世紀末，資本主义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階級用从殖民地搜刮来的大量超额利潤进一步腐化了工人階級的上层，在工人階級队伍中間造成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的人物过着一种比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他們依靠资产階級的“恩惠”而摆脱了破产的貧困的大众所遭遇的灾难和痛苦，也就丧失了破产的貧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緒。当时的客观条件又把許多小资产階級“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来。这些情况使工人运动內部机会主义思潮滋长起来。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起来攻击馬克思主义，提出一套完

整的修正主义理論。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在工会的上层官僚分子和知識分子中找到了很多拥护者，以致逐步在許多社会民主党內占了上風。

在第二国际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些“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被长期的“和平”环境和合法斗争的某些成績弄得神智不清，他們盲目地崇拜这种合法性。他們不仅沒有給当时的机会主义思潮以有力的批判，而且用妥协、調和的态度，纵容和助长了机会主义的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以考茨基为首的“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只是一些隱蔽的机会主义者。在他們的领导下，第二国际虽然也曾通过了一些革命的宣言和声明，但目的却不是为了付诸行动，而是为了騙取群众的信賴，繼續操纵工人运动。但是，到了階級公开冲突和革命的时机，原先隱蔽的机会主义，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战争更加速了机会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領袖們立即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站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場上。于是，作为无产階級国际組織的第二国际，終于完全破产了。

列宁对第二国际的历史曾經作了这样的估計：第二国际“已經完成了广泛傳播社会主义、預先地初步地極简单地組織社会主义力量这件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①，但工人运动向橫广方面的发展，却又不免使革命的水平暂时降低，机会主义暂时加强；第二国际“給了无产階級許多特別需要的宝贵的艺术，即緩慢地、坚持不懈地、有系統地进行

^① 《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9—80頁。



广泛而又广泛的組織工作的艺术”^①，但同时却使大多数工人政党的領袖因习惯于和平时期而丧失了从事革命斗争的能力。

考茨基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卡尔·考茨基，一八五四年生于布拉格，一八七四年在奥匈帝国維也納参加社会民主党。这时，他并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正像他自己所說的：“在我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期，我极不同情馬克思的理論。我对于馬克思理論曾采取批評的和不信任的态度”^②。一八八一年考茨基在倫敦結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直接影响下，开始信仰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从一八八三年起，考茨基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論杂志《新时代》的編輯。他写过大量宣傳和解釋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傳播起过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当恩格斯在世的时候，考茨基同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受恩格斯的委托，在恩格斯逝世后，編輯出版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四卷手稿，即《剩余价值学說史》。所有这一切，使考茨基博得了“正統”馬克思主义者的声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公认的有威望的理論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工人运动中处于先鋒队的地位，考茨基也就成了第二国际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論代表。

考茨基从来不曾真正理解革命的、战斗的馬克思主义。他是一个学究式的知識分子，滿身沾染着德国小市民的庸俗习气。馬克思曾說他是一个“平凡而无远見的人”、“是个天生的俗种”。恩格斯也說他“是一个純粹的学究和經院哲学家，他不但不能把复杂的問題

弄清，反而把简单的問題弄复杂了。”^③在参加工人运动以后，考茨基始終沒有拋棄资产階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即使在他还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在他那些直接反对机会主义、基本上是革命的著作中，也包含有許多对馬克思主义片面的不确切的解釋和对于馬克思主义中某些重要原理的閹割和背棄。

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期間，各国社会民主党內的革命派为反对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考茨基在許多原則性問題上，例如在反对拉薩尔主义的問題上，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問題上，在对待法国米勒兰主义的問題上，不止一次地表现了动摇态度和失节的行为。对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考茨基虽然也表示反对过，但又作了机会主义的让步，甚至还为伯恩斯坦辯护。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甚至說：“伯恩斯坦沒有使我們喪失信心，而是使得我們思考。为这一点我們應該感謝他。”^④到一九〇三年他还說：党內有沒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对他來說是不清楚的。他并公开地招认：“我起来反对伯恩斯坦是极勉强的，而且向来只是被迫的”^⑤。

一九〇〇年，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

- ① 《无产階級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頁。
- ② 考茨基：《土地問題》序言，三联书店1955年第1版，第9頁。
- ③ 轉引自叶·斯捷潘諾娃：《恩格斯傳》，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1頁。
- ④ 轉引自普列哈諾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頁。
- ⑤ 轉引自亚金：《二十世紀初期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漲》，莫斯科1954年俄文版，第102頁。



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中派”，考茨基成了这个派别的主要领袖。“中派”以所谓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际上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总是倒向机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对于“中派”曾作了如下的描述：“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从各方面‘逼迫’政府，赞成坚决‘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①。但是，他们“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中派’是被腐败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僚。”^②这样的“中派”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表现得更为狡猾和隐蔽的机会主义而已。考茨基后来成为叛徒，成为彻底叛变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完全不是偶然的。

二

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空前尖锐化的地步。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命运，如何对待帝国主义，这是区别当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的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呢，还是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缓和这些矛盾呢，——这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③。考茨基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全面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写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同盟》等小册子。在这些文章和小册子中，他以“理论家”的姿态，杜撰了一整套所谓“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专事掩盖帝国主义的重重矛盾。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所要了解的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词今天随时随地都在应用，可是人们越多地使用它，谈论它，它的含意也就越不确切，这当然也就使人对它很难进行任何了解。今天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诸如卡特尔、保护关税、财政统治乃至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国主义的名下了。按照这样的意义来理解，帝国主义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④。考茨基这段话实际上是说，卡特尔、财政资本虽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现象，但不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他把卡特尔、财政资本的垄断制和帝国主义分开，企图证明卡特尔、财政资本不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阶段。考茨基由此出发而否认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否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

①②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54页。

③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④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新时代》周刊（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下同）。



义经济形态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那么,他心目中的帝国主义究竟是什么?他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一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征服和吞并农业地区,而不管那里住的是什么民族。”^①他还说,帝国主义是“把农业地区归并于工业国家,作为它们的直接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各种“政策”中的一种“政策”^②,是资本主义工业民族实现“扩展的要求的一种特殊的形式”^③和“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手段”^④,等等。考茨基所提出的定义是完全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是工业资本而是财政资本,帝国主义的特点不只是兼并农业地区,而是瓜分世界任何一块土地,包括兼并工业发达的国家。在这个定义中,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看作仅仅是一种政策,而且把这种政策看作是一种孤立的东西,把它们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这就背弃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虽然,考茨基口头上也表示反对帝国主义,但他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兼并政策),而不反对产生这种政策的帝国主义经济制度。“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分开,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分开,来为他的那种所谓‘废除武装’、‘超帝国主义’等等鄙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扫清道路”^⑤。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是他“全面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那一整套思想体系的基础”^⑥。

考茨基既然把帝国主义政策和它的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于是他就进而认为这种政策

并不是“绝对必需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可以改变的。他说:“我也不把帝国主义看作是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我认为通过财政资本的另一政策它就可能改变。”^⑦财政资本的另一政策是什么呢?他认为“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⑧。所谓“超帝国主义”(也可称为国际帝国主义),就是各国财政集团达成协议,建立一个超出一国范围的世界财政资本垄断联合。考茨基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各国财政资本间的相互斗争为联合起来的国际财政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所代替。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是完全可以设想的”^⑨;“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造成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纪元”^⑩。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削弱它们自身的力量,因此,“任何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呼喊: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⑪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末好战成性的帝国主义就可以变为“和平”的“超帝国主义”了。

考茨基从“超帝国主义”论出发,劝说帝国主义对“最重要的农业地区最好不用帝国

①③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新时代》周刊。

②④ 考茨基:《帝国主义战争》,1917年2月16日《新时代》周刊。

⑤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页。

⑥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2页。

⑦⑧⑨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学的书》,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周刊。

⑩⑪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新时代》周刊。



主义的暴力办法,而用和平民主的办法”^①来达到扩张资本的目的。所谓“和平民主的办法”,就是“和农业地区之间建立极频繁的交往、友善的关系,这种关系便于向农业地区输出商品和资本,同样便于从这些地区获取原料。这方面的最好途径是订立尽可能接近自由贸易的贸易协定”^②。他甚至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建立和保障世界和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他还把帝国主义描绘成为似乎能够帮助落后国家“提高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取得“独立和繁荣”。实际上考茨基是为殖民主义者献策,要他们采取更富有欺骗性的手段,借以缓和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避免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为了实现“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阶段,考茨基还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国家“裁减军备”上面。他说:“如果事情弄到各民族间达成协议、裁减军备和实现持久和平的地步,那末战前曾使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日益衰落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③他肯定地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裁减军备的趋势”,可以期望当时就有“可能”出现裁减军备和实现持久和平的新“纪元”。因为据说由于“战争的教训”,在“战争结束之后,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就没有经济上的必要性了,从资本家阶级本身来看也是这样”^④。这就是说,考茨基相信,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条件下,军备竞赛的阶级基础已经没有了。

列宁斥责考茨基的这种所谓“超帝国主义”的说教,认为这只是“转移群众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将来所谓新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的

前途,用这种极为反动的办法来安慰群众,使他们抱着在资本主义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⑤。列宁又说:“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牧师。牧师劝导资本家采用和平民主的办法,并且说这是辩证法:假如起先有过自由贸易,后来又有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那末为什么就不能有‘超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有自由贸易呢?牧师在安慰被压迫的群众,把这个‘超帝国主义’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虽然这位牧师甚至还不敢说这个东西能否‘实现’!”“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听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棄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茨基对战争性质的分析和对战争的态度,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超帝国主义”论的机会主义实质。在战争期间,考茨基这个牧师变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辩护士,变成了革命的反对者。

在战争的性质和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考茨基打着“公正”的旗号,表示既反对左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是纯粹帝国主义性

①②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同盟》,1915年德文版。

③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学的书》,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周刊。

④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新时代》周刊。

⑤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7页。

⑥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7、208页。



质的，也反对右派把这次战争說成是“純粹”民族性的；表示既不贊成左派无条件地反对这种战争的立場，也不贊成右派无条件地支持这种战争的立場。考茨基使用一貫詭辯的手法，企图证明这次大战既是帝国主义战争，又是民族战争。他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进步的民族战争混淆起来，說这次战争同十九世紀反对異族压迫的民族战争有相似之处。既然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支持过民族战争，第二国际各国党也就應該“有条件”地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所进行的这种战争。在德国議會表决用于战争的軍事撥款时，考茨基不是投票反对，而是棄权。考茨基力图用这种“中派”的幌子，来隱蔽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場。他說，“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同等的义务来保卫祖国；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当因此而責备另一个民族”①。

既然要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当然也就要放棄階級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战争时期，考茨基一再提倡“国内和平”、“階級合作”，宣揚在战时法令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任何革命行动都不合时宜。考茨基坚决反对左派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唯一正确的革命口号，而且捏造一些显然愚蠢的思想硬加到左派的头上。他硬說左派好像是这样提出問題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就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造成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否則就是“沒有气节和叛卖”。于是他断言：“这看来似乎是很激进的，但其結果只能把那些不相信立刻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推到帝国主义陣营中去。”② 他把事情說成这样：仿佛机会

主义者并没有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他們无非只是“不相信”立刻能实现社会主义罢了。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这种伎俩，說这不过是那些警察式的文人用来对付革命者的办法。考茨基在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性质的騙局下，以社会沙文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个时候，考茨基不仅把革命問題置之度外（这就已經是背叛社会主义了），不仅在实际上拒絕任何系統的、頑强的革命工作，而且还居然声明說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为；他不是利用资产阶级在战争时期的困难进行革命，而是帮助本国政府渡过难关。

列宁根据第二国际的教訓，得出一个異常清楚和簡洁的結論，这就是：“国际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国际机会主义則是拥护帝国主义的。”③

三

国家政权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必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在国家問題上，在无产阶级专政問題上，考茨基“是一貫傾向于机会主义的”④。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須打碎资产阶级官僚軍事机器、必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最根本的問題，他一貫采取“迴避、保持緘默、躲躲閃閃”的态度。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考茨基

① 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周刊。

②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同盟》，1915年德文版。

③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0頁。

④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4頁。



在这些問題上的机会主义傾向已經开始显露出来。一八九一年，考茨基为即将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綱領草案，就迴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指出的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国家机器的問題，避而不談无产階級专政。稍后，考茨基被迫起来反对伯恩斯坦，一八九九年他写了《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一书，但也只是着重从經濟方面批判修正主义，对于伯恩斯坦卑鄙地歪曲馬克思关于“打碎資產階級官僚軍事机器”这一思想的恶劣行为*却不置一詞，从而抹杀了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在这一根本問題上的分歧。他說：“关于无产階級专政問題，我們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① 列宁指出：“这不是反对伯恩斯坦，同他进行論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陣地让給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階級革命任务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② 一九〇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虽然批判了机会主义，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些迫切問題，并且正确地指出：世界大战已經迫近，而战争預示着革命危机，社会民主党应当准备在即将来临的搏斗中“沿着夺取政权的道路胜利挺进”，但是他仍閉口不談无产階級革命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既沒有提到‘打碎’軍事官僚国家机器的問題，——也沒有提到同迷信国家的思想作斗争的問題，更沒有提到用巴黎公社形式的无产階級机关来代替議會机关和官僚的問題”^③。因此，即使在考茨基这些主要是反对机会主义的著作中，他在无产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不仅沒有达到馬克思

主义的高度，而且始終散发着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气息。

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同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潘涅庫克論战时，公然把馬克思的打碎資產階級官僚軍事机器的思想称为无政府主义。他說：“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間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④ 在考茨基看来，誰主張破坏、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誰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考茨基虽然也表示，工人階級要夺取国家政权，但在他看来，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徑是通过爭取选票，通过“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⑤。他說：“我們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議會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議會变成駕于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坏国家政权。”^⑥ 这也就是他后来所說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道路”^⑦。他說：“世界革命不是通过专政的道路，不是依靠大炮和机关枪，不是依靠消灭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的敌人来实现

* 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硬将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經驗所得出的“工人階級不能简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著名論断，曲解为似乎馬克思警告工人階級不要采取过激的手段夺取政权。

① 轉引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5頁。

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5頁。

③ 列宁：《馬克思主义論国家》，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8年俄文版，第135頁。

④⑤⑥ 考茨基：《新策略》，1912年8月9日和8月16日《新时代》周刊。

⑦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卷，1927年德文版。



的，而是依靠民主和人道来实现的。”^①他认为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近便、最可靠、付出代价最少的道路”^②。

考茨基这种“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他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和极端迷信资产阶级民主的必然结果。考茨基一般地虽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一般原理只能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普选权、议会制等等民主制度，这些民主制度能够“保护少数，即保护国家的反对派”^③，能够“使国家的全體成年成员、自治体的全體成年成员具有完全的平等权利”^④，因而这时的国家“按其性质来说将不是像过去的国家一样成为少数人的机关，而将成为居民中的多数人的机关，也就是劳动阶级的机关”^⑤；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开始从镇压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为解放他们的工具”^⑥。这就是说，据考茨基看来，似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不是由少数垄断资本家，不是依靠资本财富的力量决定的，而是由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决定的，似乎资产阶级民主也能够保护无产阶级和被剥削人民。这样，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民主就成了全民的、“纯粹的”、完美无缺的民主了。因此，考茨基认为，这种“具有普遍平等选举权的民主是使阶级斗争从拳头斗争变为头脑斗争的手段”^⑦，“无产阶级革命在民主已经生根的地方将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反，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来进行，而不是使用肉体暴力的手段来进行”^⑧。

由于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这一贯机会主

义倾向，终于使他在革命风暴的前夕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而当俄国无产阶级起来打碎资产阶级反动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就更进一步站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震撼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为资产阶级民主敲起了丧钟，第一次使无产阶级专政由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也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新的焦点。正如列宁所说：“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最主要的是斥责专政和维护民主。”^⑨考茨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侈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他不分析在阶级社会里民主的阶级性，不区别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他把十月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敲起了丧钟这件事，当作是世界文明的末日，当作是民主的末日。他积极投入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合

①⑦ 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德文版。

②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1946年英文版。

③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7页。

④⑤⑥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卷，1927年德文版。

⑧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参看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页。

⑨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5页。



唱，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以保护“一般民主”为名，肆意歪曲和丑化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

无产阶级专政是馬克思总结历次革命經驗得出的“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①，考茨基却把它說成是馬克思偶然提到的一个“詞儿”。他并說，馬克思“在这里（《哥达綱領批判》——引者）所說的不是政体*，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地方必然出現的一种状态”^②。考茨基还歪曲巴黎公社的历史經驗，把苏維埃与“公社”的原則对立起来。他不仅避而不談“公社”用革命暴力粉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避而不談“公社”与凡尔賽以及内部反革命分子所作的斗争，反而把“公社”的缺点和錯誤頌揚为原則，甚至歪曲事实，說馬克思也贊揚了“公社”的“純粹民主制”（既不要专政，也不要集中制）。考茨基然后得出結論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状态，是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由純粹的民主所必然发生的状态。”^③考茨基这些话表明，虽然他口头上談論无产阶级专政，但只是抽象地承认无产阶级的統治状态，而不承认无产阶级独立掌握国家政权，并对资产阶级实行强力統治。考茨基所以要把“专政”解釋为“統治状态”，是企图把統治状态与政权分开，“因为这样就能使革命暴力化为烏有，使暴力革命化为烏有”，从而最終“使革命化为烏有”^④。

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一样，閉口不談无产阶级专政使广大劳动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主，而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他說：“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消灭民主。自然，单就本义来讲，这个

詞又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个人独裁。”^⑤考茨基还把苏維埃政权根据俄国当时情况剥夺反动资产阶级的选举权作为論据，来证明专政已經消灭了民主。他只是一般地談論专政和民主，而不看建立的是哪个阶级的专政，消灭的是哪个阶级的民主。考茨基主張把资产阶级那一套“純粹民主”搬到社会主义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或多党派），同反动资产阶级讲民主、讲平等，至少也应该把他们作为“少数派”、“反对派”保护起来，不这样，专政就是“消灭民主”。

考茨基把布尔什維克党解散资产阶级立宪會議、将苏維埃变成国家机关列为“专政消灭民主”的一大罪状。据他看来，立宪會議乃是一个“全民的”机关，是“純粹民主”的化身，而苏維埃只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战斗組織”。他說：“苏維埃組織已經有了一段偉大的光荣的历史”，“它将在資本与劳动之間巨大而有决定性的斗争中获得突出的意义”^⑥，但它不应该变成“国家組織”。他并且隱瞞了列宁早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提出的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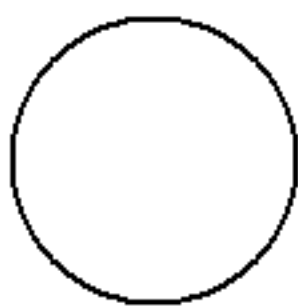
* 无产阶级专政是国体而不是政体。考茨基这里实际上是說，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国体。列宁曾就这一点对考茨基作过批判。（參看《列宁全集》第25卷，第223頁）

① 《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3頁。

②③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參看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25頁。

④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9頁。

⑤⑥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參看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39、41頁。



維埃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这一著名論断的事实，反而聳人听闻地捏造說，列宁只是当布尔什維克党“在立宪會議中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上述結論，这未免是个遺憾”^①。考茨基所以把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其目的在于否认资产阶级民主是对劳动人民实行的专政，同时抹煞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的真正广泛的民主。

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誣蔑为俄国落后的特殊产物。他說，由于俄国落后，“他們就越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替代他們所缺乏的条件”^②。他攻击这种专政是“借助于一个中央集权組織的优势和軍事力量的优势来統治无組織的人民大众”^③，說什么这种专政必然遭到“人民”的反抗而引起“內战”与“恐怖主义”。他說，布尔什維克党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不得不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考茨基一再攻击列宁，說列宁是一个“独裁者”、“多疑善妒的神”，并且把列宁与党内外机会主义的斗争說成是列宁排除異己。他說：“列宁强求整个工人阶级温順地服从他的领导，如果党内有人对其他领导者表示較多的信任，列宁就把他当成最坏的敌人，用尽一切办法同他作斗争。”^④考茨基这样恶毒地攻击列宁，是为了达到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制度，丑化馬克思主义的卑鄙目的。

考茨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攻击和曲解，表明他完全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的市儈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专政的。考茨基所追求的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議會制共和国罢了。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一书

中，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实现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⑤。考茨基很像馬克思在一八七七年时所說的“要以新的神話及其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女神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那种人^⑥。正如列宁早已一針見血地指出的，考茨基的要求“一点沒有超出资产阶级議會制共和国的范围”^⑦。他攻击俄国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专政，无非是为了拯救资产阶级专政。

四

考茨基对于俄国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布尔什維克党在社会經济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的攻击，表明他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一点区别也没有了。但是，作为“理論家”，考茨基的所有这些攻击，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經济分析”等幌子下进行的。考茨基重复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生产力論”。按照这个“理論”，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自然結果，革命阶级不需要有組織、有领导地进行自觉的革命，新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考茨基在沒有背叛革命以前，曾經正确地談到过革命的客观經济条件和主观能动作

①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參看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9頁。

②③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6、29頁。

④⑤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1946年英文版。

⑥ 《馬克思致左尔格》。《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頁。

⑦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6頁。



用的关系。那时他说：“再没有比下面这样一种意见更错误的了：认识经济必然性就等于削弱意志”，“经济必然性并不等于听天由命”^①。可是在考茨基背叛革命以后，他却成了这种反动的“生产力论”的最热烈的宣扬者。

考茨基否认，由于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即在个别国家）首先获得胜利。他在帝国主义时代坚持认为，只有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说：“除非无产阶级已经变成人口中最大的阶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已不再比无产阶级的数目多的地步，无产阶级是不能解放它自己的。”^②考茨基还特别强调，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就不应当过早地实行革命。考茨基不是教育无产阶级积极地去进行革命斗争，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而是要无产阶级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的自行崩溃。不仅如此，他甚至用所谓“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来限制和束缚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他说：“我们应当抱的这种期望，即无产阶级会壮大到，生产力会发展到足以供应人民群众丰富的资料的地步，并且生产力在这时所采取的形式会使利用这些形式的社会机关简化；最后，劳动阶级中必要的经济知识和能保证有效利用生产力的这种良知发展了，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③

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资本主义危机和衰退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繁荣的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资本主义已经“比半

世纪以前具有更大的生命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要被“社会主义的调整”所代替这样一种看法，今天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相反，他企图证明，资本主义愈繁荣，资本家的财富愈多，社会主义的条件就愈成熟。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越繁荣和发展，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就越美好”^④，“社会主义（这就是在近代文明的范围内人人享受幸福）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借助于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和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财富，才能达到。”^⑤那末在这以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什么呢？考茨基认为，任务不是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也就是说提高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的能力”。据考茨基看来，这样虽然是“延长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寿命”，但却是“通向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形式的起点”^⑥。

根据这种反动的“生产力论”，考茨基断言，俄国由于经济落后，小农占人口的多数，根本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由于战争的破坏，生产水平急剧下降，俄国更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他说，俄国十月革命并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他公然进行这样的诬蔑：“布尔什维克相信意志与力量万能，他们不考虑俄国的落后状态，要把俄国革命按

①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0、49页。

②⑤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51页。

③④ 考茨基：《唯物史观》，1927年德文版。

⑥ 考茨基：《五一节和反军国主义斗争》，1912年4月26日《新时代》周刊。



着社会主义路綫进行。”^① 由于經濟条件和文化条件都还不成熟，布尔什維克党就不得不依靠强力，“企图通过冒失的跳跃来清除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所出現的障碍物”^②。这就是考茨基所謂的“經濟分析”！正如列宁所說：“这不是‘經濟分析’，这是一场糊塗。这不是馬克思主义，这是片断的自由主义学說，这是鼓吹向資产階級和富农献媚。”^③

布尔什維克党为克服俄国經濟落后的状态所做的巨大努力，为改造国民經济所采取的革命措施，被考茨基一概誣蔑为魏特林、布朗基式的“空想共产主义”。他认为，俄国无产階級还没有能力直接管理生产，不可能把政治的民主轉变为經濟的民主。考茨基責备布尔什維克党实行工业国有化，說什么这是“光靠一紙命令和赤卫队”来实行的“韃靼式社会主义”^④。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維克党“走向社会主义”，同时他又拿自由主义的改良来冒充社会主义。他主張把铁路、航运、鋼铁、机器制造等壟断企业收归国有，然后由国家把一部分工厂出售給生产者，讓他們用生产合作社的方式經營。考茨基說：“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联的、合作社的、个人經營的”。“有些企业可以交給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則可以按合作原則組織起来。”^⑤ 这就是考茨基的“社会化綱領”。很显然，这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不触动資本主义經濟基础的改良主义。

考茨基认为，在农村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須等待农业具备了下述两个条件才有可能：第一是“拥有技术設備，运用科学，拥有最完整的机器設備，使用最新式的方法”^⑥的大农业經濟；第二是“工資劳动在农村的

发展”^⑦，即农业无产者占据优势。从这种观点出发，考茨基竭力攻击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說这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农业。同帝国主义者一样，考茨基誣蔑集体化运动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发动起来的，集体农庄是“靠强迫劳动維持”的，“是向旧的农奴制和庄园的倒退”^⑧。他硬說，由于农业經濟落后，俄国农民过分牢固地依恋他的私有财产。他說：“我仍旧主張，农民私有和单独經營自己的房子、农場和花园，同时与其他村民一同耕种田地，这样将是最有利的。”^⑨ 因此在他看来，最好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块租給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許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⑩。考茨基的这种主張就是要俄国长期保留小农經濟。他居然认为，这样反而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列宁說：“其实这是小資产階級的口号，其中絲毫也沒有‘社会主义成分’……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良。”^⑪

考茨基不仅肆意地嘲諷俄国的經濟落后，人民文化水准低下，說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根本没有資格实行和建設社会主义；而且，苏联人民为改变落后面貌所作的一切努力，也

①④⑥⑦ 考茨基：《无产階級专政》，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3、70、64、66頁。

② 考茨基：《工人革命》，1925年英文版。

③ 《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頁。

⑤ 考茨基：《社会革命》。轉引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頁。

⑧⑨ 考茨基：《布尔什維主义的死路》，1931年英文版。

⑩ 考茨基：《无产階級专政》，參看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1頁。

⑪ 《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7頁。



遭到他的百般非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考茨基看来是完全行不通的。他用讽刺的口吻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像“是天主教所说的，通到天堂的永恒幸福的炼狱”^①。他抓住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执行中的某些缺点，断言五年计划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他说：“五年计划的实质是什么呢？不过是打乱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②考茨基和苏联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一样，特别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甚至诬蔑说，五年计划是想用“烈性的饥饿疗法，把一个国家由灾难直接引导到丰足”^③。

在考茨基晚年的著作中，对“生产力论”的宣扬愈来愈多，其内容也愈来愈反动。他公然赞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工人福利的“增长”，提出“应当不带成见地”重新考察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越繁荣，资本家的收入越多，国家就越能以捐税形式“最迅速地获得它为了实现有利于群众的巨大革新所必需的资金”^④，来改进工人福利事业。而“工人在资本主义之下得到的福利越增长，他们就越安于并容忍资本主义制度，就越放棄一切不可靠的冒险企图”，从而“使社会主义越成为多余的东西”^⑤。他竟然无耻地说，社会民主党“必须公开承认这一点并且放棄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而这并不背叛劳动解放的事业”^⑥。

考茨基的这些议论，全部贯穿着庸人和叛徒的精神。他以庸人的态度把世界历史描绘成一种机械的图式，同时又用叛徒的精神把这一切做为反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据。列宁在批驳这种庸俗和反动的理论时曾经写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

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⑦考茨基虽然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却一点也不懂。当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在欧洲造成了革命形势的时候，他却重复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教科书”，极力反对俄国工人阶级发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就证明他已经完全滚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

* * *

列宁在揭露考茨基主义的时候曾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⑧只要存在着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机会主义就仍然会出现。列宁在亲手埋葬考茨基主义的时候，也曾预言：“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⑨。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完全证明了列宁预言的正确性。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是老修正主义的继续。温故而知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虽然早已破产，而我们仍不能简单地把它忘掉的原因。

①②③ 《布尔什维主义的死路》，1931年英文版。

④⑤⑥ 《唯物史观》第2卷，1927年德文版。

⑦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5页。

⑧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4页。

⑨ 《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5页。



充分地发挥技术人员的力量

· 石克俭 ·

充分地发挥技术人员的力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个崭新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要使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新的生产关系所提供的可能性，组织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同心协力，进行长期的、艰巨的努力。这样，才能根本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占领和开辟新的科学技术领域，迅速发展生产力，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熟练的技术队伍，需要把广大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地发挥出来。

对于技术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我们党从来都是很重视的。十多年来，我们贯彻执行了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在组织和培养技术人员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新中国的技术队伍已经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了。拿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技术人员来说，一九六一年底已经比一九五七

年底增加了一倍多。

在现在的技术队伍中，有一部分技术人员是在旧社会培养出来的。这部分人占整个技术队伍的百分之十左右。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受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教育，而且在解放前他们做的工作多半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但是，他们和掌握着剥削手段、不劳而食的地主、资本家是不同的。我国的技术人员生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长期地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压迫，政治上是不自由的，经济上一般的是困难的，他们的才能也往往得不到施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解放前就具有爱国的思想，希望中国强盛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抱同情的态度，或者持中立的态度。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党对技术人员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又经过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各项政治运动的锻炼，绝大多数原有的技术人员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政治思想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有些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人能够深入生产实际，同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相结合，



在技术业务能力上普遍有所提高。这部分技术人员在现有的技术队伍中虽然占少数，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技术业务水平比较高，经验比较丰富，在解决技术问题和培养新的技术干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大学和中等专科学校培养了许多新的技术人员；在这个期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有许多技术工人也提拔成为技术人员。这些新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约占整个技术队伍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在新的技术人员中有许多人出身于劳动阶级，有的本人原来就是工人、农民或其他劳动者，不少人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青团员。这部分技术人员中的绝大多数人，政治觉悟比较高，肯于刻苦钻研，进步也比较快，在许多单位里，他们担负了重要的技术工作。这部分人虽然一般说来技术水平还不够高，经验还不够多，并且有其他的一些弱点，但是他们是我国工人阶级技术队伍中的新生力量。

上述两部分技术人员，尽管出身、经历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劳动者，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从整体来看，他们都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十多年来，我国的技术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技术人员的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不过，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比较起来，技术人员的数量还是不足的，技术水平一般说来还是不高的。有关部门需要正确地执行党的调动技术人员积极性、扩大技术人员

的队伍、提高技术人员水平的政策；技术人员也应当努力钻研技术，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逐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技术人员的全面要求是又红又专。红，首先是要有革命的政治立场，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专，就是要通晓和掌握专门的业务知识。红和专的关系，是政治和专业的关系。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技术相结合，而不是二者相分离。我们应当积极鼓励和帮助技术人员学习政治，关心政治。但是，不能，也不应当要求技术人员都成为政治家。技术人员自觉地掌握和精通专门技术，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他们对于祖国应当担负的义务，也就是他们的政治任务。技术人员对此应当引以为光荣，别人对此也应当采取欢迎和鼓励的态度。我国目前不是专家太多，而是专家太少。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要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材。技术工作中的政治领导，就是要根据明确的政治方向，保证搞好专业，培养出精通业务的专家，使专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对于从旧社会来的技术人员在政治上的进步，我们应当有足够的估计，要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说过：“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



地發揮他們的才能。”^① 技術人員只要肯下苦功夫，不畏艱辛，專心致志，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貢獻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應當受到大家的尊重。

正確地安排和使用技術人員，使他們學用一致，發揮自己的專長，是充分發揮技術人員的力量的重要條件。在我們國家，對於技術人員工作的安排，絕大多數是學用一致的，這樣的條件在舊中國是沒有的，就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人材的培養和使用也是有計劃的，我們有可能根據技術人員的專長，分配他們的工作，使他們學用一致，避免人材使用上的浪費。不過，由於工作上的缺點，在少數單位對技術人員也有用非所學，或者讓技術人員擔負非技術性的工作的情形。有些技術人員的工作崗位不必要的變動太多，也影響他們業務能力的提高。無疑的，對於這些不合理的現象，應當注意糾正。人材的浪費是一種最大的浪費。我國目前專門人材不多，應當把他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對使用不當的技術人員，加以調整是完全必要的。這就是說，目前擔任非技術工作的技術人員，應當盡量讓他們回到技術工作的崗位上去；擔任的技術工作和專長不一致的，應當重新安排，充分發揮他們的專長。有的改行以後已經學到新本領的人，如果在現有崗位上能夠更好地發揮才能，當然不需要調整；至於適當的抽調某些技術人員從事新發展的专业，則是十分必要的，在這些新崗位

上的技術人員，應當努力鑽研，掌握新的技術專業。技術人員的工作崗位穩定下來，是有利於他們積累經驗和提高技術水平的。

凡是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技術人員，在我們的國家里，都應當一視同仁、量材使用，使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有責。全民所有制的工業企業是以現代技術為基礎的大生產，要求科學地、細致地組織和指揮生產。因此，在企業和其他一些技術部門，技術方面的領導職務，一般地要由技術人員擔任，在技術問題上，主要地由技術人員作決定。例如在企業里，總工程師是技術上的權威。他在廠長（經理）或者主管生產的副廠長（副經理）的領導下，對企業的技術工作負全部的責任。各級有關技術管理的專職機構，在技術工作上必須服從總工程師的指揮。經驗證明，只有這樣，才能管理好社會主義企業，促進生產的發展。

為了充分發揮技術人員的力量，各單位的行政領導人員，應該發揚民主，善於傾聽技術人員的意見，遇事和技術人員進行同志式的討論。在技術問題上，任何人都不能採取武斷的態度，當然，也絕不應當把技術上的不同見解，看作是政治思想問題。在科學技術問題上發生了不同的意見，應該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展開自由的切實的討論，使各種不同意見有充分發表的機會，經過討論找出最好的辦法。同時，技術人員

^①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2頁。



也應該本着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精神，敢于堅持真理，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

有關部門應該從各方面為技術人員鑽研業務創造方便條件。如合理地安排他們的工作和學習時間，使他們能夠用大部分時間和集中主要精力從事技術工作；根據可能，供給他們必要的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給他們提供參加學術活動的便利；必要時為某些高級技術人員配備助手，以減少他們從事輔助性技術工作的時間，使他們能夠集中力量去做主要工作，等等。對於一般的技術人員，也要使他們有深造的機會。對於從工人中提拔的技術人員，尤其要注意培養，幫助他們掌握技術理論，不斷地提高技術水平。

今天我國絕大多數技術人員在政治思想方面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他們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的領導。但是思想進步不能到此為止。毛澤東同志指出：“廣大的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後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①

技術人員的思想改造，需要依靠他們的自覺，通過自己的努力，逐步提高政治覺悟，提高認識。別人的幫助，只能運用和風細雨的方法，進行同志式的批評，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生硬的態度。在我國，廣大的技術人員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但是，對於技術人員的政治學習不能像對一般政治工作人員一樣要求。技術人員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要靠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政治運動的鍛煉，要靠在生產過程中的實踐，有些專家還要經過帶有一些自己特點的具體途徑，經過科學實踐來提高自己的認識。列寧曾經指出，要幫助技術專家“擴大眼界，要以相當的科學成果和材料為根據，要記住，工程師承認共產主義所經歷的途徑並不像過去地下宣傳員和著作家所經歷的那樣，他們是經過自己研究的那門科學所達到的實際成果來承認共產主義的”^②。列寧的這段話，對於我們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我們在貫徹執行黨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政策當中，已經取得了豐富的經驗，技術人員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已經作出了許多貢獻。我們必須繼續執行黨的政策，把廣大的技術人員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充分發揮他們的力量，同心同德，建設社會主義。

①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頁。

② 《論統一的經濟計劃》。《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135頁。



数理邏輯和形式邏輯

王 宪 鈞

数理邏輯是一門邊緣性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与邏輯学和数学的研究对象是交織在一起的。通过在計算机和自动控制方面的应用，数理邏輯和工程技术又有了密切的联系。这样，数理邏輯所研究的問題，时常既是邏輯問題，又是数学問題，也是工程技术問題。

数理邏輯的发展，从莱布尼茨（1646—1716）提出建立一个使用符号語言的邏輯体系开始，到現在大約有三百年的历史。近几十年来，由于数理邏輯这門科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一些重要部門的实际应用，它的作用日益显著，得到很多人的重視和研究。这門科学发展頗为迅速，并不是偶然的。

在历史上，数理邏輯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数理邏輯不仅与数学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同形式邏輯也有深远的淵源。数理邏輯和形式邏輯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問題。这篇文章在說明数理邏輯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拟就数理邏輯和形式邏輯的关系問題，作一些简单的分析。

* * *

数理邏輯既是邏輯学，又是数学。

数理邏輯是邏輯学，乃是因为它的对象包括有推理和证明。数理邏輯对于这些思維

形式的考察，不是从思維的发展运动着眼，而是从形式結構方面来进行的，所以，可以說，数理邏輯是形式邏輯的一个分支。

数理邏輯不仅研究推理和证明，而且研究公理学方法。所謂公理学方法，就是从一些基本命題或公理出发，根据一些特定的演繹規則，推导出一系列的定理，从而构成一个演繹系統。

数理邏輯使用其特有的符号語言。它用公理学方法作它本身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还运用一些数学理論作为方法。特有的符号語言和公理学方法，是数学里常用的方法。使用数学方法以研究思維的形式結構，特别是数学思維的形式結構，是数理邏輯的主要特征。

由于数理邏輯使用了数学方法，由于它能够將思維的某些方面作数学的处理，并且能够將这些方面的問題轉換为数学問題，所以，也可以說，数理邏輯具有数学的性质，是数学的一个部門。

数理邏輯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用代数方法来处理古典形式邏輯的推理的时期，这个阶段延續了約二百年。

数理邏輯萌芽于十七世紀末叶。十七世紀是资产階級革命的初期，资本主义还处于



上升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也日益繁荣。由于机器工业、水利、枪炮制造和航海的需要，天文学和力学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当时的自然科学中，力学占着主导地位。力学的发展与数学是密不可分的。数学的成就提供了表达运动的形式及其计算方法，力学的需要又推动了对数学进一步的研究。数学方法在认识自然、发展技术方面，既然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人们的头脑里，就产生了把数学方法推广到其他科学领域的思想。人们希望能够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思维，希望能够把思维过程转换为数学的计算。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士一六五五年在《论物体》一书中，曾经明确地提出这样的思想。他认为思维是可以计算的，推理是与加法和减法一样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一六七七年给哥洛洼的信中说，真正的方法应该能够提供给人们以看得见的和感觉到的媒介，来引导思想，好像几何学中的线条和学习算术者面前的运算公式那样。

十七世纪末叶，简单计算机器的制造有了发展。法国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巴斯格在一六四二年制造了一架简单的数字计算机，莱布尼茨于一六七一年提出了改进巴斯格机器的想法，并且在一六九四年制成了他所设计的机器。所有这些成就，促进了人们把思维过程计算化的思想。

应当指出，并不是一切思维过程都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的，辩证的思维就是不能这样处理的。作为唯心主义者的莱布尼茨，夸大了数学的作用，幻想思维可以完全

计算化，结果遭到了失败。但是，莱布尼茨提出的思维计算化的思想，其中包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某些思维过程的确是能够计算化的。这是莱布尼茨对数理逻辑的贡献。数理逻辑的发展及其在工程技术上的应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用数学方法研究思维形式，不能不对数学提出一些必要的要求，而当时的数学是具备了条件的。十七世纪，数学的发展已日臻完善，通过用字母表示已知数量和未知数量以及用符号表示运算，代数已达到完全符号化。解析几何产生了，人们已经可以用代数方法来描述和研究几何图形。微积分的出现，又使人们可以用几何和代数方法来研究物质运动的形式。这些成就，为用代数方法研究推理提供了线索。

用代数方法研究推理，就必须把命题的形式结构用符号和公式来表达，把推理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转换为公式与公式之间的运算。为此，就要求对数学里的变项、运算和关系，例如 $a, b, x, y, +, -, \times, =$ 等，给以逻辑的解释。为了表示命题的结构，变项 a, b, x, y 等可以被解释为概念， $+, -, \times$ 等可以被解释为对概念的运算， $=$ 可以被解释为概念间的关系。但是，这些运算和概念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是怎样的内容，以及它们对于内涵的运算还是对于外延的运算，为要实现思维过程的计算化，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

问题的解决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对于思维过程的计算，采取内涵的解释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莱布尼茨一生中，曾作过多次的



嘗試。其后，經過了許多邏輯學家和數學家的努力，到了布尔(1815—1864)，施履德(1841—1902)和波列茨基(1846—1907)，他們吸取了前人的經驗，採取了外延的解釋，成功地用代數方法處理了演繹推理，后来又經過一些改正和補充，發展成為現代的邏輯代數。

十九世紀末叶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是數理邏輯發展的第二階段。在這階段里，數理邏輯是適應了數學的需要，為了研究數學證明而發展起來的。

數學是關於客觀事物的量的關係的科學。十九世紀以來，由於生產技術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數學的應用更為廣泛，並且日益取得更為抽象的形式。數學分析基礎的奠定，非歐幾何的建立，以及集合論里謬論的出現，這些都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數學方法的問題，說明了研究數學證明的必要。

數學證明，就其完成了的形式而言，是屬於演繹性質的。嚴格的演繹證明，必須是從正確的前提出發，根據推理規則導出結論。前提與結論之間要有必然的聯繫，前提必須是結論的充足理由。不嚴格的證明，時常不是明顯的錯誤，更多見的，乃是前提中的概念不明確，或者是證明中隱含有未被覺察因而未經考慮的前提。掌握了推理的形式和規則，不只能夠檢驗推理過程是否正確，也有助於發現隱含著的前提。十九世紀中叶，數學家逐漸認識到，只憑幾何直觀不足以明確微積分里的基本概念，為了進行有效的和準確的計算，就必須確定一些公式和定理的有效限度，並給予嚴格的證明。對於微積分領

域里的基本概念下精確的定義，確定公式和定理有效性的限度和前提，把推理所依據的形式和規則確切地陳述出來。這些，都是奠定數學分析基礎時所要解決的課題。

對微積分里的基本概念下精確定義，要牽涉到無窮多個數所合成的類，這是一種無窮集合，因而推動了對無窮集合的研究。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幾年里，產生了關於無窮集合和無窮數的理論——集合論。

集合論建立之初，就發現了謬論，謬論是邏輯的自相矛盾。邏輯矛盾的出現，往往標誌著思想方法的錯誤。可是，集合論里的謬論並非是簡單地由於推理的疏忽所引起，而是與無窮集合的本質以及對無窮集合所引用的邏輯方法有關，這也不能不引起對於數學中所使用的邏輯方法的探討。

如上所述，從一些公理出發，根據演繹方法推導出一系列的定理，這樣建立起來的數學理論是一公理系統。歐氏幾何是一個古典的公理系統。歐氏幾何里的平行公理（在歐氏原著中是第五個公設）與以下命題相等：通過一點，在平面上只能作一直線與一已知直線平行。兩千年以來，數學家曾經試圖從其他公理推導出平行公理，沒有成功。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俄羅斯幾何學家羅巴卓夫斯基(1792—1856)提出了非歐幾何的報告，他假定了與平行公理相反的命題，並從之作出大量的推演，而沒有遇到邏輯矛盾。這實際上就說明了平行公理不能從歐氏幾何的其他公理推出。把這些問題提高到理論上來考察，就需要研究在一個公理學系統里，能夠推演出什麼，以及能否導致邏輯矛盾，這兩個



問題是关于公理学方法的主要邏輯問題。

在这个阶段，从佛萊格(1848—1925)和皮亞諾(1858—1932)开始，数理邏輯学家們继承了前一阶段的成就，在研究数学证明的过程中，他們具体地并且有系統地分析了数学里的命題和推理，揭示出为数不少的、为古典形式邏輯所未能包括的命題形式和推理形式。为了表示复杂的形式結構，他們使用了特有的表意的符号語言，这种符号語言在研究数理邏輯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他們的研究成果，表現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一些公理出发进行邏輯的推演，人們所能遵循的推理形式是不可胜数的。在研究公理系統里可能推演出什么来的时候，我們需要考察某一公理系統的全部推理規則，但是我們不可能将某一系統中的推理形式一一列举，因之就有必要将一类推理形式公理化，使之成为一个有系統的整体。这种公理系統的推演和证明，是根据特定的形式規則，通过对符号的运算而进行的，所以又被称为演算。关于推理形式的公理系統，有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命題演算是关于联結項，例如“如果……那么……”，“或”，“并且”，“非”等的邏輯特征的公理系統。謂詞演算是关于量項“一切”“有些”和謂項及关系項的邏輯特征的公理系統。在这个阶段里，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建立了，它們的重要邏輯特征也得到了有系統的研究和闡明。

一般的邏輯只考虑命題的真和假，多值邏輯除了命題的真假二值以外，还考虑到更多的值，例如，命題的各种程度的概然性。模态邏輯研究命題的模态：必然，可能，不可能

等等。在本阶段的后期，多值邏輯和模态邏輯的研究已被提出，并且取得了初步的結果。

数理邏輯的形式化，在本阶段的最后几年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們現在所熟悉的，用符号的形式表达推理結構的方法，例如：“如果甲那么乙，甲，所以，乙。”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甲”“乙”表示任一命題，叫作命題变項。这是邏輯形式化的初始情况。在邏輯代数、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里，不仅变項用符号，邏輯概念也用符号表示，在这里，我們可以用“ \subset ”表示类与类之間的包含关系，用“ \rightarrow ”表示大致相当于“如果……那么……”的联結詞，用“ \vdash ”表示断定。数理邏輯使用的是特有的表意符号語言，这种語言的每一个符号都有其确定的意义，而每一概念都被特定的符号所表示。关于符号的語法也是完全确定的。这样的符号語言与其所表达的意义是完全对应的，因之，当意义确定了之后，我們就可以暂时抛开意义，而只从語言符号来考虑某些問題。如果概念与符号之間已經建立了完全的对应，那么，在說到概念之間的邏輯关系的时候，可以只讲符号之間的形式关系。承认前件的假言推理就可以轉換为以下关于符号的規則：

从 $\vdash A \rightarrow B$ 和 $\vdash A$ 兩組符号，可得 $\vdash B$ 。

这样作，当然还是为了处理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暂时抛开了意义，决不是不顾意义，而是为了便于思維的进行。这是数理邏輯进一步形式化的結果。

虽然数学的需要推动了数理邏輯的研究，但是，也不能认为推理形式的推广，只是由于数学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說法并不合



乎历史事实。就关系逻辑来说，关系逻辑对于阐明数学概念和数学证明是不可少的，然而关系逻辑的产生并非由于数学的推动，英国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德摩根早在他的关于三段论等等五篇论文(1846—1863)中就提出了关系三段论，这是对于推理的形式结构进行考察和把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推广的结果。

从三十年代开始，数理逻辑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数理逻辑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在公理数学方法和有关演绎方法的一般理论方面都得到了重要的结果。同时，也建立了新的数学工具——递归函数论*。数理逻辑的中心问题转向了包括能行思维和能行计算的能行性理论的研究。近十余年来，由于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发展，结合计算技术的能行性研究，更成为数理逻辑研究的主要趋势。

递归函数论是为了研究数学证明而发展起来的。研究数学证明，需要考虑某一公理系统里可能作的一切证明，而一切可能的证明的数量是无穷的。为了掌握有关无穷的规律，数学归纳法和集合论中关于无穷的一些方法，是有力的工具。把这些方法引用于研究证明，就要求能够在数字与符号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事实上，这也是可能的。例如，根据一定的对应方法和规定，我们可以以1表示 \rightarrow ，以2表示P，以3表示Q，这样， $P \rightarrow Q$ 这个公式就可以用213这个数字来表示了。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把命题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符号公式之间的关系之后，逻辑关系就可以转换成数字的关系，对于逻辑问题的研究，

也就可以转换为一种数学问题的研究了。递归函数论的建立解决了数字与符号之间的对应问题，为研究证明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也是能行性研究的开端。

随着数理逻辑科学的发展，对于能行性的研究提到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一般说来，在数学中，如何给一个命题作出证明，是没有固定不移的办法的。证明的给出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是创造性的活动。但是，有些类的命题的证明却是能行的，能行的方法是，按照确定的方法经过有限的步骤，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果。就计算而言，加法是能行的，二数相加必然有结果；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也是能行的。能行方法意味着问题可以用机械的方式解决，能行方法的获得，对于证明和计算都有重要的意义。上面对于能行性的说明，只是初步的和直观的，为要对能行性作出进一步精确的定义和说明，必须对能行性作具体研究并且能给出能行的方法。歌德尔所发展的递归函数论(1931)，就是一种关于能行性的理论。英国的数理逻辑学家图灵在一九三四年用一个理想机器进一步对能行性作了科学的说明。图灵机器反映了能行性与机器计算的本质联系，也推动了数

- 递归函数论是一种关于算法的理论。最简单的递归函数可以用一对公式来定义，公式之一给出变数为0时的函数值，另一个公式则给出一个计算方法，确定如何从变数取值 n 时的函数值求得变数取值 $n+1$ 时的函数值。例如 $x!$ 的公式是：(1) $0! = 1$, (2) $(n+1)! = (n+1) \times n!$ 。当变数的值给定后，例如 $4!$ ，我们就可以根据已给出的公式，把对于 $4!$ 的计算，回归为对于 $3!$ 的计算，最后回归为对于 $0!$ 的计算，而 $0!$ 的值是已经给出的。这样，函数值就可以在有限步之内算出。



理邏輯中关于数字计算机的研究。一九五一年，苏联数学家馬尔科夫发表了他的算法論，对于能行性理論作了卓越的貢獻。

四十年代以来，数理邏輯的研究，特别是能行性理論的研究，已經与計算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結合起来，数理邏輯有了新的应用领域。在科学技术上的实际应用，促进了这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我們对数理邏輯发展的主要阶段，作了简单的說明。从数理邏輯的发展来看它和形式邏輯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数理邏輯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終是以思想方法，是以演繹方法的形式結構为其对象的。数学的推理和证明都是演繹的推理和证明，公理学方法是以演繹法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能行的推理过程又是演繹法的一个种类。可以看出，演繹法是联系形式邏輯和数理邏輯的關鍵。

与古典形式邏輯相比較，数理邏輯的对象虽然是演繹法，但是它近年来的成就，無論就深度或广度來說，都在頗大的程度上丰富了演繹法。所以可以說，数理邏輯发展了形式邏輯的演繹法。

数理邏輯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有其历史的淵源的，也是密切联系了数学思維的結果。从古代起，邏輯学家就感觉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論不足以概括当时人們的思維形式。自斯多葛派开始，命題邏輯的新形式不断地有所发现。德摩根等人关系邏輯的提出，更从根本上推广了古典的主宾詞邏輯。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紀末叶，不少邏輯学家和数学家曾分析了大量的数学命題和数学证明。他們广泛地运用了符号語言，研究了一系

列的数学方法，发现了許多新的思維形式，突破了傳統形式邏輯的局限，发展了数理邏輯。

表意的符号語言在数理邏輯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数理邏輯的許多概念，都是关于形式結構的新的抽象，它們与一般的概念有联系，也有所不同，例如，实质蕴涵 \rightarrow 与普通語言里的“如果……那么……”就有不小的差别，用原有的語詞表达，往往容易发生混淆。在日常語言里，同一語詞在不同种类的句子中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例如，大家所熟知的“是”字，它有时表示相同或相等，有时表示类和分子的关系等等，而在表意符号語言里，不同的概念都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意义是确定的。在日常語言里，同一命題，例如选言命題就有若干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在数理邏輯中，却用一种符号来表示。这种語言的符号是清楚紧凑的，公式时常是一目了然的，因而有助于思維的进行，便于运算。很难想像，沒有符号語言，数学科学能够有今日的发展。

就广度而言，数理邏輯不只在数量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形式，它还研究了古典形式邏輯所不能包括的关系推理。古典形式邏輯把命題都归結为主宾詞形式，忽略了关系命題，也抹煞了关系推理。关系命題和关系推理在思維的各个領域里都很常見，也很重要，它們的存在不容否认，也不能簡單地被归結为主宾詞形式。例如，“甲大于乙，乙大于丙，所以，甲大于丙。”和“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所以，消灭帝国主义即消灭战争的根源。”这两种推理都是牵涉到关系的推理。再就命題來說，例如这样两个命題：

(一)有些溶液可以溶解所有固体。



(二)一切固体都可以被有些溶液溶解。

从前者可以推出后者，从后者却不能推出前者。这种逻辑关系之所以成立，也是必须通过关系命题才能显示出来。关系命题和关系推理在数理逻辑里得到有系统的研究和处理。

数理逻辑突破了古典演绎法的局限，还突出表现在它建立了包括某类推理形式的整体的理论体系，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命题演算包括了与逻辑联结词有关的逻辑规律；当然也有假言推理、选言推理和二难推理。谓词演算包括了与量词以及关系命题有关的逻辑规律，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只是其中一个极小的部分。两个演算都是公理系统，都是从若干公理开始，应用推演规则而证明一系列的定理的演绎系统。它们不只是在应用上被证实为足够的，在理论上也被证明为完全的，它们可以包括属于这范围内的一切逻辑规则和推理的结构。两个演算的建立，使我们有可能把这类推理规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而为证明论的研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由于有了两个演算，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零碎的和个别的，而是掌握了一整套的有系统的工具，来从事对于推理和证明的分析。

我们还可以看到，数理逻辑所研究和使用的公理学方法，虽然也是一种演绎方法，却是超过了古典演绎法的范围。一个公理系统都能推演出什么，会不会导出逻辑矛盾，以及在其中能否导出一切有关的定理，是数理逻辑的重要问题。数理逻辑在公理学方法方面所获得的成果，丰富了逻辑学里有关演绎方法和证明的理论。在此需要提出的是所谓不完全性定理。歌德尔在一九三一年证明

了每个包括自然数理论在内的公理系统都是不完全的，其中都包含有这样的命题，它既不能被证明又不能被否定。每一个这样的公理系统都是不完全的，都不可能把它所要反映的客观内容完全概括在内，这说明了公理学方法的局限性，驳倒了那种企图把数学的某一个部门用公理系统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错误想法。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数理逻辑在命题的种类，推理的结构，推理的体系，公理学方法等方面获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都丰富了和发展了形式逻辑的演绎法。关于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我认为就应当这样来理解。

数理逻辑长期以来，为唯心主义者所歪曲。有些唯心主义者把数理逻辑的公式和规则，说成是约定的和先验的。罗素认为：“逻辑命题是不需要考察现实世界而先验地认识到的。”同罗素一样，荷兰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布劳维也认为，数学中的判断就是所谓先验的综合判断，他们把思维和客观世界相割裂，把数理逻辑神秘化，利用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为唯心主义观点服务。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它歪曲了数理逻辑这门科学的面貌。这种观点是不利于数理逻辑的发展的，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实际上，上面已经提到，数理逻辑这门科学归根到底是适应生产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的。我们应当正确地认识数理逻辑的作用，把数理逻辑和唯心主义哲学严格区别开来。我们应当关心和重视这门科学，很好地研究它，使数理逻辑得到应有的发展。



草原上的拓荒者

烏兰巴干

我要到梦布勒克*开荒队里去了解情况。临行前，公社党委书记对我说道：

“这个开荒队刚刚组成，大家的热情很高，只是对搞饲料基地、办农业经验不多。开荒队长斯琴莫日根同志是个好党员，但对领导开荒种地却是个新手。你去了，多给他们提些意见吧。”

我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直奔久别的梦布勒克。一路走着，我的脑海里不禁涌现出那一片漫无边际的荒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荒滩曾经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战的战场。我记得很清楚，在那方圆百里的荒滩上，有一条战马能跳越得过去的小小泉水，名字就叫梦布勒克。泉水附近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屯子，几个倒塌的蒙古包和几座破破烂烂的帐篷，像一条即将被狂海吞没的漏船一样，奄奄一息地停在风暴里。为了拯救那里受苦受难的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曾用自己的鲜血保卫过它。现在我又到这里访问创造新生活的人们，心里多么高兴啊！

晚秋的太阳，带着春天的暖意，普照在整个荒滩上，闪烁着一片光芒。荒滩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村庄。银白的蒙古包和金黄色的帐篷

群中间，耸立着瓦蓝蓝、红通通的美丽建筑物。梦布勒克变成了一个方圆几里的大湖，在村旁荡漾。白花花的湖水，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大天鹅。从湖里分出来两条小河，清水顺着新开的渠道流向荒滩的

遥远边际。大片新垦的土地，黑油油的摊在渠道两旁，村周围那幽静的远山，红叶稠密的树林，仿佛都朝着灿烂的太阳，发出微笑。

我沉醉地观望着这里的美景，踩着新垦的土地前进，忽然发现，在我右方的荒滩上像是一股巨大的旋风竖起了顶云的尘柱。我停下来，擦擦眼睛朝烟尘看了半晌，才看清楚，烟尘里奔跑着五匹烈马，牵引着一台铁犁。扶犁的是一个苗条身材而又刚健的女开荒队员。她把五匹烈马的皮缰一齐攥在手里头，长杆子皮鞭不断地在马头上甩出脆响，汗水与灰尘混成了泥浆糊满了脸，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上面也挂着一层厚厚的土，浅蓝色的长袍子成了土色的布衣，裹头发的方巾，束腰的宽带，全看不出原色。驯服地拉犁前进的五匹烈马，一见我走过来，全惊慌起来，挣着缰绳，其中最高大的一匹黑鬃烈马，疯也似地竖起了前肢，嘶叫着朝天伸长了脖子，一团长长的黑鬃飘舞起来，其余的四匹也都朝四面挣缰。那扶犁的女开荒队员立即被五匹烈马裹在中间。不管引犁的烈马怎样的发疯，她毫不慌乱地弄着缰绳，在马中一斜身子，猛一拉缰，把那跳起来的黑鬃烈马一下子给拉了下来，

* 蒙语，银色的泉眼的意思。



脖子向地下插去，差点儿沒有被她拉倒了。又一股更大的烟尘从地上突起，她和馬全被烟尘籠罩起来了。我的眼前模糊一片，只听她的皮鞭在空中发出脆响，震蕩着四野。

过了一会儿的工夫，馬都被她馴服了，有的把嘴巴子插在地上，作出突突鼻音，有的甩动着头搖摆着尾，原地不移地发出嘶鳴，还有的閃着眼睛盯着那扶犁的女开荒队员。烟尘消散了，扶犁的女开荒队员又熟练地甩了几响鞭子，拋去馬韁，默默地冲我走来。她那严厉的目光向着我，但是，沒有責备的意味。我向她作了自我介紹。她显然很高兴，但不多說什么，只用热烈的握手表示欢迎我。她的手，那和五匹烈馬掙紮的手啊，像是曝日下两块坚实而又火热的石头，紧紧地扣住了我的手。

我忙問道：“同志，你們开荒队长斯琴莫日根同志在嗎？我想見見她！”

扶犁的女开荒队员朝我微笑，不回答。

“啊！那么，你就是斯琴莫日根同志！”我醒悟地說道。

这时我又把她仔細地端詳一遍。她那圓形的臉上，有两只秀丽的大眼睛，像是刚从泉里撈出来的水晶石一般的明亮，头发遮着被太阳晒得紫紅色的前額，她的嘴唇儿，被枯風吹裂了几条細血縫。我忽然发现她的額头正中隱藏着一块刀砍的旧伤痕，这伤痕我多么熟悉呵！我癡呆地盯了一陣子她的臉，又远望着梦布勒克湖水，記憶潮水似地在我的脑子里涌現出来。我記得，那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勾結起这里的反动封建王爷搞武装叛乱，闖进梦布勒克荒滩，屠杀牧民，搶掠牲畜。当时，我在解放军某騎兵連当战士，我們接受了攻打进犯梦布勒克

荒滩的敌人的任务，經過一昼夜激战，把团聚在这儿的敌人打退了。清晨战斗结束后，我来到梦布勒克泉旁飲馬，这时，附近村里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朝这边跑来。那小姑娘的正額上受了刀伤，伤口带着血痕。她抱着两件血衣，好像根本沒有发现我似的，一奔到泉边，就蹲下去用泉水洗起她那两件血衣来，血衣立刻把泉水染紅了。我的战馬喝飽了泉水发出嘶号，使那小姑娘吃了一惊。她猛一抬头，才发现了我，就放下了血衣，猛地站起身子，她的眼光射成直綫，落在我的枪杆子上。她一边緩步朝我走，一边把被血衣弄紅了的手，攥着拳头。这时我发现，她那充溢着仇恨血絲儿的眼睛里，沒有泪，好似燃起了火一般的紅。她一接近我的身边，两手抱住了我的一条胳膊，仰面朝天，嘴唇儿抖索了半晌，才說出了一句話：“同志，我求求您，求求您！”

“有什么事情，你說吧！”

“我要参军！”

“参军？”

她放开了我的手，呆呆地望了一会儿泡在泉水里的血衣，慢慢地告訴我，她的一家全是王爷的奴仆，她媽媽沒有儿子，所以把她叫特木尔呼*。父亲是梦布勒克荒滩上的第一个蒙族农民，他一面給王爷放牧，一面暗地里在梦布勒克荒滩上耕营一小块地。昨天敌人来了，掠走了他們的粮食，打死了她的父母，父亲临咽气还在輕輕地叨念着他的土地……特木尔呼說完，她的眼睛又轉向敌人逃跑的方向，遥望着南边。她仿佛向天，向大地，向那寬闊无边的草原，发誓似地說道：

“我恨国民党，恨封建王爷，我要替爹

* 蒙語，铁小子的意思。



媽报仇!”

当时，我激动地听她讲完之后，对她說，她年紀还小，騎兵連还不能收她当战士；还告訴她，我們一定为她报仇。可是，沒等我說完話，她弯腰抱起那两件血衣，疯一般地跑了，我追上去喊叫她，她不应，也不回头看我一眼。

半年后，一个大雪天，我正在离梦布勒克荒滩不远的树林里放哨。忽然，林外傳來了一陣剧烈的枪声，我跑出去一看，只見在草原上疾馳来一匹枣紅馬，馬上沒有人。我奔过去，打算抓住馬，到跟前一看，馬背上搭着一条口袋，还有一个孩子，闭着眼睛，咬着牙关，两手紧攥着馬鬃，吊在馬脖子上。我吃惊地叫了一声，那孩子才松下手，跳在地上。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臉，真是意料之外，原来是特木尔呼。她把小辮子剪去了，把头用半張生羊皮裹起来，她身上沒挂花，用吊脖子乘馬木躲避了敌人的射击。她认出了我，呆視了片刻，轉身把馬背上的口袋拉了下来，里边装着一斗炒米。她把口袋拖到我跟前，猛地攥住我的手，眼含泪說道：

“同志，这是一斗炒米，送給同志們吃吧，粮食是我父亲种的，是我收的，我炒的！”

她說罢，跃身上枣紅馬就馳走了……

荒滩上的那个沉默寡言而又勇敢的小姑娘，給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看着斯琴莫日根額上的刀伤，心里边暗想，莫非她就是特木尔呼？不禁地問：“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她叫特木尔呼。”

不等我說完，斯琴莫日根笑了說：“特木尔呼不在了，她变成了斯琴莫日根。”

我惊喜地攥住了她的手，激动地一句話也說不上来了。

这时候，别处傳來鞭响馬嘶和人們的高喝声。我轉身一看，荒滩上到处散布着开拓的人馬，像是激斗一般地开垦着荒地，整个荒滩烟尘連成了一片，籠罩了一切……

傍晚时，我和垦荒的人們一块儿进了梦布勒克新村。我的心里很急，想不錯过一切机会多跟斯琴莫日根談談情况，就先走进开荒队的食堂。队员們正热热闹闹地吃着白面饅首和燉羊肉，可是，这儿沒有斯琴莫日根同志。我从食堂出来又赶到了队部。队部是一座带有四根柱子的大型蒙古包，里面寬敞，陈設也很利落，除了一张大桌外，还挂着好几面色彩繽紛的錦旗。可是，包里仍不見斯琴莫日根。我来不及細看錦旗，扭身走出蒙古包外，又赶到蒙古包东側大馬圈旁。我在馬圈的北面找到了她。她剛飲完了馬，不知为什么，一个人停在自己的铁犁旁，焦灼的眼睛呆視着自己的铁犁。我叫她一声，她明明听到了我的喊声，仍瞪着她的犁。我順着她的眼光朝铁犁一看，原来那铁犁的鐮子，已經扭成了卷筒，那粗大的铁犁全斜歪了。好久，她才轉过身来对我說道：“同志，里边坐吧！”

我們走进帳篷里。她剛打着了一根火柴点上了灯，帳篷外头，忽然傳来了嗒嗒嗒铁的碰击声，接着从外面闖进来三个青年。他們都是蒙族开荒队员，个个长的身高臂壮，全像摔跤手。他們一进帳篷，就抖拳甩手地冲着斯琴莫日根大吵大嚷：

“队长，我們明天怎么办？”

“明天，按计划开荒呗！”斯琴莫日根說。

“用啥去开？”一个青年焦急地說道。

“犁呢？”

“犁，嘿！你出去看看！”另一个青年指向外头說。



斯琴莫日根朝三个青年的脸上瞥一眼，从床头上掏出一把手电筒打着，走出了帐篷。我也随出去。在斯琴莫日根的手电筒的照射下，瘫着三台全被扭弯了的铁犁，和斯琴莫日根使坏的那台铁犁一样，扭弯的程度不差上下，犂子全扭成了卷筒。

原来，这里仅仅有七台不是开生荒用的破旧铁犁，公社临时从别处调来叫他们试用。他们刚刚抛下镐锹使上犁杖，这一天工夫就坏了四台，明天只能有三台出去垦荒了。斯琴莫日根沉默了一阵，忽然，眼睛闪起光芒，把手高高地举起来，又朝下猛地一劈，坚决地说道：

“什么困难能把人吓倒？犁坏了，我们的双手还好好呢，只要有手，总得把梦布勒克荒滩翻开！”

三个青年人盯着开荒队长的严肃的面孔，终于停下了吵嚷，都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斯琴莫日根显然在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她亲自倒了三杯水，分别送到三个年轻人的手里，随后，悄悄地解下头巾，又朝他们递了过去，像大姐姐似地说道：“擦擦汗！”

三个年轻人喝水擦汗的工夫，斯琴莫日根说：“过两天旗里就会给我们送来合格的开垦犁，那时候，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我们不能坐着等，时间太宝贵了！”她说着，把手一摆，“走，咱们立刻把所有的铁锹、大镐都集中起来，修理修理！”

这一天我们没有谈成。次日我起来的最早，又去找斯琴莫日根。来到她的帐篷一看，她已经率领那批开荒队员，抛下了坏犁，扛起铁锹开荒去了。我走出帐篷，朝着被开垦着的荒地走去，当我登上一道土坎，不禁地被一场不平凡的景象吸引住了。我看到斯琴

莫日根同志，正带领着一群队员们抡镐舞锹地翻地，那带着杂草的泥土，在他们脚下翻起了黑色的波浪。昨天晚上，斯琴莫日根的那句话又响在我的耳边：“我们不能坐着等，时间太宝贵了！”

不久，旗里给他们送来了十五台开垦犁，开荒的速度突飞猛进，没过一个星期，大片的新垦地接连地出现在梦布勒克荒滩上。

塞外的寒冷来得很早，晚秋还未过，就下起雪来。正当开荒队和严寒、僵冻争夺时间开展斗争的时候，我离开了开荒队。临行的头一天晚上，我去斯琴莫日根的帐篷与她道别。

斯琴莫日根正坐在灯下起草着来年播种计划。我们谈了些别的话，她忽然高兴地说：“朋斯克拉喜同志回来就好了！”

朋斯克拉喜是斯琴莫日根的丈夫，我想，这是女同志盼望丈夫回来的一般想法。她立刻又对我说，她丈夫是学开拖拉机的。原来，她是在盼望丈夫回来把他们的开荒队机械化，快些用上拖拉机开荒……

“你明年春天再来看看吧，我们要用麦苗装饰起荒滩的新面貌，我们要让它长出金子一样的麦粒，再堆成一座金山！”最后，她握着我的手，这样满怀信心地邀请我。

.....

冬天过去了，春风吹开了大地。在春播前，旗里分配给梦布勒克开荒队三台马拉播种机，领导上派我送给他们。我把播种机拆开分别驮在几峰骆驼上，就出发了。真凑巧，在途中遇到了斯琴莫日根同志，她也拉了十多峰骆驼。公社分配他们开荒队几千斤小麦种，她亲自来公社用骆驼驮回去。我们两队骆驼合成了一队，日夜兼程地向前走着。不料想，在一个夜晚，我们正通过一条宽阔的河槽的



时候，遭到了春洪的袭击。我和斯琴莫日根刚把骆驼拉到河槽中的一个土陵上，冰水涌满了河槽，土陵立刻成了汪洋中的孤岛了。

驮着八个袋子麦种的四峰骆驼一下子落进水里去了。登上土陵的斯琴莫日根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去牵骆驼，一块半间房子那么大的厚冰排从上流压下来，立刻把她压进水底。我惊慌地叫她一声，刚要跳水去抢救她，只见她猛地一挺身子从冰排底下挣脱出来，向我命令似地叫道：“你看住骆驼，不要下来！”

我停下来，焦急地看着她。在黄昏的余晖照得一楞一楞发黑的洪水中，她翻滚着个儿，游进水的深处，抓到了那落水骆驼的缰绳，她终于将四峰骆驼牵上了河岸。不想，最后登岸的那峰弄断了绑袋绳，一口袋麦种脱下来，还不等落水她就用肩顶住了。一口袋麦种驮在她肩上留在水里头了，她拚力地想把麦口袋扛上土坎，在水里朝土坎走了两步，就不能走了。水下冲来的黄泥，紧紧地裹住了她的脚。我不顾斯琴莫日根的劝阻，也进了水，想去抢救她和麦种。我入水没走几步，还没接触到她，也陷进水底泥里去了。我们两个人相隔十来步远面对面地在水里挣扎了许久，无法脱水上岸。而且，脚越陷越深，到后来连动都动不得了。

刚消化的春洪，冰凉入骨，似乎浑身的血液全凝成了冰。浮在水面的冰块，环绕着我们旋转，夜风掀起了波涛，水浪也朝我们扑打起来。这时我见斯琴莫日根抬起头，拚力地把自己从冰得麻木的状态里唤醒，睁大了眼睛，展望起满天的星斗。那天上的银河，那明亮的星斗，全闪动着火一样的光辉，仿佛在向她说话，就是和你们一样地落在水里，我们也永远闪光！

斯琴莫日根似乎牙齿咬着嘴唇，仿佛扛着麦种口袋的双肩，从冰里升出了热力，把着口袋的双手，慢慢地攥起了铁拳，这时候，她的眼光异常的冷静，她好似用眼睛向我说：“种子，种子，党和祖国多么需要它，人民多么需要它，我们一定要保住它，把它栽培在我们新垦的荒地上呀！”

这时斯琴莫日根在我眼光里，像是寒冷中的热光，冰里的火把，高高地竖立在我的面前……。

夜幕拉开了，星辰沉入了黎明的光辉里，大地终于托出了红色的太阳，洪水退下去了。

早晨，我们赶到了梦布勒克，迎接我们的是斯琴莫日根的丈夫朋斯克拉喜同志。他前几天把一架“东方红”牌拖拉机开到这儿。

这天我睡到过午起来，来看斯琴莫日根，不知她经过这场斗争，身体怎么样。可是包里只有她的孩子。孩子们说，妈妈早起来了，到湖边去了。我又来到湖边，老远就看见斯琴莫日根正蹲在湖边上，用湖水洗着她那抢救麦种时被洪水陷泥弄脏的衣服。

我长久地停在她的身后，望着她的背影，不禁想起在解放战争的年月里，这个湖还是小泉眼时的那些情景。她不正是当年满含血泪洗着父母血衣的小姑娘特木尔呼吗？然而，在今天却是在洗着为祖国增粮而弄脏了的战衣；她不正是曾送给我们一斗炒米的小小女奴吗？然而，在今天却是在征服荒滩、为祖国增粮而战的共产党员。清清的湖水，在她的手下荡漾着，春天正在她的身边伸开巨大的翅膀降临到这里，眼前那一片清静的湖水，映照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10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

目 录

社論：知識分子前进的道路…………… (1)

——紀念《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无产阶級政党的革命傳統……………卞忠因 (7)

——讀列宁的《怎么办?》

严格要求和耐心说服相结合……………唐平铸 (17)

数学方法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

作用……………何祚庥 (22)

麦克米倫的碰壁和

“自由国家”之間的“合作紐带”……………張振亚 (31)

如此“就业机会均等”……………胡思升 (35)

☆ 五月十六日出版 ☆



社論

知識分子前進的道路

——紀念《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

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了。在這篇《講話》里，毛澤東同志結合我國革命文艺運動的實踐，創造性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艺思想，深刻地解決了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根本問題，給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和寬廣的道路。《講話》對於我國革命文学藝術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二十年來，我國的革命文学藝術，一直沿着《講話》所指出的文艺為工农兵服務的方向前進，對整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文学藝術是階級鬥爭的銳利武器之一。革命的文艺是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當文艺工作者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們對自己所擔負的任務就會有更高的自覺，就會懂得自己前進的方向和重要的責任。他們要使自己的工作更加符合於革命的需要，就必須明確地解決為誰服務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幫助文艺工作者解決的，正是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即為革命的政治服務，為工农兵服務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啟發和鼓舞了許多文艺工作者的自覺性、責任感和積極性，他們在這種啟發和鼓舞下，下決心深入工农兵群眾，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真地逐步解決這個根本問題。

文学藝術是整個文化戰綫的一個部門，它同其他文化部門比較起來，固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又有共同性。《講話》從整個文化戰綫的角度來分析文艺在革命事業中的地位 and 作用，提出為誰服務的問題，《講話》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對於在其他部門工作的廣大知識分子，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為誰服務的問題，是一個世界觀的改造問題，是一切願意進步，願意革命的人們所必須解決的共同問題，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地把這個問題提到知識分子的面前。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從文化工作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 and 作用的分析出發，十分重視團結知識分子，同時給知識分子指出了前進的方向。《講話》指出，文化的軍隊“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在革命時期，我們要跟反動的文化作鬥爭，要建設自己的革



命的文化，就需要大量的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建立自己的文化队伍。在一个由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知识分子更加显得珍贵。所以，毛泽东同志总是告诉我们，应该尊重专家，专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九年，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更加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更加需要建立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越是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越是明确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就越是可以更好地使自己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解放以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那时，在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除了一小撮靠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并为他们服务的、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之外，其他知识分子，一般地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但是，他们的出身、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世界观，又使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群众有不同程度的距离。有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要求革命，甚至已经参加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但是还没有真正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因此他们就还不能够用自己的作品很好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对于他们说来，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就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当时，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就要在行动中，在作品中，在灵魂深处，解决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就要清除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否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虽然已经来到了革命的根据地，同革命的军队、革命的人民在一起工作，但是，因为对于工农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知心朋友，仍会发生同自己的环境和任务不协调、格格不入的情况。在全国解放以后，广大知识分子转到为新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样有一个充分适应新社会需要，使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工作真正密切地同社会主义的环境和任务相协调的问题。我们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在这十三年来所经历的一个深刻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也就是要在根本上解决《讲话》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种思想改造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指出，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中，“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之一。不坚持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注意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思想工作，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主张取消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是促进知识分子革命化，而是放纵、迁就、迎合和利用知识分子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助长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感情，其结果，必然使帝国主义腐朽堕落的文化思潮得以传播，造成社会主义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蜕化的危险。在南斯拉夫，这种危险已经成为现实。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些革命的文艺作家，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他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他们还不善于表现工农兵群众，他们所描写的工农兵，往往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革命的文艺作家和其他革命知识分子在有些事情上还有一些糊涂的观点，例如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他们之所以有这些弱点和这些不正确的想法，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彻底地、明确地解决他们的立足点的问题，他们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而加于他们的影响，他们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但是只要他们有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愿望，沿着正确的道路努力争取进步，并且得到适当的帮助，他们是有可能逐步克服这种弱点，改变这种不正确的想法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把那种实际上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作品，吹捧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范例；把那种实际上只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吹捧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新”成就。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论调只能堵死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进步的道路，他们不是把知识分子引导到工人阶级的方面去，而是把知识分子引导到资产阶级的方面去，他们的目的不是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待知识分子的长处和弱点，既看到他们拥有宝贵的科学文化知识，又看到他们身上存在着资产阶级影响；既热情地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又诚恳地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逐步改变世界观。在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这个原则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决不含糊，决不能有所迁就的。在知识分子中间，很好地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只会使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在思想上更加健全起来和巩固起来，使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会损害他们的才能和妨碍专业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知识分子转移立足点的任务，是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



农兵群众，也就是深入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创作源泉中去，这是提高创作质量的根本保证。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又有助于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因而就能更好地进行他们的创造性的文艺活动。由此可见，改造思想既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又是文艺工作者本身的迫切需要。在其他方面工作的许多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常常有接触群众的机会和必要。例如，许多社会科学家需要向群众作调查，许多自然科学家需要总结群众的生产经验，依靠群众去考察许多自然现象。他们完全可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工作，和工农群众互相熟悉起来，逐步地在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真正做到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时候，工农群众的需要就会推动他们的业务工作，激起他们研究和解决某些问题的坚强决心和毅力，也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尊重群众的经验，从中吸取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马克思主义学习得越好，思想感情改造得越彻底，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的业务工作会做得更有成效。所以，转移立足点的任务，和他们本身的业务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

把思想改造同提高业务密切地结合起来，是贯穿在《讲话》中的一个重要精神。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为了使他们的主体适应革命的环境，以便解放才能，发挥才能，使英雄有用武之地，创造出为人民群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出现了许多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好的作品，就是许多文艺工作者在这个精神指导下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各方面的知识分子要求自己既有先进思想，又有真才实学，这种要求是很好的。文艺工作者有了先进的世界观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又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就有可能在创作中逐步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科学工作者有了先进的思想，又有真才实学，就有可能为人民的事业作出更为有益的贡献。所以，改造思想和提高业务并不是对立的，我们要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不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代替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不对的，同样，离开业务的提高只谈思想的改造，也是错误的。我们既不要做无灵魂的文艺家、科学家，又不要做空头的文艺家、科学家。

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归根到底是一种自我改造。自我改造主要是依靠自觉。当我们自己深深地感觉到思想改造对人民的事业、对自己都有益处，是自己确实需要的事情，就会积极主动地进行这个改造，并且可以使这个改造收到良好的效果。自觉的自我改造当然并不排斥而且欢迎和要求别人的帮助和批评。在这里，谁也不是单纯的“改造者”，或者只是“被改造者”，而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说的改造，首先和主要是对共产党员作家讲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作为世界的改造者首先要



对自己进行改造，然后也有责任对其他人民群众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对于我们的所有革命干部来说，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也是一刻也不能疏忽的问题。一个革命干部，只有当他具有坚定的群众观点，懂得群众的心，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他才能密切地联系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做好工作。那些曾经在革命烈火的锻炼中，比较深刻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同志，现在仍然有不断巩固和提高的任务。新干部就更加需要努力实现这个思想感情上的根本变化。所有的革命干部，想问题、做工作，都要设身处地想到群众的需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同群众商量问题，从各方面克服自己身上的那些脱离群众的因素，正确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讲话》中提出的问题，不仅对于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而且对于所有的革命干部，都是应该时刻注意的问题。

认识事物是一个过程，改变自己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尤其是改变世界观，更需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并且是逐步变化的过程。认识的变化，思想的改造，是逐步深入、循序渐近的。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小的质变阶段，积累起来，才能达到一个根本的质变。这中间又可能有曲折，有反复，有参差不齐的情况。因此，对于改变世界观的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和长期努力的决心；要逐步前进而又不断前进；要不断巩固、提高，以免中途停顿，甚至倒退。在这里，决不能采取简单急躁的态度，强求一律；对于自己和别人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应重视，作为继续进步的基础。总之，对于这样的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活动，是十分需要耐心和细致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特别是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在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的斗争中，要严格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在人民内部，又要严格划清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我们要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依靠大家的努力，在文艺界和学术界像在其他各界一样，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文艺和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以利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以利于更好地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在思想改造中，怎样互相启发自觉，怎样做到既是严肃的诤友，又是热情诚恳的知己，适合于解决精神世界问题的特点，《讲话》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完全是以朋友的态度来同作家们进行亲切的谈话、商量和讨论。他生动地说明了改造思想感情、转变立场的必要性和在改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和斗争。他总是首先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提出积极的努力目标，然后细致地、尖锐地指出一些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缺点和问题，进行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说理，鼓励他们向前奋斗。他既深刻地解决了一些根本



的原則的問題，又細致地解決了文藝活動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並透過對於這些具體問題的分析，幫助文藝工作者提高思想覺悟。他循循善誘地向作家、藝術家指明，他們應該如何既重視和群眾結合，又不要放鬆學習文化遺產，鍛煉寫作技巧；指明為什麼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群眾中去，既是解決思想改造問題又是解決創作源泉問題的關鍵；指明為什麼越是與革命根據地的群眾相結合，創作出反映這個新世界、新群眾的作品，才越可能具有全國的意義；等等。採取這樣的態度，當然會受到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歡迎。我們黨的工作者和知識分子自己，在幫助別人的時候，都應該學習毛澤東同志這種作風。

《講話》使我們看到，向革命的文藝作家提出嚴格的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又使我們看到，如果用粗暴的態度來對待思想問題，那是完全錯誤的；如果以這種嚴格的要求作為尺度，對於不合乎這種尺度的人採取排斥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講話》中特別提到了文藝界的統一戰綫問題，根據當時的情況，黨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同黨外的一切主張民主、主張抗日的文學家、藝術家，而且應該同那些僅僅主張抗日的文學家、藝術家團結起來。小資產階級藝術家的思想和作品雖然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於革命，比較地接近勞動人民，所以也絕對不應該排斥他們，而應該把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到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戰綫上來，看作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二十年後的現在，具體的情況當然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文學家、藝術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這個原則現在還是極為重要的。事實上，現在我們所能團結的文學家、藝術家和其他方面的知識分子，比過去是更加廣泛了。在廣泛團結的中間，對於思想上、藝術上的不同看法，要在團結的基礎上，通過討論逐步求得解決，不應該因此而妨礙團結和縮小團結的範圍。毛澤東同志說：“在一個統一戰綫里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結，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過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錯誤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這個指示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忘記。

我國的文藝、科學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的成就，我們有着豐富和寶貴的文化遺產，我們的知識分子也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解放以來，廣大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業務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對於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在我國，已經逐步地形成了一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隊伍，他們中間有從舊社會來的經過自我改造的知識分子，也有在新社會中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團結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逐步地壯大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隊伍，是我們面前的重大任務。我們確信，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我們的知識分子一定會更好地按照《講話》指出的方向，按照又紅又專的要求，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繼續努力前進，提供出更高質量的精神產品，涌現出更多的優秀人材。我們的知識分子一定能夠在文藝、科學戰綫上，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传统

——读列宁的《怎么办？》

卞 忠 因

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是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缺乏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是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的党曾奋斗了半个世纪。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致特里尔的信里说：“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一八四七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无产阶级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①

巴黎公社之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心和领导下，欧洲各国相继成立了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即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这些党的建立，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它们曾经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积聚和团结无产阶级力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第二国际各国的党是在和平、合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

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成为直接现实的迫切任务。在这“决定关头”，这些党却由于内部机会主义的发展，逐渐成为和平主义、议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它们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来正确地解决新的革命任务，不能组织、领导无产阶级准备和实行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而远远落在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后面。革命形势迫切要求有一个新型的、根本区别于机会主义政党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恩格斯逝世以后，以列宁为首的真正的革命派，为建立这样一个党曾同当时国际性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怎么办？》一书，就是列宁在六十年前（一九〇二年）所写的一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反对第二国际和俄国的机会主义的辉煌著作。我们不准在这里全面论述这部书的各种方面的意义，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列宁在这一著作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思想，论证了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416页。



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的党，这个党应当成为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司令部。这部著作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基础。六十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完全证实了列宁所发挥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思想的正确性。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六十年前，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由于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焦点，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因此，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更是迫切的问题。当时在俄国这样的党还没有建立起来。俄国的工人运动处于思想上组织上混乱、分散和动摇的时期，党在建立的过程中遇到了机会主义者的种种阻挠和破坏活动。列宁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这个时期的英雄们所干的事情，与其说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说是把它们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成其为完整的革命理论，而变成了人们可以‘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渗进去的混合物；‘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推动人们向前去从事日益广阔、日益积极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因为据说‘经济斗争是与政治斗争有着分不开的联系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却成了替一种‘革命的官样文章’和‘民主’的儿戏作辩护的口实。”

经济主义是这个时期混乱和动摇的主要

思想根源，是当时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障碍。俄国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是伯恩斯坦主义的一个变种。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迎合和代表落后工人的要求，反对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把工人运动和党的任务限制在经济斗争和仅仅在政治上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面。他们漠视和贬低革命理论的作用，要求“自由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诬蔑为“教条主义”，而自己却醉心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他们为当时工人运动的混乱、分散和动摇的落后状态辩护，不承认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能够首先从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经济派的这些主张，实际上等于使工人阶级在迫切的革命任务和强大的敌人面前解除武装，是当时俄国工人运动的最大危险。为了结束混乱和动摇的状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就必须首先同这个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批判他们的各种错误观点，和他们在思想上“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二

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的根本分歧，首先在于对“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的不同估计，在于对“群众自发运动的

* 凡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或转引自《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作用这个基本問題”的不同看法。

俄国的革命运动从十九世紀末开始，出現了一个广闊强大的群众性高潮。这个高潮不仅来得迅速，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青年学生、一般知識分子、农民群众，都在工人运动影响下活跃起来了。当时的問題是：群众运动的高潮在繼續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起来，“但是革命家無論在自己的‘理論’工作或实际工作方面，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沒有建立起一种連續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組織”。当时的运动还是自发性的运动。

所謂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就是群众还处于不觉悟的状态，他們虽然已經感觉到自己同厂主、同个别資本家的对立，并起来进行斗争，但他們还只是看到自己眼前的經濟利益，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个資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因此，他們的斗争仅仅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政治斗争；也就是說，他們还没有真正的阶级觉悟，还没有社会主义的意識，因此認識不清自己的远大目标和历史使命。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自然应当为尽快地消除运动的自发状态、提高群众的自觉性而斗争。群众的自发斗争越是高涨，就越需要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性，以便领导和提高这个斗争。列宁在当时正是这样做的。但是，經濟派在他們的报章杂志上却赞美运动的自发性，責难列宁“輕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和夸大“有計划的自觉成分”的作用，說什么“人們因經常

想不忘政治理想而抹煞了运动的經濟基础”。在他們看来，工人运动的目的不过是追求一些狹隘的、眼前的經濟利益，根本没有什么长远的利益和远大目标。他們說什么“对每一个卢布工資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貴”，說什么工人进行斗争时，“应当知道他們現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因此，他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根本不負有提高群众自觉性的任务，根本不應該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應該对工人运动实行有目的有計划的领导。他們认为党的任务就是“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即跟着工人运动做尾巴。列宁指出，正是这样一个“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問題具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对自觉性和自发性的作用的不同估計，反映了馬克思主义者同經濟主义者之間“各种理論分歧和政治意見分歧的全部实质”。

經濟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純粹的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規定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他們认为，从所謂工人經濟斗争的内部，即仅仅（或主要是）从經濟斗争出发，仅仅（或主要是）根据經濟斗争，便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觉悟，便能够生长出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識。列宁說，这是极大的錯誤。工人經濟斗争本身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識，这种意識只能从外面灌輸进去。因为社会主义学說是一种科学，是工人阶级利益和斗争的科学表現，它只有在总结工人运动經驗的基础上，在深刻的哲学、历



史和經濟的科学知識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工人階級从自己的經濟地位出发，虽然自发地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說，它比別的階級更容易領会社会主义理論，因为这个理論最深刻最正确地指明了他們受苦的原因和出路。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包括学习和研究時間及知識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工人階級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会，必須同厂主斗争，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識。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識，或工人的政治觉悟，“只能从經濟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輸給工人。只有从一切階級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階級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識”。

事情不仅在于工人階級单靠自身力量不能形成社会主义意識，事情还在于，如果崇拜自发性，輕視以至反对向工人灌輸社会主义的意識，即不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那在实际上就是在工人运动中帮助資產階級傳播他們的思想影响。列宁說：“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們运动进程中創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問題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沒有中間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离，都意味着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加强。”

为什么工人运动的自发的發展，就有受

資產階級思想体系支配的傾向呢？这是因为，在私有制社会中，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淵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它經過了全面的和精細的加工，并拥有众多的傳播工具。因此，虽然“工人階級自发地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資產階級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列宁关于这一点的論述，具有极其深刻的、重大的意义。在資產階級思想体系占統治地位的社会里，事情是这样：就是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占統治地位的社会里，只要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影响还严重存在，外面还有帝国主义思想的包围，資產階級思想体系仍然有可能“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在后一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經确立，但是人們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識仍然不可能不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育而自发地发展起来。这里仍然存在着两种对立思想体系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的每一陣地，都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自觉斗争才能巩固和扩大。

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就是用革命方法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彻底消灭階級，把世界最終引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就是对于这个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的科学說明。恩格斯說：“完成这个解放世界的事业，——乃是現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研究这一变革的历史条件及其实质，因此，也就是使負担着完成这一事业的使命的现在的被压迫階級理解自己事业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



理論表現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①

工人的政治覺悟、工人的社會主義意識，首先就是他們對於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歷史使命的認識。只有對資本主義進行全面的政治揭露和政治鬥爭，只有不局限於經濟鬥爭而把政治鬥爭提到首位，才能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這種鬥爭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所以列寧說，工人的政治覺悟只能從經濟鬥爭範圍外面灌輸給工人，工人只有從各階級的政治關係方面才能吸取到科學社會主義的知識。自覺性同自發性的關係問題，其核心正是關於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問題，是這兩者究竟誰居于首要地位的問題。

經濟派從崇拜自發性的觀點出發，歪曲地引用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有決定作用的原理，認為在階級鬥爭中經濟鬥爭比政治鬥爭更為重要。他們說：“各個階級的經濟利益在歷史上有決定作用，所以無產階級為自己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鬥爭對於它的階級發展和解放鬥爭應當有首要的意義”。

關於這一點，列寧同經濟主義者和一切形式的經濟主義傾向作了尖銳的鬥爭。列寧批駁他們說：“從經濟利益有決定作用的原理中，決不應當做出經濟鬥爭（即工會的鬥爭）有首要意義的結論”。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輕視經濟鬥爭的意義，它是全部階級鬥爭中的重要一部分，但是不能夸大這種鬥爭的意義。在社會歷史中，經濟是基礎，是決定因素，它歸根到底決定着政治等上層建築。但“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列寧說，一個階級的“最重要的‘有決定作用的’階級利益

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革來滿足；例如，無產階級的基本經濟利益只能經過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來滿足。”俄國經濟派的觀點，即放棄工人運動的政治任務和政治目的觀點，不過是伯恩施坦所宣揚的“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沒有什麼”這一臭名遠揚的公式的直截了當的表現，這種觀點是完全叛賣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的。

“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②——列寧認為這是一個普遍原則，不論在革命時期，或者在建設時期，都是對的。列寧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適時地把經濟建設任務提為黨和無產階級的中心任務，並且曾經提出過“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經濟”的要求，反對一切政治空談。但列寧反對對他這一思想的任何歪曲，他後來聲明說：“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希望我們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經濟。但是不難理解，要實現這種願望，就必須不發生政治上的危險和政治上的錯誤。”^③ 他認為，“全部問題就在於（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也只能在於）：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④ 這裡順便提一下，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在他們的《綱領》中標榜什麼“社會主義不能使個人的幸福服從任何‘最高目

①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3頁。

②③④ 《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2、74、72頁。



的’”，这也就是要求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了个人眼前利益而忘掉自己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在新条件下的复活。

经济派还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骗人词句来掩饰他们的改良主义实质。列宁说：“所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则只是包含着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那种传统的倾向！”经济主义者并不是否认一切政治，他们只是把社会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把党的革命纲领降低为改良主义的纲领。经济派所说的“政治斗争”，仅仅是“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经济剥削，消除失业现象，消除饥荒等等”。列宁说，这种争取政治改良的斗争，虽然可以作为一个开端和组成部分包括在革命政党的活动范围之内，但它还没有超出工联主义斗争的范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使这种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而绝不能以此为限。

经济派认为，阶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是为每个卢布多争取到五个戈比的斗争。列宁说：“‘经济派’只承认萌芽阶段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它的更发展的形式。换句话说，‘经济派’只承认阶级斗争中的那些从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最能容忍的东西，而拒绝比自由派更进一步，拒绝承认更高级的、自由派所不能接

受的阶级斗争。‘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客。‘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①这里所说的“萌芽阶段的”、资产阶级“能够容忍”的阶级斗争，就是仅仅（或主要是）争取经济改良和某些政治改良而毫不触及革命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的斗争，而所谓“更高级的、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阶级斗争”，就是以推翻旧的国家政权机构为目标的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②

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把自发的工联主义政治提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而经济主义者则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这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在政治斗争问题上的一切意见分歧”。

列宁说：“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烦琐，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伟大道

①② 《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7页。



訓。”^① 列宁的这一段話，概括了他在同經濟派作斗争中所闡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和作用的观点。

三

无产阶级政党要能担負起自己的偉大历史任务，它就必須是以馬克思主义理論武装起来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来的，有着高度理論修养和高度集中統一的党。脱离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原則和組織原則的党，不可能是真正的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在同經濟派作斗争中闡述了“只有以先进理論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的思想，他认为，“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狹隘的实际活动的倾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傳密切地融合起来的情况下，必須始終坚持这种思想。”当时俄国实际运动的情况使理論工作的意义显得很突出：随着馬克思主义的广泛傳播，发生了理論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党还剛剛在形成起来，剛剛在确定自己的面貌，还远沒有同各种錯誤思想进行过清算，特别是，俄国革命有自己的特殊条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本国範圍内担負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沒有担負过的任务，它必須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国际經驗。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应当恢复和加强理論工作。一方面，必須坚持馬克思主义理論原則，保护党的思想基础的純洁性。他引用馬克思的意思說，“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締結条約，但是决不能拿原則来做

买卖，决不要作理論上的‘让步’。”另一方面，又必須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主义，拒絕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別国的經驗。

机会主义者“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轉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就同样坚决地轉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評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俄国的經濟主义者不仅“醉心于最狹隘的实际活动”，輕視和降低理論的作用，而且同西欧各国党的修正主义者一起，在“批評自由”的口号下，猖狂地攻击馬克思主义。他們把遵循馬克思主义理論說成是“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等等。这是当时一場国际性的搏斗。列宁說：“目前（这一点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費边社分子，法国的內閣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評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們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馬克思主义。”列宁把当时躲在“批評自由”旗帜下的人，叫做“公开的批評派和秘密的机会主义者”！这些机会主义者口中的所謂“批評自由”，究其实，不过是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偷換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輸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的自由；他們所“批評”的“教条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教条主义，而正是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則，特别是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原則。

俄国的“批評派”自称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以修正主义的陈詞濫調来反对馬克

^① 《我們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9—330頁。



思主义的原理。他们自己就简单地照抄“最新德国药方”，以便为俄国隐蔽的伯恩斯坦主义辩护。列宁说：“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甚至是猴子式的模仿！”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真正反对教条主义的，当然不是俄国的批评派及其“一家弟兄”，而是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反对本国的沙文主义，而且意味着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应当善于吸取别国的经验。但是，吸取别国的经验必须采取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不能囫圇吞枣地照抄别国的决议。“要真正运用别国的经验，单单了解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襲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要真正运用别国的经验，必须善于根据本国的情况独立地加以考查，在这方面决不能允许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当马克思主义经过欧洲人之手传播到美国去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地批评在美国的德国人不善于把自己的理论同美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善于使美国的党真正“美国化”，而是有意无意地使它“德国化”，以致脱离了美国群众。一八八七年一月恩格斯在给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且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是不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愈是通过他们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到他们的心坎里面去。”^①

那末在俄国又怎样呢？列宁说：“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

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② 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首先面对着一个欧亚两洲反动势力的强大堡垒——沙皇专制制度；无产阶级处于十分复杂的斗争条件下，合法活动的可能性很少；无产阶级必须和占人口中多数的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并成为农民的领袖，才可能有所作为；等等。列宁详细地分析了俄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条件，独立地探讨了和解决了俄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虽然德国党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具有最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无疑是国际工人阶级所共有的宝贵财富，但列宁反对用学究式的和教条式的态度把德国的东西硬塞给俄国群众（正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西欧的经验硬塞给美国群众一样），特别是反对照抄在德国党内已经受到批判的机会主义的教条，反对把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完整的革命理论变成“人们可以‘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渗进去的混合物”。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它、发展它，从各个方面向前推进它，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列宁就是这样地为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规定任务的。这个任务终于实现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402页。

^②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188页。



成为各国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还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党。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①。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是由党的性质和任务本身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的坚强的战斗部队时，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争取革命的胜利。

经济主义者在政治上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也崇拜自发性。他们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活动方式，为这些落后现象辩护。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直接有联系的，因为既然仅仅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当然就完全不需要有（在这样的斗争的基础上也产生不出）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的战斗组织。经济派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党，如列宁所说，不过是一个“专为工人经济斗争服务的‘执行组’”。

经济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就是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主张党是一个组织涣散、成份复杂、没有定型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可以是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或分散各地互不联系的政治协会之类的东西。他们“把凡是主张建立向沙皇制度

坚决宣战的集中的战斗组织的思想都称之为‘民意主义’”，并且声称这种组织观点是同“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列宁批驳他们道，任何革命组织，如果它真想作严重的斗争，它就非有集中统一的组织不可。“只有集中化的战斗组织，坚定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能满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并不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相抵触，而只是同极端民主化和某种“原始民主”的概念相抵触。经济主义者在当时“非法”的秘密活动的条件下侈谈什么全体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广泛民主”，列宁说，这不过是“革命的官样文章”和玩弄“民主的儿戏”。

列宁针对当时党内严重的分散情况，还谈到了党对于全国斗争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在这里，他答复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制的组织，结果会不会使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而使运动受到损失呢？我们回答道：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因为地方工作人员过分偏重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失；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决不会减弱，而只会加强我们的联系和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

总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并且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

^①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0页。



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如列宁所说的，才是“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而不是“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只有这样的组织才是无产阶级胜利的保证。

* * *

列宁在二十世纪初为建立上述的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作的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列宁所为之毕生奋斗的是这样一个党，这个党以共产主义为斗争的最终目标，它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全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有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雄心壮志，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把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和每一阶段的具体任务结合起来，善于领导群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实现其最终目标。这样一个党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希望和依靠。没有这样一个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这样一个党，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样一个党，就不可能领导全体人民最终地到达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在解放世界的伟大事业中坚定不移地执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

俄国的无产阶级正是因为列宁领导下建立了这样的党，才实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正是因为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辉榜样建立了自己的新型的党，并且在自己的队伍中反对和肃清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才使世界革命事业获得了像今天这样的伟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建党思想的指导下和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接受了列宁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的革命传统，一般地说没有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坚决地反对了和纠正了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不断地发扬了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传统，巩固和加强了自己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现在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不断地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今天，斗争条件更加复杂，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论是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的党，或者是正在争取革命胜利的党，都需要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都需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无产阶级的国际经验。无产阶级的国内任务和国外任务不是轻松了，而是更加艰巨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面临着从现代修正主义方面来的危险。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攻击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他们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过去社会改良主义政党那种状态，使“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后退为“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在这种情况下，重读《怎么办？》一书，使我们感到更加亲切和更有教益。我们应该从列宁的著作中吸取伟大的思想力量，保卫和发展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思想，反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发扬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传统而斗争。



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相結合

· 唐平鑄 ·

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相結合，是人民解放軍的管理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則。这条原則，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革命軍隊中的具体运用，是毛澤东同志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論的具体运用，也是我党我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个优良傳統。根据这个原則，組織对个人，上級对下級，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或者工作上，都应该按照革命利益的需要，提出严格要求，不能降低标准，不能姑息放纵；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应该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簡單生硬的方法。就是說，必須用耐心說服的方法，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这样一項原則，不仅对人民解放軍的管理教育工作是适用的，对其他一切部門和单位，也应该說是适用的。

为什么要严格要求呢？这在軍隊是显而易見的。軍隊如果沒有严格要求，每个官兵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揮，千軍万馬就决不可能在一声号令下迅速准确地行动起来，就无法抓住战机，爭取战斗的胜利。机关、工厂、学校的情况，固然各有不同于軍隊的特点，但是在这点上也是大体相类似的。工厂

如果对每个工人不作严格要求，对他们生产上、思想上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听之任之，不聞不問，这样能够很好地完成生产任务嗎？学校如果不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对他们的学业和思想品德上的問題放任不管，这样能够培养出有用的人材嗎？我国有句老話：“严师出高徒”。这是很有道理的。

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在一个組織內的所有成員，需要具有統一的意志和統一的行动。如果集体中的各个成員可以各行其是，这个組織就会像一盘散沙，决然不会有什么力量。所以，在一个組織內，必須要求所有的成員，严格地遵守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严格地执行上級的指示和組織的决定，严格地遵守各种規章制度和秩序，坚决地完成自己担負的任务。各行各业、各种組織，为了使群众有組織地行动，使工作有秩序地进行，行政命令和組織紀律無論如何是不可缺少的。許多人生活工作在一起，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組織紀律，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混乱，更談不到有克服困难、取得成績的巨大力量了。毛澤东同志說：“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維持，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①因此，在一个組織內，每个成員都要受到一定的組織紀律的約束。我們所說的严格要求，正是这种組織性和紀律性的表現，它是和一切小資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习气、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根本不相容的。小資产阶级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頁。



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一些人往往不习惯于有严格组织纪律的生活，不习惯于领导上的严格管理。所以，要做到严格要求，就必须和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

组织对个人，上级对下级，作严格的要求，是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表现，也是对同志、对下级的最大的爱护。要求严格，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得到切实的锻炼和提高，使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和学习的任务。如果平时要求不严，马马虎虎，一旦发生了问题，才来一次“算总账”，这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对同志、对下级不负责任的表现。

当然，我们强调严格要求，决不是说，可以不分问题的性质，不管事情的大小，一律从严，越严越好。无论在工作、思想或者生活的各个领域，总有原则问题和非原则问题、重大问题和一般问题的区别。我们指的严格要求，主要是对那些原则问题和重大问题而言的。对于任何一个干部，对于军队的每一个官兵，首先是要看他是否忠实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立场坚定，经得起严重斗争的考验；是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组织的决定，认真执行上级的命令、指示，积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是否努力学习，力求上进，在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方面很健康；是否能够联系群众，不计较个人得失，坚持真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服从整体；等等。一个组织及其领导者应该从这些方面严格要求同志，而不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都来“严格要求”。如果样样要求严格，结果一样也严格不了，并且还会束缚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如此，即使是一些原则问题和重大问题，对不同的对象也应该作不同的要求，不能千篇一律。例如，对党员要更严格

一些，对非党员要比较宽一些；对老干部要更严格一些，对老干部要比较宽一些。因为党员和非党员，老干部和新干部，他们的觉悟程度不同，他们在革命工作中应起的作用有所不同，实际能够达到的水平也有差别。我们决不能用同样的水准去要求各种不同的对象。如果不区别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问题，从一个框子出发，作同样的严格要求，那是不正确的。当然，这里说的宽一些和严一些，是比较而言，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说要求比较宽一些，决不是说可以离开原则。

应该怎样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呢？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要严格要求，就应该多下命令，少讲道理；多施批评指责，少进行说服教育；只能上级说了算，不容许下级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在态度上还要声色俱厉，等等。这是把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军阀主义的作风和正确的严格要求混同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说的严格，是要求上的严格，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坚持原则性，而不是态度粗暴，更不是滥施惩罚。态度粗暴和滥施惩罚，这不是以平等待人的态度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的残余，是和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的身份根本不相称的。事实上，用简单粗暴的办法，也不可能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不可能使干部、群众真正得到帮助，真正解决思想问题，最多也只能取得一时的表面的效果。因此，为了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既要注意克服某些人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习气、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也要十分警惕某些领导干部的高人一头的思想，要反对用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的作风对待下级和群众。

我们党历来强调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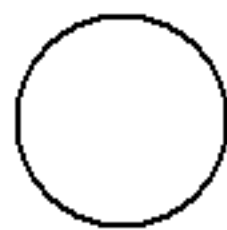
法，来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毛澤东同志說：“凡屬於思想性质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強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①他又說：“为着維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况下就行不通。”^②为什么人民內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而不能用強制的方法去解决呢？为什么只有用耐心說服的方法才能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呢？这是因为在我們革命組織的內部，在人民的內部，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上級和下級之間，干部和群眾之間，官兵之間，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他們只有职务的分工，沒有人格的貴賤。在革命組織內部，在人民內部，也有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一般地說，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只能够和只应该采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够和不应该采用命令主义和強制手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解决思想問題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接受真理的过程。这就需要領導者讲清道理，以理服人。我們共产党人是坚持真理的，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飯，靠实事求是吃飯，靠科学吃飯。”^③干部和群眾是能够接受真理的。只要把真理讲清楚，就能够启发他們的自觉，就能够有效地領導他們前进。同时，他們也只有接受了真理，提高了觉悟，才能够在完成各項任务中，發揮高度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反之，如果不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不向干部和群眾讲清楚各种正确的道理，批判各种錯誤的

思想，就不能够真正解开人們思想上的“疙瘩”，使人口服心服，心情舒暢。因此，做領導工作的同志，在处理各种实际問題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耐心的說服教育，讲清道理，說明意义，分析原因，指出办法，启发干部和群眾的觉悟，提高他們的自觉性，使他們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种說服教育的方法，是毛澤东同志历来提倡的工作方法，是我們党的一种优良的傳統作風。

強調耐心說服，是不是放任迁就呢？如果把耐心說服看成是姑息迁就，对有缺点錯誤的同志不进行批評教育，甚至出了严重問題也不严肃处理，这是离开严格要求这一目的，对耐心說服的方法作了片面的、錯誤的理解。把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对立起来，以为要严格，就不能耐心；表现了耐心，就不能严格要求，这是不正确的。我們是要通过耐心說服的方法来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如果离开了严格要求，孤立地談耐心說服，就可能导致姑息放纵；反之，如果不要耐心說服，单纯地讲严格要求，也可能走向簡單生硬。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这两者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二者結合得好，并不很容易。我們需要从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出发，把这二者很好地結合起来。只有具备了高度的政治責任心，才能够严格地要求每一个同志，而决不会姑息迁就，放任不管；也只有具备了高度的政治責任心，才能够从实际效果出发，耐心地进行艰苦的說服教育工

①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頁。

③ 《反对党八股》。《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6頁。



作，实事求是地解决同志们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而决不会发脾气，耍态度。

严格要求和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对什么人适用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只是对易于说服的先进分子才适用，而对不易说服的人就不适用或者不完全适用。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党历来认为，在群众中，总有先进、中间、落后这三种状态的人。这种差别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的，而且永远都会存在。在领导工作中必须承认这种差别，善于对待这种差别。实践经验一再证明，严格要求和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对于群众中的各种类型的人都是适用的和必需的。而且，对于思想越是落后一些的人，就越要重视运用这一原则。因为先进分子，自觉性比较高，一般地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有了一些问题，也比较容易说通。对于中间状态的人，就要多做些说服教育工作。在一项大的改革的开始，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往往占多数。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觉性，但不如先进分子；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自觉性，在另一个问题上就不那么自觉。这就需要领导者耐心说服，启发他们的觉悟。至于对那些思想落后的人，领导者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了。思想落后的人既缺乏自觉的约束力量，别人的三言两语又往往点不破他们。因此，对这部分人既要时刻注意严格要求，又要特别注意耐心的说服教育。我们应该相信，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那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是可以推动和督促他们进步的。在革命组织中，在人民内部，人们自觉程度的高低，思想的进步和落后，是同旧社会对他们的影响程度，同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自我努力分不开的。作为领导者，应该承认和看到

这种现实情况，以更大的注意力帮助那些进步慢的人，使他们在上级、同级和下级的同志们的帮助下，在先进分子的带动下，经过自我努力，以较快的步伐赶上前去。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些人表现落后，就对他们丧失信心，嫌棄和厭惡他們，或者用简单粗暴和惩办主义的方法对待他们。有的人，开始也觉得对思想落后的同志应该耐心地说服教育，但是做了一些教育工作以后，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有了一点效果，过不久又旧病复发了，因此就对说服教育的方法发生了怀疑，不相信那些落后的同志能够逐步提高觉悟，认为非采取强制压服的手段不可。这样对待思想落后的同志，不可能达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的目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①我们应该坚持这种正确的态度，反对那种对待落后的同志采取嫌惡、排斥、打击的错误态度。

还有一种情况，领导者三番五次地进行说服教育，但是被领导者并不能心悦诚服，或者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通。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就要看领导者本身工作做得够不够，对问题的处理是否正确。如果领导者用以说服人的，只是一般的道理，不能“对症下药”，触动对方的思想深处，自然不会有什么说服力。说服人的工作，是一种艰苦细致的工作。领导者要说服别人，不仅要把情况摸清楚，摆事实、讲道理，把话说到点子上，而且要热情坦率地向对方交心，讲心里话，耐心等待对方的觉悟，一次谈话不行，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0页。



二次，三次。不仅要指出对方的缺点錯誤，而且要帮助对方分析产生錯誤的主客观原因，提出改正錯誤的方法；同时要注意表揚和鼓励对方的成績和进步。如果领导者对問題处理得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当然就不可能說服別人，更不能責怪別人固执了。有些人，虽然领导上一再进行說服教育，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見。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就應該特別認真听取和分析这些人的意見。如果分析的結果，证明这些人的意見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部分，那就應該本着服从真理的精神，接受这些正确的意見或其中的正确部分，改变或部分改变自己原来的意見。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不是批評別人固执和不听說服的問題，而是领导者自己进行自我批評的問題。毛澤东同志經常教导我們，要善于和意見不同的人共事。一方面，我們的革命事业要求我們有統一的意志和統一的行动，如果在我們的党内，在革命军队中，在一切的革命組織中，沒有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真正統一，就不可能有堅強的战斗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党内，在军队和其他一切革命組織内，总会有不同意見存在的，对任何問題和在任何情况下意見都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問題在于如何正确地处理意見分歧。不仅对日常事务性質的問題上产生的意見分歧，而且对某些原則問題上产生的意見分歧，都只能夠和只應該采取充分展开討論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強制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有的人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坚持自己的意見，只要他执行上級的指示和組織的決定，積極地完成自己的任务，那末，是可以允許他保留自己的意見的。如果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意見是对的，领导上就應該改变原

来的意見，按照他的意見办；如果他保留的是不正确的意見，那么，事实会教育他，促使他改正自己的錯誤認識。

強調說服教育，并不是不要紀律約束和必要的紀律处分。毛澤东同志說：“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須用社会主义的紀律約束自己。”^①某些时候，对某些人采取強制性的紀律約束和必要的紀律处分，这也是达到严格要求所必需的、正确的手段；但这仍然是建立在說服教育基础上的。为了貫徹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每个組織和每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处理干部和群衆的思想問題和实际問題的时候，必須既要严格要求，又要耐心說服，既要發揚民主，又要有紀律約束，使二者很好地結合起来，不要強調了一个側面，忽視了另一个側面。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教育群众，必須先向群众学习。只有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俗話說：身教胜于言教。作为一个领导者，應該首先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处处做群众的模范，并且虛心地接受群众的批評和监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應該教育下級和被领导者，自覺地接受管理，服从领导。这两个方面應該很好地結合起来。这样，就能夠更有力地貫徹执行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相結合的原則，就能夠充分調动群众的积极性，做好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完成党和国家交給的光榮任务。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頁。



数学方法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作用

· 何 祚 庠 ·

在現代科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应用将越来越普遍。这是一种极有发展前途的重要科学研究方法。

在科学史上，数学方法的应用要一直上推到十七和十八世紀期間的牛頓。牛頓发明了微分学，并把它应用到力学中，这就使得力学以及天体力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十九世紀出現了一批专门在这个方面工作的科学家，如傅立叶、馬克斯威尔、玻尔茨曼等人。他們广泛地把数学解析应用到物理学各部門，在傳热学、电磁学、分子运动論等方面，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这样就获得了一个和“实验学派”相对立的名称——“数理学派”。此后，随着各种科学向定量的方向发展，数学也就获得多方面的应用。它不仅仅应用到一切称为“精密科学”的研究領域，而且还正在逐渐推广到生物科学、思維科学以及經濟科学的領域，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試图分析一下数学方法所具有的某些特点，以及它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作用。

数学——認識客观世界的 辯証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

关于数学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作用，首先是恩格斯作了确切的評价。恩格斯在《自然辯证法》一书〔总的計劃草案〕中曾經指

出，“数学：辯証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①。恩格斯沒有完成《自然辯证法》一书的写作計劃，因而他对于这个提綱草案中的論点，并未能加以發揮。从恩格斯的这个論断中，可以看出数学的作用有两方面。第一，数学是認識客观世界的辯証的輔助工具。第二，数学又是一种輔助的表現手段，亦即是一种語言。

为什么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要把数学提高到作为研究客观世界的一种輔助工具、亦即是科学方法論这种高度呢？这首先是因为对于事物量的研究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并且数学还具有方法論的性质。恩格斯說：“数学是数量的科学”^②。又說，“純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間的形式和数量的关系——这是非常现实的資料——为对象的。”^③量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一切事物都有质和量这两个方面。因而专门以研究量的关系为目的的数学，就会有广泛的应用。

为什么对于事物量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方法論問題？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領域內，有許多量的問題，本身就是头等重要的問題。不进行这种量的关系的研究，就几乎不能得到任何关于

①②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6頁。

③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頁。



这类事物規律性的知識。例如，在火箭技术的研究中，必須对燃料的裝載量及消耗率、推力大小的变化、結構重量及載重量、飞行的軌道等等因素作定量的研究，否則就不能准确地控制火箭的航行。又如在中子反应堆的建造中，必須事先对材料配置的比例，临界体积的大小，中子通量的大小，控制棒的作用等等作定量的計算，不如此，不仅不能使反应堆开动起来，而且还可能出严重的事。在基本建設上一个重要的原則是必須有正确的設計。所謂設計，就是要根据一定的需要，事先計算好材料、装备等等在空間的地位和数量关系。一个优良的设计，将为国家节省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国民經济計划的制訂方面，对于比例关系的計算，常常是头等重要的問題。不把各个生产部門間的比例关系計算好，那末就有产生比例关系失調的危險。由此可見，在許多实际工作中，都有很多极重要的量的关系問題。对于这些量的关系进行透彻的研究，会給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

第二，事物的质和事物的量总是以一定的关系而互相联結起来的。唯物辯证法中“从量轉化为质和从质轉化为量”的規律，就是研究质和量的关系的。事物的质总是通过一定的量来表现的。质的变化，只有由于物质或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也就是說，要知道质，就要知道量。

毛澤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曾特別強調要“胸中有‘数’”。他指出，“对情况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沒有数量也就沒有质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

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①。毛澤东同志的这段話，对于一切事物的研究都具有原則性的意义，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精神，就是把对事物量的分析提高到方法論的高度，并且強調在研究事物的质时要和数量的分析相結合。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这种通过数量来分析质量的方法是特別重要的。这常常表现在对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数量級”的分析上。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常常十分注意透过錯綜复杂的现象抓住决定事物实质的那些因素。用自然科学研究里常用的术语來說，就是要把所研究的事物的变化发展及各种因素形成一个全面的、定性的“物理图像”，从而根据这种“物理图像”来提出假說，制定进一步的工作方案等。經驗表明，“物理图像”的形成，常常是对各种因素进行“数量級”的分析的結果。离开了这种“数量級”的分析，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物理图像”。这也就是說，不仅仅是研究量的問題需要进行量的分析，在研究事物的质时，也必須进行量的分析。

数学本身还具有一系列的特点。

数学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严密的邏輯性。不論是初等数学或是高等数学，都是以邏輯推理的形式来表述量的关系和空間形式的。邏輯推理的特点是由这一命題推出另一命題，由已知的关系求出未知的关系。在数学上这种邏輯推理往往表现在数学定理的证明和方程式的求解上。数学定理证明的一

^① 《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3頁。



个特点是，它必須由已知公理、定理或引理中給出这个新的数学定理的证明。而数学方程式的求解，就是要利用已知的量的关系来求出未知的量的关系。正因为数学具有这种邏輯推理的性质，所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它就常常被用来作为科学定理的证明的工具和求出未知量的关系的方法。

数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具有若干辯证的特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证法》等著作中，曾經以大量的篇幅来探討运动和辯证法是如何进入数学的。即使是初等数学，恩格斯也举出了許多例证說明那里也存在着許多辯证的特性。对于高等数学，恩格斯評論道：“在那里即使很簡單的关系，如抽象的量的关系、惡的无限，都采取了完全辯证的形式，迫使数学家們既不自觉又不自願地轉变为辯证的数学家”^①。恩格斯指出，高等数学中这些辯证的概念，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这种辯证特性的一种反映。所不同的只是在于：“一个是由人的头脑有意識地实现出来的，而另一个則是由自然界无意識地实现出来的”^②。正因为在数学中存在着和自然界相类似的这种辯证的特性，所以数学也就能用来不仅闡明事物中若干較简单的联系，而且能用来探討自然界中某些較复杂的辯证的联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只有微分学才能使自然科学有可能用数学来不仅仅表明状态，并且也表明过程，即运动。”^③

恩格斯对于高等数学的辯证特性的分析，是針對十九世紀的数学而言的。現代的数学比起十九世紀的数学来，水平已經大大提高了。但由恩格斯所揭示的高等数学中的辯证的思想，仍然一直貫穿到二十世紀的数

学。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范围也是大大地扩展了。

数学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它的抽象性。数学在研究量的关系时，总是暫時地舍去了事物所具有的許多具体的性质，而抽象地探討事物的量。乍看起来，数学所探討的量是和具体事物无关的。然而它却是现实世界的空間形式和数量关系的一种反映，是从許多具体事物中抽取出来的一种普遍关系。因而反过来数学也就能在各种不同的領域內获得普遍的应用。

数学在这方面的特性，有点类乎辯证法。辯证法的規律是自然、社会以及思維运动的最一般的規律。辯证法的規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引出来的，并且以抽象的形式反映着事物所普遍具有的一些联系。因而反过来，辯证法就既是一种方法論，又是一門邏輯学。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思維科学中能普遍的应用。当然，辯证法所探討的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維的普遍規律，而数学所探討的是空間形式和量的規律；辯证法是一切事物发展的邏輯，而数学只是一种量的邏輯。从这点說，辯证法所涉及的領域是更为广泛而普遍的。人們在研究数学問題时，固然常常是暫時地舍去了事物的质而抽象地考察量，但是，在应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科学工作中的具体問題时，就不能只研究量而不探討质，不能脫离了质而只考察量。因而在应用数学于科学研究时，还要采用其他邏輯方法，如归納、演繹、分析、綜合、抽象、概括等，特別是要以辯证法作

①②③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7、227、229頁。



为指导。正因为如此，从方法論的角度說，数学并不能和辯证法并列，它只能是一种輔助的方法。

数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它是一种表达手段，亦即是一种語言。應該說，高等数学中函数的概念，用来描述物体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是再恰当也沒有了。至于函数和函数間的关系，亦即物体的这个状态和那个状态之間的关系，那末微分方程、积分方程等解析表达式便是表述这种关系最簡练的方式。假如我們試用日常使用的語言把电动力学的基本定律描述出来，那就可能写成一部长篇大論，还說不清楚它們的內在联系。而在电动力学里用了一个馬克斯威尔的偏微分方程，就把它最主要的特征都概括在里面了。对于那些更复杂一点的物理規律，只应用函数的概念还不足以表达出它們，因而还要用函数和函数之間的关系，亦即所謂算子来表达。例如，微观世界的物理量就是用算子来表达的。而微观世界的物理規律，如量子力学中的量的关系，就表示为算子和算子之間的关系。显然，对于这种物理規律，离开了数学的語言，就簡直无法精确地表达它們的实在的内容。

語言在人的思維活动中，起着重大作用。斯大林說：“語言是直接与思維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动的結果，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①他又說：“不論人底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础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底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②由此可見，語言对于人的思維的发展起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正因为使用了这种明白而簡练的数学語言，才能使自然科学的理論研究有可能在这种語言的基础上走到很远的范圍。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精通和熟练数学的語言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所謂“精密科学”的領域內，数学是进入这些科学宝库的一把钥匙，不熟习这种語言，就几乎无法深入这些科学領域。

归結起来，数学在人的認識活动中的作用有二：第一，它是一种認識方法；第二，它是一种語言。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起着重要的方法論的作用，低估了这种作用是不对的。

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

数学方法是理論思維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自然科学中的实际应用有两方面：一是概括經驗材料，二是預測新的現象。具体說来，它包括下列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利用数学来分析和概括实验材料、經驗規律，并从中建立起唯象的、半唯象的模型理論或抽取出基本定律。

第二，从基本定律或模型理論出发，利用数学演算的方法，有时結合着若干实验材料来分析和解决各种不同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

前一方面的内容，其特点是由个别到一般，它以建立新的理論体系为目的。后一方面的内容，其特点是由一般到个别，它以应用現有理論解决实际問題为目的。在物理学中，第一方面的内容称为理論物理学，第二方面的内容称为数学物理学。实际上，这两方面

^{①②}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2 版，第 20、38 頁。



的內容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基本理論的建立常常是从解决具体問題开始的，而另一方面，檢驗基本理論的正确性，只有通过具体問題的解决才能作出判断。

但是，不論上述的哪一方面的內容，在应用数学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时，极为重要的是，必須严格遵循唯物主义的立場，科学地运用抽象方法和严密地进行邏輯推理，才能使数学方法获得有效的成果。具体說来，在运用数学方法于科学工作时，首先必須充分估計到实验材料对于理論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在工作过程中和实验工作取得紧密配合。

恩格斯指出，“不論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領域中，必須从既定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須从物质的各种对象形态和各种运动形态出发；因此，在理論的自然科学中不能虛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就要尽可能地用經驗去证明”^①。

在应用数学方法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时，对于恩格斯的这个原則性的意見是必須加以重視的。

一般說来，一个理論問題的提出，总是从实验事实或經驗材料出发的。人們在使用数学方法来进行研究时，首要的是列出正确的方程式。数学方程式必須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否則就是一堆形式主义的游戏，成为沒有意义的东西。而数学方程式列得是否正确，必須由經驗材料来判断。

在数学方程式求解时，也仍然要进一步概括經驗材料。数学方程式求解时常遇到的一项困难，是数学問題的极端复杂。一般說来，对于极其复杂的数学問題，要想严格地

求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要真正地求出解答，就不得不将实际情况进行簡化，引进若干假定，略去一些次要的或不关重要的因素，从而近似地求出它的解答。但是不論是在理論模型中引进假定也好，在計算中利用近似表达式也好，或是深入研究一个理想化的典型也好，都是实际条件的一种抽象。这种抽象是否正确，必須由經驗，亦即由实验材料来判断。

数学問題的求解方法，也常常是在实验材料的启示下得到的。理論物理学家和力学家們常常是凭借物理的直观“猜”到数学問題的答案，然后再去实际地求解出来的。显然，对于一个事先已經“猜”到了它的答案的人，将更容易找出它的合适的求解方法。

在实际应用数学方法于具体問題时，保持数学的演算、推导和证明的严密性，也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不保持数学演算、推导和证明所必需的严密性，就常常会导出錯誤的結論。初看起来，要做到数学证明的严密性，似乎只要依照邏輯的規則就够了。然而单凭邏輯的規則并不能保证证明所依据的前提是正确的。而对于前提的正确性，常常要由經驗材料来判断。因而所謂证明的严密性，也仍然要依賴实验資料。

最后，由数学方法所导出的結論，一般还应进一步由实验来加以驗證，也就是說，“要尽可能地用經驗去证明”。

总之，在运用数学方法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时，紧密地保持理論分析和科学实践之間的联系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忽略了这一方面，就常常得不出应有的結果。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頁。



数学方法的应用，一方面要以实验工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对实验工作有重大影响，可以弥补实验工作的不足。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常用实验来进行研究。实验方法具有以下一系列的优点：第一，由实验方法所获得的知識都是第一手的直接經驗，因而这些知識都是可靠的知識（除非在实验工作中有錯誤）。第二，在实验过程中，由于使用了仪器、設備，因而极大地扩展了感官所直接观察的范围。第三，在实验工作中，已包含“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之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綜合（动物的狡猾伎俩）”^①。因而对于原始的直接观察說来，实验已經大大提高了一步。

然而实验工作仍有它的局限性的一面。实验工作只有在理論分析的紧密配合之下，才能取得重要的成果。

第一，实验常常要受到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例如，目前还不能用实验来研究白矮星状态下的物质；也还不能用人工方法获得能量在一万亿电子伏特以上的高能粒子。即使这种物质条件都已具备，但实验上还常常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如杂质的影响不能完全驅除，外界干扰所造成的“本底”过大等等，因而从实验上常常并不能保证事物“表现在最精确的形态且最不受扰乱影响的地方去考察”^②。在实验过程中，虽然已包含对未知对象的分析、綜合，但是总不能达到思維抽象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实验室内，无法获得绝对滿足理想条件的惯性坐标，也不可能造出一部滿足可逆过程条件的热机。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可能由物质上来实现，只能由思維来实现。理論計算常常能摆脱物质条件的限制，这正是数学方法的一

个突出的优点。

第二，即使在实验上的各种技术问题都已经获得解决，利用实验方法有时仍然得不到合乎实际的知識。例如，在工程技术的领域内，常常用模型試驗来进行研究。然而，模型和实物总有尺寸大小的不同。即使十分注意实验材料的选择，尽量地滿足“相似律”，然而要把一个问题的一切相似条件都同时滿足，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因而，这种实验研究也不能完全地如实反映实际情况。但在某些情况下，当人們可以利用理論計算方法来严密地处理这些问题时，利用理論計算反而能比实验测量得出更可靠的結果。

第三，实验方法只有和理論計算結合起来以后，才更能发挥它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作用。經驗表明，实验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对于自然界中的一切現象作深入細致的研究。重要的是，要对認識过程中的关键性問題，亦即典型的現象作精細的研究。抓住了关键以后，便能收“举一反三”，“聞一知十”之效。怎样挑选出最恰当的实验，必須有賴于理論計算的指导。而理論計算之所以可貴，在于它常常能給实验工作指出新的途徑。实际上，不仅仅在实验的挑选上，需要理論的指导，而且在实验的安排上，也离不开計算。經驗表明，实验装置只有經過仔細的理論分析以后，才能做出最好的安排。

第四，实验結果常常只有在对它进行了深刻的理論分析以后，才能更发掘出它的意义。毛澤东同志曾經指出，“感觉到了的东

① 恩格斯：《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頁。



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①。科学史上常有的情况是：有許多实验結果，在当时并不能正确理解它的意义，甚而有时还会反过来以为实验做錯了。只有当理論发展起来以后，才看出这个实验的真正的深刻意义。例如，在天文学的观察上，长久以来发现水星繞日运动偏离理論計算的結果。当时各种可能的修正都不能給予完滿的解釋。直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論发展起来以后，才弄清楚这种和理論計算的微小偏差，原来是广义相对論效应的結果。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們使用微波技术来測定电子的磁矩，結果发现了电子具有偏离当时理論值的“反常磁矩”。进一步进行理論分析，并做了很多計算以后，才了解到原来这是电荷的一种“重正化”效应所導致的結果。显然，这些重大的科学結論，不借助于数学方法，就不可能得出来。

第五，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論实验工作进行得如何深入，科学总不能停留在經驗材料的阶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經驗的自然科学收集了如此龐大数量的实证知識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領域中有系統地和依据其內在联系把它們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簡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識領域互相間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但是自然科学因之便走进了理論的領域，而在这里經驗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能求助于理論的思維。”^② 科学史的經驗表明，这种在实验材料基础上的深刻的理論概括，对科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人們常常能从这种概括中做出重大的科学結論。举例來說，在现代超声速流体运动的研究中，冲激波的現象起着重要的影响。而这种現象却首先是由

非綫性流体力学方程式所“預言”，然后再由实验“找出”的。无綫电电磁波也是首先由馬克斯威尔方程式“推导出来”，然后赫茲再由实验加以“证实”的。現在，这两种自然現象都获得了广泛的技术应用。

总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时，必須正确地解决它同实验的关系。只有将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有机地結合起来，才能多方面地获得科学成果。

数学方法的应用正面临新的飞跃

在現代化的工业、技术和科学发展的条件下，广泛地发展以数学作为研究工具的理論科学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可以期待的是，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将出現新的飞跃。因为現代工业、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为这种研究方向提供了特別有利的条件。这些重要的因素是：

(1) 現代化的工业技术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走向高温、高压、高速、高强度和广泛地采用自动化。仅仅依靠感官的直接的經驗来发展这种新的技术是远远不够了。普遍的趋势是要越来越依靠于理論計算的指导。

(2) 科学实验室的規模变得愈来愈大，有些实验室設備本身就是大規模的工业装备。进行一个較重要的实验，常常要耗費很多的資金和人力。可以肯定地說，所謂卢瑟福的“悬絲、封蜡”的时代，已是不能应付目前的需要了。为了充分发挥实验設備的作用，

① 《實踐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5頁。

② 《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頁。



避免設置實驗設備上的盲目性，不能不對實驗的目的性作多方面的探討。這就要愈加求助於事先的理論分析。

(3) 科學實驗室的建立已經普及到很大的範圍。比起十九世紀時期，只有少數中心地區才有科學實驗室的狀況，現在是多出很多了。特別是實驗技術的日新月異，使科學資料的積累速度已較前大為增加。這樣，綜合實驗資料的要求就愈來愈迫切。

(4) 現代科學發展的重要趨勢是日益走向定量的方向。若干在過去不能用數學來處理的學科，現在卻變成為以數學的計算為主要的研究工具了。例如，短期天氣預報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現代的短期天氣預報中，人們常常使用數值預報的方法，因而比過去單純憑經驗的預報方法的準確度大大地提高了。恩格斯曾對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里應用數學的狀況作了評述。他指出，“數學的應用，在剛體力學中是絕對的，在氣體力學中是近似的，在液體力學中就已經比較困難了；在物理學中是試驗性的和相對的；在化學中是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學中等于零。”^① 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現在的狀況是：在所有的力學和物理學中，數學的應用已經絕對的了。在化學中所應用的數學早已超出了初等數學的範圍；在那里高等數學已應用得十分廣泛，並且發展出量子化學、化學流體力學等這種需要高深的數學工具來處理的學科。現代數學也開始進入了生物學，人們已經在嘗試運用數學來分析神經活動的規律、遺傳的規律等等。數學進入經濟和社會的研究領域，發展出運籌學這一新的科學部門。至於統計方法在工業管理中的應用，已經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了。數學還滲入了語言科學的

範圍。目前人們正在從事用數學來處理語言的詞匯和文法，以便把它們變成能用機器來翻譯的東西。數學甚至還滲入思維科學的領域，在現代的邏輯學研究中，由於引進了數學方法而發展出數理邏輯這一門新的學科。總之，日益和數學密切結合，是現代科學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趨勢。如果低估了這種趨勢的重要性，就會使我們落后於現代科學水平。

(5) 現代數學也正在日新月異地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數學領域，並將逐漸影響自然科學的研究。例如，概率論就是一門極有應用前途的科學，它是研究大量現象的一門科學，是研究具有多種隨機因素的自然現象的有效方法，而人們還只是剛學會如何把它運用到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去。泛函分析也是有新的應用前途的科學，它是研究具有無窮多個自由度的物理系統的有力工具。它和理論科學中若干重要部門，如量子場論、量子力學多體問題、統計物理等門科學的發展密切聯繫着。現代數學還發展出若干超越古典意義下的量的關係的數學，如上面所說到的數理邏輯就是其中的一種。數理邏輯不僅在數理證明上有重要應用，而且還影響到電子計算機的研究。總之，可以預計的是，現代數學還將不斷地提供新的研究工具。

(6) 二十世紀的重大發明之一，是電子計算機的發明。由於電子計算機的出現，將給數學方法的應用開辟出一個全新的境界。可以毫不夸大地說，電子計算機將和生物學上的顯微鏡、天文學上望遠鏡的作用相媲美。而它的影響將遍及於一切可以用數學來計算的科學、技術部門。有些同志把電子

^① 《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9頁。



計算机譬喻作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重炮”，意思是說，“不发則已，发必有中”，这确是很恰当的。目前电子計算机的計算速度，一般已达到每秒万次以上，而新型的計算机却可以达到每秒百万次的水平。我們知道，由于現代技术的发展，在力学和物理学中，那些能由古典的解析方法来处理的綫性方程已經不能应付实践的需要。在許多情况下，那些綫性方程将由非綫性方程来代替。然而，非綫性方程的求解，一直是数学中最困难的問題，因而不能不限制了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可是在电子計算机中，这些非綫性方程，仍然可以用数值計算的办法来求解。即使对于那些极其复杂的方程式，它們带有十分复杂的边值条件，在过去，人們只能大量地略去一些次要項、甚至是較主要的項来近似地求解，或者根本不能求解的，而現在却可以用电子計算机設法求出它們的解答。因而人們在使用理論計算方法来进行分析时，就可以既把主要因素又把次要因素都一起包括在內，从而使得計算結果和实际条件高度符合。正因为这样，人們就可以利用电子計算机进行这种“紙上的实验”来代替实验研究，甚至比实验測量还要精确，并且还可以在不同条件下計算若干次，得出不同的方案进行比较，避免进行大規模实验研究时的很多麻煩。在理論研究的領域內，人們常喜欢用解析的办法求解。解析的式子能够表現出一般的規律，因而一下就能找出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对于这类問題，电子計算机仍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电子計算机对于做理論計算的人們，仿佛是添加了一种实验工具。因为电子計算机可以給出精确的数值

解答，人們可以利用这种精确的数值解答来形成“物理图像”，分析事物的內在規律性，并利用机器的計算結果来檢驗解析求解方法所取的近似的好坏。由于电子計算机的出現，还促进了新的数值計算方法的研究。例如，蒙特卡洛方法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計算方法有計算程序简单、方便、实用等等优点，可以簡便地进行多重积分，求解极其复杂的边值問題，等等。总之，我們必須預見到电子計算机給理論科学所带来的新的变革。

(7) 十九世紀思維科学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唯物辯证法的出現。而“辯证法是唯一适合于自然科学現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更高级的思維方法”^①。显然，这种高级的思維方法将能使数学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得到更恰当的应用。

总之，从以上的分析看来，在現代科学中广泛地使用数学工具，确是科学中的一种进步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飞跃。从这个角度說，不論是在我国科学工作中或是我国的科学教育工作中，都应该估計到科学发展的这种趋势。特別是在学校教学中，不断提高学生对于数学技巧的掌握和訓練，是一个頗为重要的問題。这不仅关系到学生对于高深的理論科学的掌握，而且也牵涉到学生邏輯思維能力的訓練的問題。在教学中广泛使用数学工具，加强学生在数学方面的基本訓練，使学生的理論知識訓練得比較严格、比較深刻，才有可能在这种較深厚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創造，以便把我国科学提到更高的水平。

^① 恩格斯：《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5頁。



麥克米倫的碰壁和 “自由國家”之間的“合作紐帶”

· 張 振 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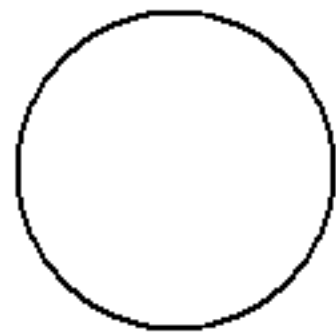
“在美國同歐洲的新關係中，美國的態度就像父母對子女似的”。

四月二十九日，英國《星期日電訊報》駐華盛頓記者用這樣一句啼笑皆非的話，談論白髮蒼蒼的麥克米倫遠渡重洋去同在年齡上是他的晚輩的肯尼迪會晤的事件。這位記者並作了這樣的注腳：“美國歡迎麥克米倫這位受到信任的老朋友的热烈情緒並沒有減少。但是像對從前的幾次英國首相訪問時的那種期望很大的氣氛，期望取得某種具體成就的氣氛，已經沒有了。”

這家報紙所說的英國不再受美國統治者的重視，是勢所必然的。因為麥克米倫是以“斗敗的公雞”的身份往見肯尼迪的。戰後以來，英國的政治、經濟勢力日漸衰落，英聯邦長期處於矛盾、渙散之中，這幾年與共同市場國家的角鬥中，英國又處於明顯的劣勢，它正在緊敲共同市場的大門，請求准予加入。在這種境況下，當年丘吉爾同羅斯福、艾德禮同杜魯門、甚至麥克米倫本人同艾森豪威爾那樣平等地會商西方大計的情況，自然是難以繼續維持了。麥克米倫四月二十五日飛抵紐約時，《紐約時報》就不客氣地說：“這位（英國）首相不能用前幾年的

權力說話了。英國本身現在已不再是過去那樣的國家了，它現在正在設法參加共同市場。因此，雖然這兩個政治家將作為平等者在華盛頓會晤，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肯尼迪處於比麥克米倫先生‘更為平等一些’的地位。”

不過，麥克米倫卻不會由於這類毫不客氣的奚落而退縮。因為他的訪問華盛頓是應肯尼迪的邀請，而非“不速之客”；更重要的是，他懂得雖然“肯尼迪比艾森豪威爾更準備蹂躪英國人的腳指頭”，雖然“美英聯盟”的概念已變得越來越模糊，但是從一定的角度看，美國今天所處的境地同英國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因為西歐共同市場的崛起，正在成為對美國和英國的共同威脅；戴高樂正在歐洲積極地搞脫離美國控制的“第三種政治力量”，並要求同美英分享原子秘密；西德在對外政策上也同美國經常存在着矛盾，並力爭使自己控制原子武器。這些都是肯尼迪所感到棘手的。在華盛頓當局對西歐的控制越來越發生問題的時候，衰老的大英帝國在山姆大叔的眼中，仍不失為一個可以利用的“伙伴”。顯然，麥克米倫正是要投肯尼迪政府的困難之機，想重整旗鼓；爭



取恢复当年“美英联盟”的盛景。

麦克米伦所乞求于肯尼迪的东西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要求后者支持英国在进入共同市场后仍能保有它在英联邦的利益，以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而不至降为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用麦克米伦这次在纽约的讲话来说就是：使“英国能履行其既作为一个英联邦国家又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双重义务”。

但是要实现这个要求，却是十分困难。原来，英国同西欧共同市场“六国”（西德、法、意、荷、比、卢）的谈判，在今年夏天将进入最后阶段。按照共同市场条约的规定，英国参加进去以后，在对六国逐步拆除关税壁垒的同时，对外必须采用共同的统一关税。这样就同英国传统上用以维系英联邦关系的帝国特惠制发生了冲突。因为它要遵守共同市场对外统一关税的规定，就不能对英联邦国家彼此实行贸易优惠制待遇。显然，如果英联邦其他国家的工业品、原料和农产品不能受优待地自由进入英国市场，那么英国的出口货物也就不能受优待地自由进入英联邦其他各国。这就会使英国对外贸易（它的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对英联邦国家）受到巨大损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英国在同“六国”的谈判中，一直要求共同市场国家也能同英联邦其他国家作出贸易特惠安排，以便英国参加共同市场后，基本上仍然保留它的帝国特惠制。但是，英国的如意算盘，却为一心想削弱英国的西欧国家所拒绝，它们只愿在英联邦的个别进口商品上考虑给予特惠安排，而且还只能是过渡性质。

英国如果不接受以上条约的规定，就不能加入共同市场，就要被隔绝于欧洲之外，失掉对欧洲经济和政治施加影响的能力，使自己的国际地位更加下落；如果要接受这些规定去加入共同市场，又舍不得丢掉英联邦。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局面，麦克米伦不得不去面见肯尼迪，请求给予支持。而英国所愿意付出的代价是：在它参加共同市场后，为美国控制西欧的政策尽犬马之劳；例如，支持美国的大西洋两岸同时实行减税政策的主张，压制法国和西德过分醉心于成为核大国的“无理要求”，帮助实现美国拟定的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计划并使其受美国指导，等等。

但是，麦克米伦想在加入共同市场后保持英国同英联邦其他国家特殊贸易关系的要求，并未得到肯尼迪的“谅解”。英国《每日快报》报道，会谈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肯尼迪）总统对麦克米伦在英联邦问题上的不动摇的立场表示了一点……不耐烦情绪”。

为什么会出現这种不愉快的局面呢？原来拆散討厭的英联邦体系，不但是亟欲向外扩张的共同市场国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华盛顿当局多年来求之不得的事。一直宣布要在对外贸易上开辟“新边疆”的肯尼迪政府，对于资源丰富的英联邦各国早已垂涎欲滴，随时找寻机会趁火打劫。英国《星期日快报》就曾指责说，在促使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向英国竭力述说放棄英联邦而同欧洲联合所能得到的经济利益，另一方



面实际上却在为自己夺取英联邦。现在麦克米倫要在这件事情上，求助于这位存心不良的“朋友”，这又怎能不碰壁呢？

不但这样，美国不肯答应让共同市場国家和英联邦国家之間作特殊貿易安排，还因为这种安排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肯尼迪政府正在由于共同市場国家加紧对农产品的进口作严格限制大伤脑筋，美国要保持它的农产品向西欧市場輸出本已困难重重，而現在英国的計劃如果实现，那么作为英联邦成員的加拿大和澳洲的小麦，将无阻拦地进入西欧，这就更会加重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困难，显然这是华盛顿所不願意的。

另外，如果英联邦的非洲热带国家同共同市場作出特殊貿易安排，将会使拉丁美洲国家在向西欧輸出咖啡、可可等原料时，处于极为不利的竞争地位，这种情况显然又是直接与美国的利益相关而为美国所害怕的。

美国和英国的这一矛盾就是这样的深刻而不可調和。因此，这次麦克米倫和肯尼迪进行会談时，肯尼迪对于英国在共同市場問題上的要求，不但不肯給予支持，甚至如合众国际社記者汉斯莱所报道的，他在会談中直截了当地用警告的口吻向麦克米倫表示，美国希望“英国加入共同市場的条件不会攪乱美国为了同这个新集团作出有利可图的貿易安排而进行的努力”。美联社記者糾利克也报道說，尽管肯尼迪和麦克米倫在会談中对共同市場这个問題的討論比其他任何問題为多，但是由于美英利益的冲突而未达成協議。

华盛顿当局这种对待英国的不友好行为，当然大大增加了英国的苦恼。不过，这决不是說，肯尼迪政府不急于要英国参加共同市場。相反，肯尼迪老早就主張建立包括英国在內的西欧的“政治和經濟一体化”，并不断施加压力，催促英国参加共同市場。因为把西欧的所有国家組織在一个区域性的机构內，一直是美国在战后对西欧的一项重要政策。美国要实现这样一个計劃，不但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陣营內爆发革命危机，防止帝国主义陣营更加走向四分五裂，以对抗強大的社会主义陣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做非常有利于美国进行控制。美国在战后通过馬歇尔計劃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欧洲經濟合作組織，欧洲支付同盟，欧洲煤鋼联营，欧洲原子能联营等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欧洲共同市場的建立之所以受到美国的积极支持，美国之所以要英国参加这个集团而不同意后者另立門戶，原因也在这里。

美国最近急于要英国参加共同市場，还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这就是，西欧共同市場經濟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今年年初，肯尼迪就惊呼：“欧洲共同市場的发展（向美国）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对于这种挑战的危險性，美国《讀者文摘》在一篇题为《共同市場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的文章中說得很明白。作者布鲁斯·汉契森写道：“毫无疑问，欧洲用它的成功的經濟管理已經向我們显示了清楚而现实的危險。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力量相等的世界市



場的竞争对手。欧洲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贸易集团，如果使用限制或歧视性的关税，以及它的武庫中的所有各种经济导弹，就能够挫伤北美洲的经济。这个集团一旦同美国展开一场经济战，就能蹂躏世界市场，并使自由的联盟破裂，从而把未来双手奉送给共产主义。”

为了应付共同市场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形成的对美国的威胁，并防止它们脱离美国的控制，肯尼迪提出了一个建立大西洋联盟的计划来防止这些国家自立门户。为此，他在今年年初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他的所谓“扩大贸易法”，以之作为一种谈判工具，要求在大西洋两岸同时减税，就是说，要拆除共同市场的关税壁垒。而美国要实现这些计划，就需要借助于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用它来冲淡共同市场国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小集团趋势。于是，肯尼迪在叫嚷大西洋两岸必须同时降低关税否则就会两败俱伤的同时，竭力利用英国在加入共同市场问题上的两难处境，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同它所不爱但又不能不去勉强结合的共同市场这个新娘结婚，以便美国从中渔利。美国的这种做法，既可以利用英、法、西德等国之间的重重矛盾，予以牵制和驾驭，防止“第三种政治力量”抬头；又可以乘机削弱英国，夺走它的英联邦，这真是一举数得的好买卖。

那么，西欧共同市场国家是否会乖乖地接受英国加入，并接受美国的大西洋联盟计划呢？这还要看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而定。

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错综复杂，共同市场国家在对待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条件方面是存在着分歧的，它们对于华盛顿当局，在军事和政治上仍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所有这一切都使情况复杂化，并有利于肯尼迪政府玩弄各种分化手段，继续保持它对欧洲的所谓领导地位。

不过，领导尽管是在领导，这个领导却一天天在动摇。

针对着肯尼迪迫不及待地要求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针对着美国政府焦急地要大西洋两岸同时降低关税和积极推行“大西洋联盟”的计划，共同市场国家已经在提出一些刁难。一向对美国“忠诚”的西德总理阿登纳，从来是表示欢迎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但是今年三月，阿登纳在巴黎接见法国《世界报》总编辑时却改口说：“太多的国家参加共同市场可能使这个集团‘爆炸’而成为某种巨大的经济单位”；英国是否“真正属于大陆欧洲”仍然是一个问题。他甚至同意戴高乐的这样看法：在“六国”和美国之间只能建立“合作”的关系，而“不可能简单地合并成为一个过大的联盟”。据合众国际社透露，最近阿登纳更表示反对英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认为英国只能作为共同市场的一个联系成员。尽管事后阿登纳政府为了不愿把事情弄得太僵，因而对阿登纳的话又加以否认，但是，这并不能勾销掉西德同美国之间实际上存在的矛盾。路透社记者赫弗南就报道说，这事已引起华盛顿官员的“相当不安”；“某些观察家担心阿登纳可能支持



戴高乐而设法使西欧（不包括英国）实现政治联盟”。至于一直同美国大闹别扭的法国，它的反美情绪就更加突出。戴高乐一直在设法阻止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这已经不是秘密。另外，他还不肯把从阿尔及利亚撤回的两师军队交给北大西洋集团，不许美国把核弹头存放在法国，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独霸核威慑力量的专横态度。

“加强工业化的自由国家之间的合作纽带”，这是华盛顿当局所一贯叫嚷的“外交总路线”之一，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尴尬处境而停止对于所谓“合作纽带”的吹嘘，但是只要把这块金字招牌揭开，其内容之污秽丑恶即暴露无遗，因为这种所谓“合作纽带”本来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间尔虞我诈的产物。

如此“就业机会均等”

胡 思 升

近来，美国统治集团围绕国内的黑人问题，接二连三地吹起了一种动听的调子。

肯尼迪在今年一月的国情咨文里信誓旦旦地说，美国政府“主张在民权方面得到发展……（美国公民）不分种族和肤色，保证得到充分的平等权利”。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跑到非洲象牙海岸去，也吹嘘说，自从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被美国政府雇用的美国黑人的数目逐渐增加了，言下之意是，今日美国黑人的境遇，已非昔日可比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话又做了具体的补充。这家御用刊物在今年三月五日的一期中，特地刊登了一篇有关美国黑人民权的中心问题——就业的文章，并

且配以官方提供的统计图表和十七幅黑人就任政府职务的照片，煞有介事地大吹大擂起来。

文章的题目叫做“为了黑人：更多和更好地在政府中工作”。确实响亮！编者还用粗体黑字加上了这样的按语：“黑人进入政府工作的肤色限制已经废除。在肯尼迪总统的命令下，黑人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而且是更好的工作。”这篇文章像透露秘闻似地谈到肯尼迪进入白宫后的“首要事情之一”，就是着手研究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白人和黑人的薪金分配比例，并且在他就任的第一年内下令贯彻“就业机会均等”政策。尽管白宫的这个御用宣传刊物竭力替美国种族歧视



的现状涂脂抹粉，但是，人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看出，它的吹嘘不仅没有能掩盖住美国垄断资本所培育的一整套种族歧视制度的实质，反而把美国统治集团的面目涂得更丑，抹得更黑了。

首先，这家杂志吹嘘黑人在美国政府部门中就业的比例大大增加，并说“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下令增加政府部门黑人雇员的数目”。但是，美国统治集团在哪些部门中特别“关怀”黑人呢？人们看到，在就业比例上占第一位的是总务局，黑人占该部门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数目的确不少。什么叫“总务局”呢？这家杂志解释说，这是“政府为所属的政府建筑物提供看管或类似服务的‘家务性’单位”。原来如此！这不就是为政府大厦看门、擦玻璃、拖地板、开电梯、送茶倒水等等为“高等白人”低头弯腰的勤杂工作吗？说起来冠冕堂皇，美国政府的一个单位就业人数中的黑人比例已经增加到三分之一，但是，这部分黑人担任工作的情况，恰恰就是美国“公民权利委员会”列举的种族歧视的丑恶现象之一，即黑人通常是担任最繁重的粗活；这也恰恰是盛行种族歧视的美国南方各州在“就业歧视”上的翻版，即对黑人工人的提升，只能从“看管厕所”提升为“清洁工”。再如，这家杂志说，美国邮政部雇用的黑人，在绝对数字上占第二位，共计八万五千人。本来嘛，叫更多的黑人去分发信件和递送电报，跑跑腿，是无损于“高级白人”的统治的。黑人干的是粗活，挣的是低工资。在事实面前，这家杂志也不

得不承认：“今天绝大多数黑人集中在低工资的工作上”。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家杂志所提供的关于黑人在“国防部门”的“就业”占绝对数字第一位的材料：有十万以上的黑人受雇于国防部当兵，“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黑人受雇数字”。然而，这与其说是“就业”，不如说是被美国统治集团雇用来充当炮灰更合适些。

总之，干粗活、做跑腿、当炮灰，这就是“为了黑人”，这就是所谓给予黑人“更多更好的工作”，这就是所谓“肤色限制已经废除”，这就是肯尼迪“就业机会均等”政策的“德政”！

以上这些，还只是这家杂志透露出来的黑人在政府部门“就业”的片断的情况，至于广大美国黑人失业的情况，它根本没有敢触及到。美国黑人工人大批失业，失业的比率大大高于白人工人失业的比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根据美国全国都市同盟的调查，在十二个美国大城市中，包括像芝加哥、底特律、费城、克利夫兰和圣路易这样的城市，黑人工人总人数中失业者的比率相当于当地工人总人数中失业者的比率的三倍。甚至肯尼迪手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二十二日的一份报告中也被迫承认，美国在就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非白种工人不到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二，但却占失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和占失业十五星期以上的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这种事实，再一次挑开了肯尼迪挂起的“就业机会均等”和黑人白人享受“充分平等权利”的遮丑布，从



一个侧面露出了当今美国种族歧视的真实景象。如果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宣传标题改为“为了黑人：更少和更坏的工作”，不是更贴切些吗？

肯尼迪之流的所谓消除种族歧视的高调和事实相去如此之远，人们不禁要追问一下，他们装做对黑人“关怀备至”的样子，到底居心何在？

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种种丑闻，显然是不利于肯尼迪政府打着“攀亲戚”的旗号，向非洲推行它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到非洲去“攀亲戚”的美国政府的一些要人，常因被人揭发“家丑”而弄得瞠目结舌、狼狈万状。就拿今年的一个例子来说，在二月八日的晚上，正当美国所谓“非洲十字路口”工作队副主任林赛·怀特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大学做所谓“各国之间的谅解”的诱惑人心的讲演时，听众就曾狠狠地将了这位美国头面人物一军；当时，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向他责问：正当美国本身存在着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时候，怎么能够促进‘国际谅解’呢？这使美国的《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也不能不担忧：如果美国仍然不愿意让美国黑人得到比勉强给予的象征性的公民地位以更多的东西的话，美国就不能说服非洲的愤怒的群众，使他们相信美国的制度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狡猾的肯尼迪政府在掩盖和粉饰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丑闻方面着实花了一番苦心，它所以在黑人“就业”问题上这样大做文章，不但是企图欺骗美国人民，同时也是企图欺骗非洲人民而想出的“应变”的花招。

但是，不管肯尼迪之流的骗术如何花样翻新，他们一手终究难遮天下人的耳目。事实是，除了黑人的就业问题以外，美国国内大量存在的种族歧视的事实，随时都在使他们的骗术露底。什么蒙哥马利城事件，什么“自由乘客”事件，以及层出不穷的殴打和侮辱非洲国家驻美外交官的事件，不都是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轰动世界的丑闻吗？美国国内的黑人群众和许多非洲人士，已经从这些事件中日益识破肯尼迪政府的虚伪面目。美国《纽约邮报》今年四月十日发表的密尔顿·维尔斯特的文章承认：“肯尼迪政府已经由于黑人领袖们（对它）加紧抨击而开始感到刺痛”。这个作者说，黑人团体的一些发言人指出，在一九六〇年的选举中，许多黑人曾经由于肯尼迪对他们许下诺言而支持他，但是他们对肯尼迪一直没有实现这些诺言越来越不满。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劳工秘书赫伯特·希耳今年四月初指责说，美国政府关于在同政府订有合同的企业中禁止种族歧视的计划，“在宣传上捞到很大好处，但是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只有表面上的、象征性的结果”。一位非洲国家驻美国使馆的参赞愤怒地说，美国“现在一方面在无休止地谈论平等，可是另一方面却明目张胆地实行种族歧视”；他强调说，“我不相信这个国家”。

事实俱在，肯尼迪之流的“给黑人以更多更好的工作”之类的鬼话，究竟能值几文钱呢？肯尼迪竭力掩盖和粉饰国内种族歧视的丑行，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11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 ★

目 录

社論：积极开展技术政策的科学研究和

討論 (1)

西方哲学史中的主观能动性問題..... 汝 信 (6)

試驗和推广.....李守璋 李学昆 (17)

“新边疆”和“全球战略”的真谛陈 原 (20)

“和平革命”的招牌和殖民主义的

实质.....鍾国豪 (24)

肯尼迪正在南越重蹈历史的复轍..... 陈有为 (29)

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

按比例的发展 許滌新 (32)

教学小品 敢 峰 (38)

漫画：“拓荒的勇士們，开步走！”.....江有生 (23)

☆ 六月一日出版 ☆



— 社 論 —

积极开展技术政策的科学研究和討論

在我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科学技术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建国十几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参加国家建設中各种科学技术問題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們的劳动和貢獻，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不仅有許多具体科学技术問題，需要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参与研究和解决，而且有許多技术政策和重大技术措施問題，也需要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試驗，参与討論和解决。这样的問題在各方面都有，例如，有关农田耕作制度的确定和改革，优良品种的选择，森林采伐和更新的方式，水利工程修建和利用的原则，重大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和推广，各种工业的原料材料选择和构成的方案，各种燃料和动力机械的构成比例，不同生产部門机械化、自动化的水平等等的問題，以至如何利用自然資源和自然条件的规划，在什么地方建立什么商品粮食和經濟作物的基地，在什么地方建立什么工业等等的問題。技术政策和重大技术措施的制定，关系到国家建設各个方面的重大部署和生产技术各个方面的发展方向。决策正确，建設工作就能进行得多、快、好、省；决策有缺点或錯誤，就会給建設工作造成損失。

正确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和要求，适应我国社会經濟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充分地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符合我国自然資源的情况和特点，合乎科学技术的規律，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为了制定技术政策和重大的技术措施，一方面，有許多經濟問題需要研究，有关的政治因素也需要考虑；另一方面，有許多科学技术問題需要研究。一項技术政策和措施在科学技术上是否有充足的根据，是否合理，是这项技术政策和措施能否在經濟上达到多、快、好、省的根本前提。因此，国家建設工作的各个領導部門，應該十分重視組織有关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科学研究和討論，把这种研究和討論当作决定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必要的基础工作之一。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当苏联刚刚开始經濟建設的时候，列宁曾經組織了二百位科学技术专家参加制定全俄电气化的統一經濟計劃。在討論这个电气化計劃的全俄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說：“我們是在非常重大的轉变关头在这里开会的，这个轉变無論如何都证



明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①

我们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方针、政策、措施，从来是主张走群众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当然也要采取这个方法。在科学技术问题上走群众路线，就是说：既要集中广大工农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也要集中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经验和智慧。技术政策和重大技术措施问题，既然对国家建设事业有重大的影响，就更加需要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倾听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有较高造诣和较多经验的科学技术专家的意见。这是我们国家建设工作中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科学技术人员来说，积极参加国家建设规划和技术政策、技术措施问题的讨论和制定，在这些工作中，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研究成果，从科学上、技术上和经济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对于国家事业的政治热情、主人翁态度和责任感的重要表现。

在研究、讨论各项技术政策和措施的时候，会出现许多学术上不同的意见和技术上不同的方案，会发生许多争论。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来对待这些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呢？我们党的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方针。这个方针要求我们在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问题的科学讨论中，必须容许和鼓励人们发表不同的科学技术见解，提出不同的技术路线、方案、方法和设计，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让不同的见解、方案、学派都有条件进行研究、试验，并且自由地进行争论，自由地相互比较。

认识自然规律，要经历曲折的道路。要在实际生产中很好地利用自然规律，又需要研究各种复杂的工程技术问题。制定技术政策和确定重大的技术措施时，还要结合我国自然资源的特点，结合我国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这就必须考虑到许多极为复杂的情况和因素。在进行各项生产建设工作时，不但应该力求获得目前的、直接的有益效果，而且要考虑长远的、间接的良好后果，预防和克服各种消极的后果。一项技术政策和重大技术措施的采择，不但会影响到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利益，而且往往还影响到其他部门、其他地方的利益。充分认识这些目前和长远、直接和间接、局部和全局的后果，并正确地加以处理，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此，在研究各种科学技术问题时，在讨论各种技术政策和措施时，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出现关于技术路线、方案、方法、设计等等的各种不同主张，是十分自然的。

不同的科学技术见解可能是各有所见，各有所偏；经过自由的同志式的讨论和批评，可以克服各种错误和片面的认识，达到比较一致、比较正确、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不同的技术

^①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6页。



路綫、方案、設計等，也可能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通過具體的分析和比較，權衡它們在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優劣利弊，可以擇優汰劣，選取一個比較合理和先進的路綫、方案和設計，或者取長補短，促成一個新的、更合理、更先進的路綫、方案和設計的出現。如果意見十分分歧，爭論相持不下，很難統一，那末我們就應該考慮，對這項技術政策和措施作出決定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或者在實行某些措施時採取更加慎重的步驟。因此，這種充分揭露矛盾，力陳利弊的討論，對於我們最後制定出正確的或者比較正確的技術政策和措施來說，對於我們在生產技術上進行正確的或者比較正確的領導和指揮來說，是極為有利和十分必要的事情。

自然科學和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關於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不同學術見解和技術見解的爭論，一般來說，都是屬於認識過程中的矛盾的表現，而不是階級利益衝突的表現。因此，在關於技術政策和措施的研究和討論中，對於不同的學術見解、技術方案等等，不應該貼上各種階級的、政治的標籤。當然，實行不同的技術政策、措施和方案，會影響到國家的建設事業，使它搞得更好一些、快一些，或者差一些、慢一些，甚至受到損失。但是，不能把科學技術方面的不同主張，把由於認識不足而提出的較差的甚至錯誤的主張，當作政治性質的錯誤來批評。而且究竟哪一種主張較好，哪一種主張較差，並不是很容易地就能判定的；如果忽略了各種複雜的條件，只從某種片面的見解出發，就輕率地判定某一種主張是唯一正確的主張，而把其餘的主張看成是錯誤的，這種判斷當然是不可靠的。

在科學技術上，我們不但提倡敢想、敢說，而且提倡敢干。敢干，就是說，敢于去進行試驗。一切科學技術上的創舉，必須經過充分的研究和試驗，有了可靠的根據，才能逐步推廣。一切未經試驗證明切实可行的技術措施，絕不應該推廣。在進行試驗時，如果條件允許，應該儘可能使不同的技術路綫、方案、方法和設計都能進行試驗研究，使它們有通過實踐獲得考驗和比較的機會。有一些試驗研究工作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得出結果，對於這些工作，我們應該看得遠一些，及早地作出安排。

在技術政策和措施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中，應該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國的經驗。當然，各個國家技術的發展，決定於每個國家的經濟制度和具體的社會條件與自然條件。社會主義制度，為按照科學技術的合理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造自然，發展生產，开辟了廣闊的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技術的發展則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束縛和影響。但是，應該看到，不僅是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就是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技術發展的經驗，也會有許多共同的东西，可資學習和借鑒。一種技術能否在一個國家、在一個企業被採用，而且取得經濟上的良好效果，總要取決於這種技術本身在經濟上的優越性，取決於自然資源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近年來，有許多技術，因為在經濟上的巨大優越性，以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在社會



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得到普遍的发展。合成纖維和塑料技术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例子。因此，在討論各种技术政策和措施时，应该广泛收集和研究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发展的情况；研究各个国家在发展技术、改造自然方面的历史經驗，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經驗。这些情况和經驗，在某种意义上說，都是为我們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技术路綫、方案、方法和設計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比較，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們自己的生产和建設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結論。

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討論，与制定和执行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实际工作，是有联系的，但是它們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情。对于学术討論，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需要、也不应该由行政上对爭論的問題作出結論；而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执行，是实际工作問題，需要由有关的行政和技术领导机关在一定时期內經過慎重的选择，作出决定，按照某种学术見解，某个技术路綫、方案、方法和設計等来采取实际行动。

在制定和执行技术政策和措施时，必須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是：（一）在制定技术政策和措施之前，要高度发揚民主，充分展开討論，仔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見。科学研究和学术討論越是充分地进行，当然越是有利于制定正确的技术政策和措施。（二）对必須作出决定的实际工作問題，在民主討論、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根据职权的規定，由有关的行政和技术领导机关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凡是規定必須执行的，有关的工作人员都要认真地执行，不能因为在学术上、技术上抱有不同的見解，而各行其是。如果因为在科学研究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容許在工作中不按行政的决定办事，那当然是不对的。（三）作出决定以后，在有关的工作人员切实遵守决定的前提下，仍然容許有人保留和繼續提出不同的意見，甚至反对的意見，仍然容許不同的見解、方案、学派进行研究、試驗、自由討論。如果因为工作上有了行政的决定，就不容許学术上的自由討論，当然也是不对的。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决定，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必須根据实际經驗，根据条件的变化，根据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来不断地加以补充，使它更加完善。如果发现有些决定錯了，就应该及时改正。因此，对于执行中的各项技术政策和措施，广大群众、工作干部、科学技术工作者通过一定的方式，提出各种批評和建議，总是有好处的，总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在决定一項技术政策和措施时，作出的各项結論，都是工作上的結論，而不是学术上的結論。在工作上已經按照某种学术見解作了决定，并不等于学术問題的是非已經有了判定。学术上的是非，应该而且只有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討論，通过实践的考驗才能解决。

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的决定和执行，是一个复杂的問題。在我們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中有全民所有制，也有集体所有制，在各个地区間，有人力物力财力条件的不同，自然資源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在制定和执行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时，就要充分考虑这些不同的条件，充分



利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不能简单化；还要注意因时因地制宜，有必要的灵活性。

一项技术措施，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好的，在另一种条件下，不一定是好的。例如，在水利工作中以蓄为主，在某些山区是好的，在某些平原地区就不一定是好的。有些不同的技术措施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同时采用，相互补充。例如，在森林更新的方式上，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的关系有时就是这样。

在推广先进的技术措施的时候，对于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只能采取建议、宣传、示范和提供各种条件的办法来提倡，而不能采取命令的办法来推广；对于全民所有制的工业生产，也要区别情况，有些事情只应该采取建议、示范的办法，有些则需要下命令执行。无论是哪种情况，又都必须经过试验，证明可行，才能推广。同时，在技术上，有些是重大的方针性、政策性问题，是关系重大的措施，需要由一定的上级机关讨论和决定；有些则是执行中的具体技术措施和技术管理的问题，应该根据职权的规定，由有关的技术人员负责决定和执行，其他人不要加以干涉。总之，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条件和情况，才能使技术政策和措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

在讨论、制定和执行各种技术政策和措施时，怎样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在有关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科学研究和讨论中，怎样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制定和执行技术政策和措施中，怎样实行民主集中制，怎样保持必要的一致性和灵活性，——对这些问题，各个生产和建设部门几年来都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现在需要总结这些经验，细致地研究和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使这些原则精神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

各个生产和建设部门，应该积极组织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科学研究和讨论。特别是那些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上又比较成熟的问题，更要抓紧进行试验研究和讨论，争取早日取得积极的成果，以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在吸收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参加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问题的讨论时，应该给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料 and 进行考察、试验的条件等等。有一些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研究和讨论，如某些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涉及到几个生产部门，需要由有关的领导部门进行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机关和学术团体，也应该把组织科学技术人员参与技术政策和措施问题的科学研究和讨论，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毛泽东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①。积极地开展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科学研究和讨论，在这种研究和讨论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可以使我们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更加先进，更加合理，更加符合于我国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社会经济条件，更加符合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西方哲学史中的主观能动性問題

汝 信

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是关涉到主体和客体、人和周圍世界的相互关系的重大哲学問題。这个問題和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不仅具有理論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曾經引起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們的热烈探討。但是在馬克思主义哲学誕生以前，这个問題从来没有得到正确而彻底的解决。为了系統地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說明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面的偉大历史貢獻，有必要对以往的哲学史作一个簡略的回顾。

* * *

在西方哲学史上，严格地說，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是近代才出現的哲学概念。西方哲学思想肇始于奴隶占有制时期的古希腊。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对自然的認識处于幼稚的神話时代，支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微弱，因此，人們对主体和客体之間的关系还缺乏明确的理解，还不能在真正科学意义上提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問題。另一方面，古希腊的哲学家們，不論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是当时社会的統治階級，即奴隶主階級的思想代表。他們脫离生产劳动，鄙視物质生产实践，把脫离

实践的純理論活动奉为最高的生活理想。古希腊最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生的最高幸福，在于观照所謂理念世界^①。另一个古代偉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認識或观照置于实践行动和創造之上，把它看作最高級的人类活动。在他看来，理性的沉思活动是“人的最完滿的幸福”，因为它“既有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②。这种靜观的哲学观点，在当时进步的唯物主义者身上也同样可以看到。例如古希腊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德謨克里特就认为，平靜安泰的生活是人的理想，“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③。显而易见，古希腊哲学的这种靜观性质，使它不可能认真地探討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

应该指出，我們在个别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的萌芽。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关于形式和质

① 参閱《柏拉图文艺对話集》，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176—178、284—287頁。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学》第10卷，第7章。見《古希腊羅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27頁。

③ 参閱《古希腊羅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7頁。



料的学說中，把形式看作积极的、能动的本原，似乎由于形式的作用，才使包含在消极的质料中的可能性轉化为现实。比如說，建筑材料（质料）之所以成为一座建筑，是由于建筑家的設計图（形式）的作用。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他对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素朴的理解。但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謂形式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一切存在的本质，而不是专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且归根到底和神学的目的論观念結合在一起，他认为神是“一切形式的形式”、“第一推动力”。因此，我們很难說亚里士多德已經明确地認識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

大致說来，这种情况在整个欧洲中世紀哲学中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經院哲学占統治地位、宗教蒙昧主义势力横行的条件下，哲学淪为神学的侍婢。經院哲学家們大多对现实生活不感兴趣，他們极端鄙視自然，鄙視物质实践，甚至連带到鄙視肉体。他們沉溺于抽象的思辨和煩瑣的形式主义的爭論，鼓吹禁欲主义，追求“灵魂解脫”和神秘的内心生活。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的支配下，一切都被归結为上帝的安排，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几乎完全被抹煞了。

在西方哲学史上，明确地提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是在封建制度开始崩潰、资本主义关系初步形成的时期。早期的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們，对封建主义及其思想支柱經院哲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們尖銳地批判了宗教哲学家們脱离实际、蔑視自然和貶低科学知識的观点，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論准备。他們反映当时生产力巨大发展和新兴

资产阶级的需要，强烈地要求認識和支配自然，提倡实践，宣傳科学精神。这样，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提到議事日程上来了。

一般认为，十七世紀的英国著名唯物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是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強調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哲学家。馬克思把他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現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①，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績。

“知識就是力量”，这是培根的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培根推崇知識，強調知識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知識是人們駕馭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源泉。在他看来，以往的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的主要缺陷，就是它的思辨的、靜观的性质。培根反对脱离实践的空談，要求知識服务于实践。他认为人类应该确立大志，凭借科学知識的帮助，努力扩展人类对于宇宙的权利和統治，也就是說，他要求人們尽可能發揮主观能动作用，去掌握知識，征服自然。因此他謳歌一切发明創造，把它看作是最高貴的人类活动；他鼓励人們破除迷信，大胆追求科学知識，反复強調知識的偉大威力；他号召人們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

作为唯物主义的捍卫者，培根闡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那就是，人要發揮主观能动作用，必須以認識客观規律为前提，必須充分尊重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才能收

^① 《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頁。



到实际的效果。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奴隶，但要驾驭自然，首先必须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的各种规律。因此，对自然的正确的知识，是人们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真正基础。他说：“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因为原因如果没有知道，结果也就不能产生。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在思考中作为原因的东西，在行动中便构成规则。”^①这些话表明，培根已经注意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并且指出，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可以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培根的很大贡献。

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培根虽然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但他的理解却是朴素的、直观的。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实践的理解还很狭隘。他所承认的实践只限于科学实验，只是单纯的技术活动，他不了解广泛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因此，在他那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要限制在科学实验室里。尤其是，培根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探讨主观能动性，所以他不能了解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培根的哲学观点带有“神学的不彻底性”^②，承认“双重真理”，为宗教信仰留下了地盘，这也妨碍了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达到更高的理解。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培根的后继者没有进一步发挥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在主客观的关系问题上，流行着机械决定论的看法。无论霍布斯、洛克或者斯宾诺莎，他们都片面地强调自

然对人的制约作用，忽视人对外部世界的反作用。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的第一个特有的、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就是把力学的比例尺用于化学过程和有机界的过程，广泛地用纯粹机械的原因去解释各种现象。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拉美特利写过一部以《人是机器》为题的名著，在他看来，人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③。这种把人看作机器的观点，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中间得到了普遍的支持。霍尔巴赫认为可以用纯粹的机械作用来解释各种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而狄德罗则把人叫作“由血肉组成的机器”，似乎人与铁制机器的区别，仅在于人是由血肉组成的，人在运行时是有意識的。应该承认，这种观点在当时反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可是把人当作机器，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人看作纯粹由外力刺激所推动的被动的东西，这样就必然会片面地夸大对周围世界的消极的承受性，而忽视人的积极的能动作用。

法国唯物主义者强调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他们认为：人是自然界的创造物，他生活在

① 《新工具》。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页。

②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③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65页。



自然界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他不能摆脱自然界，甚至他的思想也不能超出自然界。就承认客观规律对人的制约作用这一方面来说，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只是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的决定作用，没有注意到人们也能依据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面。

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意识活动完全由外部世界所造成的印象而引起，人们在行动时，表面上似乎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实际上却只是一系列外部原因支配他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服从于自然界的铁的必然性，人的意志不能影响事物的进程，一切都已经预先决定。这样，他们就由反对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说”，而倒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

从机械决定论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宿命论。大多数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宿命论者。这种宿命论的倾向在霍尔巴赫的巨著《自然体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看来，“我们的行为都是命中注定的”。他这样写道：“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或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像在自然界发生的或我们认为自然界所造成的一切一样，都归于必然的原因，这些原因按照必然的规律而起作用，产生必然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又产生另一些结果。命中注定性，这就是在自然界建立的永恒的、不动的、必然的秩序……支配物理世界运动的必然性，也支配着精神世界的一切运动，因此，精神世界的一切也都是命中注定的。”^①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非人力所能影响，那末谈论人的主观

能动性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法国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贯彻在他们的哲学学说的各个方面。在认识论方面，他们大多坚持唯物主义感觉论的立场，把整个认识过程归结为通过我们的感官被动地从外界接受印象，消极地反映外部世界的过程，而忽视了人在高级认识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上的能动作用。在社会伦理学说方面，他们强调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不理解环境是可以由人来改变的。正因为不能正确地解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所以他们终于陷入无法自拔的循环论：一方面认为，“意见支配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意见单纯是社会环境的结果，最后不得不到“人性”中去寻找出路，沦为唯心主义的俘虏。总之，他们的根本缺陷就是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因此他们不可能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应有的估价，对周围世界采取了消极直观的态度。

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相反，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着重探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可以说，这个倾向是从康德开始的。

康德的所谓“批判哲学”的出发点，就是认为在研究人的认识之前，必须先对人的认识能力作批判的考察。康德企图脱离具体的认识过程去考察人的认识能力，黑格尔正当地讽刺说，这是教人在下水以前学会游泳。

^① 霍尔巴赫：《自然体系》，1777年法文版，第173—174页。



康德的观点虽然极其錯誤，却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即認識主体在認識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問題。

康德认为，人們要認識自然，要受教于自然，就必须接近自然，可是理性不能听任自己为自然所支配，它受教于自然，决不能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唯教师之言是听，而要充当法官，强迫证人回答它自己所提出的問題^①。这也就是说，人在認識过程中不应当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而应该积极地發揮主观能动性。

康德在認識論方面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断定說，客观事物本身，即所謂“物自体”是我們永远不能認識的，我們只能認識現象，而这个現象世界則是人的意識的产物，認識的对象是由主体的主观認識能力和創造活动所創造的。康德強調的是“意識从其自身产生观念的能力，認識的主动性”^②，他把它叫做知性。在他看来，物本身并没有什么規律性和因果联系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知性形式加在物身上的，因此知性是真正的“自然的立法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康德虽然重視人在認識中的能动作用，但把这种作用片面地夸大到荒謬的程度，以致把許多客观存在的東西都歪曲成主观的产物。

一般說来，康德也主張实践，他认为实践理性与純粹思辨理性相比是占着优先地位的，因为“一切利益終归属于实践范圍，而且甚至思辨理性的利益也只是有条件的，并且只有在实践运用中才能圓滿完成”^③。但是，康德所說的实践只局限于抽象的道德意識的活动范圍內。他強調人在实践中的主动

性，反对被动性，指的只是人在道德方面的自由的“自律”，也就是說道德律的遵守出于人們的自由意志，不帶任何利己的动机，也不問效果如何。康德的这种脫离现实的空洞的道德說教，正是当时怯懦的德国資产階級不敢真正地参加社会革命实践而沉溺于自由的幻想的絕妙写照。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談論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也就不能不帶有极端抽象的性质了。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另一个著名代表費希特，在探討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比康德走得远一步。

費希特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疇就是行动。在他看来，整个世界只是自我意識的实现，因此应该从“自我”出发。“自我”不是存在，而是行动，它是絕对的、毫无任何限制的东西，它不是事实 (Tatsache)，而就是行动本身 (Thathandlung)。費希特高唱：“行动，行动——这就是我們存在的目的。”^④

在費希特那里，这种对于主观能动性的強調，是同他的整个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密切結合的。在他看来，作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的“絕对的自我”是絕对无条件的，不为任何更高的东西所决定。“絕对的自我”的

① 參閱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文，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頁。

②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学》，商务印书館1960年版，第30頁。

③ 參閱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館1960年版，第124頁。

④ 費希特：《論学者的使命》，1935年俄文版，第63頁。



第一个行动就是设定自己，但要使“自我”的活动成为自觉的活动，就必须遇到反作用。因此，“绝对自我”的第二个行动就是设立“自我”的对立面：“非我”，亦即人周围的整个客观世界。费希特认为，“自我”与“非我”的对立、主客体的对立，完全是通过“自我”的活动才建立起来的，而且只存在于“自我”之中。这样，“自我”就成为整个世界和永恒运动的唯一来源，一切都决定于“自我”的活动和意志，因此费希特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我论和唯意志论的泥沼。

从上面可以看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被费希特极端夸大了，甚至被他説成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外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即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现实的客观基础完全被他取消了。费希特的错误不仅在于片面地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且还在于把主观能动性看作纯理论的精神活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指出，费希特的“自我”无非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①。因此，费希特所说的那种“自我”的能动性，也始终没有能超出精神、自我意识的范围。

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更深刻的探讨，应该说，黑格尔对于主观能动性的理解是比他的先驱者们更接近于真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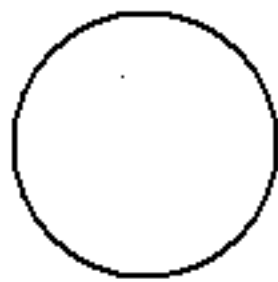
早在《精神现象学》一书的著名的序言中，黑格尔就已发挥了绝对即主体的思想。在他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②，而活的实体，只有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它才真正是主体。在

这里，黑格尔是针对斯宾诺莎而言的。黑格尔批评斯宾诺莎的实体只有客观性，缺乏能动性，因此他用唯心主义观点改造了斯宾诺莎的实体，把实体说成是主体。作为主体的实体，本身是积极能动的，它从自身中树立起对立面，自身分裂为二，异化为客体，然后又克服这种异化，征服客体，在这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大家知道，在黑格尔那里，主体指的是自己发展的“绝对精神”。他认为“绝对精神”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活动的本原、能动的力量。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它表现为逻辑概念的发展；在第二个阶段上，它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异化”为自然；最后在第三个阶段上，又扬弃这个对立面而回复到自身，终于达到了自我认识的目的。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主体凭着自己的力量发挥能动的创造作用的结果，精神从自身中“异化”出自自然界，最后又把自然界“据为己有”。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就是描述精神的这个自己运动的历史。

黑格尔认为，人不仅要理解世界，而且还要去“宰制”世界。他说：“人类的努力，一般地讲来，总是趋向于理解世界，能自己适应并宰制世界，目的总在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换言之，加以理想化，使符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页。



合自己的准則。”^①在《邏輯學》里，黑格爾以非常抽象晦澀的形式，表述了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思想。根據黑格爾的說法，認識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在理論活動中，人們主要是研究客觀世界，獲得知識，以糾正自己的主觀片面性；在實踐活動中，人們就要按照自己的觀念來改造客觀世界。在他看來，理論和實踐應該是統一的，絕對理念便是“理論的和實踐的觀念的統一”^②。列寧對黑格爾的這些思想給予很高的評價，並且作了高度的概括和唯物主義的改造：“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客觀世界”，“世界不會滿足人，人決心以自己的行動來改變世界”^③。

黑格爾強調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認為兩者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在他看來，由於思維具有主動性和創造性，它可以轉化為存在，又從存在返回到自身，這種轉化正是人、精神的主觀能動作用的明顯表現之一。唯心主義者黑格爾堅持精神第一性的原則，把存在統一於思維，這當然是完全錯誤的。但是，他反對把思維和存在絕對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的形而上學觀點，強調思維對存在的能動作用的辯證法思想，卻包含着“合理的內核”。所以列寧說：“觀念的東西轉化為實在的東西，這個思想是深刻的……，那裏有許多真理。反對庸俗唯物主義。”^④

黑格爾對於人的活動和客觀條件的辯證關係已經有了相當的理解，例如他在研究從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時，指出必然性的三個環節是：條件、實質和活動。有了條件和實質，還必須通過活動才能使實在的可能性

變成現實；反過來說，活動之所以可能，也僅僅是由於有了條件和有了實質。黑格爾寫道：“活動僅是一種從條件里建立起實質（實質本來潛伏在條件里）的運動”^⑤。這就是說，人的活動是離不開客觀條件的，然而單具備了客觀條件而不經過人的活動，可能性仍然不會轉化為現實。這個看法確實是相當深刻的、辯證的。

但是，作為一個唯心主義者，黑格爾沒有也不可能對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真正科學的解釋。問題在於，“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所稱為觀念而甚至將其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不過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⑥正因為這樣，黑格爾哲學就有着“兒子生出母親，精神產生自然界”^⑦的神秘主義色彩。在他那裏，一切都顛倒過來了，整個客觀世界、客體只不過是精神、主體的“異在”，因而出現在主體面前、與主體相對立的客體，只是主體自身，即“對象化了的自我意識”。這樣看來，主體對客體的主觀能動作用、對客觀世界的改造，歸根到底始終只是在主體的自

①② 黑格爾：《小邏輯》，三聯書店1954年版，第133、421頁。

③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8、229頁。

④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頁。

⑤ 黑格爾：《小邏輯》，三聯書店1954年版，第318頁。

⑥ 《資本論》第2版跋。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435頁。

⑦ 《神聖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4頁。



我意識的範圍內進行，始終只是思辨的實踐活動。

黑格爾對勞動的理解，也說明他未能正確地解釋人的主觀能动性問題。馬克思曾經指出，黑格爾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認識到勞動的本質，把對象化的人……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但是“黑格爾所認識的並承認的勞動乃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①。因此，儘管黑格爾看到了勞動在歷史發展和人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可是他所理解的勞動，不是具體的社會生產實踐，而只是思維活動，只是自我意識使自己“異化”為對象又克服這種“異化”的精神活動。由此可見，人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的真正的主觀能动性作用，仍然是黑格爾所沒有理解的。

黑格爾哲學的批判者費爾巴哈，拋棄了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傳統路線，而重新恢復了唯物主義的“王位”。費爾巴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了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學說，並且比他們更前進了一步，可是他的人本主義哲學，沒有擺脫忽視人的主觀能动性的缺陷。

費爾巴哈不再把人當作機器，這確實是一個進步。但是，“費爾巴哈談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現實的歷史的人’”^②。他所說的人，指的是自然的、“一般的人”。因此，在他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除了純粹自然的關係、即兩性關係外，就只有“愛”和“友誼”。他只看到生物學的人，而看不到社會的人。這樣，他當然就不可能理解人們的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的意義。

費爾巴哈也談到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相互

作用，但是他把主體、人只看作“感性的對象”，而不看作“感性的活動”。馬克思指出，費爾巴哈不理解，人的感性活動，即不斷的勞動和創造，乃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在他那裡，人對周圍客觀世界始終只採取感性直觀的態度，似乎人不能改變和創造對象，只能觀察和使用對象。因此，從根本上說，人在自然界面前仍然處於被動的地位。

費爾巴哈所以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动性，歸根到底是由於他不理解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係。當然，他有時也談到實踐的作用，例如他說過：“理論所不能解決的那些疑難，實踐會給你解決。”^③但是他把實踐狹隘地理解為人們之間的生活關係，而且他總是貶低實踐活動，把它放在理論活動之下，認為“理論的直觀……是令人喜悅的、令人滿足的、幸福的直觀”，而實踐的直觀則是“一種不純潔的、被利己主義沾污了的直觀”^④。因此，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說，他“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動，而對於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活動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⑤。

① 馬克思：《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一般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15頁。

② 《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頁。

③ 《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卷，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248頁。

④ 《基督教的本質》。《費爾巴哈全集》第6卷，1960年德文版，第237頁。

⑤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頁。



从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們，無論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都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上抱着这样或那样的片面观点。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綱》中，曾經对这段历史作了概括，他說：“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①在这里，馬克思指出了以往两个基本哲学派别的缺陷：旧唯物主义者对客观世界持感性直观的态度，因而忽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些唯心主义者虽然強調了主观能动性一方面，却又对它作了抽象的、歪曲的解释。彻底糾正他們的錯誤，对这个問題作出科学的辯证唯物的答案，这个历史任务是由馬克思主义担負起来的。

* * *

由于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近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伴随着它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的出現，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革命实践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規模。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馬克思主义。人們第一次可能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科学地理解客观規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二者的辯证关系。

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上，馬克思主义

和以往各种哲学体系的根本区别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与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相反，馬克思主义在肯定“物质先于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的基本前提下，充分強調精神对物质、意識对存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就是人对客观世界、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辯证法》中曾經指出，人在对自然的关系方面不同于一般动物，动物只能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以自己的存在来改变自然界，它們作用于周圍环境完全是无意識的；而人則逼使自然界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对自然界的作用带有經過思考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性质^②。人不是消极无为的生物，他不仅有意識地积极改造自然环境，而且也有意識地积极改造社会，同时也就改造了他自己的主观世界。在認識論方面，馬克思主义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也有本质的区别。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只承认思維、意識是存在的反映，否认它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因此他們所主張的是消极的反映論。馬克思主义者則把辯证法彻底应用于認識論，认为思維、意識不仅是存在的反映，而且对存在可以起巨大的改造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决定的主要的作用），可以能动地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而轉化为存在，因此辯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論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論”。在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中，認識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頁。

② 參閱恩格斯：《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4、145頁。



和实践是辩证地统一的，而在认识和实践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毛泽东同志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

第二，与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相反，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同时，着重指出这种能动作用必须符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唯心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不是根本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便是把规律胡说成人的主观思维的产物或“方便假设”。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这种荒谬观点，认为无论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既不能为任何人所创造，也不能为任何人所废除。这种客观规律的存在，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现实基础，只要离开了这个基础，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向坏的方面转化，变成主观盲动。列宁教导我们说：“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②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规律，是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条件。只有认识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才能在人的活动中运用这些规律，以达到预定的目的。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受客观条件和认识水平所制约的。唯心主义者不顾客观条件来谈人的主观能动性，结果往往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片面地夸大到荒谬的程度，仿佛一切都取决

于人的主观意志，人可以为所欲为。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唯意志论观点，指出了它的严重危害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客观条件，只有充分估计到必要的条件，从现有条件出发，利用现有条件，并根据客观规律去创造那些可能创造的条件，才能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③在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正确的行动要以正确的思想为根据，而思想则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应有正确的行动，而且应有正确的思想，即对客观世界的正确的认识。因此，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态度，是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前提。

第三，与以往一切哲学体系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能局限于脱离实践的抽象思辨的领域，不能局限于个人的理智活动，而首先应该表现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过去的哲学家不是根本看不到实践

①③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7、468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0页。



的作用，便是停留于对实践作抽象的、直观的理解，他们都不能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具体考察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都不能真正地了解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的统一。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对这个问题作了正确的解决：“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循环往复的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一个最好的说明。

第四，与以往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不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局限于个人的范围内，而把它首先理解为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和社会阶级斗争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唯心主义者以及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陷入唯心主义的旧唯物主义者，都不理解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所以当谈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时候，至多只是指“杰出的”个人的能动作用。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科学地解决了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充分承认杰出人物在体现历史发展趋势时所起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则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是否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在革命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僧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③，这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以承认人民群众的革命

的能动性为基础的，而党的领导则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

在整个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外，谁也没有对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科学、唯物辩证的解释。但是，直到如今，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还在竭力散布一种早已破产了的神话，诬蔑马克思主义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只有冷冰冰的物质、规律，没有人的地位。例如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攻击马克思主义忽视人的主观因素，把人弄成“公式化的图式的傀儡”，并叫嚣说要用存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恢复”人的地位，把“主观性因素”加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这种资产阶级学者的陈词滥调是不值得一驳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更重要的还在革命的实践中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到应有的高度。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群众，在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能够遵循着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1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页。

③ 《社会主义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页。



試驗和推廣

李守璋 李學昆

一切經過試驗，試驗成功了再有步驟，有區別、分期分批地推廣，這是我們黨一向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

人們在變革自然和變革社會的過程中，常常要提出一些新的設想、方案或措施。這些設想、方案或措施，一般地是經過了調查研究，集中了群眾的已有經驗，或者根據一定的理論提出的。但是，它們在實現之前，總是屬於主觀的東西。要證明主觀的東西是否符合客觀，在主觀的範圍內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只有把主觀的東西付諸實踐，通過實踐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才能證明它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毛澤東同志說過：“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① 列寧也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實踐不僅有普遍性的優點，並且有直接的現實性的優點。”^② 試驗，就是一種具有直接的現實性優點的實踐。

試驗，總是在一定範圍內小規模地進行的。在試驗的過程中，人們可以集中精力，對自己的設想、方案或措施的各個方面，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和研究，根據試驗所提供的材料，不斷校正和補充自己的認識，使原來的設想、方案或措施更趨於完善。同時，

正因為試驗是一種小規模的實踐，即使原來的認識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它所造成的損失也不會很大。

任何設想、方案或措施，在付諸實踐之前，人們不僅對它的正確性沒有把握，而且對於如何把它變為現實也沒有經驗。經過試驗，人們總結了實踐中的經驗，進行了分析比較，就有可能摸索出一個比較合理的實現自己的設想、方案或措施的具体方法。當然，這裡所說的經驗，既包括成功的經驗，也包括失敗的經驗。成功的經驗，從正面告訴人們應該怎麼做；失敗的經驗，從反面告訴人們不應該怎麼做。

試驗也是用具体事例對群眾進行宣傳工作的一種形式。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最相信他們自己看到的和亲身体驗到的東西。列寧曾經說過：“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實際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我們應當拿出具体的例子來證明‘康姆尼’（共產主義——引者）是最好的東西。”^③ 經過試驗，擺出樣子，就可以用具体、形象、生動的事實

①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②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頁。

③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頁。



教育群众。例如在試驗田中采用先进的技术措施，如果取得了增产的效果，群众自然就会相信。用这种实例进行宣傳，是最有說服力的。

我們党和政府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一切号召和倡議，总是給予极大的信賴，这就要求我們每提出一項新的方案或措施的时候，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坚持一切經過試驗，证明确实行之有效以后，再普遍付諸实施。这才是对群众負責的表现，才能把事情办好。

在实际工作中所进行的一切試驗，都是为了推广。在一点上的試驗，如果取得积极成果，就要推广到其他点上去，这是在进行試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的。这里，有两个問題值得注意：一个是进行試驗的条件选择問題，一个是試驗中的群众路綫問題。

任何試驗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在某一些条件下，試驗会得到一种結果，在另一些条件下，試驗会得到另一种結果。試驗既然是为了推广，那么，就应该十分注意試驗条件的选择，使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样，当試驗获得成功的时候，試驗的成果就能够在比較大的范围里推广。相反，試驗条件如果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或者人为地創造一些特殊的条件，来进行試驗，即使試驗获得成功，試驗成果也不易于在比較大的范围里推广；如果勉强推广，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遭到失敗。

为了使試驗的成果能够普遍推广，試驗往往需要多点进行和多次进行。多点試驗，就是选择几个具有不同条件的点同时进行試驗。这样做所以必要，是因为各个地方的主

客观条件錯綜复杂，个别点的条件常常不能完全代表广大范围内的各种不同条件。条件愈优越的地方，試驗就愈容易成功。但是，如果把把这个地方的試驗成果拿到条件差的地方去推广，就会遇到新的困难，甚至根本行不通。在某些条件不好的地方，虽然有創造新的条件的可能；但是創造新的条件也有难易的不同。把容易創造新条件的地方的試驗成果，拿到不容易創造新条件的地方去推广，也会遇到新的困难。选择几个点同时进行試驗，就可以取得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經驗，使經驗更全面、更丰富，又可以把不同經驗互相比較，更加准确地观察这种試驗的正确程度和适应范围。多次試驗，就是在一个点上或者几个点上反复进行試驗，在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观察試驗結果的正确程度和适应范围，并且通过反复的試驗使經驗不断深化。

我們在实际工作中所进行的各种試驗，都是小范围内的群众实践。試驗如果离开了群众，閉門造車，那是不会有好的效果的。只有和群众在一起进行試驗，依靠群众自己动手，并且尽可能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在試驗过程中，认真地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意見，試驗才会有好的效果，也才能使試驗的过程同时又是教育群众和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也才有利于試驗成果的推广。和群众一起进行試驗，不仅领导上可以取得經驗，群众也同时取得了經驗。这样，群众就对試驗成果更有信心，把它看成自己的东西，积极主动地去推广。因此，在試驗中要自始至终地走群众路綫。

群众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中，



积累了丰富的經驗。我們所要試驗的新方案、新措施，虽然一般地是突破了群众已有經驗的东西，但是它們仍然不能离开群众的已有經驗。因为这些新方案、新措施，或者本身就是集中、提高了的群众經驗，或者需要与群众經驗結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試驗中應該十分重視群众的經驗，認真听取群众的意見。群众对于新的事物，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經驗，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意見，有的贊成，有的怀疑，有的甚至加以否定。不論何种意見，我們都應該虛心听取，認真分析，吸取其合理部分，以修正或充实新方案、新措施。对于怀疑和否定的意見，也要容許提出和保留，因为事情既然在試驗，其正确性就还待证实。群众中的正确的意見，固然有利于試驗的进行；群众中的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意見，有时也会有助于促使試驗更深入更扎实地进行。試驗成功了，群众就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提高，这时群众中的一些思想問題也就会比較容易地得到解决。

試驗是推广的先决条件。但是，試驗成功了，还只是有了推广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推广的时候还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注意。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項試驗成功以后，在推广中，有时得到成功，有时却不能完全成功，甚至失败了。这是因为，在小規模的試驗中证明可行的东西，在大規模的推广中不一定是可行的。所以，在試驗成功的基础上进行推广的时候，仍然要采取极其謹慎的态度，看到試驗成果的一定的局限性。

試驗成果的局限性，首先是指它的适应

范围是有限的。在一定条件下試驗成功的东西，只能在条件大致相同的地方推广。我們應該很好地研究試驗的成果，分析它产生的条件，本身的特点，然后經過細致的比較，决定哪些地方可以推广，哪些地方不可以推广。例如，在南方試驗成功的增产措施，就不能随便搬到北方去推广，在山区試驗成功的經驗，也不能随便搬到平原地区去推广。如果客观上确实有把試驗的成果推广到条件不同的地区去的必要，那么在推广之前就需要再次进行試驗，取得在条件不同的地区推广的經驗。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試驗成功的东西，只能在相同的条件下推广，絕不是說只能消极地适应条件。有些条件，經過一定时间的努力是能够改变的。如果条件基本上具备，而某些不利的条件經過努力又能够改变，仍然應該积极做好工作，进行推广。

試驗成果的局限性，同时也是指試驗成功的东西，仍然会存在着某些缺陷。这是因为事物是发展的，人的認識也是发展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人对事物的認識总有它的局限性。只有通过反复的实践，人对事物的認識才能逐步完善和深化。因此在推广的时候，不應該貿然全面铺开，而要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使上一期上一批的推广，对下一期下一批的推广來說，又是較大范围内的試驗。这样穩扎穩打，逐步推进，就能使試驗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而且經過不断的总结，經驗也会愈来愈丰富。在推广中采取这种循序漸进的做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工作的进展很緩慢，其实并非如此。过去我們党领导进行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改革，都是經過試驗，积累了經驗，根据主客观条件，制定出



分期分批推广的计划。推广一批，总结一次经验，再推广一批，再总结一次经验，波浪式地前进。每经过一次实践，我们就学会一些新经验，使推广的进程愈来愈快，愈来愈健康，从推广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并不缓慢。进行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我们所面临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耕作习惯不同，在这方面要推广一些新措施、新办法，更要注意分期分批地进行。

要把推广工作做好，同样要坚持群众路线，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推广不同于试验，它是规模广阔的社会实践。试验成果的推广，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在推广中必须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依靠群众的自觉行动。如果群众还不能接受，就要耐心等待，继续进行说服教育。只要试验成果本身是正确的，在客观上是符合群众需要的，它就一定会在实践中逐步为群众所接受。

试验的成果被群众接受以后，在广泛实行的过程中，还需要倾听群众意见，深入扎实地做工作，具体解决各种问题。对于新方案、新措施的推广，群众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特点，提出一些补充或修改意见，或者提出符合当地情况的具体做法。对于群众的这些意见，应该认真进行分析研究。新方案、新措施在具体条件下采取什么具体方法去实行，应该给群众以选择的余地。

一切经过试验，试验成功了再分期分批地推广，这种工作方法，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把工作做得更好。

「新边疆」和「全球战略」的真谛

陈原

“新边疆”

美国的武装部队已经进入泰国——这样，就给肯尼迪一直在吹嘘着的“新边疆”精神，又一次作了明白的注解。

本来，走向“新边疆”，是指美国发展史上开拓几乎没有人烟的西部荒原，现在却被肯尼迪拿来作为美国统治集团向外扩张的代用词，显然，这是不伦不类的。但是，既然这位据说是爱好词章的总统，新近仍然大书其文章来鼓吹这种“精神”，人们也就不得不问一问，他所谓的“新边疆”，究竟是在何方；那些“探索着”这“新边疆”的“未知的道路”的“拓荒者”，又是什么样的一些脚色？

各式各样的美国垄断资本家和他的喉舌，都曾经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有一位游历过非洲的美国轮船公司老板曾洋洋得意地宣称：“若论做生意和投资，则美国的新边疆是在非洲。”又如，纽约出版的《商业周刊》说，对刚果特别感到兴趣的，只是美国钢铁公司，联邦人造纤维公司，麦地逊化学公司，美孚油公司等等。那么，对这几家垄断资本的大亨们来说，“新边疆”无疑是在刚果。但是对于西屋



电公司，美国铜公司，大通国际投资公司的股东们，照同一个杂志的材料来判断，他们要“奔向”的“新边疆”却又到了东尼日利亚……。依此类推，我们对于“新边疆”的涵义，就可以“思过半矣”。

为美国统治集团的“新边疆”政策四方奔命的“拓荒者”是谁？他们又是些什么样的脚色呢？肯尼迪也早就宣布过，是那些被肯尼迪一再夸奖过的“宇宙航空员、和平队、武装部队中的男女和许多美国人”。据肯尼迪说，这些美国人——不，这些“拓荒者”不仅比其他美国人“更具有美国味”，而且他们那种“征服”、“冒险”的“优秀的品质”，还使他——这位热中于开辟“新边疆”的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哩。

肯尼迪利用“宇宙航空员”来作为开辟“新边疆”的“拓荒者”，难道是他打算将几个州的人口迁移到月球上去“拓荒”吗？当然不是。原来在美国政客的语汇里面，“宇宙航空员”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借词”，它的真正涵义应该是侦察火箭、洲际导弹和间谍飞机之类。如若不信，有史为证：当一九六〇年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被击落之后，最初出来发表声明的是一个被称为“负责美国空间计划的非军事性的机构”——美国全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这个所谓“非军事性的机构”煞有介事地说，被击落的U—2飞机“不过”是一架“考察飞机”，它在进行一项“研究高空所发现的阵风气象条件的连续计划”时，“由于供氧困难”而迷失道路了。可是，偏偏那个间谍飞行员还活着，这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赶紧出来取消了这家“非军事性的机构”的声明。这段历史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了所

谓“宇宙航空员”这种“拓荒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在“拓荒者”的队伍中，有一批是受到肯尼迪特殊看待的、手里摇着橄榄枝的所谓“和平队”。据美国报刊说，这是一群特选的富有“美国味”的青年男女，他们到“不发达国家”的“穷乡僻壤去跟老百姓直接接触”，但“他们不是去建筑水坝或公路”，而是去教会那些“低级种族”怎样才能达到美国式的民主和如何实现美国生活方式。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承认的，使肯尼迪“深受感动”的这一批“拓荒者”要“拓”的“荒”，有一部分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传教士所已经做过的”，但是“和平队”的“勇士们”，却又尽量“避免与宗教活动联系”，要将自己打扮成为“落后”民族的“真正”朋友，也就是说，他们将要“开拓”同殖民主义有密切联系、而为现在觉醒了的人民看穿了的美国反动传教士所难以“开拓”的“荒原”。对此，几内亚《自由报》在一篇评论中曾经指出：“美国‘和平队’的成立以及建立与此相应的经济机构，这些都是美国辛迪加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渗透活动的辅助组织。这也是执行全球战略的辅助组织，因为，这些‘和平队’旨在心理上为美国扩张政策准备土壤。”可见，“和平队”——美国“新边疆”的“探索者”，只不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推行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传教士，是美国垄断资本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渗透和推行扩张政策的一种工具。

怎么武装部队也算得上“拓荒者”呢？关于这一点，人们立即可以联想到美国分布在各大洲的几百个海外军事基地和美国向海外派出的一百多万军队。试问，这些“拓荒者”



又能“拓”什么别的“荒”呢？这不明摆着是要把世界各国都变成华尔街和白宫所要“不断前进地”奔向的“新边疆”吗！尽管美国统治集团像俗话所说的“丑人多抹粉”，用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巧立名目，说什么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是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遍设军事基地网是为了“保卫这个地区的安全”和“承担义务”，在欧洲驻扎三十万军队是为了“保卫欧洲的自由”和“加强欧洲的防务”……等等；但是，名目虽多，归根到底，还是肯尼迪自己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将追求的目标”是“使我们认为符合各地人民基本愿望的一种政府制度有可能最后普遍建立起来。”这就是说，他要向全世界进行侵略。现在，肯尼迪又下了命令，把一批“拓荒者”——武装部队送到远离美国太平洋海岸一万英里的泰国，这就更戳穿了肯尼迪所谓“争取自由的斗争的边疆”的谎言。泰国就在中国以南，就在老挝和越南南方的近旁，他们要到这个地区来“探索”什么“未知的道路”，难道还不容易理解吗！

由此可知，肯尼迪式的“新边疆”精神，不过是武装侵略与和平渗透的代名词。关于这一点，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现在使用的“新边疆”这个术语，它原来所包含的“社会创造力”，已经是不存在的了。什么“新边疆”，什么“拓荒者”，不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臭名昭彰的“全球战略”么！

“全球战略”

被称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侵略蓝图，据说已由前白宫的军事助理、现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华尔特·罗斯托博士拟

好了“草案”。四月九日纽约《新闻周刊》报道，这部厚达两英寸，长达二百八十五页，用浅蓝色封面装订起来的“全球战略”，现在已经放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高级官员们的桌子上，等待着他们“批注意见”了。

这位罗斯托博士的“全球战略”包含些什么内容呢？不久前，他在美国帕都大学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为题所做的演讲中，提出了五点方针，关于这五点战略方针，他前前后后说了千言万语，但究其实质，不外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美国统治集团策划如何对付世界上三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和国家。

尽人皆知，作为世界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的美国，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对手“消灭”。罗斯托现今开出的药方，并没有多少新鲜玩意，请看吧：

“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这是一九五八年杜勒斯打的如意算盘；

“我们必须为东欧准备好一套更灵活和更现实的做法”——这是肯尼迪在一九六〇年提出的主张。

罗斯托的“战略”只不过是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拟订的具体方案，即：既要准备“寻找同共产党政权有一致利益的有限的领域”，同时还要“耐心地”促进“那种缓慢的演变性的发展”。如果把这些晦涩、曖昧的话用普通语言翻译出来，那就是：一面搞谈判，一面搞颠覆。

对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战略”是“结成新的伙伴关系”，“互相依靠”。用罗斯托的说法，那就是“加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



国家之间的联系”。在资本统治的世界，各国统治阶级间的“伙伴”关系，其实只是一种明争暗斗、弱肉强食的关系。照美国的如意算盘，所谓“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必须循着这样的公式来建立的：美国是主人，其他国家是仆从。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应该“作为盟国的领袖”，“盟国”应该“忠诚地追随于后”。肯尼迪政府这一年多以来跟它的西方“伙伴”，就是企图维持这样一种主与仆、领导与追随的关系，而西方各国却谁也不甘心作美国的仆从，因此对美国的不满是与年俱增的。试举一个例子。美国以为靠着它的“无可比拟”的核力量，就可以“威慑”西方“伙伴”，要他们同自己建立上面提过的“伙伴”关系，但正是在这个核问题上，伙伴们都不买账。新近在雅典举行的以讨论核问题为中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部长会议，就证明了西方的部长们“在自己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按照伦敦《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会议“所做的是，最后地揭穿了所谓‘一致’这雅致的虚构”。在会外，法国戴高乐对于肯尼迪那种垄断核力量的专横态度，更是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了。连战后被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西德，也深为不满。最近西德《世界报》有篇社论的标题很有意味，那就是“美国站在门口”几个大字！这是为反对美国的“出口攻势”而说的。其实，美国对付它的“伙伴”的“战略”，岂止是“站在门

口”，有的地方简直已升堂入室，反客为主了。这又怎能不叫那些小“伙伴”们担心呢。

“南半球”的不发达地区和国家，是罗斯托在他的“战略”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五条战略中就有两条提到了美国统治集团最感兴趣的这个地区。据罗斯托说，美国决心要建立一条“新的南北纽带”，并且“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南半球”的不发达地区和国家“根据自己的传统和愿望来建立他们自己的形式的现代社会”。（这句话是弥天大谎。古巴不是正在根据自己的愿望进行现代化吗？为什么它却受到美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又说，“帮助维护这种广泛的现代化过程的完整和独立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利益”。这就对了，美国统治集团不正是在根据它们的利益，运用所谓“争取进步联盟”之类的圈套来缔结什么“南北纽带”的吗？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博士的“战



“拓荒的勇士们，开步走！”

江有生



略”，其实是不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和国家取得真正的独立，而不过是采用狡猾的手段，戴上一副“友谊”的假面具推行新殖民主义罢了。美国有一位自由主义老教授弗莱明，曾在两卷本的大书《冷战及其起源》中，“感慨系之”地说过一段话，他说：

“我们不是跟一切摆脱殖民统治的人民一起，重新作为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国家，一同生活下去，却总是害怕随便什么地方发生任何一种革命。我们不是乐于看到所有古老的封建政权垮台，而是将我们自己放到这

样的一种地位，仿佛要在东欧和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去拯救这些政权，终于死抱着蒋介石、佛朗哥和沙特王不放。我们不是回忆起我们民族年青时代如何向往着中立与和平，而是把许多解放了的民族这种需要加以谴责，说这是一种邪恶。”

这位可怜的自由主义教授不懂得资本主义美国的青春已一去不复返，不懂得这个帝国主义已经活到腐朽的老年，丧钟也已经为它而鸣了。……但是，这位教授的感慨，却也说明了一个真相，那就是美国对“南半

“和平革命”的招牌 和殖民主义的实质

· 鍾 国 豪 ·

一九四一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激烈地进行着，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商讨如何对待殖民地的問題。这两位国家首脑在讨论中曾发生过一场争吵，罗斯福当时这样抨击丘吉尔：“我不知道是你的大臣中的哪一位曾经介绍过一种政策，主张把殖民地国家中的原料财富都搬走，而反过来却丝毫不给这个国家以任何报酬或是代价。二十世纪的方法是把工业介绍到这些殖民地中。二十世纪的方法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给他们新的教育，给他们卫生的设施，以增加这个国家人民的财富，使他们明白他们的原料虽被搬走，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是得到相等的报酬的。”罗

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分歧似乎是重大的，即：一个主张用“十八世纪的方法”，全部搬走殖民地的原料财富；一个主张用“二十世纪的方法”，一面搬走那里的原料财富，一面“帮助”殖民地人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给予“他们新的教育”和“卫生的设施”作为“相等的报酬”。

丘吉尔的方法，看来好像对殖民主义者更有利，可以任意掠夺财富而自己一毛不拔；但是华尔街的“文明的”垄断资本家，根据他们的掠夺经验却认为，罗斯福的主张比丘吉尔的要“高明”得多。因为尽管花一点钱，却可以替自己搬走财富的恶行盖上一层“相等报酬”的薄纱；甚至还可以向落后国家邀“帮



球”各国的独立，绝不是什么“帮助”，而是决心要加以阻止的。

至于博士所说的美国已经开始同“南半球”国家建立了一种什么“合伙的新基础”，它到底新在什么地方呢？《加纳时报》早就指出过，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只是为了“诱骗非洲”才“假装成非洲的朋友和恩人”。这家报纸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假面具能遮盖他们的毒牙，美国已经成了目前正在争取彻底解放的非洲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最近华盛顿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考察了拉丁美

洲十四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后，也作出结论说：“美国的威信在这重要的大陆上迅速降低。……现今拉丁美洲的情况比之一年前美国宣布成立‘争取进步联盟’的时候，甚至更为糟糕。”

博士挖空心思开下的“全球战略”这帖据说又是守势、又是攻势的药方，对于我们认清美国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是颇有好处的。华尔街要“征服”世界的“好梦”和肯尼迪要“开拓”“新边疆”的妄想，值得全世界人民引起新的警惕。我们需要擦亮眼睛，看它如何蠢动。

助发展经济”之功，岂不名利双收，堂哉皇也！正是在这位罗斯福总统当政的十多年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拉丁美洲进一步排挤了英、德等帝国主义，并使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利润猛增；到罗斯福死后的第三年，他们所取得的利润，便比罗斯福上台前后十年间（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的每年平均数高达三倍。难怪华尔街的老板们把罗斯福奉为当代的“伟人”，当今的肯尼迪总统也把他尊崇为对付南方邻邦不满情绪的“先哲”哩。当肯尼迪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就已经极力主张要发扬罗斯福的精神，他说：“罗斯福的睦邻政策是很成功的，因为这种政策表明了对本半球问题的不断关怀。”

也许是受了这种罗斯福精神的启示吧，肯尼迪上台以后，就在拉丁美洲大力推行“争取进步联盟”的计划，今年三月十三日，他在向国会提出的“援外咨文”中，又建议“单独设立一项长期的争取进步联盟基金”，要求“在今后四年对进步联盟提供三十亿美元”，来实现“半球规模的和平革命”。人们知道，三

十年代的罗斯福，是为了平息当时由于美国对南方邻邦频繁的武装干涉而引起的极端不满，挽救华尔街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和倾销商品显著下降的危机，才伪善地提出“睦邻政策”的。如今肯尼迪高唱什么“和平革命”的调子，也是为了消除拉丁美洲人民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他说什么：“如果我们不愿把我们的资源和精力投向谋求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任务的话，我们将面临一种严重而紧迫的危险，那就是，绝望的人民将转而把共产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暴政视为他们求得改变的唯一希望。”肯尼迪的所谓“和平革命”与当年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如此酷肖，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肯尼迪上台伊始，曾经忧心忡忡地惊叹拉丁美洲各国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加深”，而一年多来，随着美国对拉丁美洲控制的加强，那里的革命情绪又在与日俱增。不久前墨西哥《永久》周刊曾发表文章，指出拉丁美洲的贫困和落后是美国掠夺政策和大庄园制度造成的，只有革命才是使这个大陆从美



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道路，才能使各国实现现代化，收回富源，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国内市场，实行生产多样化，促进人民教育，推动工业化。古巴人民在这方面已为拉丁美洲各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走古巴的道路”越来越广泛地成了这个大陆人民的呼声。现在，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巴拉圭等国家的人民，都已被迫拿起武器，与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厄瓜多尔、秘鲁、洪都拉斯、巴西等国家的农民夺地斗争也在不断发展，“美国佬，滚回去”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拉丁美洲……。这到处蔓延着的烽火，真叫白宫和华尔街的那些先生们为之手足无措。尽管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使尽力气，在巴拿马帮助各国反动统治集团大批训练“防止和镇压叛乱”的部队，派遣无数“情报专家”、“游击战战术专家”潜入各国进行颠覆破坏等等活动，但是都无济于事。这就使得以扼杀民族解放运动而臭名远扬的、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不得不沮丧地表示无能为力，他认为：“光用军事力量是不会自然而然击败共产党人的，除非进行内部经济和社会改革。”面对着这种局势，肯尼迪就同“先哲”罗斯福使用“睦邻政策”的手法一样，狡诈地装出一副关心南方邻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样子，并且打出“和平革命”的招牌，妄图阻挡和扼杀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

当然，也不应该抹煞肯尼迪的“独创”。如果以为肯尼迪只是恢复了“睦邻政策”，那就未免有点埋没了肯尼迪的“功劳”。罗斯福只是主张搬走财富时“赐予”殖民地国家以“高的生活标准”、“新的教育”和“卫生设施”；而肯尼迪的“争取进步联盟”则提出要在“本

半球进行和平革命”，让拉丁美洲各国“自己进行土地改革”、“税收改革”，使“命运大部分掌握在各国自己的手中”，“大量外来援助”只作为“提供一种补充”。他甚至还多方面敦促这些国家中的“有钱有势的人们”迅速进行“改革”呢！请看：既主张南方邻邦起来“革命”，又鼓励它们自己“掌握命运”，还慷慨解囊拿出大笔款项“援助”那里进行“革命”，这不是很“友好”的“帮助发展经济”的行动吗？哪里有“把殖民地国家中的原料财富都搬走”的野心呢？

不过，且慢，让我们看看肯尼迪在拉丁美洲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吧：秘鲁是美国政府直接策划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之一，去年肯尼迪也公开表示过要与秘鲁政府“紧密合作”，实现“改革”的计划。可是，“土地改革”计划公布了一年多了，至今由美国公司经营的大庄园，像塞罗德帕斯科公司所属的畜牧场那样全国最大的庄园还依然如故，它们并没有把所霸占的任何一寸土地归还给农民；恰恰相反，由于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庄园主继续对农民进行横暴的掠夺，去年底以来，当地的印第安人就不得不以大刀和弹石作武器，向美国公司展开了夺地斗争。但是，这一正义的行动，却遭到由美国扶植的反动军警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就在美国塞罗德帕斯科公司的庄园里，造成了夺地的农民惨遭枪杀和被打伤的事件，激起了秘鲁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那里的大庄园主直至今天还在所谓“土地改革”计划的指导下，用放火烧毁农民住房的办法，大批驱逐农民，扩大土地壟断。哥伦比亚的“土地改革”也是由白宫的先生们一手策划进行的，从拟订计划，组织“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到制定“土地改



革法案”，都得到美国政府的点头“同意”，据说美国还专门给了他们七千万美元贷款，来“帮助”实现这一计划；肯尼迪政府的第二批“和平队”就是派到这个国家“帮助”进行“农村建设”的。然而，这种“土地改革”，不但对美国公司的大庄园没有丝毫触动，就是对本国的大庄园也是严加保护，穷苦农民并没有取得分厘的耕地。而那些整天侈谈“土地改革”的肯尼迪政府的大使和美国将军，却在那里直接策划镇压那些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争取实现土地改革的农民游击队。就此看来，肯尼迪口中的所谓“土地改革”，究竟是种什么货色，不是明白得很吗？

肯尼迪吹嘘所谓“和平革命”，大叫大嚷要通过“争取进步联盟”来“援助”拉丁美洲各国“发展经济”，但是，他的漂亮的言词对拉丁美洲各国带来了什么结果呢？据说，委内瑞拉是肯尼迪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范例”之一，去年由华尔街控制的泛美银行发放的“争取进步联盟”贷款，它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居于拉丁美洲各国的首位。不仅如此，肯尼迪还亲自动手设计呢。去年年底他访问南美时，飞机刚在加拉加斯着陆，便风尘仆仆地转乘直升飞机到弗里奥去主持“建筑四十八家廉价住宅的开工典礼”，还来不及喘息，又飞到莫里塔视察他的“先进土地改革区”。回到华盛顿后，肯尼迪大加渲染，说什么他“在（南美洲的）工人、农民中亲自看到希望在上升”。如此不惜工本陈设的所谓“进步”、“繁荣”的“橱窗”，应该说可以代表肯尼迪的杰作了吧！可是，近年来，在这个国家里，失业和贫困更加加剧了，工人不能忍受美国公司日益加深的残酷掠夺，不断举行大规模罢工，农民为了取得维

持生命的土地，只好拿起枪杆开展游击斗争。在委内瑞拉《号角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争取进步联盟”执行一年后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分析：“争取进步”的“结果是怎样呢？在哥伦比亚，贫困状况日益加深；在危地马拉，伊迪戈拉斯依靠着执行火与剑的政策仍然把持着政权；在反对党取得了选举胜利的阿根廷，发生了军事政变；在委内瑞拉，正在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措施，结果货币贬值了，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四十，经济危机不断加剧，上百万的人生活在贫困中。”失业增加、货币贬值、生活费用上涨、经济危机加剧……这些就是拉丁美洲人民把所谓“争取进步联盟”斥之为“争取落后联盟”的有力的根据。

为什么这些国家接受了美国的“援助”，而它们的境况却越来越糟？墨西哥《费加罗》周刊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争取进步联盟’的款项将带着巨额利息回到美国垄断企业股东的腰包里。”这家周刊揭露，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华盛顿在拉丁美洲发放了六亿零三百万美元贷款，而拉丁美洲各国根据“债务账目”向华盛顿交纳了三亿五千多万美元，以“利息”名义交纳了一亿四千二百万美元，美国实际支付的所谓“援助”只有一亿一千一百万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官方统计材料，这两年华尔街的垄断集团从拉丁美洲共搜刮了十六亿美元利润，就是除去所谓“援助”的一亿一千一百万美元，实际上还攫取了十四亿八千九百万美元。据美国《工人周报》揭露，就是在这位自称为拉丁美洲人民摆脱饥饿贫困的施主的肯尼迪当政的一年中，美国垄断企业从拉丁美洲榨取的利润便高达八亿二千万美元，比他上台



前的一九六〇年几乎增多了一亿美元。这就是肯尼迪大叫大嚷“援助”拉丁美洲各国“发展经济”的真相。

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曾经在洪都拉斯发表过一份所谓“宣言”，它这样说：“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控制这个国家和它的财富，以便得到我们在战略利益上所必需的一切土地。我们必须获得固定的合同，以便保证即使在很久的将来也不会有人能和我們竞争。同时，任何其他企业的建立与发展都必须受到我们的控制。我们必须获得让步、特权、免税，我们必须废除关税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减少我们的利润的负担。我们必须教育这些殖民地的人民，使他們认识到我們的重要性，而且普遍地认识到我們的权威。……我们必须使这个国家日益上升的经济陷于停顿，以便增加它的困难，便利于我們计划的实现。”今天的肯尼迪，比联合果品公司的大老板們更善于掩藏他的狐狸尾巴，在他的言論中，的确很难找到像“控制这个国家和它的财富”、“使这个国家的经济陷于停顿”一类的語言，而是滿紙什么“首先承认，我們北美并不是始终认识这个（半球的革命的）共同使命的重要意义”啦，“帮助加速经济、教育和社会进步”啦，使“命运大部分掌握在各国自己的手中”啦，等等。不过，在这些娓娓动听的谎言掩盖之下，肯尼迪的所作所为，却是更深刻地摧残着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经济。尽管肯尼迪不断卖弄他的三寸巧舌，从现代辞典中搜尽了所有进步的語汇，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足的“革命者”，可是，他却无法掩盖住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拉丁美洲人民无止境地进

压榨的恶行。

肯尼迪创造出这么一套“和平革命”的魔术，同时也是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垄断集团的焦灼不安。肯尼迪原以为端出“争取进步联盟”，装出一副慈悲相，就可以彻底消除拉丁美洲的革命“骚乱”。谁知“争取进步联盟”推行头一年，情况就很不妙，“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因此，肯尼迪惶恐万状地哀叹道：“历史已经使（拉丁美洲）各国不再有和平革命和暴力革命之间的安全界线。现在再也没有一段悠閑的間隔時間了”；“誰使得和平革命成为不可能，就是使得暴力革命成为不可避免”。早在一九五三年，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就曾經說过：“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在南美的，在拉丁美洲的情况，有点类似三十年代的中国情况，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已在开始。……可是我們并没有对之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事情不断发展下去，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发展到最高峰。好啦，假如我們还是不加警惕，某天早晨，我們睁开眼睛就从报纸上看到，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发生了的同样事情，在南美也发生了。”多少年来，美国統治集团不但提高了“警惕”，而且采取了它所能采取的一切行动来阻止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可是历史并没有按照它的愿望发展。肯尼迪如今梦想借助“和平革命”的招牌，对拉丁美洲继续进行殖民統治，結果只能是枉費心机。《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說得好：“在美国垄断控制越厉害、寡头势力的剝削越殘忍、工农群众的处境越不能忍受的那些国家里，……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人民的革命。”事情正是在这样发展着。



肯尼迪正在南越重蹈历史的复轍

陈 有 为

“现在是应该把关于印度支那的明明白白的真相告诉给美国人民的时候了……。我直言不讳地认为，不管美国在印度支那投下多少军事援助，都不能征服一个到处都是而又到处都不是的敌人，一个受到人民的同情和暗中庇护支持的‘人民的敌人’……。”

这段话，是一个美国人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对美国参议院说的。

这个美国人不是别人，就是当年的民主党参议员，今天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在肯尼迪讲这段话的时候，奠边府战役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半岛正面临着彻底崩溃的末日。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阻挡越南人民的胜利攻势，以便把印度支那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叫嚷着要冒“严重风险”，纠集西方盟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派出载有原子武器的美国军舰“拳师号”和“菲律宾号”到南中国海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肯尼迪当时不满艾森豪威尔政府向美国公众隐瞒干涉印度支那的真相，并且反对进行这种“徒劳的、自找毁灭的”冒险；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美国“把军队派到（这个）世界上地势最艰险的地方去”，“将会碰到一种远比……在朝鲜碰到的情况甚至更为困难的情况”，而“看不到一线

胜利的希望”。

但是，八年后的今天，当了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却面对着他过去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同样的责难了。

美国的一批教授和科学家们，今年四月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致美国总统的一封公开信，责问肯尼迪“为什么把（美国的）陆海空军派到南越去导致死亡和流血”。他们认为：“美国的军队肯定一直在参加南越的战斗；美国的伤亡人数在增加，……美国已卷入了一次真正的，虽然没有宣布的战争”，但是肯尼迪“本人对这种危险的局势只透露了微不足道的一点情报”，因而使得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都没有适当的机会来公开说明和辩论”美国政府在南越的政策。这封信特别向肯尼迪指出：“你在一九五四年当参议员时所说的这些话，都适用于你的政府一九六二年在南越做的事情。”

肯尼迪为什么这样前后矛盾，从当年的不愿冒险变为现在的不惜冒险呢？其根本原因是：美帝国主义今天在印度支那半岛已经取代了法国殖民者的地位，它把对越南南方和对老挝的武装干涉看做是它在全世界加紧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南越人民和老挝人民爱国斗争的蓬勃



发展和节节胜利，不但打破了美国霸占印度支那半岛的美梦，而且危及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整个殖民统治结构和侵略部署。肯尼迪现在不惜一切代价力图保持住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残局，正是他登台后一再表示“必须投入全部精力”以阻挡整个亚洲和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总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他不但继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部侵略政策，而且比他的前任干得更狡猾、更冒险。

现在，美国在南越的军事人员，已经从印度支那战争停火时的二百人增加到六千人，他们不但充当“顾问”，而且直接指挥和参与作战。美国给吴庭艳傀儡集团的“援助”每年高达四亿美元之巨。美国的高级军政官员，从副总统、总统的军事特别顾问、国防部长、助理国务卿，到驻太平洋武装部队总司令和陆军司令等等，接二连三地到南越“访问”、“视察”。美国用来进行干涉和镇压的工具，不但有飞机大炮、震荡炸弹，而且有脚镣手铐、军用猎犬和化学药剂。美国干涉和控制南越的计划，从“八点措施”、“斯特利计划”到“日出行动”，一个一个地拟订了出来。总之，肯尼迪政府所策划的一整套关于“特种战争”的办法都正在南越付诸实施。如果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当年在印度支那半岛还只走到“战争边缘”的话，今天的肯尼迪政府却已在南越进行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了。

但是，肯尼迪政府在南越的这一切侵略行动，都是“悄悄地”进行的。五月四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美国在南越“这种

影响深远的义务是在极少引起公众的大惊小怪的情况下，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词承担下来的。美国在南越的活动一直在不声不响但却是大规模地增加着”。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首脑们，对于美国干涉南越的规模与性质，始终是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不敢直言。他们说什么美国只承担“训练”与“后勤支援”的“义务”，充其量也只承认美军在“陪同”南越伪军“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被迫地”处于“战斗状况中”而已。肯尼迪本人在今年二月间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一再向他提出关于美国在南越“牵连得多深”和“是否已尽可能多地把一些事情告诉了美国人民”的问题时，肯尼迪显得很不耐烦，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他只能“试图……尽可能地使人们知道一切情况”，作到“尽可能地坦率”。总统既然封了口，知趣的记者也就只好转移话题了。

八年前曾经激烈指责过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的真相说得不夠“坦率”的肯尼迪，现在为什么自己也对美国在南越的行动諱莫如深呢？这当然是有他的难言之隐的。

肯尼迪和他手下的文武官员知道，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美国在南越的行动是为了“维护独立”、“保卫自由”、“促进社会进步”，但是美国人民却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必须派兵到南越去“支持吴庭艳的腐化和反动独裁政权”，在那里“导致死亡和流血”。肯尼迪承认这在美国国内是“一个非常容易激感情的问题”。他害怕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会束缚住他对南越进行武装干涉的手脚，



因而竭力掩飾南越局势的一切真相。

但是，肯尼迪政府这种“悄悄地不声不响地干”的所謂“新方式”，难道能掩盖美国人民的耳目以及美国对南越的侵略实质嗎？难道能挽救美国在南越的失败嗎？事实是，它即使投入比八年以前多得多的赌注，但是前景却仍然像八年以前一样的遥远和渺茫。合众国际社前驻西貢分社社长多門，今年四月底在重訪旧地以后发出的几篇連續报道中承认：“对在南越的大多数美国人來說，战争只是刚刚开始”；那里的“美国顧問們现在承认，用在乡下进行大规模的、吃力的扫蕩的办法，是永远不能获得胜利的”，因为每次“扫蕩”之后，军队的坦克和卡車一开走，南越人民自卫武装力量立刻又出现了。这个記者发现，在南越，支持南越人民自卫武装的“力量分散在……数以千計的农村里”，南越人民自卫武装的人員，“同农民群众一道亲密地学习和劳动，并且使自己同农民們完全打成一片”。这个美国記者所得到的結論，正是同八年以前肯尼迪得到的結論一样：在南越，“遍地都是敌人而同时又哪里都沒有敌人”。

对于美国侵略者和他們的走狗吳庭艳集团來說，南越人民的爱国自卫斗争就像是一个无边无际而又深不可测的海洋。《紐約时报》說，美国和南越伪軍虽然学会了“游击战术”，却没有“学会在人民的海洋中游泳”。的确，他們永远也不可能学会这种“游泳术”，当然也永远不可能达到“胜利的彼岸”。他們即使暂时还是那样凶恶殘暴和拼命进行掙扎，但也免不了要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海洋中

下沉而灭頂。

不是嗎？在肯尼迪政府对南越进行猖狂的武装干涉一年多以后，南越人民的爱国自卫斗争不但沒有熄滅、削弱，反而更加猛烈，更加扩大了。现在，美国官員和报刊評論員們不能不承认，“南越的軍事形势是难以控制的”，美国正在进行的是“一件非常危險的工作”，一个“长期、緩慢、艰巨”的过程，“在这个长期战斗中不会有重大的胜利或解决的办法”，“美国用純粹的軍事手段不可能取得胜利，就是用社会改革也不可能”。

当然，肯尼迪政府现在还没有放棄自己的迷梦。肯尼迪本人在今年四月間举行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仍然表示，美国“在南越不能罢休”。据美国报刊透露，美国的軍政决策人員正在謀划着提高南越战争的“級別”，扩大战争的規模，而且一直在鼓吹“南越問題不可能孤立地解决”，主張把美国在南越、老撾、泰国的軍事行动联成一片，准备在印度支那半島的这个地区打一次朝鮮式的战争。

肯尼迪政府这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侵略行徑說明，南越人民今天面临着比过去更加凶恶的敌人，他們爭取独立解放的爱国正义斗争还有着艰巨和曲折的历程。但是，法国老殖民者所失敗了的，美国新殖民主义者能够成功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做不到的，肯尼迪政府能够得逞嗎？在朝鮮半島上潰敗了的，在印度支那半島上能够取胜嗎？历史已經懲罰了过去侵略印度支那半島的帝国主义者，它也必然会对美帝国主义者作出同样的判決。



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的发展

· 許 滌 新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要求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和各部門內部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按比例地分配生产資料和劳动力，要求国民經济各部門的发展必須服从国家的統一計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客观上也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資料为資本家所占有，社会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比例关系只能通过周期性經济危机去強制地实现。列宁說：“资本主义必須經過危机来建立經常被破坏的平衡”^①。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資料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而，人們就能够自觉地通过国家的計劃，正确地安排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的比例。恩格斯說：“无产階級夺取社会权力，并用这个权力把从資产階級手里取来的社会生产資料变为整个社会的財產。这么一来，无产階級就使生产資料解脫了

一向为它所固有的作为資本的那种性质，而使它們的社会性能有完全的发展自由。从此，按照預定計劃来进行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了。”^②

国民經济发展中最重要比例关系，是生产資料的生产和消費資料的生产之間的比例关系。消費資料主要是由农业和輕工业部門生产的，生产資料主要是由重工业部門生产的。因此，消費資料的生产和生产資料的生产之間的比例关系，一般是通过农业、輕工业和重工业之間的比例关系反映出来的。农业和工业之間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經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农业是发展国民經济的基础，工业的发展必須依靠农业的发展。就是說，工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农业的制約，工业发展的規模和速度，不能超越农业提供商品粮、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也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目前我国农业还未脫离以人力操作为主、畜力耕作为主和使用自然肥料为主的情况，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农业对于工业发展規模和速度的制約，就更为显著。当然，农业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工业的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水利建設的设备、电力建設的设备、运输工具、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都是要从工业方面取得的。农业如果离开工业，就不能实现技术改造，就不能实现农业現代化，因而，也就不能充分地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这里。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

① 《非批判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6頁。

②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0頁。



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的方针，正确地反映了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

在工业内部，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也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轻工业的发展不能离开重工业的发展，重工业为轻工业制造设备和提供一部分原料、材料，如果没有这些，轻工业的发展就成为不可能。同时，重工业的发展也不能离开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为重工业积累资金和提供消费资料，如果离开轻工业的支援，重工业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是要求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冶炼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以钢铁工业为例，发展钢铁生产，不但要增加钢铁的冶炼能力，而且要相应地增加采矿能力、选矿能力和轧钢能力。如果采矿和选矿能力小于冶炼能力，那末，冶炼能力就难于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轧钢能力小于冶炼能力，炼出来的一部分钢锭就不能及时轧成钢材，供应加工工业的需要。在发展钢铁工业时，还要相应地发展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等部门。这些部门，如果没有按比例地相应地发展，钢铁工业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此外，上述这些部门，在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时，还需要农业和轻工业部门供应消费资料。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它只能在同有关部门保持一定比例的条件，才能顺利地发展。如果把某一部門过分突出而不照顾到左邻右

舍，如果这个重点部门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占得太多，就会削弱其他有关部门的生产，而那些受到削弱的有关部门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个重点部门的生产。

基本建设和生产，也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基本建设搞得太少，从长远来看，生产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基本建设搞得太多，就会削弱当年的生产，就会分散人力、物力和财力，使物资供应呈现紧张，而投入生产的项目反而不多。基本建设工程有很多是不能在当年投入生产的，规模越大的基本建设单位，从开始建设到投入生产的过程就越长。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材料和设备，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在基本建设方面支出的工资，很快转入市场购买生活资料。特别是农民变成工人之后，他们的购买力会迅速上升。这样，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而且由于职工人数的增加，增加了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基本建设的规模过大，就会影响到劳动力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就会影响到日用品的供应和居民的货币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我们在处理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重工业能够提供的原料、材料和设备能力，而且要考虑农业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和劳动力；不仅要考虑到生产上长远的要求和建设上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当前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据这个规律，就有可能正确地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实现计划生产。



但是，可能性并不是现实。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必须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认识这个规律，学会掌握和运用这个规律。只有这样，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才能正确地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

二

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计划工作，自觉地安排平衡，但是，不平衡的现象仍然会不断出现。毛泽东同志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①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不平衡的原因很多。例如：（一）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技术革新，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打破旧的平衡。例如，由于技术革新，冶炼一吨铁所需要的焦炭平均消耗量，比过去减少了，那末，钢铁部门对于焦炭的总需要量就会减少，从而，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就不能不发生变化。（二）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也会在生产上引起新的不平衡。每逢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出现以后，它为有关部门提供产品，就会推动这些部门生产的发展；同时，也要求很多部门为它服务，要求得到必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力。这样，原来的平衡和统一就被打破了。我国建立汽车工业、农业机械工业和其他新工业部门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三）工业的发展是受到农业的制约的。在现在的条件下，农业生

产的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然情况。风调雨顺的时候，用同等数量的劳动，能够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使我们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去发展工业。在农业生产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产量减少，就会影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进行。农业丰收或歉收，都会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四）某一部门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就引起这个部门同其他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例如，当个体手工业改造成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上述情况说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经常冲破旧的平衡，出现新的不平衡。但是，也有一些不平衡，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于人们在主观安排上的错误所造成的。当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候，经济计划就会违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就会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出现不协调的现象。毛泽东同志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②客观规律是能够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但是，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有可能要犯一些错误。有一些问题，由于人们缺乏经验，没有充分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发生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也有一些问题，只要我们认真走群众路线

^{①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2—13页。



織，加强調查研究，善于同专家、技术人員、工人和农民商量，是可以避免发生錯誤的。因此，我們应当經常总结經驗，不断提高認識，克服片面的、主观的观点，使我們的經濟計划工作更加符合于客观实际。

社会主义国民經济发展过程中出現的不平衡，同資本主义国民經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的不平衡，是生产資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的一种反映，是对抗性的矛盾。資本主义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經濟危机才能达到平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出現的不平衡，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生产資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的不平衡，能够通过国家的自觉調节而轉化为新的平衡，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国民經济的发展中，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是矛盾不断出現，又不断解决的客观过程。認識国民經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是为了正确地解决矛盾，使其达到相对的平衡。列宁說：“經常的、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計划性”^①。根据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划、按比例发展規律的要求，經常进行綜合平衡工作，使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保持相对的平衡，正是社会主义国家計划工作的任务。

正确地处理薄弱环节同先进环节之間的关系，是綜合平衡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从发展上来看，应当改进薄弱环节使其适应于先进环节的要求，以解决它們之間存在的

平衡。但是，改进薄弱环节，需要有一定的条件，需要有一个过程，要我們去做一系列的艰苦細致的工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勉强使薄弱环节去适应先进环节的要求，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积极的方法，事实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方法。因为采取这种方法并不能消除薄弱环节，反而会扩大薄弱环节同先进环节之間的不平衡。正确地处理薄弱环节同先进环节之間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一系列的艰苦細致的工作，逐步地去改进薄弱环节；另一方面，在薄弱环节沒有得到改进以前，需要适当地放慢先进环节的发展速度，这样做并不是消极的平衡方法，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改进薄弱环节所需要的生产資料和劳动力，就难于得到保证。在一定的時候适当地放慢先进环节的发展速度，不但可以保证薄弱环节的改进，有利于切实地解决薄弱环节同先进环节之間的矛盾，而且有利于先进环节本身的充实、巩固和提高。

在进行綜合平衡的时候，必須从国民經济各部門、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看到需要，又要看到可能。从实际出发，就是不但要根据当时工业已經达到的設備能力，而且要根据当时的粮食、燃料和其他重要原料、材料的供应能力，安排国民經济各部門的生产指标、基本建設指标和它們之間的比例关系。粮食、燃料和其他重要原料、材料，是在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进行綜合平衡的物质基础，对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进行綜合平衡，是不应当超越当时物資供应的可能性，而单凭人們的主观需要去安排的。如果

^① 《非批判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6頁。



离开客观的可能性而片面强调需要，就不可能达到平衡。

在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必须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这就是要把一切应当办和可能办的事情，纳入国家计划，并且在制订计划的时候要考虑到各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国家的综合平衡同各部门的专业平衡和各地方的地区平衡，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综合平衡是以专业平衡和地区平衡为基础的；专业平衡和地区平衡，必须以综合平衡为前提。各部门、各地区，如果不遵守国家的统一计划，各自为政地去安排平衡，必然会分散力量，使应当快办的事情推迟，使应当推迟的事情反而提前，这样，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没有统一性，也就没有计划性。分散主义同综合平衡是不相容的，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是不相容的。刘少奇同志说：“我们所提倡的地方工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的发展，而不是盲目的、自由竞争的发展。为了防止和减少可能的资源资金的浪费和产品的积压，中央和地方各级都必须认真地加强协作和平衡的工作，必须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和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①反对分散主义，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是加强计划性，做好综合平衡工作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分别主次、先后、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先办那些应当办、可能办的事情，推迟那些应当缓办、可以缓办的事情，才能收到经济上应有的效果。在这里，部门之间、地区之

间、部门和地区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在某些方面是会存在着矛盾的。当综合平衡同某些专业平衡或地区平衡发生矛盾的时候，综合平衡在可能条件下要照顾专业平衡或地区平衡；但是，更重要的是专业平衡或地区平衡必须服从综合平衡，局部必须服从整体。

在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对于国民收入的积累部分，必须保留一部分作为必要的后备和储备，而不应“满打满算”，把全部的积累都用到生产或基本建设上去。留有必要的后备，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能够灵活地调度各种物资，能够从容地应付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和其他意外事件，能够及时地调整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不平衡，保证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不断扩大。

三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要求我们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合理地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正确处理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反映着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现代工业主要是由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经营，农业主要是由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安排得好，农业能够得到必要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就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有可能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页。



以大量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去支援工业，使重工业和轻工业得到顺利发展。这样，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更加密切，它们的发展就更加迅速，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就更加巩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安排得不好，农业得不到必要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就会受到削弱，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也就不能顺利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之间，就会出现矛盾。这种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不利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利于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壮大，也不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可见，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重要问题。

(二) 在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要正确处理现代工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现代工业主要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主要是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安排劳动力和分配生产资料时，必须适当地照顾手工业企业。这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才能为社会提供丰富多采的手工业产品，也才能保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收入。

(三) 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反映着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就能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同时，又能保证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

和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但是，积累和消费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果积累的比重占得过多，就会使人民的眼前利益，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受到影响；反之，如果积累的比重占得过少，就会使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受到影响，从而，就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受到影响。因此，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①

(四) 在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国内市场的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矛盾，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矛盾，即是说，生产方面和分配方面的问题，都会集中地反映在国内市场问题上。国内市场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必须把生产过程同流通过程统一起来考虑，必须把社会生产同人民生活统一起来考虑，必须把国内市场的問題，放在安排生产的视綫之内。在安排市场問題的时候，必须注意居民日益增加的购买力同日用消费品可供量之间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才能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提供有利的条件，才能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教 学 小 品

敢 峰

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

教师不但要教好课，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逐渐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

我国有句古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生不能跟教师一辈子，教师也不能教学生一辈子。对于学生攀登知识的千山万壑，教师毕竟只能作一些指引和教给他们一些攀登知识山峰的基本的本领，将来能否有所成就，还要靠学生本人的努力。路，终究是要自己去走的，在学习的道路上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学生幼时要教师领着走，跟在教师后面走，都是必要的，但总还要慢慢地学会自己独立地走。逐渐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这是教学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对于学生终生做学问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学生有了自修的能力，是在学习的道路上终生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过去不少有学问的人，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没有受过系统的完备的教育，没有上过大学，甚至也没有上过中学，他们的学问主要是靠自修得来的。如果说他们上过大学也可以，那就是社会大学、生活大学、自修大学。他们在刻苦自修中碰到了问题，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摸索、探讨，

还千方百计地寻师访友，求得指教。他们走的路虽然是曲折的、艰难的，但是，因为他们在学习中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所以能够扎扎实实地获得知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为我们的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应当教育学生珍惜这种学习条件，引导他们更加发愤和刻苦地学习，培养自修能力。千万不要使学生错误地认为，现在学习条件好了，学习就成了轻而易举、不费苦功夫的容易事情，就可以躺在教师身上，一切依赖教师了。目前在教学上，有的教师终日只忙于给学生装知识，却忽视了在此同时要逐渐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因此，有些学生也只希望教师把知识嚼得稀烂来喂自己，而不懂得或不注意锻炼自己的自修能力；碰到一个新问题，自己还没有去钻研就叫难不迭，要求教师给现成的答案。这种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主要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计算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这是普通教育阶段教学的重要任务。要指导学生在基本知识和进行基本训练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学会正确的自学方法，锻炼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们在学习的道路上逐步做到离开教师也能



够走路。这样做，当然并不是說不需要教师的指导，更不是把教师在課堂上应当解决的問題推給学生去自修，加重学生的学习負担和困难。

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最重要的是通过教学实践为学生打好自修的基础。首先是逐渐培养学生正确的立場、观点和学习方法，以及严格认真的学习态度。这是学生自修能力的灵魂。其次，要帮助学生认真掌握一定的文字工具(如文言文、外文)，学会运用一般的工具书(如字典、辞源等)。牢固地掌握使用这些工具的技能技巧，是自修所必须具备的起碼条件。第三，还必须进一步使学生打好文化知識和技能的基础。这个基础打得越好，学生的自修才能进行得越順利，今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盖起更高的知識大厦来。

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主要应当通过学校的教学实践去进行。諸如：在讲课前帮助学生功课进行适当和必要的預习；在課堂教学中要善于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活跃学生的思想，在系統讲授的前提下，适当地让学生回答一些問題；要督促学生独立地完成作业，根据不同学生在作业中碰到的实际困难，加以指点；在理化实验中，要注意培养学生自己动手的能力；等等。此外，还要提倡学生适当地多讀一些好的課外书籍，向他們介紹各种好的讀書方法，最好还能使他們养成写讀書筆記、积累資料和做索引等良好习惯。

逐步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这是教学上

的“金不换”，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教师在教学上不但要打开知識的大門，引导学生走进去，还应当把打开知識大門的钥匙交給学生，让学生掌握。

“死”而后活，“死”中有活

先讲一个寓言：

古代两个哲学家站在一只肥猪面前，研究如何能将肥猪肉变成自己的肉。

哲学家甲主張把猪杀掉，吃下肚去。

哲学家乙反对：“不能吃死猪，死猪怎么能变成活肉呢？”于是走到猪面前，用手摸摸，用鼻子聞聞，以为这是将猪肉变成自己的肉的最好方法。

讀書，就是要使书上的知識，使前人的斗争經驗，成为自己知識上的血肉。有些人怕讀“死书”，結果就少讀書或不认真讀書，只是“用手摸摸，用鼻子聞聞”，并没有把书上的知識細細咀嚼吃下肚去。

談到讀“死书”，我就联想到一个讀書方法的問題：“死”而后活。这里說的讀“死书”，不是像书呆子那样以死讀死記为最終目的，而是认真地讀，老老实实地讀。“死”而后活，就是使书上的知識，經過自己的理解、記憶和独立思考，变成自己活的知識的血肉，并在实践中能正确地运用它，这样，就把书讀活了。同时，在讀書的时候，要边讀边想，尽可能地把书上的知識同自己生活中的现实問題，同自己要解决的問題联系起来，做到理論联系实际。这样就可以从“死”中求活。好



比我们吃东西，虽然吃的都是死的做熟了的东西，但经过肠胃的消化和吸收，就能成为我们身体的活的有机体的一部分。怕读“死书”而不认真读书，不从“死”中求活，结果从书上什么也得不到。

读书的最大毛病是不“死”不活。不“死”，就是不老老实实地读书，坐不下来，读不进去，浮光掠影，一知半解；不专心，不踏实，怕困难，想偷“巧”。这是读书上的一条大忌。不活，就是不了解书中的精神实质，不能联系实际，不会运用。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死”而后活，“死”中有活。首先要坐下来老老实实、专心致志地读书，真正要有“十年寒窗”的那种苦学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一丝不苟，也就是说一定要先“死”。读书如何由“死”到活？这就要在老老实实读书的基础上，努力领会书中的精神实质，分析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读书中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努力做到学以致用。读书从“死”到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下苦功夫读书到深入掌握书的精神实质的过程，从深刻地理解书中的内容到实际运用的过程，从更高的要求来说，还包括从学习到独创的过程。古来也有一些人读书读“死”了，读成书呆子，这主要是囫圇吞枣，食而不化，不会运用。只要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就可以避免这一点。古语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读书没有入“虎穴”的苦学精神，怎能把书中的知识和精华学到手呢？但是，入“虎穴”是为了得“虎子”，不是要让老虎吃掉。读书是为了学到有

用的东西，不是为变成书呆子。因此，读书要从“死”中求活，先“死”后活。不求活，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要使学生的才能 有充分发展的天地

学好课堂教授的各种知识，是对全班学生的一个基本要求，而对一些程度较高、在某一方面有才能的学生来说，只是课堂教学还不能满足他们在学习上的进一步要求。因此，对这些学生，除了严格要求他们完成课堂上教师规定的功课外，还应当组织他们在课外多读一些书，和参加一些有利于发展他们才能的课外活动，使他们的才能有充分发展的天地。

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普遍提高全班学生各科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程度，这是基本的、主要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各门课程的学习中总会有几个“拔尖”的学生，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使他们在切实学好各科知识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不但是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同时对带动全班学生的学习和钻研风气，也有很大好处。资产阶级的天才教育，是牺牲多数学生的学习来培养少数几个人，不是满园春色中的“红杏”，而是满园荒蕪中的“红杏”。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我们要在全班学生学习质量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使几枝“红杏出墙”，从而使满园的春色更加鲜艳美丽。

在科学文化的领域中，一个人在某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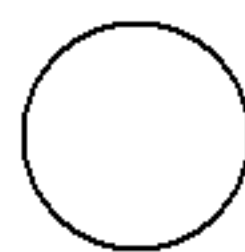
面的才能的成熟，一般說来是較晚的，需要經過較长时期打基础和勤奋学习、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才能和天才的萌芽往往在青少年的学习阶段就开始显露了。教师除了努力提高全班学生的学习程度外，还应当注意发现在本門課程中有才能、有天才萌芽的学生，精心加以培养。十个指头有长短，要求学生的程度一刀齐，或者門門功課都要五分，把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都安排得死死的，沒有多少自由支配的余地，这是教学上的一种有害的平均主义倾向，是不符合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

教师要善于海闊教魚跃，学生要善于天空学鳥飞。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因而充分发展学生的才能，关键仍然在于严格訓練他們和正确引导他們，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地培养他們，为他們今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打下更好的根基。否則，学生的才能或天才往往因根基淺薄而曇花一現，結不出丰硕的果实来。历史上这类的經驗教訓很多，我們应当特別記取。教师在課堂上要狠狠抓紧各科基础知識和基本訓練的教学，在課外，除了

要巩固課堂上的教学外，对那些程度特別好的学生，或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有天才的学生，还要加以个别的指导和帮助，使他們在学习的道路上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既不要放任自流，也不要加以限制，以一个框框去套死。在学习上要保证他們有一定的自由支配時間，給他們創造一定的学习条件，并加强对他們課余学习的指导。同时，学校还可以适当地（不是过分地）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如办墙报、优秀作文展覽、数学比赛、写字比赛、朗讀和演讲比赛，以及举办課外閱讀小組、課外科学技术活动、課外文学艺术活动、課外体育活动等等，来满足学生課余的各种正当的爱好和要求，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在各种課外活动中得到鍛炼和提高。在开展这些活动的时候，要注意：一、必須以教学为主，要有助于課堂教学而不是削弱課堂教学，更不是代替課堂教学；二、必須完全采取自願的原则；三、不要过多地牵扯教师的时间和精力，要注意劳逸結合。这些方法，只要运用得当，学生就会从中得到很大益处，天长日久，就会培养出人才来的。



红旗



一九六二年 12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 ★

目 录

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几个问题 赵 璞 (1)

——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著作的体会

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甘子玉 (14)

关于选择研究题目 严中平 (18)

农村人民公社干部应该加强

经济核算观点 陈 因 (28)

说鞭策 吴介民 (32)

美法交恶：西方外交万花筒上的一个新镜头 张振亚 (34)

丑恶的“形象” 胡思升 (38)

☆ 六月十六日出版 ☆



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几个問題

——学习毛澤东同志有关著作的体会

赵 漢

我們党的干部政策，是我們党的組織路綫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澤东同志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詳尽地論述了党的干部政策。他充分地估量了干部問題的重要意义，全面地分析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并且从这一点出发，对挑选干部、識別干部、提高干部、团結干部等一系列的問題，都做了精辟的分析和具体的指示。

毛澤东同志对干部政策問題的論述，是同他对党的建設的其他方面的論述密切联系、融为一体的，內容十分丰富。这里，只就其中的几个問題，提出自己在学习中的一些体会。

一、党在干部問題上的出发点

毛澤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干部問題，并且把这个問題同我国的革命和建設事业紧紧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說过：“指导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党，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①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偉大革命斗争的党，沒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②对于干部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毛澤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說过：“經濟建設运动的开展，需

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他們是經濟战綫上的指揮員，而广大群众則是战斗員。”^③他在一九五六年最高国务會議上又說：“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內，努力改变我国在經濟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偉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④。

一切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都必须有自己的統治人材。离开了干部，政权問題就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工人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权，当然也必须有自己的领导人材，必須組織和培养自己的干部。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它不是以一种剝削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剝削形式的革命，而是旨在消灭一切剝削制度和一切剝削阶级的革命。工人阶级絕不能通过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来达到

① 《为爭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而斗争》。《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67頁。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4頁。

③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9頁。

④ 見《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期，第1頁。



自己的目的，而必須彻底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为了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需要培养大批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建设等方面的干部。当工人阶级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不可能足够地准备好这样的干部。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对旧社会来的人材要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一方面还必须大量地培养各方面的新的干部。因此，工人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干部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的组织任务。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工人阶级对于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权问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党和国家要经过干部来集中群众的意见，以便根据群众的意见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计划、法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计划、法令，要靠干部去组织领导群众具体执行。人民群众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计划、法令的意见，也要通过干部集中起来，反映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党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良作风，要靠干部去身体力行和发扬光大。没有干部，党的领导就无法实现。可见，干部问题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强调干部的作用，决不是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决不是离开人民群众而孤立地强调干部的作用。我们共产党人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来观察人类社会的。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我们的工作能够取得伟大的

成绩，一定是：一方面，由于领导机关制定了适合广大群众需要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干部善于贯彻党的政策、取得群众的信任，善于依靠、动员、组织和发挥群众的力量。这两条缺一不可。干部必须依靠群众。干部脱离了群众，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干部只有在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前提下，在他们的行动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够起自己所应该起的作用。如果认为干部可以在人民群众之外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无疑是极大的错误。同时，人民群众也必须有自己的领导骨干。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只有在正确的领导之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因此，不应该把干部的作用和群众的作用对立起来。当我们谈到干部的作用的时候，也正是指干部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使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作用。在确认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地估量干部的这种作用，是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最忠实的代表者。我们的党和国家，都是人民群众的工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个出发点，也就是我们在干部问题上的出发点。我们的干部，本来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脱离群众的特殊阶层。他们是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产生

①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1095—1096页。



出来的。他们能够按照人民群众的需要，担任领导工作；也能够按照人民群众的需要，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在担任领导工作的时候，他们也只能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我们的干部，既是人民群众的老师，又是人民群众的学生；既是人民群众的领导骨干，又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他们必须按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办事，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不为人民群众办事，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他就随之丧失了继续担任干部的基本条件。刘少奇同志说：“正因为我们重视人民群众及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才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干部。我们重视干部，是从重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的，并不是离开人民群众的观点而去孤立地重视干部，不是为重视干部而重视干部。”①

在干部问题上，我们和一切剥削阶级统治集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全部政策，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的；而一切剥削阶级统治集团，都是从他们少数人的利益出发的。他们之所以重视干部问题，是指望依靠少数臣僕来维系对人民的统治。弄清楚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出发点，对于正确地领会和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是很有好处的。

二、使用干部问题上的两个对立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②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只是一味地重用皇亲、外戚、近侍、佞臣，而对比较正直、清廉、聪明、能干的人，却加以排斥和摧残。他们本想用这样的干部政策来笼络亲信，驾驭臣下，统治人民，维持自己至尊无上的地位。但是，结果总是适得其反，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基础，不是挽救了而是加速了皇朝的崩溃。这种情况，不能光用帝王个人的昏庸无能以及群臣之间的排挤倾轧来说明。这是封建阶级黑暗统治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所必然产生的现象。

也有一些比较英明的帝王，敢于跳出狭小的圈子，到比较广泛的范围中去物色“贤才”。唐太宗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唐太宗主张“求贤”、“审官”、“纳谏”、“去谗”。他说：“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讎不棄”。他根据“广求贤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亲、疏、新、旧的关系，把房玄龄、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等一批优秀的文臣武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充分地运用了他们的力量。即使是“犯颜干上”、“狂言直谏”的人，如果他认为确实出于忠心，所提的意见对他确实有利，他也能够看重他们，团结他们，采纳他们的意见。魏徵是历史上著名的、有才干的谏臣，对唐太宗多次提出过批评。其

① 《论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89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页。



中有些意見相当尖銳，措辞相当激烈。唐太宗却不以为忤，很重視魏徵。魏徵死后，他还思念不已，說：“人以銅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鏡，可以見兴替，以人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①

像唐太宗这样比較英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止一个。他們确实选用了一些“賢才”、“諫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有利的作用，因而对人民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一切历史人物，都有他們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一切剝削阶级的統治者，都是按照剝削阶级的政治标准去使用干部的。他們所謂的“賢才”，必須是忠于“君”、忠于当时統治阶级、并且善于为当时統治阶级效劳的人。他們的这种政治标准，是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

和一切剝削阶级相反，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在使用干部的問題上，实行了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任人唯賢”的路綫，是同人民群众对干部的要求完全一致的。

毛澤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綫，服从党的紀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謀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綫。”^②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澤东同志把干部的条件概括为“德”和“才”两个方面。我們党遵循着毛澤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在干部条件上一貫坚持了“才德兼备”的标准。

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一方面为了防止和克服只重視业务、忽視政治的傾向；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和克服空談政治，不重視钻研

业务、学习技术的傾向，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又紅又专的口号。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說：“又紅又专，这是全国知識分子和技术人員的前进道路，也是我們全党各級干部的前进道路。”^③又紅又专这个口号，是同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一致的。

由此可見，我們党在使用干部問題上所說的“賢”，包含着“德”和“才”这两个方面的內容。“德”，是指政治品质。“才”，是指业务能力。在“德”的方面，要求每一个干部忠实于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地执行党和国家交給的任务，努力为人民服务。每个干部都应该在这个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于党员干部，則应该有更高更严的要求，他們必須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站穩工人阶级立場，貫徹执行党的政策，服从組織決議，遵守党的紀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才”的方面，要求每一个干部，都掌握一定的业务知識和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能够把工作切实做好。对于党员干部，則要求他們要更多地懂得党的政策，并且在工作中，在提高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方面，起模范作用。当然，对从事不同工作的干部（例如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和从事技术工作的干部）在德才方面的具体要求是不能完全相同的。在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时候，必須从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职务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而不应该强求一律。

① 以上引的唐太宗的言行，参看《資治通鑑》唐紀。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頁。

③ 《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頁。



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毕生为之努力的方向。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该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加紧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的修养，努力通晓和掌握社会发展和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精通业务，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德和才这两个方面的水平，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古人说，“德”是“才”之帅，“才”是“德”之资。一个干部，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才能够自觉地发挥和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如果对人民的事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不用积极的和谨慎的态度去做工作，他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但是，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句空洞的、抽象的口号，它只有通过每个干部做好自己份内的业务工作才能体现出来。我们的干部，越是认真钻研业务，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就越能做好工作，也就越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如果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和热情，没有一定的政策水平，缺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就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因此，必须把德和才、红和专结合起来。

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德和才是统一的。党所要求于我们干部的德，是为人民服务的德；党所要求于我们干部的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才。刘少奇同志曾经把党的干部标准用一句话来概括：“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①凡是人民群众认为“贤”的干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就坚决地使用他。凡是人民群众认为“不肖”的人，任何领导机关都不能违反人民群众的意志而把他强加于人民群众。这就是

我们党的“任人唯贤”的路线。

长期以来，我们党在使用干部方面，曾经不断地向“任人唯亲”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一些人，实行过“任人唯亲”的错误路线。像张国焘和高岗、饶漱石等，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不惜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拉拢亲信，排斥“异己”，组织宗派，阴谋篡党。除此以外，有的领导干部，在使用干部时从不纯的个人动机出发，也犯过“任人唯亲”的错误。这种“任人唯亲”的错误，不论它用什么形式出现，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乃至封建宗法思想在干部政策问题上的反映，必然会给党造成危害，这在我们党内都是不合法的，从来都是受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党内一切正直的同志的坚决反对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的，过去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②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是根据“任人唯贤”的路线建立起来的。人民群众亲切地体会到，我们党的使用干部的路线是正确的。他们对于党和国家的干部总是给予很大的信任。为了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有责任更加谨慎地执行“任人唯贤”的路线，慎重地选拔和使用干部。

^① 《论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0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页。



同时，我們每一个干部都应该用党所提出的干部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样，群众对于干部就会更加信任，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联系就会更加密切。

三、在执行“任人唯賢”的路綫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为了正确地执行党的“任人唯賢”、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首先对于德才兼备的原則要有正确的認識。

党和国家要求我們每一个干部既要关心政治，又要钻研业务。思想和政治是統帥，是灵魂。如果取消了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經濟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任何干部都应该承认政治的重要性，承认政治必須挂帥的原則，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但是，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们是为完成經濟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們是为經濟基础服务的。如果离开了經濟工作、技术工作等实际工作，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就无从談起。我們党所說的政治挂帥，指的是党的路綫挂帥，党的政策挂帥。每个干部，应该在党的路綫和政策的指导下，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把实际工作做好。只有做好实际工作，才能具体地貫徹执行党的路綫和政策。毛澤东同志总是教导我們不要做空頭政治家。把政治付之空談，看上去好像很关心政治，实际上对人民毫无用处。一个干部，如果不去钻研业务，不去做好自己崗位上的实际工作，就說明他并没有真正实行政治挂帥。要是发现了这种不好的傾向，領導上就有責任帮助他糾正过来，把他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当然，我們的干部也不应该做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如果只注意业务，不去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端正立場观点，以致在实际工作中違反了党的路綫和政策，那也是錯誤的。这种錯誤也必須糾正。这种錯誤，不在于认真钻研业务，而在于离开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钻研业务这一件事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加以非难。钻研业务同輕視政治沒有必然的联系。真正关心政治的好干部，应该是刻苦钻研业务的模范。如果因为某一个干部认真钻研业务，就认为他輕視政治，显然是錯誤的。

党和国家要求我們每一个干部既要有动脑筋、提意見的积极性，又要有服从組織的紀律性。是不是服从領導，执行決議，能不能遵守組織紀律，是判断一个干部政治品质优劣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对于任何工作、任何問題，人們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种正常的現象。一个干部，通过正当的組織手續，对工作提出意見或者对領導上提出批評，这正表現了一个干部的积极性。毛澤东同志教导我們說：“处在偉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發揮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謂發揮积极性，必須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发表意見、批評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監督作用。沒有这些，所謂积极性就是空的。”^①任何干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版，第317頁。



部，只要他在遵守組織原則的範圍內，向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提出意見、提出批評，都是合法的、正當的。如果他的看法有不正確的地方，也不應該把思想認識上的錯誤說成是組織紀律上的錯誤。我們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能夠經常地保持生氣勃勃的革命朝氣，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能夠保持自己的領導正確，當我們在工作中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的時候，總是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及時地發現和糾正，正是因為我們有着為數眾多的這樣的好幹部。

黨和國家要求每一個幹部既要完成任務，又要執行政策。能夠堅持走群眾路線，對群眾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又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務的幹部，是人民群眾所需要的好幹部。有的幹部，雖然在行動上沒有違反黨的政策，但是沒有完成經過努力可以完成的某些工作任務；也有的幹部，在完成某些工作任務的過程中，違反了黨的政策，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損害黨和人民的聯繫。對於這兩種情況，都要教育幹部注意糾正。黨的組織，對於每一個幹部的工作，應該把他完成任務的情況和他執行政策的情況，以及他在工作中所採取的方法和作風統一起來，進行全面的評價；而不應該僅僅把其中的一個方面作為衡量幹部的標準。

除此以外，如果僅僅根據幹部的家庭出身、個人經歷、社會關係去判斷他的政治品質，而不去具體地了解他的政治態度、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如果把業務能力僅僅理解為幹部的文化程度，而不全面地了解他的業務工作能力；如果把幹部的德才的高低簡單

地和他的資歷的深淺等同起來，而不看他現有的水平和在工作中的實際表現；所有這些看法都是不正確的。如果按照這些不正確的看法去挑選和使用幹部，都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偏差。

為了正確地執行黨的“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對於幹部的具體情況還要有全面的了解。當我們正確地理解了黨的幹部政策的時候，如果知人不明，還可能用人不當。

毛澤東同志很重視識別幹部的工作。他說：“必須善於識別幹部。”^①他要求我們“對於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應該採取分析研究的態度。”^②一個一個地對於幹部進行全面的深入的考察了解和分析研究，當然是十分繁重而又十分細緻的工作。但這是正確地執行黨的幹部政策的基礎，是決不能忽略的。

毛澤東同志還具體地指出：“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③如果違背了這種方法，就會在識別幹部的工作中陷入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個人的政治觀點、思想作風和工作能力，往往要在較長時間的工作中，通過許多次的反復，才能比較全面和比較清楚地表現出來。要正確地識別幹部，就必須從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中去看他的實際表現，不能單憑幹部一時一事的表現來作出判斷。有一些在工作

①③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頁。

②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5頁。



中脚踏实地，讲求实效，说得少，做得多，真正埋头苦干的干部，乍看起来似乎并不出色，并不引人注目；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是一步一个脚印，经得起检查和考验。如果不从本质上进行考察，仅仅根据一时的、片断的表面现象来判断一个干部，是难保不犯错误的。

干部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常常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对干部要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有分析的头脑，养成分析的习惯，不要对复杂的问题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①对于任何一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只要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要如实地承认它们，如实地分析它们。“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②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从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着眼。如果因为干部在某一项工作上有了某些成绩就不再去注意他在其他方面存在的缺点，或者因为干部在一件事情上犯了错误就抹煞他在其他方面的成绩和优点，都是很不妥当的。

对干部要善于用其所长，补其所短。干部的“德”和“才”，总是越高越好。人民群众对干部寄以这样的期望，干部本人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人。“德有所不至，才有所不能”。人总是有优点和长处、同时又有缺点和短处的。因此，在使用干部的时候，要注意发扬他们的优点，发挥他们的长处，及时帮助他们克服缺点，补足短处。

考察和了解干部，不能只凭固定不变的

老印象，必须把干部的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的干部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从历史上考察其根源，帮助他认识产生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要因为一个干部犯了偶然的、个别的错误就去算老账、算总账。

要了解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防止在识别干部工作中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必须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考察结合起来，必须充分依靠群众。我们的干部，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众（包括同级干部和被领导干部）之中，并且经常地在他们中间进行活动。群众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上，帮助领导机关识别干部。如果群众反映的情况同干部在领导机关面前的表现相一致，固然可以加深和充实领导机关对干部的了解；如果不一致，也可以对原有的了解加以检验或者修正。

在考察和了解干部的时候，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就可以使领导机关既了解干部完成任务和执行政策的好坏，又了解干部思想作风的优劣；既了解干部在执行领导机关的指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干部在实现当地群众的某些特殊的具体要求方面的情况；既了解干部在领导者面前的表现，又了解干部在被领导者面前的表现；既了解干部的各个方面的概况，又了解干部的某一方面的详细情形。这样，无疑要比单纯从哪一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更确实、更全

^① 参阅《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3、952页。

^②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5页。



面、更深刻。

領導機關注意了解群眾對幹部的意見，不僅對於識別幹部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可以推動幹部更加密切地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的利益，遇事同群眾商量，自覺地把自己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領導機關這樣做，還可以使群眾主動地關心幹部，監督幹部，幫助幹部不斷地進步。

四、培養和提高幹部

培養和提高幹部，是各級黨組織的一項重要任務。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我們的幹部具有更高的理論修養和政策水平，具有更多的生產鬥爭知識和實際工作經驗。黨的組織必須認真組織幹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總結實際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鑽研本行業務知識，使幹部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逐步精通自己的業務，切實做好工作。

組織幹部學習，必須遵守理論聯繫實際這條基本原則。在指導幹部學習理論的時候，要使幹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原則同實際鬥爭中的經驗教訓聯繫起來加以研究。實踐是最偉大的學校。實際工作中的一切成功的和失敗的事例，都是我們最好的教材。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從戰爭學習戰爭”^①的著名口號。我們黨的許多領導骨幹，就是在武裝鬥爭和群眾運動的烈火中鍛煉出來的。現在，我們正面臨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任務。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的報告中教導我們：“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會主

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②這就要求我們從建設學習建設，在建設的實踐中解決這個矛盾。我們每一個幹部都要抱着虛心學習的態度去做工作，從實踐中增長知識。

我們黨的實踐證明，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指導下，認真地總結經驗，是一個重要的學習方法。在新的任務面前，我們大家都缺乏經驗，“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要有一個過程。”^③在我們每一個同志的工作中，都有着成功的和失敗的紀錄，都有着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認真地總結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我們的事業就會不斷發展，幹部也就會不斷提高。經驗是幹部和群眾實踐的產物，只有虛心地向群眾學習，向各種專家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從實際出發，集中幹部和群眾的智慧，才能够從經驗中總結出科學的結論。在總結經驗的時候，必須充分發揚民主，使大家暢所欲言，從不同的角度上提出各自的見解，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把大家的正確的意見集中起來，使片斷的零星的經驗上升為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經驗，使大家分清正確和錯誤的界限，達到統一的全面的認識。無數的事實證明，在和風細雨、心情舒暢的氣氛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總結經驗，是培養提高幹部的最實際最有效的方法。

①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4頁。

②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38頁。

③ 《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0頁。



培养和提高干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关心干部的业务学习。党的各级组织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使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能够刻苦钻研本行业务，成为本行本业的专家。为了使干部熟悉业务情况、钻研业务、积累经验，就必须使干部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干部的专业在可能条件下保持稳定。

领导干部本身起模范作用，善于指导干部，是培养和提高干部的一个重要环节。领导者的一举一动，常常对干部起着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优秀的领导者可以为党带出一批好的接班人。所以，就党的组织来说，在整个培养提高干部的工作中，应该首先地并且着重地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水平。就各级担负领导责任的干部来说，更要以严肃负责的精神，加强党性锻炼，提高领导水平，为被领导者树立德才兼备的榜样；同时，还应该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贯穿到自己的行动中去，贯穿到布置工作、检查工作、总结工作中去。

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去指导干部：“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①凡属方针、政策和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则问题，一定要抓得很紧，耐心教育，使干部真正懂得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和思想作风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如果只布置任务，不交代政策和基本的工作方法，或者语焉不详，不针对干部的思想疙瘩把道理讲清楚，就不能帮助干部正确地进行工作。至于在细节问题上，在那些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具体问题上，就应该让干部根据具体的情况和群众的经验，

去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机械地、硬性地、烦琐地划出许多不必要的“框框”，不仅不利于锻炼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而且也不利于养成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

要认真地、及时地、深入地检查干部的工作，并且通过检查来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②检查工作，一般要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马。不能让那些不懂党的政策和组织原则，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作风飘浮的干部去负责检查工作。在检查时，既要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也要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既要了解工作中的问题，也要了解干部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中的问题；既要听取干部的汇报，也要倾听群众的反映；既要看到工作中的成绩和成功的经验，又要看到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失败的教训。发现了当地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帮助干部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积极地找出改进办法，鼓励干部进一步做好工作，而不应该简单地斥责了事。发现了领导机关自身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进行自我批评，改进工作。总之，要通过检查，给干部以切实的帮助。

为了帮助和督促党的干部逐步提高自己，改进工作作风，必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要教育干部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

党的组织应该像慈母一样地爱护干部，

①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516页。



應該在政治上、思想上關心干部的成长，關心干部的工作条件，珍惜和愛護干部的積極性，使干部親切地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使他們能够做好党和人民交給他們的工作。

五、党的團結干部的政策

我們要不斷地加強全國人民的團結，不斷地加強人民群眾的領導骨干的團結。我們必須加強全党和全國干部的團結，使黨員干部和非黨干部、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漢族干部和少數民族干部、地方干部和軍隊干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劉少奇同志說：“我們干部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不是以私人生活上的利益和感情來作團結基礎的，而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上的一致，來作為團結基礎的，而是以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綱領，來作為團結基礎的，而是以黨中央的正確路綫來作為團結基礎的，而是團結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之下的”^①因此，干部的團結和進步，是不能分開的。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越高，干部對黨的路綫和政策的認識越透徹越明確，干部的團結就越鞏固，也就越能同心同德，做好革命和建設工作。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他說：“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②這是一個意義十分深刻的指示，需要我們認真領會。要把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團結

好，並不是困難的。比較困難而又容易被忽略的，是如何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的問題。

有的同志，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見看成是進行工作的障礙，或者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見簡單地同錯誤意見混為一談。這種認識是不利於工作，也不利於團結的。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不同的看法，常常可以促使大家更全面更縝密地考察問題的各個側面，從而作出更加切合實際的決定。因此，把不同的意見提出來，這是達到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的一個正常的、必要的步驟。如果聽不到不同的意見，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認識就容易陷入片面性。在工作中，有少數同志提出與多數同志不同的意見，這並不是什麼不好的現象。有時，少數同志和多數同志有了分歧的意見，到底真理在哪一方面，需要到實踐中才能得到最後的證明。我們應該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採取謹慎和耐心的態度，團結共事。這就是說，對於不是迫切的、急需付諸行動的問題，如果意見不一，就應該繼續調查研究，不必急於做出結論。對於需要及時作出決議的問題，則必須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辦事，這就是必須按照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去行動。在這樣做的時候，對於仍然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或者個別人，只要他們在行動上服從決議，就應該允許他們保留意見和向上級領導機關提出意見。正如鄧小平同志說的：

^① 《論黨》，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2頁。

^②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4頁。



“这对于党不但沒有害处，而且可以有某种益处。只要党的決議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見的党员又是願意服从真理的，他們終于会心悅誠服地認識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錯誤。如果真理最后被证明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認識真理。”^①

对于犯了錯誤的干部，應該幫助他們認識和改正錯誤。毛澤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結論中指出：“我們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們一道工作。”^②毛澤东同志关于團結犯过錯誤的干部的政策，是大家所熟知的。党对于干部所犯的錯誤，是要坚决糾正而决不迁就姑息的。但是，对于犯了錯誤的干部，党总是本着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幫助他們走上正确的道路。对于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是决不能用简单的粗暴的組織上的惩办去糾正的。毛澤东同志說：“我們揭发錯誤、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医，不固执錯誤，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願意医治，願意改正，我們就妥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魯莽的态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③对于干部的缺点和錯誤，一定要从團結的願望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計，把思想認識問題和政治問

題、小是小非問題和大是大非問題、偶然的个別的錯誤和一貫的系統的錯誤严格地区別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團結好同志。对于犯了錯誤的干部，一定要坚持党的正确政策，用同志式的态度，与人为善地帮助他改正，热情地爭取和欢迎他进步，这是正确对待同志的原則問題，是关系到党的團結的原則問題。毛澤东同志說：“对于人的处理問題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这是我們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④

党的組織，不仅有責任把党內的广大干部團結好，而且有責任把党外的广大干部團結好。毛澤东同志曾經多次指出：“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們置之度外。”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誠意地幫助他們，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們”^⑤。他还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別人、壟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⑥无

- ①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頁。
- ②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4頁。
- ③ 《整頓党的作风》。《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9—830頁。
- ④ 《学习和时局》。《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2頁。
- ⑤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5頁。
- ⑥ 《在陕甘宁边区参議会的演說》。《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1頁。



論黨員幹部還是非黨幹部，都是為着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工作的。大家應該在這個共同的目标下親密團結，互相關心，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學習。我們黨對於廣大的非黨幹部，同對待黨員幹部一樣，一視同仁地執行着“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政策，一視同仁地執行着提高幹部和團結幹部的政策。如果埋沒黨外的人材，這是黨和人民所不能允許的。

建國以來，非黨幹部在全國幹部隊伍中的數量空前地增加了。他們分布在各个方面。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擔負着各種重要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加強黨和非黨幹部的團結，意義就更加重大了。

十三年來，廣大的非黨幹部同黨員幹部一起，同甘共苦，為祖國和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由於黨的培養教育和他們的自覺努力，他們在思想、政治上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一般地說，從舊社會來的非黨知識分子幹部，經過十三年的鍛煉，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黨的領導，並且願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黨組織的責任，是要進一步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心情舒暢地、自覺地、逐步地進行自我改造，進一步克服資產階級和其他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影響，樹立工人階級思想。有一些非黨幹部經過自我改造，已經參加了共產黨。應該看到，就總的趨勢來說，非黨幹部和黨員幹部在政治上的差別性將會逐漸縮小，共同性將會逐漸增加。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對許多非黨幹部在政治上的

進步估計不足，不給他們以應有的信任，不去大膽地放手地讓他們工作，這是不利於團結的。當然，如果只看到非黨幹部和黨員幹部的共同性正在逐漸增加這一方面，不承認他們之間客觀存在的差別，就會忽視非黨幹部的具體特點，或者放鬆對他們的幫助，或者用黨員幹部的標準去要求他們，那也是錯誤的，不利於團結的。

正確地執行黨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是維護團結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要加強團結，就必須分清是非。而黨的幹部標準問題，也正是在廣大幹部中提倡什麼和反對什麼的是非界限問題。對幹部的提拔、表揚或者批評、處分，都是一定的是非界限的具體體現，都會對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的其他各个方面，首先是幹部的團結方面，發生重大的影響。因此，為了維護和加強幹部的團結，必須堅決地貫徹執行黨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同一切違反黨的幹部政策的現象進行鬥爭。

我們的許多老干部經歷過戰爭和革命的烈火的鍛煉。許多年輕的幹部正在黨的優良傳統的影響下，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不斷地成長起來。我們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有了一支強大的幹部隊伍。他們分布在各種不同的崗位上，和人民群眾在一起，進行着辛勤的工作。正確地執行黨的幹部政策，我們就一定可以進一步提高幹部隊伍的水平，進一步加強幹部隊伍的團結，更充分地發揮廣大幹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性。



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 甘子玉 ·

我国富饶的自然资源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我国人民正在大规模地展开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必须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把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正确地结合起来，不但是当前生产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利益，应该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

对于自然资源，既要利用，又要保护，这就需要恰当地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自然界是统一的，各种自然现象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大自然有机的整体。人们在从事某一种生产活动、变革某一项自然条件的时候，如果只从眼前的狭隘

的利益出发，采取不适当的措施，忽视了这些措施对自然界各方面的和长远的影响，就有可能使某些自然资源 and 自然条件受到破坏。这种滥用自然和破坏自然的后果，往往在短时期内还看不出来，然而等到它的后果显著地暴露出来以后，就会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的损失。因为自然资源 and 自然条件一旦遭到破坏，常常需要用很大力量和较长时间才能补救，有些甚至是很难以补救的。

恩格斯曾多次指出，要学会统治自然，必须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对自然界的长远影响。在谈到人类历史上滥用和破坏自然

资源的情况时，恩格斯说：“可是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的这种胜利，第一步我们确实达到预期的结果，但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常常正好把那第一个结果的意义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却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蕪不毛之地，因为他们把森林砍完之后，水分积聚和贮存的中心也不存在了。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因为要十分细心地培养该山北坡上的松林，而把南坡上的森林都砍光了，他们预料不到因此却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预料不到这样就使山泉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枯竭了，而且在雨季又使洪水倾泻到盆地上去。”^①

滥伐森林，不适当的垦殖，过度的放牧，不合理的耕种等滥用自然的現象，在阶级社会，在科学技术水平較低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人们依靠科学知识已经能够估计到生产活动对自然的较远的影响，许多科学家也提出过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各种方案，但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仍然十分严重，破坏自然的現象继续加剧，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自然资源的蹂躏劫掠，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为整个社会、为长远利益打算，运用科学技术的成就，合理地利用和保护自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5—146页。



然资源，有计划地实现改造大自然的理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①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愈来愈大，利用自然的广度和深度必然日益增加。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

从利用和保护自然的角度来说，自然界中的资源可以分作两类。有一类自然资源，主要是各种矿产资源，被人们开发使用以后，是不能再生长出来的，或者是只能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才能生成的。另一类自然资源，主要是农、林、牧、副、渔业和水利方面的资源，像土壤肥力、森林、水力、动物和植物等资源，如果能合理利用、合理经营，在使用后是可以不断地恢复或增加的。

对于不能再生长出来的矿产资源，除了要注意综合利用以外，还应该注意合理开采和矿产保护。在开发矿产的时候，要按照各种不同的矿物、矿区地质和地形条件等情况，制订合理开采的规程。对于特殊、稀有的矿产，更要严格遵守特定的采掘方法和利用方法，严格防止发生破坏与滥用资源的现象。在采掘业的生产过程中，一般需要有生产准备、开采、运输等许多必要的环节，如果人们违反这种程序去开采，就难以持续地、顺利地进行生产。例如在采煤工业中，正确处理开拓、掘进、延伸、回采、运输等各个工作程

序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生产正常进行，使储量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在同一矿区中，对品位高的富矿和品位低的贫矿，也要根据利用和开采的技术水平，规定合适的开采比例和方法，防止净吃富矿、抛掉贫矿的现象。今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对矿产资源的品种与数量的需要，将会越来越多。为了适应今后发展的需要，矿产资源的勘察、开采和保护工作，应该得到更加密切的结合。

对于可以再生长出来的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涉及的因素更多，影响更广。

农业生产（包括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农业生产中，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是同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错着的。动植物的生长、发育、繁殖，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自然条件（如气温、水分等等），这个自然再生产过程是农业的经济再生产过程的根据。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运用科学技术，缩短或延长自然再生产过程的时间，改变它所需要的自然条件，但是，不能取消这个过程。因此，农业生产在更大程度上受着自然条件的影响。如果人们对这些自然再生产过程施加了破坏性的或不良的影响，就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在农业的经济再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反之，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结合得很好，农业上的自然再生产过程进行得更好，那就会对农业的经济再生产过程发生积极的、有利的作用。

例如，森林和其他植被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就是一个迫切而重要的问题。拿黄河流域来说，在古代原是林木葱茂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由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

^①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接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78页。



条件的限制，人們采取了錯誤的垦殖方式，把自然森林砍伐精光了，使水土流失逐年加剧，气候日趋干旱，河道中泥沙淤塞不断增加，黄河下游河底高于两岸平原。三千多年来，黄河下游发生泛滥、决口一千五百多次，尤以明代以来更为频繁严重。清代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对自然的破坏继续加剧。这就是黄土高原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许多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根本原因。长江流域的情况比较好一些，但是植被复盖也受到一定破坏，例如在江西、湖南一带的紅土区域中，由于山上森林砍伐过度和陡坡开荒、土壤風化等原因，到了近代，紅土已經裸露，并出现了若干成片的沙荒现象。广东的雷州半島和海南島上的热带森林，由于历史上的燒山和不恰当的垦殖，许多乔木林已变成灌木林，有些又由灌木林变成了草地，到近代已經出现一些由草地而退化形成的“人为沙漠”。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一經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立即着手医治历代封建皇朝、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遗留下来的自然界的創伤，用持續而辛勤的劳动，努力創造一个更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的自然环境。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然状况的調查和科学研究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开展，广大人民群众組織起来，进行了大规模的造林、育林、水土保持、改良土壤等工作。治黄、治淮以及其他水利工程也大规模地开展，山区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治理沙漠的試驗开始进行。这些都对自然条件的改善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保护和改造自然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工作量是很大的。和我国广大的幅員比較起来，我国现有的森林面积还是比较小的，水土流失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特别

是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还远远沒有完成，西北高原和华北平原气候干旱的問題还需要作巨大的、长期的努力才能解决。而且，由于有些自然保护工作还跟不上需要，有关科学技术知識还不够普及等原因，在个别地方，还存在着不适当的垦殖、燒山以及違反水土保持要求的耕作等现象。因此，造林、护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工作，仍然需要引起我們极大的重視，并有計劃地認真地进行。

在我国广大的自然界中，还存在着种类繁多的有益的禽兽、昆虫、水生动物和有用的野生植物。这些动植物资源具有很大的經濟价值。注意保护和合理利用，就可以使它們不断繁殖孳生，如果濫捕濫采，就可能日益减少，甚至有灭种的危險。許多地区，根据科学研究的結果，对若干动植物资源采取了保护、养殖的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保护自然资源，不是消极地保存原状，而是要把利用和保护結合起来，防止不正确的利用方法，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和充分的利用。例如，在山区生产建設中，对农田、林場、牧地应该因地制宜、全面安排；造林、护林和水土保持工作应该与当前农业生产密切結合，对自然条件的改良治理，应该远近兼顧、长短結合，并且分清輕重緩急，首先抓紧对近期生产有利的措施。山区的开荒和治山要配合进行，开一片荒就治一片山，随开随治，尽量不让开垦的土地发生水土流失的现象，并防止在不宜开荒的陡坡上开垦。例如山西的雁北专区，解放后十多年来积极进行山区建設，植林护林和农业生产密切結合、互相促进，全区林地面积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五点六倍，区内桑干河两岸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这个专区中風沙災



害較重的金沙滩公社，由于撫育了防护林带，風沙侵襲减少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牲畜都有了增加。这种自然条件得到改善、农林牧业协调发展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山区是很不少的。許多事实都证明，只要我們尊重自然規律，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把利用和保护这两方面的工作結合得好，我們就既能在当前生产中收到效益，又能从根本上逐步改善自然条件，使之在今后长远的生产中发生有利的作用。

此外，我們在注意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明显的經濟价值的自然資源和自然条件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和保存某些对科学研究有重要意义的自然条件。例如各种典型的自然景观(如若干有代表性的原始林等)，典型的地质剖面，各种珍贵禽兽和奇花異木，以及主要的化石产地等，这些东西就好像是在大自然这个“博物館”里的“陈列品”，对人們研究有关自然历史和自然条件的科学問題，具有很大价值。保护和保存这些自然条件，能够幫助我們进一步探索自然規律，因此，归根到底也是为更好地利用自然資源所需要的。

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資源，使它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提供更多的財富，是一项长期、复杂、細致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須更好地了解自然，对自然界各因素进行調查研究，掌握自然变化的規律性。对于一个区域的自然状况，常常需要进行綜合考察，不是单纯从个别产业部門的角度而是从綜合开发利用整个自然資源的角度来周密地了解自然。必須認真总结当地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經驗，考查国内外相似情况下自然状况变化的历史經驗和教訓，应用自然科学理論和技术成果，并进行

社会經濟的分析，才能制訂出較好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資源的方案。

在一个地区中，各项自然資源怎样开发利用，采掘、加工工业和农、林、牧、副、漁业怎样配置发展，自然条件怎样改良等等，都是极其复杂的問題。要妥善处理这些問題，除了根据当时当地的社会經濟条件和技术条件外，还必须从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出发。推行某些变革自然条件的生产、建設措施，对現有农业生产方法的改变以及其他改造自然的行动，必須事先經過深入的研究，广泛征求群众和有关科学技术工作者、經濟工作者的意見，并通过一定的典型試驗，确实弄清楚其效果之后才能实施。例如，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兴修水利的方案、森林的采伐和更新方式、土壤改良的措施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防治方法等，都是关系到重大的技术政策或技术措施的問題，必須集思广益，充分討論，通过必要的試驗，证明它确实具有比較充分的科学根据，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有准备、有步驟地进行。

我們祖国富饒的自然界，是供应我們一切原料和动力的“仓库”和“工厂”，正确地利用它、保护它，就可以永續不断地为我們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資源。我国地域辽阔，許多地区、許多資源都还没有經過科学的調查和勘察，还有許多天然宝藏沒有发现；就是已經发现的資源，也还远远沒有全部开发和充分利用。为了使大自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为了造福我們的子孙后代，我們必須珍惜祖国的山河草木、矿藏农田，更好地掌握自然发展的規律，利用和改造自然，使我們祖国的自然界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富饒美好，錦綉如画！



关于选择研究题目

· 严 中 平 ·

同志们常问，科学研究工作到底怎样搞法？科学研究工作的方法问题，归根到底乃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方法，是和他的立场、观点密切相关的。有关立场、观点的问题，我不想多说。我只能就有关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很可能有偏颇乃至错误的地方，我在这里只不过是提出问题，引起讨论罢了。

选定什么研究题目，这是搞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当然是实际需要，即社会实践中的需要、思想战线上的需要、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上的需要。但科学研究工作，就其本身来说，也有它的正常秩序。让我先从这个问题的说起。

一、按照科学研究的正常秩序，从小处入手

首先应该明确，选好科学研究题目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项研究工作。这是需要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和其他一系列问题具有一定的认识，才能办好的事情。过去我们有的同志，在跨开选题这第一步时就走错了地方。他们走错地方的原因，主要的就在于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还不很熟悉。

每门科学都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个

研究对象包含许多事物的一系列发展过程。这些过程的相互之间，有联系，有矛盾，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当人们在某一门学科里选择研究题目时，可以挑选其中许多事物的复杂过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也可以挑选其中个别事物的单一过程，乃至过程的某一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性的研究。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认识规律需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①这里说的是，从个别事物到一般事物的认识的秩序。

毛泽东同志又说：“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②而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就是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

• 这篇文章，是作者根据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编写组讨论研究方法问题时的发言整理成的几篇文章中的一篇，参加这次讨论的多数是青年同志。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0页。



树木，不看見森林。这里說的是，从矛盾的各个方面到矛盾的总体的認識的秩序。

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济学“首先研究在生产和交換的发展上每一个別阶段的特殊規律，只在这样研究的結末，它才能确立极少的非常一般的、可以用于一般的生产和交換的那种規律”^①。这里說的是，从个别发展阶段到发展全程的認識的秩序。

經典作家的这些提法告訴我們，人类認識过程是：由个别事物达到諸多事物，由个别方面达到全面，由特殊規律达到一般規律。我領会毛澤东同志所說“人类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②，就是指的这个过程。

毛澤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中具体談到我們研究近百年中国史的方法时指出：“应先作經济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③这里所說的經济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可以看成是个別事物或局部方面。这里的提法和《矛盾論》中关于从矛盾的各个方面到矛盾的总体的認識秩序的提法，通是一个意思。即由个别、局部“着手研究”，达到一般、总体的“了解”，由特殊規律达到一般規律。

由个别到諸多，由个别方面到全面，由分析到綜合，由特殊規律到一般規律，不仅是人类認識运动的正常秩序，也是科学工作者研究工作能力成长提高的正常秩序。大致可以这样說，越是处理較多事物或較长历史的研究課題，就越是需要多方面的基本訓練和多方面的知識积累；越是探索普遍意义較广的，也即抽象概括的层次較高的一般規律，就越是需要更加熟练的駕馭資料的經驗和更高一层的从事抽象概括的理論修养。

恩格斯說：“唯物主义的認識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靜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話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資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④“一个历史实例”尚且如此，何况是科学地闡明一系列历史的总体发展过程？

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是通过理論学习和工作实践去提高的。我們可以这样說，从某一事物的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矛盾的某一方面入手，乃是科学工作者研究能力成长提高的出发点。

过去我們有的同志在选题这一步上跨錯了地方，正由于忽略了这一点。他們常抱着一种范围要广、意义要大、层次要高的观点去寻找題目。他們常根据这种观点从經典著作上搬下一个題目，或者从报纸杂志上抓下一个題目，或者自己設想出一个重要問題。当然，所有这些題目未尝不是重要的，該做的，但是，对于尚未具备基本鍛炼的同志而言，这类題目有时就嫌过大，成为一个挑不起的負担。

不論从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說，或是从科学工作者研究能力的成长提高說，选定研究題目的一个原則是：先个别，后一般；先局部，后全体；先断代，后通代；先分析，后綜合；先具体，后抽象；先把局部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1頁。

②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頁。

③ 見《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2—803頁。

④ 《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批判〉》，《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7頁。



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搞清楚，然后进行全面的发展规律的抽象概括。总之一句话，从小处入手。

不过，这里所说的大小、先后，只是相对的意义，不能作机械的、绝对的理解。

说相对，首先是就研究题目本身说的。例如，相对于近百年中国通史而言，近百年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可以说是个别事物、局部过程。但近百年中国经济史本身又包含一系列事物的发展过程，如近百年中国工业史、农业史，近百年中国封建主义土地关系史、资本主义发展史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是近百年中国经济通史综合研究中所包含的个别事物或局部过程，对于它们的研究是一种分析的研究。而相对于这些研究内部所包含的许多问题而言，则这些个别事物、局部过程的分析研究却又变成了总体的综合研究了。例如近百年工业史就包含各工业部门的发展史，以及产品市场、资本积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以此类推，层层下去，局部之中还可以有综合。在这一个意义上是从局部的、分析性的研究开始入手，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从总体的、综合性的研究开始入手。因而，所谓分析性的研究和综合性的研究是相对的。它们的先后秩序也是相对的。

说相对，又是就不同的研究者而言的。同一个研究题目，对于从事这一专业的或有这样修养的同志而言，可能是较小的问题，对于另一专业的或有那样修养的同志而言，却还嫌其太大。例如各工业部门的发展史或资本积累、产品市场这类问题，对于通史工作者而言，可能已嫌其太小，而对于专门研究工业史的同志而言，却又是相当大的问

题。同时，已有深厚修养的同志处理这些问题，可能应付裕如；而经验不足的同志则又感到难以掌握。所以大小是相对的，它们的先后秩序也是相对的。

总起来说，每个科学工作者应该选择多大范围的研究题目，这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去具体考虑。不过，在相对意义的前提下，不论从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说，或是从科学工作者研究能力成长提高的发展过程说，我们前面所说的先后秩序还是适用的。

二、明确普遍联系的全面观点，从大处着眼

那么，人们又是根据什么准则去具体地考虑当前的具体情况，选定研究题目的呢？首先，我们说从小处入手，当然不是随便拣来某一局部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就进行研究。列宁指责那些“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的做法，斥之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列宁说，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在这里，列宁所回答的问题是怎樣搜集事实，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对于选题问题来说，列宁所指出的原则也是完全适用的。这原则就是，“从全部总和”、“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也就是从普遍联系的全面观点去掌握事实，从大处着眼去选定研究对象。

我们所说的全面观点、从大处着眼，有两

^①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个意思：一、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去确定研究題目；二、全面考察当前的需要与可能，据以规划自己的工作任务。

在經濟史的研究領域里，馬克思列宁主义經濟科学和历史科学上的一般規律就是我們确定选题的向导。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規律、經濟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統一的規律、农业为国民經济基础的規律、生产資料优先增长的規律以及农业、工业、金融、貿易等各部門和生产、交換、分配各領域的种种規律，等等。只有以这些一般規律为向导，我們才能找得到、认得出經濟各部門、社会各階級局部过程中的本质的东西；弄清哪些是必須仔細分析的關鍵問題，哪些是可以含象的次要現象；从而明确各項研究課題的理論价值及其发展方向。

要抓關鍵問題，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誰都不願意把精力浪費在无关紧要的問題上去。抓发展方向，有时就被忽略了。科学上，有些問題是会分裂的，經過研究，一个問題会引起一系列的問題，并且会出现新的關鍵性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不会再产生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另一方面，一个科学工作者是要以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因而需要考虑今后若干年内的研究范围和当前研究課題的联系問題。这两方面就是我們所說当前課題的发展方向問題。

对于中国近代經濟史來說，还有其他許多特殊要求。在中国近代史上，人們可以看到封建制和資本主义制同时存在着，而且还可以在某些地区找到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农奴制的变和形态或殘存因素。有关这各种因素的一般經濟規律和历史規律也都或多或少地在发生作用，并且交互影响着。这就給

我們的选题工作和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認識中国近代經濟史的“全部总和”，“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我們需要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的著作。

在这里，我們不可能詳細談論毛澤东思想对中国近代經濟史研究工作的指导作用。毛澤东同志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原理，是我們从事研究中国近代經濟史的向导和指导；特别是关于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两个主要矛盾而前者又是最主要矛盾的原理，更是我們研究中国近代經濟史中第一位的指导原理。掌握事实，确定选题，都应该从这些原理出发。

說到这里，有必要简单提到經濟史这門学科的研究对象問題。

对于中国經濟史这門学科，人們曾討論过对象范围問題。这种討論是有益的。因为明确了这一学科的对象范围，人們自然也就连带地明确了这一对象和其他学科的对象的区别和联系。“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辯证法的宇宙观主張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①。我們明确了經濟史这一学科的对象及其和其他学科的对象的关系，就能使我們明确自己的任务，对于某些問題有必要既从經濟史的**内部**去研究它，——这是第一位的；又从經濟史和那些学科的联系中去研究它，——这是第二位的。

《資本論》的副标题叫做《政治經濟学批判》，这总是一部以生产关系为对象范围的著作。可是馬克思并没有拿政治經濟学的对

^①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9頁。



象範圍去束縛自己的手脚。在《資本論》里既有关于工具、机器这类技术方面的专题子目，去談生产力的問題，又有关于工厂法、圈地法、殖民学說这类上层建筑方面的专题子目。原因很简单，为了闡述他所提出来的問題，馬克思有必要这样做。

但是，有个别同志却不是这样看問題的。他們倾向于抽象地規定一个对象範圍，并把这个範圍当作一个圈定的地区，用以限制自己的行动。例如，在具体分析中国近代經濟史上的問題时，有的同志就认为，如果經濟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史，那么自己的研究工作就不該考虑到生产力或上层建筑的問題，哪怕在这二者对生产关系发生重大作用时也不例外，原因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在經濟史的对象範圍之內。这就割断了这門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只是从它的“内部”孤立地去进行研究。其結果，就仿佛是，經濟史这門科学不是为揭示生产关系的发展規律服务的，倒是生产关系必須在經濟史这門科学的对象範圍以内去发展。这当然是荒謬的。事情應該是科学家去掌握科学，而不該是科学去掌握科学家。

有些专门从事某一部門經濟史研究的人，其选题範圍长期地局限在那一部門的“对象範圍”以内，很少从各部門的相互联系上去考虑問題。长期下来，这些同志很自然地就形成一种画地为牢的观点，孤立片面，鼠目寸光。对于这些同志而言，有必要明确个别事物的分析研究和总体事物的綜合研究的关系問題，这也就是专精和广博的关系問題。

讓我們再来体会毛澤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里那一論断的精神吧。毋須說明，綜合研究并不等于分析研究的总和。我們对

于“應該先作經濟史……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这一論断是不該从字面上去作简单的、机械的理解的。否則，邏輯的結論就会是，在完成經濟史等等部門的分析研究以前，通史工作者就不應該、也不可能撰写近百年中国通史。这当然是不对的。我领会毛澤东同志这一論断的精神无非是強調分析研究是綜合研究的基础。这并不妨碍人們在完成分析研究以前就去进行初步的綜合研究。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虽然这种研究是在比較薄弱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能不受到相当的限制，然而却是有益的，它会反过来帮助分析性的研究，使分析的研究不致走上孤立的狹窄的道路。

在科学发展道路上，綜合和分析的矛盾将是永远存在的。取消了这个矛盾也就取消了科学的进步。

毛澤东同志又說过，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是認識的两个过程。“人类的認識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認識不断地深化。”^①这就指出了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特殊的辯证統一的关系。

根据这一論断的精神，我們可以說：广博、綜合的研究需要在专精、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去建立、充实和提高，专精、分析的研究需要在广博、綜合研究的指导之下才能全面、准确和深刻；脱离专精、分析的研究，則广博、綜合的研究将有空泛不着边际之虞，脱离广博、綜合的研究，則专精、分析的研究便可能走入歧途。广博、綜合必須以

^①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頁。



专精、分析为基础、为轴心、为出发点、为支撑点。由点线扩大为面；专精、分析必须以广博、综合为向导、为指导。掌握一般规律，才能高瞻远瞩，在全面考察中去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

因此，我们认为，研究经济通史的工作者至少需要精通一部门、一行业的专史，或精研某一重大问题，才有可能成其为通材；而专攻某部门、某行业专史或某项专门问题的工作者，也需要时时不忘通史，才有可能专精深入下去。综合与分析、广博与专精的这种关系，也是人们选定研究课题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一则以前人现有成果作自己研究的基础或向导，一则以当前研究课题为将来发展方向作准备。从小处入手，还须从大处着眼。

明确全面观点、从大处着眼的第二个意义，是全面考察当前的需要与可能，据以选定研究课题，提出工作任务。

在一门学科的范围以内，任何时候多半都会同时存在着各种主题范围大小不等、综合概括的层次高低不等的许多级研究成果（包括论著和资料）。这各级成果所已经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构成当代这门学科的科学水平。这是人们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现实的基础。

拿中国近代经济史来说。新中国建立以来，这个领域里的既有成果，是十分丰硕的，它们已超越旧中国若干年的长期积累。但其中各方面工作的发展进程却是很不平衡的。简单说，在地区上，一般地偏重于沿海沿江几省和少数大城市，内地各省广大农村和众多的市镇较少；而各少数民族地区、苏区、边区、革命根据地，和一九三一年以后的东北、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关内日本帝国主义占领

区，都是大块空白；在部门上，一般地偏重于现代工商经济方面，农业、手工业较少，而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恰恰又占旧中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十。在生产关系方面，人们的注意力比较偏重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问题，论及封建土地关系和工商业行会发展史的很少，至于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则寥寥无几。在时代分布方面，对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历史，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而论著较多，而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不免相形见绌。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内，关于农民起义、阶级斗争的研究成果收获较丰，但专论起义的经济根源和经济作用的研究成果则较少。如果再看成果的表现形式，则资料多于论著。资料中片段摘抄旧文献的较多，整块编印档案的较少，精心加工的统计资料奇缺。论著中，短篇论文较多，成本专著较少；主题范围较大，综合概括层次较高的较多，而小范围分析研究较少；争论过的几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尚待提出的问题尚多。总之，空白的不少，薄弱的很多，发展进程不平衡、不成龙、不配套。我们这行研究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但是，教学、科学研究和思想战线上的需要却又是全面的，并且是十分迫切的。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又一个矛盾。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要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要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要努力进行那些“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①。这也是我们科学研究工作者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



事实上，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应当像毛澤东同志在二十多年前告訴我們的那樣“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組織的状态”^①。据此，我們似乎可以这样說，分工以从事部門的、局部的分析研究，合作以从事整体的、全面的綜合研究；从全局观点出发，从大处着眼，經過一段時間的刻苦研究，一定可以在中国近百年經濟史的研究領域里，取得丰碩的科学成果。

三、摸清条件，作好准备，选定研究典型和典型的目的性、代表性、局限性

我們碰到过一些同志，他們滿腔热情地要做經濟史的研究工作。但是他們說，“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恰当的題目。”这是因为他們沒有对确定选题的具体条件，进行过調查研究，只是坐在那里想。对于这些同志來說，选题之道，首先是要行动起来，摸清客观条件。

前面說过，在一門学科以內，主题范围大小不等、抽象概括的层次高低不等的既有成果，构成这門学科的当代科学水平。这就是人們确定选题时應該了解的一項重要的客观条件。

就这方面說，人們也是会碰到矛盾的。大致可以这样說，那些已經經過好多人长期爭論的問題，已发现的史料是比較丰富的，各家分歧意見的焦点也是比較明确的，因此，从某一方面說，問題也就比較容易入手。但是，正因为这是經過前人长期钻研而尚未解決的問題，比較易得的史料多半已被前人所充分利用，所以这类問題多半比較微妙曲折，牽涉的方面很广，是难攻的堡垒。人們如果要对这类問題进行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全面

檢閱前人的一切論著，彻底审查其立場、观点和方法，严密校核其史料来源，并对各家主張进行比較分析。这些工作都是繁重的。要对这种問題的解决添加新的东西，哪怕是很少一点，多半也得花费极大的劳动。

反之，那些尙未經前人钻研过的、或者钻研得还不很多的問題，新鮮資料尙多，人們对問題的認識尙淺，所以也就比較容易有收获。因此我們认为对于某些同志來說，与其“攻坚”，不如从“开荒”着手。即对前面所說的那些空白和薄弱地带进行“开荒”工作。当然，“攻坚”也是需要的，其中有些問題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于剛做科学研究的同志來說，一般而論，不宜从“攻坚”入手。这并非“钻冷門”，而是从怎样便于提高研究工作能力着想，也是从填补空白的科学研究的客观需要着想。

經濟史料的現存状况是确定选题时必须有所了解的另一項客观条件。这就是科学工作者的“家底”。摸“家底”并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拿图书資料來說，这就需要不少的目录学知識才能略知文献的主要内容。为此，人們就必须钻进图书馆里去，广泛地翻閱各种文献，了解史料情况。至于本地区可能存在的碑刻、档案、口傳史实等等，就更需要多方面去采訪了。

摸“家底”，人們很容易从量的方面去考虑問題。当然，丰富的史料文献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献的数量不多，可做的工作也就必然很少。同时，尽管文献的数量很大，当前入手的工作，也还可以简化，該做的工作就必然很多。工作量

^①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2頁。



的多少，一方面決定于文獻本身的數量和價值，另一方面則決定于工作者的主觀條件，而主觀條件，倒常常是關係很大的問題。

所謂主觀條件，有修養問題，也有看法問題。

這裏的修養問題，指的是對史料價值的敏銳力、識別力和對資料進行加工製作的能Ⓐ力。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兩位研究工作者做同一個問題，遇到同一條資料，一位棄如敝屣，一位如獲至寶。這可能是由於二人考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因而對史料的取舍不同。但常常還是由於二人對史料價值的敏銳力、識別力不同，所以對史料價值的估計也懸殊很大。

對於史料價值的高度敏銳力、準確識別力和對資料加工製作的熟練技巧，是在學習中、研究中逐步提高的。但為了選題而初步學到一些本領，總是必要的。這可以從前人的論著中去學習。這個工作最好對前人所引用的資料按圖索驥地查出原書，把前人書中所引用的材料和原書加以對照。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學到一些目錄學知識，一方面也可從前人取舍資料、運用資料的方法上，去學習怎樣估計資料價值和怎樣做研究。對於統計資料，還要注意其加工改製的方法。這都是重複前人研究進程中的某一“工序”的工作。這樣做，好像是浪費勞動，其實對於初試研究工作的同志而言，卻是捷徑。不如此，不易學得本領。要知道，只看“制成品”是不會懂得“工藝過程”的。

這裏所說的看法問題，主要是眼高手低，不屑於做某些工作。

通常人們談論科學研究的選題問題，所謂“研究”，不言而喻地是指最後要寫出論著

來的那種工作而言的。有些同志認為如果只是進行資料的收集、整理、考訂、注釋、校勘、排比、分類、統計和編輯工作，而不寫出論著來，那就叫做“資料”工作，稱不上是“研究”工作。而言外之意，這所謂“資料”工作又比那所謂“研究”工作低一等，最好由別人去做。有的人一聽到要他做資料工作就惱火，仿佛這對他是一種輕視。這種把資料工作和研究工作一刀兩斷，並把它們對立起來的想法是錯誤的。這就是一種眼高手低的思想。

一般說，通常所說的資料工作是比較容易入手的，但卻不是容易做好的。這裏一樣地包含着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夫，而這些，豈不正是研究工作？人們可以看到有不少人把絕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資料”工作上，但絕對找不到不做史料工作的史學家。

對於某些同志來說，選題之道，似乎還要首先作好思想準備，然後從易于入手的資料工作入手。能把資料工作做好，就是貢獻。

眼高手低的另一種表現是迴避瑣碎的、細緻的、大量的艱巨勞動。這是在人們遇到大量資料時可能冒出來的思想情況。有時人們所遇到的資料，分量十分龐大，以致“不知從何下手”，“想來想去”，想不出題目來。在這里，確有一個如何入手、如何加工的技術問題。但主要的，恐怕還是心目中對“規律”想的太多，好高騖遠，眼高手低的思想在作梗。對於這些同志來說，選題之道，也還是首先作好思想準備，然後切實去做。只要做，就可能找到入手的辦法，而“想”却是想不出來的。

還有一個問題也可附帶說清楚，我們有時聽到人說：“我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對那



个问题硬是没有兴趣。”这就有点把个人兴趣凝固化了。其实，兴趣不是天生的，而是培养出来的。人们对于某个问题有了兴趣，这不过说明他对某个问题接触较多，思考较多，有问题、有发现罢了。如果人们拿起一个新的问题，勇于钻研，接触一多，自然就会有问题，有发现，于是兴趣就勃然而起了。这一点，也可算是确定选题的一项思想准备。

摸清了客观条件，作好了主观准备以后，就需要考虑问题的提法。

我们是主张从小处入手的。在一门学科里，每一级主题范围大小不等、抽象概括的层次高低不等的研究，相对于其上一级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的研究而言，都可以说是“小处”，是分析性的专题研究，也就是一定意义上的典型研究。

人们常说，“典型调查”，“解剖麻雀”，“从一滴水去看整个世界”，意思就是说，通过对个别事物的调查研究去发现全体事物的一般规律。这样说，有两个意义。一方面，这意味着在典型和典型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个别与全体的量的关系。这个量的关系说明典型研究的必要性。因为人们对于事物全体是不可能、也不必一件一件地去进行调查研究的，只能通过个别事物去研究全体事物，以个别去代表全体。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典型及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着质的关系，即全体事物的一般规律存在于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或者说，全体事物的一般规律具体地体现在个别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

典型和典型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量的关系，即典型事物能够代表多大数量、多大范围的全体事物，取决于典型及其所代表的事物

之间的质的关系，即典型的个性能够反映多大数量、多大范围的事物的共性。这个质的关系，制约着典型研究的目的性、典型事物的代表性和研究结果普遍意义的局限性。

社会现象和生物现象有极大的差异。因而这两种科学对于典型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也就有了极大的差异。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解剖麻雀”的典型研究方法，并不能像生物学家那样地去理解和运用。

生物学家为了研究麻雀的生活习性而解剖麻雀，不存在个体麻雀是否有代表性的问题。因为麻雀这种生物天然具有一致性（姑且把品种问题含象掉）。因而任何一个麻雀都能作为全体麻雀的典型代表。生物学家随便抓到哪只麻雀都行。在这里，全体麻雀的共性、一般规律是可以和个体麻雀的个性、特殊规律画上等号的。

但是社会现象却不是这样。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不是作为自然产物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产物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关系上的各个具体事例之间并不像这只麻雀和那只麻雀那样天然具有全面一致性。它们可能全面一致，可能部分一致，也可能全不一致。于是典型的代表性就大成问题了。

例如，要是我们的目的是研究旧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性质，随便找来某些事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把某些地区的个别新生的或残余的情况，当作典型来代表全国，便将是**以偏概全**，把个别新生的、或残余的东西，夸大成为基本的、主导的东西，把特殊规律夸大成为一般规律。

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当然必须选取汉族地区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来做典型。但地主和农民之间，又存在着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



貸关系、政治关系、法权关系等各种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之間有联系、有矛盾，有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也有居于第二位的次要矛盾。为了研究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用說，必須抓住佃关系，即抓住主要矛盾。但佃关系仍然不是一个内容那么單純的范畴。它仍然有地区的差别、形式的差别、性质的差别等等复杂情况。这就是說，人們仍然需要更进一步抓住基本的、主导的东西，或者說主要矛盾；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虑典型的个性能在多大範圍內反映其所代表的事物的共性问题。正因为这个緣故，所以我們对旧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就决不是抓住个别的典型所能解决問題的。

不仅如此，上面还是就首先确定典型研究的目的性，然后，从大量事物中挑选适合要求的典型而言的。这无非是要說明，人們在具体运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时，原則上必須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中、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根据事实严格审查典型的代表性和局限性。

事实上，我們搞經濟史研究工作，問題远比上述情况复杂得多。还是拿佃关系來說，历史文献中有关佃关系的記載本来就是不够全面詳尽的。我們所找到的，則又是这不全面中的一小部分。把这一小部分用来当作典型事例，并不能全面反映典型事例在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在这里，我們几乎完全丧失了任意选择合用典型的自由。因此，我們研究的所謂典型，其代表性当然就更加縮小，局限性更加扩大了。

正因为这些緣故，所以，搞經濟史研究的人，常常不是像生物学家那样，首先确定典型研究的确切目的，然后按照目的性的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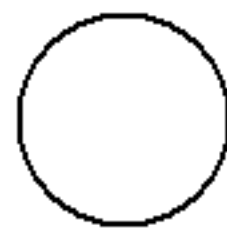
求去选择典型，考察典型的代表性，合則取，不合則去。倒是相反的，起初只能立下一个极其广泛的、一般化的目标，然后再根据所得事例的代表性和局限性去进一步規定典型研究的确切目的，于是，这就变成了：根据所得事例的代表性和局限性去确定典型研究的确切目的性。

根据所得事例的代表性和局限性去規定典型研究的确切目的性，几乎可以說是在經濟史工作者必須遵守的一条原則。实际上，这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問題。

違反上述原則，結果便将以偏概全，把特殊的东西說成是一般的東西。这是我們在研究工作中最容易犯的、最常犯的毛病。

根据上述原則，我以为对于典型研究的問題的提法要力避全称，例如中国如何如何，近百年如何如何，等等；对于結論要力避提的太高，推的太远，例如必然如何，完全如何，絕不如何，肯定如何等等。总之，我們要严格地根据資料的具体情况說話，根据典型及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間的质的关系去規定其量的关系，把自己所找到的規律性严格地局限在典型事物所可能說明的範圍以內，而不去夸大它。

最后，让我提出一个建議，即学习毛澤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語。这部书收集了一百七十六篇农业合作社的調查报告，可以說，就是一百七十六个典型研究。把毛澤东同志所加的按語和报告所提供的情况結合起来去体会，人們就可能学会，为了什么目的应该选择什么典型，什么典型又有什么代表性和局限性，目的性、代表性和局限性又如何規定問題的确切提法。



农村人民公社干部

应该加强经济核算观点

陈 因

经济核算，就是通过记账、算账，了解和分析生产中的劳动消耗和费用开支，要求以相同数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是农村人民公社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重要的推动力量。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首先是生产队的干部，应该树立和加强经济核算的观点，十分注意节约劳动消耗，节省各种开支，学会最经济、最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

农业生产，并不是在集体化以后才需要经济核算。在个体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生产规模很小，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性质；那时，农民在生产经营上虽然不一定都有簿记，但是他们也都计算生产中的消耗，计算盈亏。马克思曾经说，个别商品生产者，有些单是在他的头脑中作簿记，农民就是一个例^①。在集体经济条件下，生产规模比较大，经营范围比较广，产品中商品部分的比重提高了，如果生产不能获得赢利，甚至亏损，就不是只影响一家一户农民的生活，而是影响许多户农民的生活和整个集体经济的发展。所以，经济核算

就更加重要。集体生产的经济核算，不能单在头脑中进行，必须有比较健全的簿记。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愈采取社会的规模，愈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簿记——当作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就愈成为必要”^②。簿记，这是进行经济核算的最重要的工具。

实行经济核算，不仅能够使我们知道经营管理结果的好坏、盈亏，而且能够知道：赚了，是由于哪些环节上工作做得好，人力、物力、财力使用得合理；亏了，是由于哪些环节上工作没有做好，人力、物力、财力使用得不合理。这样，就能够及时地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不断地找出增产节约的潜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经济核算，对于生产中的劳动消耗和经济效果，对于所采取的生产措施，经常地在计划与实际之间，今年与去年之间，本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进行分析、比较、讨论、研究，有利于吸引社员群众参加生产管理，推动劳动竞赛，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

^{①②}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3、145页。



方針。可以說，經濟核算是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社員学会經營管理农业生产的最实际的学校。

在目前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物质基础还比較薄弱，特别是經過几年来連續的自然災害，农业歉收，許多公社的收入和积累有所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經營管理，精打細算，節約开支，把有限的資金、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使它們發揮最大的作用，这对于农业增产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实际經驗告訴我們，即使在生产条件較差的情况下，只要采取正确措施，搞好經營管理，做好經濟核算，处处注意勤儉節約，凡事讲求經濟效果，仍然有可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依靠勤儉，依靠“穷办法”，这是过去許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現在許多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一条基本經驗。而勤儉、“穷办法”，也是最符合經濟核算的要求的。

当然，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实行經濟核算，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农业生产（包括农、林、牧、副、漁）的項目繁多，产品多种多样；所用的生产資料，有购买的，有自給的（如种子、肥料等）；产品有出卖的，有直接分配給社員消費的；社員的劳动报酬，一部分是用货币支付，一部分是实行实物分配；在生产中采用某种技术措施，其效果往往需要較长的時間才能明显地表現出来；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强烈影响，产量和劳动报酬不容易稳定。所有这些，都是人民公社經濟核算比較复杂、困难的一面。但是，正

因为在生产經營上有以上的特点，建立精确的簿記，詳細地記賬、算賬，就更加必要。否則，就难以做好生产管理和收入分配工作。因此，不能因为經濟核算有以上复杂、困难的一面，就不去逐步地实行。

农村人民公社的經濟核算，就是公社各級，特别是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把生产經營上的各項开支和主要的經濟活动，进行計算、比較，以达到厉行節約，全面增加生产、普遍增加收入的目的。在这方面，农业合作化以来已經逐步积累了許多經驗，有了許多有利的条件。早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很多社队就已經初步建立了財務計劃制度、會計制度、現金管理制度和物資保管制度等；积累了包工、包产、包生产資料的費用（通常叫做包成本）的經驗；已經有把实物收支折合成货币同現金收支一起綜合計算的經驗。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經濟核算的要求。人民公社实行三級所有、三級核算、各負盈亏的制度，特别是生产队这个基本核算单位，有生产經營管理权和分配决定权，实行独立核算，自負盈亏，这也是有利于实行經濟核算的。只要很好地总结这些經驗，充分运用这些条件，就有可能逐步地把經濟核算工作做好。

农村人民公社三級都要进行經濟核算，而重点是在生产队。公社和生产大队兩級的經濟核算，首先是对本身的收入、支出，对社办和大队办的企业、事业，进行核算；同时，尽可能对所屬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进行全公社或全大队的綜合核算。而生产队是



公社的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生产队生产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好坏，对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做好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工作就更为重要。同时，只有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工作做好了，生产大队和公社这两级才有可能进行综合核算。

生产队作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单位，有自己的资金和生产资料，有固定在本队的劳动力，有采用一定的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的自主权。生产队的经济核算，首先就是要全面地计算全年生产中资金、生产资料等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全年的产品在补偿这些消耗以后，是盈余还是亏损，盈余多少，亏损多少。在正常年景下，一个生产队的生产是盈是亏，主要决定于经营管理的好坏，决定于资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使用以及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的采用，是否得当，是否合理。根据经济核算的要求，生产队的资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要用于生产最急需的地方，尽可能多地投入当年能够得到收益的当前生产，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的开支和管理费用，适当控制短时间内不能见效的基本建设开支。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的采用，必须从有利于提高总产量和总产值出发，从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出发。有些耕作措施，孤立地从一种作物或一季生产的产量、产值来看，可能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和其他作物联系起来，从全年或一个轮作周期的产量、产值来看，效果就不一定好，甚至是不合算的。有些措施虽然能够增加产量，但是所花的工本过大，结果收支相抵，不能

增加实际收益，甚至造成亏损。因此，在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和技术措施的时候，就需要全面地核算它们的经济效益。

决定生产能不能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增产，而且在于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在同样产量的情况下，成本越低，赢利就越多。因此，成本核算是生产队经济核算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了成本核算，就能够具体地了解产品生产中各项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其增减变化的情况，通过对这种比例关系和变化情况的分析、比较，就可以发现其中不合理的因素，找到降低成本、增加赢利的途径。

严格地说，没有成本核算，也就没有完整的科学的经济核算，也就很难达到以同样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这一经济核算的基本要求。成本核算不仅在工业企业中是能够实行的，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同样是能够实行的。在个体经济时期，农民虽然不进行科学的成本核算，但是注意“保本”，“将本求利”，却是农民十分重视的问题。农民的“本”“利”观念是综合的，他们对产品一般并不分项计算成本和赢利。生产队的成本核算则要求更细致些，更精确些，既要有综合的成本核算，又要尽可能逐步地建立分项的成本核算。当然，建立比较精确的成本核算不是很容易的，有些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解决，在实际工作中也要有一个由粗到细、由不精确到精确的发展过程。但是，只要认真地总结已有的经验，并努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可能逐步做到的。

人民公社实行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促进



增产；而增加生产，又是为了满足需要，即满足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对农副产品的需要。因此，人民公社在核算经济效果，特别是计算赢利的时候，就不能仅仅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而应该在服从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把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这三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要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核算，公社各级干部应该树立明确的经济核算观念。无论是制定生产计划、改进耕作制度、采用技术措施、进行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等等，都要对开支和收益进行精打细算，反复考虑它们的经济效果。这些，都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群众也是有经验的，因此应该很好地同群众商量，向群众学习。

为了实现以同样的生产开支，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这个经济核算的基本要求，需要对于劳动用工、物资消耗、财务开支等事先定出合理的计划和限额，严格控制。特别是对于各种非生产性的开支，对于行政管理费用，应该严格按照计划规定的标准，尽可能地节约使用，绝不能随意超过。如果不注意节约开支，杜绝浪费，即使增加了生产，也不能增加收入，甚至可能减少收入。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从各方面堵塞一切铺张浪费的漏洞，不断降低非生产性开支和管理费用所占的比重，这是评定一个生产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农村人民公社中逐步做好经济核算工作，还有赖于财务会计工作的加强。人民公

社各级的财务会计人员，应该是既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办事公道，能够联系群众，又有一定的业务能力，会记账、算账，精打细算。从当前的情况看来，公社特别是生产队的财务工作人员有许多还是新手，还缺乏管理财务工作的经验，有些社、队的财务会计制度也还不够健全。这就需要大力地加强公社各级特别是生产队的财务会计人员的选拔、培养和训练工作，健全生产队的账目和财务会计制度。在账目和财务方面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切款项和实物的收支，都要有手续和凭证，做到账款相符，账物相符，账证相符，账账相符。更进一步的要求，还应该尽可能做好生产过程中重要经济活动（例如某种作物每亩用了多少种子、肥料、农药，用了多少工等等）的登记、统计工作。这样才能为经济核算提供准确可靠的资料。

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核算，财务会计人员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但是要做好这项工作，仅仅依靠他们还是不够的。公社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认识经济核算的重要性，掌握关于经济核算的知识，亲自动手，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经常帮助、检查财务会计工作，善于从财务会计人员所提供的资料中发现经营管理上的问题，改进经营管理。同时，还需要发动广大社员参加财务会计工作的管理、讨论和监督。把领导干部、财务会计人员和社员群众这三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努力，人民公社的经济工作就能够越做越细，经济核算就能够由粗到细地逐步健全和加强起来。



說 鞭 策

吳 介 民

鞭策，原意是用鞭策馬。在旅途中，当駿馬步履迟緩的时候，鞭策便成为前进中的一种助力。着鞭的地方可能感到有点疼痛，但鞭策的作用却在于推动、激励、召唤駿馬前进。

我們現在說的鞭策是一种借喻。来自同志，来自朋友，来自上級，来自群众的批評，就起着鞭策的作用。它是一种警醒，一种督促，一种开导，一种校正。我們的批評，既要誠懇、坦白，又要尖銳、深刻。它是鋒利的，能够发人猛省，但不伤人；它是善意的，讲究分寸适当，但又切中弊害。对于被批評者來說，鞭策的声音，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火辣辣地烤炙着痛处；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只要采取虛心的态度，它就会帮助你去掉思想上的坐穢，給你带来卸却沉重包袱的輕快，給你带来前进的勇气和决心，給你带来将要在工作和学习上得到新的收获的衷心的欢愉。

“人苦不自知其过”，需要別人的鞭策。然而，別人的批評只有通过自己的觉悟才能起积极的作用；同时，当自己的思想毛病还没有表现为行动，或者还没有明白显示出来的时候，別人往往不容易察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說，自我鞭策是更为要紧的。我們要

把別人对自己的批評和鼓勵，別人的长处和短处，別人的成功和失錯，都当作自己的一面鏡子，吸收經驗教訓，严格要求自己，督促自己。朱熹就說过：“开卷便有与圣贤相似处，岂可不自鞭策。”^①这自然說的是过去的事情。在我們今天的生活和斗争中，以革命导师和先进人物为榜样，时时反躬自問，反躬自責，就可以洞察自己的缺陷，取得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向前进步的动力。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經驗吧。当你工作获得成績，有自滿情緒的时候，当你学习到一点东西，认为已經差不多了的时候，当你受到表揚，有点忘其所以的时候，当你碰到困难，精神懊喪的时候，当你走完一段艰苦路程，松懈下来的时候，当你有了缺点或錯誤，还没有認識到的时候，你从別人的正面或反面的事例中得到了启示，或者有人在你身旁大喝一声：同志，眼睛要朝前看，当心掉队啊！同志，你有病了，赶紧医治吧！于是，你蓦然驅逐了懈怠的情緒，振奋起来，抖擞精神，鼓足干劲，重新走上征途。这时，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对你再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了，过去的成就不过是使你获得另一个成就的起点；你眼望前方，迈开坚定的步伐，

^① 《讀书法》。《朱子語类》卷之二。



前进一步就是一个新的胜利。

鞭策是激发人们前进的力量，是革命者无时或缺的伴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可贵品质和崇高风格，并不在于他不会在工作中产生任何缺点、错误，因为这样的人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而是在于：他从来不企图掩饰和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并从中学习，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使自己所担负的革命工作做得更好。认真地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人所特有的作风。我们与害怕正视和揭发导致本阶级灭亡的脓疮的没落阶级的人们根本不同，我们是先进的阶级的战士，我们坚信着自己的未来，我们深知自己的缺点、错误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的，是必须克服而且能够克服的。鲁迅说得好：“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①

我们要善于在自己的同志间正确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善于接受别人对自己的鞭策和进行自我鞭策。俗话说：“快人一言，快马一鞭。”我们要努力使自己成为“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一言便醒的“快”人。难道作为一个革命者，有谁甘愿落后，不欢迎别人对自己的鞭策，不愿意进行自我鞭策，以便对可能或已经出现的一切妨碍革命事业发展、妨碍自己进步的因素，及时地加以防止和清除吗？

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形，只要我们正确地对待，也可以成为一种鞭策。这就是形形色色的敌人对我们的欺负、嘲笑和咒骂。解放以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的联合势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凭着武装到牙齿的威势，为所欲为，极尽其残暴之能事，妄想把中国人民压倒。在中国人民做了自己国家主人的今天，帝国主义者仍然敌视我们，瞧不起我们，用武力威胁我们，用恶毒的语言嘲笑和咒骂我们，用种种卑鄙的手段企图孤立我们。这一切，都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反面教材。

中国人民是有革命志气的。任何困难和障碍都吓不倒中国人民，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敌人越是欺负、嘲笑和咒骂我们，我们越是要争一口气，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过去，我们没有向敌人屈服，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掀掉；今天，我们也要让帝国主义者瞧瞧：我们用不着向他们求乞，凭着中国人民的双手，也同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一定要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和落后这两座大山挖掉，在中国的大地上，建设起宏伟的美丽的社会主义大厦来。

当然，敌人挥动的大棒和同志之间的鞭策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恶意的攻击，目的是想把我们打死；后者是善意的帮助，目的是为了我们机体的健康。两者绝对不能混淆。但是，当我们在自己的队伍内部互相策励的时候，也不妨听听来自敌对方面的嘲笑和咒骂的声音，并且懂得怎样把激愤变成力量，奋发前进。

^①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



美法交恶：

西方外交万花筒上的一个新镜头

張 振 亞

五月十七日，肯尼迪在华盛顿的贸易政策会议上，用不客气的声调反驳了戴高乐在十五日所说的西欧对美国应保持独立的讲话。他说：“我深信，大西洋的团结代表了历史的真正的进程——欧洲和美国联合力量已有十多年，现在不是有限的见识和猜疑能够分化得了的。我们的命运的方向是走向合作和信任，美国决心要实现这个命运。”

肯尼迪以财大气粗的姿态说，美国在西欧所“作出的努力比任何其他国家为大，只要美国一直在这样做，我们将继续参预有关那个地区的战争和和平的重大决定。一项统一的政策不可能既要求我们驻军而又要求我们不参与决定”。

在十七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还对法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声明表示了不满，说那样做“是在进入一种越来越危险的局势”，是在“削弱”“有效的防御联盟”。

美国总统针对他的盟国的国家元首发表这样露骨的指责，在战后西方的外交活动中是罕见的。一年之前，肯尼迪在巴黎同戴高乐会晤时，还把这位法国总统称为“垂诸史册”的“当代最明智、最英勇的人”，而

现在，这个“最明智、最英勇的人”却突然变得只具有“有限的见识”，并且由于“猜疑”而在竭力“分化”“大西洋团结”，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美国报刊透露，考虑到国际影响的重大，肯尼迪对他自己的发言，逐字逐句都进行了斟酌和推敲。可见，美国总统的激烈语言，是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一项严重警告。

戴高乐受到肯尼迪的申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美国领导的西方“自由的国际大家庭”里，法国只被看作是一个三等国。两次世界大战，法国都是战胜国，按照法国的想法，它应当同美、英平起平坐，但是由于实力不济，它在华盛顿当局眼中，一直是和居于战败国地位的西德同列一等。而现在，这个三等伙伴竟挺身而出，要以欧洲代言人的身份同美国唱对台戏。在肯尼迪看来，这对于美国的西方霸主地位的稳固显然是不利的。

肯尼迪对戴高乐的言论所以不能容忍，还由于这些言论的发表，正好是发生在美国积极推行它的“全球战略”的紧张时刻。为了实现美国统治集团进一步夺取和控制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扼杀民族解放运动的迷梦，为了摆脱国内恼人的经济停滞和严重的美元危机，为了集结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同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抗，并妄图瓦解和消灭社会主义阵营，肯尼迪一直把加强对西欧国家的控制作为基本的环节。这也就是他的建立大西洋两岸“新伙伴关系”的真正目的。为此，他一直在西欧展开紧张的外交活动，要求西欧各国“在援助、贸易、财政、外交和防务”方面接受美国的领导；他千方百计地要使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以便进一步建立它所希望的“大西洋共同体”；他提出了“一九六二年扩大贸易法”，以便应付西欧的“挑战”。就在肯尼迪艰难地进行这些努力，而成败尚未可知的时候，戴高乐偏偏提出了要在西欧否定美国领导地位的意见，这又怎能不使他为之暴跳如雷呢？

可是，不论肯尼迪怎样声色俱厉，剑拔弩张，他的对手似乎并没有表现丝毫畏缩。在肯尼迪十七日的演说发表后的第三天，戴高乐就在法国中部的里摩日城斩钉截铁地表示：“法国并不是由任何其他国家拖着走的”，“它希望有它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行动和政策”。

积在戴高乐胸中的怨气如此之大，这不是偶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印度支那、中东和北非的殖民地，正在被美国插手进去，有的已经落入了它的美国伙伴的荷包。法国为北大西洋集团提供了自己的人力和物力，但是它既无权得知美国在西欧的原子战略计划，也分享不到原子武器的秘

密……如果它是战败国，犹可容忍，而法国又偏偏是战胜国。

当然，在过去不容忍是不行的。在“马歇尔计划”时期，法国是西欧依靠美“援”最多的国家之一。受人之惠就得听人支配，更何况它无论是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或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战争，都得依赖美国的军“援”来维持。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每年都要使法国已经涸竭的国库白白耗费掉十几亿美元，几十万法国军队被冻结在那里，国家的财政、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因此而一落千丈……显然，这一切都捆住了法国统治者的手脚，因而只能忍受华盛顿当局的欺凌。

现在，对美国绝对有利的局面已经在改变。一九五八年冬季法国宣布货币改革，一九五九年初共同市场国家开始实行内部减税，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国在经济和贸易上的好转，都使它对华盛顿的依赖逐渐减少。在共同市场树立关税壁垒以后，法国极力抵制美国农产品的倾销，这对于美国自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停止，更使戴高乐有可能拔出脚来插入到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中去。在这个时期，美国为了保护脆弱美元信用，已经开始在国际金融会议上向巴黎求助。情况正像去年八月三日《法兰西观察家》周刊叫嚷的那样：“我们（法国）不再是马歇尔计划时代了，那时美国拥有对法国施加的极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而目前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倒过来了。法郎比起美元的脆弱来，成了强有力的货币，因此



看不出美国目前拥有什么真正的方法对戴高乐施加压力。”

法国已经有些本钱，华盛顿当局对戴高乐的“紧箍咒”自然也就不那么灵验。相反地，美国无论在加强北大西洋集团、促使英国参加共同市场、建立西欧和北美的“新伙伴关系”，以及推行新贸易法等方面，都处处需要法国的支持，这就使戴高乐能够要求同华盛顿当局平起平坐，共享原子秘密。可是肯尼迪政府对于新的、变化了的情况，偏偏不肯刮目相看，特别是在原子秘密方面，对法国的防范反而更为严密，这就不能不导致美法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美国和法国的矛盾发展为这样一场新的斗争的危险性，美国统治集团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肯尼迪去年五月底赶往巴黎，会晤戴高乐，就是为了弥合美法之间的裂痕。据《纽约时报》评论员苏兹贝格今年五月七日的文章透露，肯尼迪和戴高乐当时甚至还“取得了一项巴黎将同伦敦一样受到华盛顿的平等对待的不成文协议”。只不过是后来——仍然用苏兹贝格的话——“事实恰正相反”罢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肯尼迪还亲自写信给戴高乐，向他说明美国不能给法国“原子援助”的“苦衷”，据肯尼迪说，他担心这会给西德开辟先例。至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原子合作”，肯尼迪说那是受了战时条约的约束，只能如此。

可是，这种解释并没有能使戴高乐信服。理由是：从一九四六年美国国会通过“麦

克马洪法”，不许向第三国透露原子秘密起，直到一九五八年止，英国从来没有取得过华盛顿的任何原子援助。这证明所谓“战时条约规定”不过是一句搪塞语。而一九五八年以后，英国之所以能取得美国的一些“原子援助”，主要是因为英国当时已掌握了原子秘密，美国为了同英国共同垄断核秘密并乘机加以控制，这才答应实行“合作”。不但这样，根据英、法一九四二年的一项原子秘密协议，英国在获得核秘密后，本应为法国提供援助，而英国后来的变卦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压力。至于说到担心会给西德开辟先例，戴高乐则是这样回答的：法国比美国更清楚地了解用核军备武装西德的危险，不过，这同法国作为战胜国而拥有核武器完全是两回事。

当然，不论戴高乐如何振振有辞，肯尼迪也是不会为之动摇的。借用路透社记者赫弗南最近的话来说，这是因为“肯尼迪政府关心的主要事情是把欧洲的注意力从核威慑力量的概念上转移开去，而转向建立常规部队，以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三十个师的目标”。而戴高乐拼命闹着要拥有核武器，这不但有利于美国对法国的控制，而且也并不符合肯尼迪政府按照它的“总战略”对“盟国”军事力量所做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美国统治集团在核秘密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让步，那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纽约时报》评论员苏兹贝格所说的：“他（肯尼迪）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很随和，在一些非重要点上有时还愿意让步，但在真正重要问题上



坚硬无比。”

戴高乐为了争取法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已经拿出了他认为最厉害的一着：号召建立一个同“盎格鲁撒克逊”脱离的大陆欧洲。法国打的算盘是：以共同市场为基础，另搞一个以法国为首的、排除英国的欧洲政治联盟，同美国相抗衡，打破美国通过北大西洋集团对西欧的控制。正像法国报刊所说的，戴高乐这个欧洲政治联盟主张的实质，就是要把美国排除于欧洲之外。《纽约先驱论坛报》更指出，戴高乐主张建立的欧洲，不仅是要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能够同美国对抗，在他看来，这第三个目的几乎同第一个一样重要”。

不但如此，法国还一直多方阻挠英国参加共同市场。戴高乐认为，肯尼迪政府支持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是想“制止欧洲大陆的独立倾向”。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麦克米伦在今年四月访美时，已告诉过肯尼迪，如果英国终于因代价太高而不能进入共同市场，那么英国将被迫从西德撤回驻军，从而使北大西洋集团解体。这些话固然有威胁华盛顿的意思，可是，美国对这一情况却不能不加以注意，因为戴高乐阻止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初步计划倘若成功，不但肯尼迪政府为重新建立美国在世界的“优势”而设计的大西洋“合作”计划，会发生严重危机，甚至连北大西洋集团的现状都将难以维持。

严重的困难终于摆在肯尼迪政府的桌面上。当然，华盛顿当局是无论如何也不愿让戴高乐的“欧洲独立观念”得逞的。麦克

米伦六月初的访问巴黎，美国副国务卿鲍尔最近在西欧各国首都的旅行，腊斯克的即将访问波恩和他最近在华盛顿同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的频繁接触，都表明肯尼迪政府在准备孤立法国的同时，也在力求软化他的对手。双方的紧张的外交斗争正在急剧展开。

可是，华盛顿的统治者不论怎样绞尽脑汁，也很不容易改变这一现实：尽管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依赖美国，但是，它已不肯再无条件地受美国的控制，不安心于做美国的“保护国”，听任美国摆布。而且这还不仅是法国的戴高乐。关于这一点，西德《世界报》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今年五月四日就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这种不平等起初曾是必要的……今天是另一回事了。一般欧洲人越理解这点（指西欧日益强大），要求这个新兴欧洲的领袖创造欧洲自己的（核）威慑力量的压力则越大。”

苏兹贝格最近在论及华盛顿同巴黎的严重摩擦时会说，肯尼迪在对西欧的外交政策上犯了两个不应有的错误：自己欺骗自己和没有看出自己行动的全部严重后果。苏兹贝格主张，美国“必须承认（西欧的）现实，并设法加以适应”，“妥协尚可保住一些东西，执拗只能引向牛角尖”。这倒的确不失为一个“以退为进”的上计。不过，这位策士显然是忘记了，假设肯尼迪真是对戴高乐做出什么重大让步的话，那将会带来多么大的麻烦；而这显然又是美国统治集团所不敢想像的。



丑恶的“形象”

胡 思 升

美国的“形象”如何，这是美国朝野近来经常放在口头上的话题。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报道，“肯尼迪和他周围的一切人物都紧张地工作，树立白宫希望树立的形象”。不久前，在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西雅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的“形象”问题又一次成为问答中的一个题目。腊斯克在答问时摆出笑脸说：“我认为美国的最好的东西表明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将大大加强我们在国外的形象。”

美国统治集团是用怎样的行动“加强”自己的“形象”的呢？

当腊斯克把“非常伟大的国家”和“最好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美国军队已源源进入泰国。因此，有个美国记者不无担心地问：鉴于我们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行动，我们的形象如何？腊斯克故弄玄虚地回答说，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有助于对你的问题发表意见”。

那么，有些什么反应呢？

虽然肯尼迪一口咬定美军进入泰国是应泰国政府的“邀请”，但是，被派做“主人”的人，却不敢公然承认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路透社发自曼谷的消息引述泰国外交部人士的话说：“泰国实际上并没有正式邀请美国派

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这个国家，而是在美国提出来的时候表示同意。”泰国《荣誉报》在一篇社论中也说，“美国这次派军驻泰，并不是出自泰国的请求”。这就奇怪了。“主人”并没有邀请“客人”上门，“客人”却全副武装，成群结队而来，这不是赤裸裸的“占领者”的形象吗？

其实，泰国当局对美帝国主义驻军的决定，完全是俯首听命的。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形象”过于丑恶，因此，他们对进驻的美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英国《每日电讯报》透露，泰国政府要求美国把它的占领军部署在距离首都曼谷稍远一点的地点，理由是避免给人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这个国家已经被外国占领了。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泰国统治者心虚和遮丑的事实充分表明，美军的“占领者”形象，实在是太显眼太露骨了。泰国内政部长乍鲁沙天不安地表示：“我希望他们（美国占领军）不会带太多钱到这里来，致使香烟、大米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其实，泰国人民憎恶美国军队，还不仅仅因为美国军队会在泰国搞扰乱市场的勾当，更为重要的是，它蹂躏了泰国的主权和独立。无怪乎替美军捧场的泰国《荣誉报》也担心“泰国人民可能会因为美



軍駐泰而感到焦虑不安”。情况果然如此。泰国内政部长接着证实，在美軍进驻的一些地区內，已經出現反对美軍进驻的傳单。日本共同社发自曼谷的消息則指出：“可以預料，如果美軍单独驻扎的时间拖长，必然会同泰国人民发生摩擦。”許多事实证明，哪个国家中驻扎了美国軍隊，那里的人民总是要吃苦头，当然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強烈的反对。

在泰国邻居的眼中，进入泰国的美軍又是一种什么“形象”呢？美联社在一則調查东南亚反应的消息中承认，“美国由于派軍隊去泰国而遭到东南亚一些报纸社論的強烈譴責”。它又說：“某些最強烈的批評来自中立主义的緬甸，……所有报纸都譴責美国把海軍陆战队派往泰国的行动。緬甸的报纸說，肯尼迪把战争威胁带到了緬甸的大門口。”《柬埔寨电訊报》五月二十一日发表評論，指出美軍占领泰国是違反常理和根本没有道理的。

在东南亚国家中，所以有这样的輿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十分明显，美国出兵泰国，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这是美帝国主义对整个东南亚地区侵略部署的一个組成部分。肯尼迪政府为了推行它的所謂“总战略”，现在正日益加紧它对东南亚地区

的侵略活动。它在这个地区竭力筹划一个把矛头主要指向中国的軍事包围圈，而出兵泰国，正是其中的重要步骤之一。同时，美国的这一行动，也是企图把东南亚地区变成它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局部战争的“新战略”的試驗場。这一点，美国资产阶级报刊也并不諱言。

狡猾的肯尼迪政府，为了逃脫泰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譴責，想尽方法掩飾它那副“占领者”的凶相。就在肯尼迪下令美軍进驻泰国的时候，他还花言巧語地說，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帮助保证这个和平国家的領土完整”。肯尼迪說这句话的目的，是企图反噬老撾爱国軍隊，想誣蔑老撾爱国軍隊“威胁”了泰国。說起来这也不是什么新花样了。肯尼迪之流嘴巴里的“威胁”，一向是这样解釋的：組織雇佣軍武装侵略古巴，說是为了消除古巴对拉丁美洲的“威胁”；武装干涉南越，說是在南越人民的爱国自卫斗争“威胁”了美国。如此等等。自己去搶別人的东西，还要反咬別人搶了他，这真是道地的強盜的邏輯！就連英国《观察家报》也不得不承认，說泰国遭到直接威胁的借口，“已經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不論肯尼迪政府怎样披上画皮，都遮盖不了它为了向外扩张和侵略而“紧张地工作”所树立起来的穷凶极恶的形象。



红旗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一期到第十二期总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页数)

- 社論: 鼓足干劲, 争取社会主义建設
的新的胜利…………… (1 · 1)
- 社論: 加强党的战斗力……………(3-4 · 1)
- 社論: 知識分子前进的道路…………… (10 · 1)
- 紀念《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
发表二十周年
- 社論: 积极开展技术政策的科学研究
和討論…………… (11 · 1)
- 社論: 反对美国反动派迫害美国共产党
的暴行…………… (2 · 1)

政 治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李維漢(3-4 · 5)
- 共产党员应该是人民群众的
忠实代表……………杜 敬 (6 · 1)
- 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几个問題…赵 漢 (12 · 1)
- 学习毛澤东同志有关著作的体会
- 論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肖 述 馬群兵(3-4 · 55)
- 我們的时代和卡德尔的
“辯证法”……………吳 江 (5 · 17)
- 論考茨基主义…理 夫 李思溫 王福如(8-9 · 28)
- 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傳統……………卞忠因 (10 · 7)
- 讀列宁的《怎么办?》

經 济

- 社会主义經濟工作中的权威
問題……………海 波 (1 · 27)
-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
問題……………苏 星 (7 · 1)
- 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

- 按比例的发展……………許瀚新 (11 · 32)
- 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护……………甘子玉 (12 · 14)
- 增产更多更好的日用輕工业品…孔祥禎(3-4 · 46)
- 从信貨的偿还原則談到銀行的
监督作用……………李佐文 (6 · 11)
- 进一步加强成本管理……………赵少平 (7 · 20)
- 关于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
大会制度……………李潤之 (2 · 33)
- 充分地發揮技术人員的力量……………石克儉(8-9 · 42)
- 做好人民公社的财务工作……………朱光福 (1 · 32)
- 不違农时是领导农业生产的一项
重要政策……………章 竟 (7 · 10)
- 农村人民公社干部應該加强
經濟核算观点……………陈 因 (12 · 28)

国 际

- 欢呼民族解放运动的偉大胜利…郭济洲 (1 · 6)
- 剛果的形势說明了什么…郭济洲 吳休 (5 · 1)
- 危机四伏的美国經濟……………孟用潛(8-9 · 1)
- 当“敗狗”翘起尾巴的时候……………袁先祿 (1 · 15)
- 肯尼迪的裁軍童話和大炮預算…張振亚(3-4 · 38)
- 美国式的“自由”……………陈 原(3-4 · 41)
- “神圣”的祈禱和肯尼迪的謊言…岑 桑(3-4 · 44)
- 奴役, 还是进步? ………………陈 原 (5 · 8)
- 肯尼迪与牛奶……………岑 桑 (5 · 11)
- 所謂“自由的臂膀”的真相……………陈 原 (6 · 27)



在“全民福利”的幌子下……張振亚 (6·31)
 鲍威先生的灾难和美国国务院
 的苦恼……張振亚(8-9·20)
 肯尼迪与产业后备军……陈 原(8-9·23)
 麦克米伦的碰壁和“自由国家”
 之间的“合作纽带”……張振亚 (10·31)
 如此“就业机会均等”……胡思升 (10·35)
 “新边疆”和“全球战略”的真諦……陈 原 (11·20)
 “和平革命”的招牌和殖民主义
 的实质……鍾国豪 (11·24)
 肯尼迪正在南越重蹈历史的
 复轍……陈有为 (11·29)
 美法交恶：西方外交万花筒上
 的一个新镜头……張振亚 (12·31)
 丑恶的“形象”……胡思升 (12·33)

哲学·科学

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陈元暉 (1·18)
 真理是具体的……張世英 (2·5)
 新与旧……公 盾(3-4·51)
 西方哲学史中的主观能动性
 問題……汝 信 (11·6)
 关于选择研究題目……严中平 (12·18)
 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和
 觉悟性問題……宁 可 (7·23)
 論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
 的若干問題……何祚麻 (2·13)
 关于認識中的肯定否定問題……龔育之 (5·13)
 ——談太阳系学說的一段历史
 自然科学和实际应用……何祚麻 (7·24)
 数理邏輯和形式邏輯……王宪鈞(8-9·46)
 数学方法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
 作用……何祚麻 (10·22)

关于臭椿—蓖麻—蓖麻蚕—
 寄生蜂的速中发展和綜合
 利用問題的芻議……朱 洗 (6·34)

教 育

教学小品……敢 峰 (11·38)

思想修养·工作方法

謙虛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吳介民 (2·25)
 从全局出发……陈展超 (6·3)
 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林一舟 (7·16)
 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相結合……唐平鐸 (10·17)
 試驗和推广……李守璋 李学昆 (11·17)
 說鞭策……吳介民 (12·32)

文学·艺术

关于戏曲老艺人的艺术經驗……曲六乙 (1·36)
 历史劇三題……戴不凡 (6·15)
 古典文学理論中的風格問題……刘綬松 (6·21)
 草原上的拓荒者……烏兰巴干(8-9·53)
 漫画：春色滿园……毕克官 (1·12)
 不怕鬼的眞事……方 成 (1·17)
 肯尼迪的命运……米 谷 (2·4)
 平 衡……方 成(3-4·40)
 为鑿者釣……米 谷(3-4·43)
 临刑前……毕克官(3-4·45)
 新老漁翁四釣竿……华君武 (5·5)
 美国之“鸚”……江 帆 (6·30)
 飞向更新的边疆……华君武 (6·33)
 遺產稅……江 帆(8-9·27)
 “拓荒的勇士們，开步走！”
 ……江有生 (11·23)
 木刻：韶山四月……刘續明 (6·7)
 电灌站……莫 測 (6·14)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13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三期 ★

目 录

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薄一波 (1)

“人民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黄范章 (11)

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张友渔 (20)

新的“挑战”和新的“选择”.....向 阳 (28)

利害篇关 锋 (32)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冯其庸 (34)

——文艺随笔

☆ 七月一日出版 ☆



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

薄 一 波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各部门，尤其是工业各部门，决不可能脱离农业这个基础，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能够提供多少劳动力，能够提供多少购买力，无论对于轻工业的发展或者重工业的发展，都起着首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以农业为基础，这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根本问题。一切隶属于全局的局部问题，只有在正确处理全局问题的条件下，才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指导工业建设必须具有这种全局观点。

正确地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且正确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内部的各个行业、各个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关系以及如何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问题，作些探讨。

重工业包括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两个部门。在这两个部门发展的相互关系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又是以采掘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采掘工业直接为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提供原料，并且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燃料。采掘工业所提供的原料、燃料愈多，冶炼、化学等工业就能够愈快地得到发展，从而机械工业和其他加工工业也就可以愈快地得到发展。反之，如果采掘工业发展得慢，加工工业的发展也就决不可能快。这是重工业发展过程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于采掘工业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铁和煤是近代工业的大杠杆，我们无论怎样重视这种改良（按：这里是指采用先进技术）的意义，都不算过分。”^①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3页。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铁矿石、矿物燃料、森林、水力、化学工业原料的资源以后，接着说到：“用最新技术来开采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基础。”^① 列宁并且根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的总结，指出：“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② 这个结论，不仅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已经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所证明。

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采掘工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都把大力发展采掘工业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位置上。在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经强调指出，必须增多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工业等采掘工业的生产，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十二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采掘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同加工工业之间，也出现了新的不平衡。采掘工业特别是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等工业的生产，在当前重工业生产中，成为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在采掘工业各个行业内的某些生产环节之间，也出现了不尽适应的情况。这种不平衡，有些是在大发展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有些是在具体工作中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而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们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③

我们应当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的基础上，在工业发展的新的水平上，求得重工业内部新的平衡。要做到这样，关键在于根据新的比例关系的要求，集中必要的力量，加强采掘工业，使采掘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使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关系进一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88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步地協調起來，使采掘工業內部的各生產環節之間的比例關係更好地適應起來。

二

采掘工業必須得到優先發展，這是重工業發展的客觀要求，是由采掘工業的特點所決定的。要加強采掘工業，使采掘工業得到優先發展，必須正確地認識和掌握采掘工業的特點。

采掘工業同加工工業比較起來有些什麼不同的特點呢？

第一，加工工業的勞動對象，即生產所用的原料、材料，都是其他工業部門生產的成品，都是可以移動的；而采掘工業的勞動對象，如馬克思所說：“不是過去勞動的生產物，……都是自然不要報酬賜予的”^①，都是固定的，不能移動的。由於這樣，采掘工業只能就那種固定的勞動對象，經常地移動機器設備和其他設施來進行生產，而不能像加工工業那樣，可以有計劃地調動勞動對象來進行生產。加工工業的工作場所，可以經常保持穩定；就一個加工工業企業來說，它的勞動手段經過不斷更新，勞動力經過調整、補充，原料、材料經過有計劃的供應，生產能力一般地是不會降低，而是不斷增長的。而采掘工業則不同，它受礦產資源的分布、生成狀態和儲量的限制，在一個礦井、礦區內，礦產資源開采一點，就減少一點，開采完一個地區，就必須轉移到另一個新的地區去開采，不然，即使有足夠的設備和工人，也發揮不了作用，生產將發生中斷。因此，要保持采掘工業生產的穩定性，就需要事先不斷地準備好新的礦產資源和開辟出新的工作場所。

第二，加工工業一般地是在地上進行生產，而采掘工業一般地是在地下進行生產。采掘工業工人在地下作業，經常要同水、火、瓦斯、地層壓力、煤塵、岩塵等不利的自然條件作鬥爭，而且勞動比較繁重，體力消耗較大。一般地說，采掘工人的勞動條件不如加工工業工人的好。同時，采掘工業企業所占的勞動力又往往要比加工工業多得多。因此，在采掘工業企業里，尤其需要注意保證安全生產，鞏固井下工人隊伍，並且不斷地提高技術裝備水平和機械化程度，減輕笨重體力勞動，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三，采掘工業的礦產資源一般是深藏在地下，要找到它，弄清它的儲量、品位和生成狀態，要弄清它的地質條件，要確定開采的方法和建設的規模，都要經過詳細的勘探工作。而且由於許多礦產資源往往蘊藏在山區，要在這些地區建設采掘工業企業，常常還要興修鐵路、公路和電站。這種情況同建設加工工業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建設采掘工業企業比建設加工工業企業往往需要更多的投資，需要多用一兩倍或者更長的時間，需要克服更多的困

^① 《資本論》第1卷，第757頁。



难。而且采掘工业企业投入生产以后，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時間，比起加工工业企业要慢得多。

第四，加工工业企业，一般地只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时候，需要进行基本建设，而采掘工业企业不但在扩大再生产的时候，需要进行基本建设，就是在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中，也需要经常进行基本建设，如完成掘进（剥离）工程，而且这种工程量是很大的。

第五，加工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对于它的劳动对象来说，主要是物的形变和质变；而在采掘工业企业，主要是物体的采掘和转移，而且是笨重物体的大量转移，动辄有千百万吨。因此，运输在采掘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是一个基本的环节，它的地位比在加工工业企业中重要得多。脱离开搬运，采掘工业的生产过程就不可能完成。采出的矿石、煤炭如果不能搬运出来，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它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可能实现，加工工业企业也就得不到必要的原料、燃料。同时，采掘工业的生产，由于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性是比较大的；社会生产对矿产原料、燃料的需要又是经常的、大量的，它们的运输量是很大的，在全国货运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发展采掘工业必须充分地考虑矿区内部的和矿区外部的运输条件，注意运输的经济合理性。

采掘工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要比加工工业的发展受着更多的限制，需要更多的条件、资金和时间。我们在安排采掘工业生产和建设的时候，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它的这些特点，既要考虑到需要，又必须考虑到自然资源、建设力量等方面的可能；既要考虑到当前的需要，又要考虑到长远的发展；既要考虑到采掘工业本身的条件，又必须考虑到整个工业合理布局的要求。

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在发展中必须保持互相适应的比例关系。由于采掘工业是加工工业的基础，而且加工工业本身的发展相对地比采掘工业容易一些，因此，在经过综合平衡、保持正常比例的范围内，应当加快采掘工业的发展，使采掘工业的生产能力更富裕一些，就是说，使它留有适当的余地，以便为加工工业的发展创造更为雄厚、可靠的物质基础。这样做，对于加工工业的发展，以至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都是有好处的，它可以提供充分的基本原料、燃料后备和储备，而这是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和防备意外事故所完全必需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废止以后，社会再生产“一方面必须有一定量的固定资本，比直接需要的更多；另一方面，并且特别是原料等物品的储存，也要比直接的常年的需要更大。（这一点，对于生活资料方面说，是尤其适合的。）这种过剩生产，等于是社会对它自己的再生产所需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器。”^①

① 《资本论》第2卷，第586页。



床有大有小，矿层有深有浅，矿质有富有贫，在交通条件方面也各不相同。而且采掘工业的建设所需的资金、设备、材料较多，国家在一定时期用于矿山建设的物质技术条件又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在采掘工业企业的建设规模上，应当根据矿产资源的状况和当前人力、物力、财力的具体条件，作全面的经济比较，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加以确定，该大就大，不该大的就搞中型或者小型的，不宜强求一律，或者主观地规定大、中、小型的比例。也不应当分散建设，把战线拉得很长，而应当根据投资和材料、设备供应的可能性，选择开发条件最好的矿区、矿井，分期分批地进行建设，以便充分地发挥投资效果。

在矿山建设过程中，应当严格注意保证工程质量，切实做到按期、按质地交付生产。那种“简易投产”，降低工程质量，或者不适当地削减必要的单项工程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对于一部分没有按规定的质量标准移交生产的矿山建设工程，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首先使各项工程搭配成套。拿煤矿来说，应当有计划地使提升、运输、排水、通风等生产系统，和井巷开拓等项工程，尽快地达到矿井的设计水平；同时，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矿区范围的各项工程的填平补齐工作，使装卸、洗选、机修能力同原煤的生产能力相适应，以便充分地发挥矿井的生产能力。在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矿山，同样应当注意解决类似的问题。在某些采掘工业企业，适应新增生产能力的需要，还应当相应地解决矿区外部铁路运输和电力供应等问题。在进行这些建设的时候，也都应当注意防止资金、物资的分散使用。

在新建、扩建、改建矿山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一个矿区资源的蕴藏量，究竟用多少年代把它采完最为合理，也就是说，一个矿区每年的生产能力定成多大、服务年限定为多长，才最为合理。一个矿区的矿产蕴藏量同开采能力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的，这种比例关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开发强度”。

对于采掘工业企业来说，怎样的开发强度才是最合理的呢？最重要的是要符合以下的要求：（1）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矿产资源；（2）基本建设投资最低；（3）劳动生产率最高；（4）生产成本最低；（5）更好地为矿区附近的冶金、化工等企业服务，更好地适应国民经济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几年来有些采掘工业企业，采用先进的、合理的开采方法，适当地提高了开发强度，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但是，也有的采掘工业企业，超过了合理的开发强度，用多打井，多增设备，多添人的办法，来提高开采能力，并且采取错误的开采方法，只采厚层矿，不采薄层矿，只采品位高的矿，不采品位低的矿，这样做，虽然一时产量有所增加，但是，却降低了回采率，严重浪费了资源，过多地增加了投资，浪费了人力、物力，甚至造成生产下降，结果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社会主义的积累；而且有可能同附近的冶金、化工等加工工业企业的发展脱节，甚至使它所服务的加工工业企业，提前失去原料基地。显然，用这样的方法，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因此，每个矿区都应当



“人民資本主义”的反动本质

· 黄 范 章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在壟断資本家的带动下，掀起了一种硬把“人民”和“資本主义”这两个不相容的概念捏在一起的“人民資本主义”的叫嚣。一九五六年初，美国政府和美国广告协会还大張旗鼓地举办了专门的展覽会，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亲临捧場。

“人民資本主义”的中心思想是：現代資本主义“变了”。它的鼓吹者，往往在假惺惺地責难十九世紀資本主义是“貪婪”、“剝削”、“非人道”的制度之后，便竭力宣揚美国資本主义已經或正在通过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变为一个“民主的”或“人民的”資本主义，說什么这个資本主义不仅与过去“毫无任何相似之处”，而且“远远胜过馬克思所梦寐以求的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他們把現代資本主义說成在本质上不同于过去的資本主义，宣布美国已經“不用流血和革命而改革了資本主义”，企图以此来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人民資本主义”是为日趋沒落的壟断資产階級服务的一种謬論，其内容混雜，众說不一。在它的鼓吹者中間，有的說美国現在

已是“人民資本主义”了，有的則說正处在“过渡”阶段。他們捏造了种种所謂資本主义“革命”，但各人所側重宣揚的“革命”内容又不尽相同。他們都強調股份公司的“革命”作用，但有的人同时把所謂“国家調节”（尤其是收入分配方面的“調节”）、工会組織的作用也看作是“人民資本主义”的組成部分，有的人則說这些只是“过渡”阶段所需要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看出，在美国的所謂“人民資本主义”的喧囂中，比較突出的論調有“資本民主化論”、“經理制度論”、“收入革命論”这些說法。

所謂“資本民主化論”的鼓吹者宣揚，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推行以及股票在居民中間的广泛推銷，似乎在生产集中的过程中，竟相反地发生了資本分散的过程，企业的所有权竟从少数大資本家手中轉到了广大人民手中。例如，美国司密斯学院教授薩尔瓦多里在其著作《自由經济学》中說：“企业愈大，所有权就分散得愈广”。美国鋼铁公司董事长布劳也煞有介事地說：“我們企业的所有权已发生了变革，……它們已为千万各式各样的人所占有”。美国布朗迪斯大学教授



馬·勒尔納更把这个情况吹嘘为“所有制革命”。他們企图制造“人民占有”企业的幻觉，来掩盖财政寡头对生产资料的独占。他們还引证了股份公司的所謂“民主制度”（如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民主”选举等等）来渲染这个幻觉。

此外，他們（如薩尔瓦多里等人）还把参加儲蓄、保險的工人和小生产者都說成是各种企业的“所有者”。理由是銀行、保險公司持有这些企业的股票或債券。

所謂“經理制度論”的鼓吹者宣揚，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在壟断企业里发生了管理职能和資本所有权相“分离”的現象，即企业的管理全权已从資本家手中轉到了一个主要由董事、經理們組成的“新”的“經理階級”手中，并且說这是一次“經理革命”。他們抹煞企业的管理职能完全取决于資本所有权的事实，硬把它們割裂开来，把董事、經理們說成不仅是独立于整个资产階級之外的另一个“階級”（或“阶层”），而且是駕凌于它之上的“权力集团”。例如，美国的資本家兼政客、教授的阿道夫·貝利在其著作《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革命》及《沒有財產的权力》中，就竭力宣揚这个“集团”“沒有財產”，但“拥有支配美国工业經濟的至高的、实际上无可抗衡的权力地位”；而股東們除了有权分紅外，其“权力地位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資本家“已經不是一个决定因素”。薩尔瓦多里吹嘘說，这个“經理階級”的出現，是“美国經濟革命的一个方面”。

“經理制度論”者都是壟断組織的忠实卫士，其辯护手法的特点是：承认統治美国經濟的权力集中在一小撮集团手里，但是，他們把这种集中不看成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而仅仅看作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并且竭力用謊言安撫人心說，掌握这个权力的是一个“嶄新”的“經理階級”，它不是財政寡头的代理人，而是“社会的代表”、“职工的代理人”；它不是靠財產而是靠管理企业的天才、組織才干等获得权力的；它主要关心的不是利潤而是“社会生产”、“人民福利”等等。他們企图借渲染“經理階級”的“权力地位”，来掩盖壟断资产階級对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剝削和統治。

所謂“收入革命論”的鼓吹者宣揚，近一、二十年來，在美国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发生了日益有利于“低收入阶层”（主要是职工和小生产者）的“革命”。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国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庫茲涅茨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儲蓄中的比重》一书。該书不仅用个人之間的收入分配来掩盖階級之間的收入分配，而且故意給壟断资产階級少算許多收入（如公司的未分配利潤、逃稅和避稅的收入等等），捏造出他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所有的“人民資本主

• 美国經濟学家維克托·佩洛在其《收入“革命”》（中譯本名《美国各阶层的收入分配》，財政經濟出版社1954年出版）一书中，对庫茲涅茨的这本著作进行了系統的揭發和批判。



义”的鼓吹者，都宣揚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似乎已經駁倒了“共产党人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宣傳”。近几年来，肯尼迪政府的重要顧問罗斯托的《經濟成长的阶段》、現任美国駐印度大使加耳布莱思的《富裕社会》等书，更是竭力宣揚美国社会的“富裕”，吹嘘它达到了“高額群众消費时代”。

許多人(如薩尔瓦多里、布劳之流)还援引股份資本“分散”的謬論，来宣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有来自劳动和資本这两个来源的收入”，并胡說这“足以抹平尖銳的階級划分”。此外，所謂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調节”、工会組織的經濟斗争等等，也被渲染为促成“收入革命”的因素。总之，“收入革命論”者竭力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事实，掩盖現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剝削实质，抹煞階級对立。

从以上这几种主要謬論来看，“人民資本

主义”的鼓吹者无非是宣揚：通过股份公司的扩大股票发行、管理职能和資本所有权的“分离”，壟断資本企业已經或正在日益为人民所“占有”和“管理”，同时人民也由于获得“資本收入”而日益“富有”。尽管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同时強調了其他因素，但几乎一致地都吹嘘股份公司的“革命”作用，把它捧为“革命的工具”、“理想的工具”等等。

美国壟断資本集团还利用“人民資本主义”这块招牌，来扩大股票发行。不少壟断企业(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等等)大力发行股票，实行各种利誘企业职工购买企业股票的“計劃”。紐約証券交易所甚至自詡为“人民資本主义的基石”。

“人民資本主义”的論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出籠之后，西德、奧地利、英国、日本等許多国家的壟断資本集团也都群起鼓吹。他們宣傳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目的則是一致的。

二

既然股份公司是“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們玩“人民資本主义”戏法的魔棍，那么，了解一下股份公司制度的实质及其在現代资本主义經濟中的作用，将有助于識破“人民資本主义”的騙局。

当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的阶段，社会化的大生产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已經不能单纯依靠个别資本的积累来实现，而要求把

許多个别資本集中在一个股份公司里，以摆脱个别資本数額有限的束縛。由于股份公司实现了巨大的資本集中，资产階級才有可能举办过去无力举办的大規模的生产事业。馬克思說过：“如果必須等待积累，来使若干个别資本大到可以承当铁路建筑事业的程度，然后再来建筑铁路，恐怕世界今天还会沒有铁路出現。但集中会通过股份公司，一



反掌間，就把它弄成功。”^①所以，股份公司是适应資本和生产集中的需要而出現的資本主义企业組織形式。股份公司制度的推行，加速了資本集中和生产积聚，从而推动了資本主义进入腐朽的、垂死的壟断資本主义阶段。

在壟断資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公司成为基本的企业組織形式，成为財政寡头对广大人民实行經濟統治的重要工具。

首先，股份公司是資本集中的工具。財政寡头用这个工具来动員閑散貨幣資本和零星資金，將它們集中在自己手中。股份公司組織程序一般是这样：一小撮壟断資本家集合一定數額的資本，創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把一部分留給自己，把其余股票出售；而持有股票者都成为企业的股東，有权根据股票的票面額从企业盈利中領取一份收入——股息。公司成立后，由股东大会选举最高领导机构——董事会。在这里，有选举权的不是股東而是股票，即有多少股票便有多少选举权。这种虛假的“公司民主”，保证了壟断資本家能够掌握董事会和公司的领导权力，从而支配从其他股東手里收集来的資本。壟断資本家犹嫌不足，还通过出售所謂“优先股票”（有稳定的收入而沒有选举权的股票），和保留所謂“普通股票”（收入不固定而有选举权的股票，有的还是“多权”股票）等詭計，更牢固地将公司的权力和财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股份公司制度的帮助下，“大資本合并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東們的

不大的零星資本，变得更加雄厚了。”^②

对于財政寡头們說，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实行“参与制度”，是一种更加重要的进行資本集中的手段。大股份公司购买其他股份公司的股票达到一定數額（例如百分之二、三十左右），便使之成为自己控制的“女儿公司”；还可以通过“女儿公司”收购其他公司的股票，使之成为自己的“孙女公司”。財政寡头通过这种多級的“参与制度”，組成了一个从“母亲公司”到“女儿公司”、“孙女公司”的控制体系，从而掌握了超过其自有資本許多倍的資本。例如，洛克菲勒家族在一九五六年所控制的资产（六百一十四亿美元），竟为其自有财产（三十五亿美元）的十七倍以上。

掌握公司的控制权的壟断資本家主要是拿其他股東的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冒險，千方百計地进行詐欺。例如，攫取巨額的“創業利潤”（股票价格*總額和投入企业的真实資本總額之間的差額）；实行“資本滲水”（发行的股票額超过企业的真实資本額）；將大量紅利分給“普通股票”；甚至伪造财务決算表，隱瞞巨額利潤，等等。总之，“公司的創

* 股票价格是資本化了的股息。股票价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股息的多少和平均利息率的高低，其次取决于該公司股票供求关系。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1頁。

② 《資本主义财富的增长》。《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94頁。



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买卖，引起一整个体系的詐欺。”^① 垄断资本家还利用每一次经济危机的机会，洗劫其他股东，吞并其他股份公司。这种情况，正好证明了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预见：在股份公司制度下，“成功与失败，同时都引起资本的集中，使剥夺以最惊人的规模来进行。在这里，剥夺已经由直接生产者，推广到小资本家和中等资本家了。”^②

其次，股份公司被财政寡头用来建立对企业的绝对控制。

如前所述，财政寡头可以凭持有能够使他控制该企业的一定数量的股票盘据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领导机构，其职权主要是：选举和任命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若干专业经理等领导人员（在美国，董事长常兼总经理）；确定公司业务总方针；审查企业经营的结果；分配利润等。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并提出报告，董事会向股东们

（自然是大股东）负责并提出报告。董事长、董事、经理的名单，其实是在选举前由少数大股东在幕后拟定的；他们或者是财政寡头的家族成员，或者是他们的亲信的代理人，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财政寡头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者和执行者，体现着财政寡头对企业的控制。在股份公司产生以后，虽然出现了资本所有权和管理职能分离的表面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财阀们对企业的支配权力，相反地是剥夺了广大的中小股东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力。

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股份公司的使命，是帮助财政寡头们建立其对全体劳动人民的经济统治，决不像“人民资本主义”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是实现所谓资本“分散”和“剥夺”财政寡头对企业的控制权力。实际上，它已经扩大和加强了垄断资本对劳动的榨取，加剧了劳动人民贫困化的过程，激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三

美国的现实，也完全揭穿了股份公司的所谓“革命”作用，粉碎了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谎言。

“资本民主化论”者把股票扩大发行的现象渲染为资本“分散”的趋势，宣扬垄断资本企业已为人民“占有”。然而，现实却完全与此相反。

近数十年以来，美国的股份资本明显地表

现出集中的趋势。据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伯特·蓝普曼在今年年初出版的《1922—1956年最大的财富所有者在国民财富中的份额》一书中说，占美国成年人百分之一的人所拥有的股票价值，在全部股份资本总值中的

^① 《资本论》第3卷，第560页。

^② 《资本论》第3卷，第561页。



比重：一九二二年是百分之六十一·五，一九二九年是百分之六十五·六，一九五三年是百分之七十六，而現在至少占四分之三。至于美国劳动人民，特别是产业工人很少持有股票。据美国一位学者密尔斯统计，制造业工人中百分之九十八·六都没有股票。美国工资劳动者所持有的股票总值（包括工头的股份），只及洛克菲勒家族在“新泽西美孚油公司”这一家公司中所持有的股票价值的一半。面对这个事实，连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里汝斯顿也认为宣扬股票广泛分散是“一种可怜的说辞”。

职工即使持有股票也决不意味着他们参与对企业的占有。第一，少量的股票在职工手中并不会使他们成为有产者。事实上，他们还是无产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而且资本家随时可以把他们赶出企业。第二，工人虽然凭小额股票获得一点收入，但是他们决不能获得对企业的任何控制权。何况有的公司（如“福特汽车公司”）只将没有选举权的股票售给职工，有的公司（如“艾索美孚油公司”）规定由一家信托公司掌管职工的股票。所以，职工决没有像垄断资本家那样，通过购买股票便取得了企业的所有权，而是使自己菲薄的储蓄变成了公司老板手中用以压迫自己的资本力量。

对于公司老板说，向职工推销小额股票，不仅没有“分散”企业的所有权，反而加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因为他用更少的资本就足以

控制全公司的财产；可以更便当地操纵一切权力，为所欲为。

明明是资本集中，却说成是资本“分散”；明明是垄断资本家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却说成是劳动者“占有”了垄断资本家的企业。这是强盗的逻辑！

美国的现实，也完全揭穿了所谓“经理阶级”剥夺了财政寡头对企业的支配权力的谎言。

“经理制度论”者所吹捧的董事、经理等决不是什么“新阶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佩洛所说，他们“如果不是财阀的家族成员也基本上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是被持有股票控制额的财阀委派来执行管理职能的，忠于职守犹恐不及，自然谈不上“剥夺”老板的权力。

“通用电气公司”被誉为摆脱了“银行和投资人意见的监督”的所谓“经理控制”的典型之一。根据一九五四年情况，该公司的董事会的十六名董事中，七名是摩根银行的董事，四名与摩根财团有密切联系；公司的主要经理人员也多是由摩根财团及其联盟者（波士顿财团）共同挑选的；连它的诉讼案件，也是由与摩根财团有联系的怀特与凯斯特律师事务所办理。事实上该公司完全处于它的最大的股东——摩根财团的控制之下。

经理人员的任务就是执行垄断资本的机能——榨取最大限度利润。连华尔街的喉舌《幸福》杂志一九五一年二月号的一篇吹嘘



“經理革命”的文章，也认为所謂經理人員不关心利潤的說法“至少是天真的”。同时經理人員自己都拥有大量的股票，并在“薪金”、“津貼”、“獎金”等名目下获得巨額的壟斷利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財政寡头們普遍采取了一种給經理人員低价售与股票的奖励“計劃”，就为的是“要給那些对公司真正有貢獻的少数人提供額外的刺激”，即鼓励他們更积极地为自己榨取利潤。正如美国学者密尔斯所說，“經理是大所有者的代理人，而不是小所有者的代理人”，“富豪在公司中的地位拥有私人財產制度所固有的一切权力和特权。”

美国的现实，还完全揭穿了所謂职工的股票收入日益“削弱”了資本主义剝削的謬論。据統計，持有股票的一般职工一年获得的“紅利”約有四十美元，而一个“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即使根据右翼工会的統計，一年至少要給福特財团創造六千美元的利潤。这种微不足道的“紅利”，何济于职工的貧困，不过是福特家族用来使职工忘却惨重

剝削的一种麻醉剂。此其一。其次，所謂“职工股票”彻头彻尾是一个騙局。仍以“福特汽車公司”为例，它曾宣布一周有一百美元收入的职工可以参加购买有价证券（一半是公債，一半是公司股票）的“計劃”。規定公司按半价将股票售給职工，但职工必須在五年內每周扣除百分之十的工資来购买。但是，职工中間有几人能够在五年內都一直有工作并且每周都負担得起这笔开支呢？一旦危机来临，公司解雇，股票价格下跌，职工連老本都将丢掉。連右翼工会头目也认为，这“計劃”对广大职工毫无“实惠”。其实，这不过是福特家族对职工实行又一次“文明的”掠夺。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股份公司不可能而且事实上也沒有使現代美国資本主义“革命化”或“人民化”，只是加强了壟斷資本集团对人民的榨取和統治。“人民”和“資本主义”两个概念是不能相容的。只有經過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資本主义制度，人民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四

“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所兜售的反动論調，决不是什么新玩意儿。例如，所謂“資本民主化論”、“經理制度論”曾先后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美国出現过。至于所謂“收入革命論”，不过是美国长期流傳的“階級利益調和論”的又一个变种。这些說法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之所以盛行起来，并冠以“人民資本主义”的招牌，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別是随着东風压倒西風的国际形势的出現，美国壟斷資本集团亟需把“資本主义”描繪成“一个有前途的而不是垂死的社会”，以抵制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吸引力；亟需掩盖腐朽的垄断资本的统治，欺骗劳动人民，以窒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人民资本主义”正是适应这种需要，由垄断资本集团及其辩护士们一手抓着股份公司的表面现象，一手挪来最陈腐、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凑成的反动货色。

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之所以这样大肆鼓吹“人民资本主义”，是有它的政治经济目的的。

垄断资产阶级把“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作为抵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深远影响和粉饰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包括了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人口已占全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社会主义经济的欣欣向荣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重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吸引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向往于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大肆宣扬“人民资本主义”来美化垄断资本的统治，迷惑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使其放弃革命的理想和斗争。有的“人民资本主义”的鼓吹者，还诋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吹嘘“人民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为优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凯尔索和阿德勒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资本家宣言》一书中，提出要以《资本家宣言》代替《共产党宣言》，以所谓“资本主义革命”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建

立一种所谓“正当的资本主义”，即“一切都作为资本家参与生产”并“享有经济平等”的资本主义。

“人民资本主义”的宣传又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反对国内工人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日益感到要窒息国内工人阶级斗争，除了继续采取镇压手段外，仅仅收买一小撮工人贵族已经不够，便强调要用“股票”、“红利”这根金黄色的锁链，把劳动人民牢牢禁锢在垄断资本的统治下。他们强调必须用发行“小额股票”的办法“使大多数人都感到他们分享到利润制度的利润，否则他们就会决定要别的制度”^①；强调必须让每个人“都拥有与我们资本主义制度利害与共的东西（不动产、政府债券或股票）”^②；叫嚷资本的所有权越是能够在“全民”中间分散，将越有可能阻止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并且把这种做法宣传为“人民资本主义”。实际上，这不过是垄断资本家掠夺和奴役工人的一种新手段。资本家推销股票给自己企业的职工，不但把工人的一部分工资收入变成剥削工人的资本，而且做了种种剋扣工人的规定，例如不少垄断企业（如“美国钢铁公司”）规定职工如擅自“停工”或因有“过错”而被开除时，他们的股票便被宣布作废或停止分红。这样，就有利于资

① 约翰斯顿：《新资本主义》。刊《语音文摘》，1946年8月号。

② 《新闻周刊》，1956年7月30日，第61页。



本家扼杀工人的反抗，使工人听任他們的宰割。

“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还为財政寡头通过国家来榨取劳动者的国民經济軍事化和通货膨胀政策进行辯护。他們当中有一些人沿用凱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是龐大的国防支出等等“对购买力的人为刺激”的結果，并认为龐大的国防支出之所以需要是为了要保证“充分就业”。他們还把国民經济軍事化，歪曲为出自劳动人民的“需要”，认为这是多数劳动者沒有掌握私人資本以前，解决就业問題的一种手段，企图用“人民”的外衣，来装扮当前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

凱尔索和阿德勒还拟制了一系列标榜为“人民資本主义”的政策。除了散布由資产階級国家“制止”資本私有权“过度”集中的謊言外，他們还說什么全民成了“資本家”而极力主張：政府应采取規定公司将全部淨收入分給股东的立法；应取消公司所得税和調整个人所得税；应取消提高工資和各种失业“救济”的立法。显然，实施这些政策，只是为了进一步地掠夺劳动人民，加强壟断資本家

的統治。

美国壟断組織还在自己的海外殖民企业中推行“資本民主化”的“計劃”。例如，据美国《福柏斯》杂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报道，两家在非洲的美国銅矿公司宣布五百名工資較高的非洲工人有資格参加“购买股票計劃”。它供称，該計劃的目的，是使当地劳动人民“亲身体驗私有制的好处”，并和美国殖民企业的“所有权发生一种利害与共的关系”。这說明，美国壟断組織阴谋用“人民資本主义”的宣傳和政策，来毒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階級的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妄图扑灭民族解放斗争。

从以上所揭露的种种政治、經济的目的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壟断資产階級和它的代言人所进行的关于“人民資本主义”的叫囂和他們所采取的相应的措施，不过是美国壟断資本集团进行垂死挣扎时所抓住的一棵水草。“人民資本主义”决不能挽救美国壟断資本主义的灭亡。美国的未来决不属于美国壟断資产階級，而属于美国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

更正

本刊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第二十四頁右栏末一行的“該做的工作就必然很多”一句，应删去。



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

張友漁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历史上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度，标榜“主权在民”、“议会至上”、“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上一般都规定，议会是由有公民权的公民选举产生的，是“表达公民意志的机关”。资产阶级的这种民主制度，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相比较，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只是用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了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一种工具。可是，资产阶级总是掩盖议会的阶级性，他们一贯把议会装扮成全体人民的代议机关，制造“全民民主”的假象。适应着资产阶级的要求，修正主义者也把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吹捧为“纯粹的民主”。例如，老修正主义者考茨基说，包括议会制度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能够“使国家的全体成年成员……具有完全的平等权利”和“保护国家的反对派”。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谎言，显然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驳斥的。

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到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议会所具有的权力和所起的作用，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曾较多地利用虚伪的议会民主来对劳动人民进行统治。同时，自由竞争要求在资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制，议会当时在解决资产阶级内部的利害冲突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资产阶级议会在这个时期的权力和作用比在帝国主义时期要大。恩格斯在考察了英国国家制度后指出，英国“实际上下院在颁布法律，并通过内阁大臣们（他们只不过是下院的执行委员会）来管理国政”^①。这一句话真实地描述了资产阶级议会在当时的权力和作用。

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逐渐集中到政府手里，议会的权力被削弱了，它实际上处于从属于政府的地位。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时期，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经济上的垄断，必然要求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上的垄断。控制着巨大财富的垄断资本集团，就愈来愈大地扩大军事官僚机构的权力，不断地降低议会的作用，使议会从属于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同时，垄断资产

^① 《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4页。



阶级为要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加紧了对本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剥削和压榨，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对外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并且镇压国内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反抗，绞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必须扩大军事官僚机构，加强政府的权力。列宁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制转向政治反动。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①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议会虽然在形式上仍享有立法和监督政府的职权，但实际上，议会的立法权却往往被政府通过所谓“委托立法”和紧急命令权等等所代替。所谓议会监督政府，也由于政府控制了议会中的多数党而有名无实。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②这已不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内阁“只不过是下院的执行委员会”了。就是资产阶级学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詹宁斯就曾露骨地说，议会对政府的“控制成分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从某种观点上说，下议院控制了政府，但是从另一种更为实际的观点说来，却是政府控制了下议院”。

议会民主的虚伪性在帝国主义时期是更

加显露了。有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在有些时候，采取公开的法西斯化的形式实行专政，抛弃掉了议会民主的形式。在还保存着议会民主形式的帝国主义国家里，议会也只是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为了欺骗劳动人民，为了在国内和国外推行反动政策制造所谓法律根据而利用的一个工具。

资产阶级用两党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来掩盖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他们说，两党或多党轮流在议会里控制多数就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三权分立就可以使议会制约住行政和司法的专横，这样，资产阶级议会似乎真是什么“全民”的民主组织了。

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方式，争夺议会席位，并使得议员有所更替。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他们据有议会席位，是经过人民选择了的。实际上，这些不同名目的资产阶级政党，谁占有议会的席位，对于劳动人民来说，都是换汤不换药。美国是两党制的国家。可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忠实走卒，它们无论哪一个在议会中占多数，都执行着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政策。法国实行多党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议会中资产阶级政党的力量经历了很多变动，但是法国议会始终为资产阶级所控制。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本质，正如列宁所说的，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

^①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0页。



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压迫人民”^①。

資產階級特別把資產階級各个政党之間的爭吵，吹噓为民主的表現。各个資產階級政党在竞选期間，往往对它的競爭对手进行謾罵、攻击，对选民許下許多諾言；在議會开会期間，他們也进行着无休止的清談和爭吵，有时甚至吵得很激烈。而实际上，他們之間的种种爭吵，归根到底，只是各个壟断資本集团經濟上的竞争和傾軋在政治上的反映，只是他們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和对外进行侵略擴張的具体做法上的意見分歧。至于資產階級政党在竞选中对劳动人民許下的諾言，不管多么动听，都是一文不值的，只要选举一过，他們就把这些諾言置諸脑后，他們的所作所为，往往完全違反自己的諾言。

資產階級标榜所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議會、政府、法院互相制約，这也无法掩盖資產階級議會的階級实质。三权分立的学說，是在資產階級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这种学說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分別由議會、政府和法院行使。那时的資產階級企图由他們所控制的議會来限制还在封建势力手里的行政机关的权力，使它不致过于专横。三权分立的学說，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时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資產階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都被資產階級所掌握，用来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务，因此，就談不上什么权力的分立。資產階級的議會和資產階級的政府、法院，只不过是进行着分工以實現資產階級的統治罢了。

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虛偽性，明显不过

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議會的全部选举活动中。資產階級为了达到控制議會的目的，千方百计地阻止无產階級政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代表进入議會。

資產階級首先是利用法律对选民的資格規定种种限制。例如，法国一七九一年宪法規定：公民按财产多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只有“积极公民”才有选举权，而“积极公民”的主要条件是交納一定的直接稅。当时法国二千六百万人口中，“积极公民”只有四百万人。到了十九世紀中叶以后，由于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結果，資產階級在选民資格問題上作了某些让步。例如法国（一八四八年）、德国（一八七一年）先后在法律上宣布了男子的普遍选举权，英国（一八八四年）也进一步縮小了直接的财产的限制。但是，在西欧大多数国家，到十九世紀末，还只有約近百分之五的居民参加了选举。在一九〇〇年，英国选民的数目只相当于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一。

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来，資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虽然大都先后取消了对选民資格的直接的财产的限制，但是，間接的财产的限制还是很多。有些国家规定，公民要取得选举权，必須在一定的选区内居住不少于法定的期限，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繳納一定賦稅等。例如，美国很多州和地方的法律都規定了居住一至二年的限制，不少州要求选民通曉英語并能“正确地讲解宪法”，美国南部有七个州的法律規定，选民必須繳納一定賦稅后才能投票。許多劳动者經常处在失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9頁。



业半失业的状态中，到处颠沛流离，很多人不可能有固定的居住地点；他们受不起教育，自然大多数人没有能达到所要求的教育程度；他们收入微薄，不得温饱，或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当然缴不起税。因此，劳动人民仍然由于财产的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资产阶级借助间接的财产的限制来排除劳动人民参加选举，是更加狡猾的一种手法。它比直接的财产的限制容易欺骗人，而收到的效果却一样。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一九六〇年选举中，就有八百万人因为居住资格的限制，一千二百万人因为教育程度和选举税等等限制，而被排斥在选举之外。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还采取了种族限制的办法。在美国，对黑人选举权的限制十分突出。美国统治集团使用很多方法阻止黑人进行选民登记。例如，美国南方各州主管选举的官员，经常向黑人提出一些只有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才能回答的问题，当他们回答不出，或者只因为有一个拗口的字念得不对就要被剥夺投票权。据美国民权委员会一九六〇年的报告，在美国南方各州，已达到投票年龄的黑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进行了选民登记。

上面说的种种选举资格的限制，实际上否定了资产阶级宪法和选举法形式上宣布的普遍选举权，使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选举权遭到剥夺，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代表进入议会设下了第一重围墙。

其次，资产阶级还规定了许多限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提出候选人的办法。例如，美国有些州规定，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外

的任何第三个党，如在上一次选举中未取得一定数量的票数，它们在提出候选人时，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选民签名表示支持，才能参加竞选；对签名人数的规定，有的竟多到几万人。但事实上，签名支持美国共产党候选人的人，就有遭到严重迫害或丧失职业的危险；签名人的家属和亲友，甚至也要受到联邦调查局等特务机关的追究。这样，美国共产党实际上被剥夺了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权利。同时，根据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法的规定，候选人必须缴纳巨额的保证金。在英国，候选人须缴纳一百五十英镑的保证金，如果候选人所获选票不到投票总数的八分之一，保证金就要被没收。在法国，根据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必须缴纳十万法郎作保证金。这种保证金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样，即使一部分劳动人民取得了投票的权利，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或者难于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种投票权利也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资产阶级还运用修改选举制度和重新划分选区等措施，使议员的选举获得有利于他们的结果。

资产阶级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来运用选举制度。在资产阶级力量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般都采取多数选举制。由于他们在各个选区大都能有把握获得较多选票，采取这种制度，就使他们能攫取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议席。如美、英等国就是采取这种选举制度的。在意大利，一九五一年二月，以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右翼



集团在议会通过的关于市政委员会选举法，也是采用的多数代表制。对于这样一个反动的选举法，意大利当时的内政部长谢尔巴曾毫不隐讳地宣称，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削弱共产党通过市政委员会操纵国家生活的那种势力”。在资产阶级政党较多、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分散的国家里，他们可能采取比例选举制。这种制度是按照各政党所获选票的多少为比例来分配议会的席位，它可以使林立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在议会中获得一定席位，同时，还可以防止获得较多选票的无产阶级政党得到更多的议席。

但是，当资产阶级看到共产党的影响扩大，现行选举制度不利于他们的时候，就要对选举制度加以修改，采取更加反动的选举制度，以保证得到有利于他们的选举结果。例如，一九五一年法国国民议会就通过了选举制改革法，以“一输多数联盟制”代替了原来的比例选举制。根据这一制度，各政党可以结成联盟参加选举，如某一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某选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票，即可独占该选区的全部议席；如都得不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票，该选区议席即按各党所得票数比例分配。法国在一九五一年的选举中，由于法国政府使用这一选举制度，使得法国共产党虽然获得了五百多万张选票，但只能在议会中获得九十四席。一九五八年的选举中，戴高乐政府又采用了“单一提名二轮多数制”。根据这一制度，在每一个选区中只选出一名议员，在首轮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绝对多数选票才能当选，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即进行第二轮

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参加竞选的政党获得相对多数就可以当选。这样，资产阶级政党就可以结成联盟争取相对多数来对付共产党。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虽然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三百八十八万余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九，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三百七十四万余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七六，但总共只得到十个议席，还不到议席总数的百分之二；而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少于共产党的极右政党“保卫新共和联盟”却窃取了一百八十八席。

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能选出他们的代表，还采取了重新划分选区的办法，以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他们在重新划分选区时，把无产阶级力量占优势或直接控制的地区，不划为一个选区，而把它分成若干块，分别并到保守力量占优势的选区里；或者在无产阶级人口占优势的工业区减少选区，而在保守势力有较大力量的农业区增设选区。前一办法使无产阶级政党无法集中选票，选出自己的代表；后一办法则使无产阶级不能按照票数的比例选出自己应有的代表。

由于资产阶级采取了反民主的选举制度和重新划分选区的办法，即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也难于当选。

第四，资产阶级还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操纵和控制选举，用种种卑鄙手段阻止人民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歪曲选举的结果。

资产阶级往往在进行竞选活动时，使用大批金钱，动员所有的宣传工具，向选民进



行欺騙宣傳，同时，雇用一批流氓騙子为他們張罗选票，或者直接收买选票。一九五三年意大利議會选举中，資產階級右翼政党花了几十亿里拉（意货币名）来进行竞选活动。他們对乡村和其他居民区中的选民贈送通心粉，有些地方送給选民一只左脚穿的鞋，同时告訴这些选民，如果他們的候选人当选，还会得到那只右脚穿的鞋。选民有时还得到半張一千里拉的紙币，如果給他們錢的候选人当选，他們就可以得到另外半張紙币。收买选票的情况，在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中同样是十分惊人的。在金錢收买的同时，資產階級还兼施政治威胁。西德在一九六一年大选时，仅仅在七月底八月初的一个星期中，西德警察和司法部在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亚就逮捕了六名以个人身份作为联邦議院候选人的德国共产党员。

資產階級在选举中营私舞弊的行为是不胜枚举的。他們有的在進行选民登記时，故意不把一些具有选举資格的劳动人民列入选民名册；有的把已死或已迁出的人登記进选民名册，然后用这些人的选民证投資產階級政党的票；还有的用造假票和換票等方法来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

在无产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力量强大的情况下，資產階級如果靠上述那些办法还达不到目的时，他們就派出軍隊、警察、特务、打手，用反革命的暴力和血腥的鎮压，来保证他們的候选人当选。他們或者杀害、迫害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党派的候选人，或者采取各种野蛮的暴力行为，阻撓替进步候选人进行选举鼓动，或者在选举日出动大批軍警，鎮

压选民。日本一九六〇年众議院的选举中，池田政府除了頒布反动法令，剝夺人民集会、游行的权利，限制人民的选举自由以外，还专门召开了全国警察头目會議，調动了一万八千名刑事警察和五万名便衣警察，加强对民主力量的鎮压，特别是采取了最殘暴无耻的手段破坏日本共产党的竞选活动，并且唆使法西斯暴徒杀害了社会党領袖淺沼稻次郎。当时，共同社也不得不承认这次选举是“严重破坏公正选举的金錢和权力的选举”。

第五，即使共产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代表通过重重障碍当选为議員，資產階級还可以采取种种手段来否定选举結果。資產階級可以宣布全国或部分地区选举“非法”，重新进行选举；可以利用資格审查，确认某些議員不具备当选条件；可以借口維護議院秩序，將議員加以“扰乱秩序”的罪名予以开除。資產階級用这种种办法剝夺已經当选的共产党和其他劳动人民代表的代表权，把他們排斥在議會之外。甚至当共产党所支持的某个資產階級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不利于整个資產階級的統治时，他們也要否定选举的結果。这里可以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阿根廷，由于亲美卖国的执政党（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的选举中失去十二个省的席位和众議院的絕對多数，而共产党所支持的庇隆主义党却获得八个省长的职位和众議院中的四十三个席位，阿根廷統治集团竟于三月二十日下令取消庇隆主义党在五个省赢得的选举結果。四月二十四日它进而取消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以来的所有省市选举結果（实际上取消了庇隆主义党在十



一个省当选省长的结果),四月二十五日又取消了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的联邦选举的结果。五月二十日阿根廷统治集团进一步地悍然宣布停止议会工作,命令改组政党。

大量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总是能够使用各种伎俩,甚至采用实际上把共产党置于非法地位的办法和采取暴力行动,阻挠共产党的代表进入议会,使共产党难以在选举中获得资产阶级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或者使共产党一个席位也得不到。在美国国会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分据了国会的席位(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的第七十九届国会到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的第八十三届国会,只有进步党和美国劳工党各占有一个或两个席位,从八十四届到现在的第八十七届国会,席位则完全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所占有),国会中根本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席位。西德一九六一年选出的联邦议院,全部席位为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所瓜分。其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占二百四十一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占一百九十一个席位,自由民主党占六十六个席位。在英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是在一九四五年的议会选举中有过两个席位,在这以后的五届选举中,资产阶级一直没有让共产党获得一个席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战后最初几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中,共产党的席位一度有了增长。但是,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的议会的本质。而且资产阶级总是能够设法削弱共产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很明显的事实是,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曾

一度争得较多的席位,但是资产阶级却不让它能够稳定地保持住这些席位。法国共产党一九五六年在全国议会的五百九十六个席位中占了一百五十一个席位,可是,一九五八年由于戴高乐政府采取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选举法,就使法国共产党在全国议会中的席位,骤降为十个席位。法国共产党是法国第一大党,但目前它在议会中却是少数派,即使在戴高乐上台以前,资产阶级也没有让它在议会中占过绝对多数。在意大利,共产党在议会中占有的席位,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多一些,但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仍然拥有多数席位,而共产党在众议院的五百九十六个席位中只有一百四十个席位,在参议院的二百四十六个席位中只有五十九个席位。

资产阶级除了在选举中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以外,还运用各种手段来限制共产党的代表在议会中发生作用,以至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和人身自由。因此,共产党即使在议会中获得一定数量的席位,他们的活动仍然会由于资产阶级的破坏而发生种种困难。

资产阶级仅仅是通过他们所谓“合法”的手段,就可以大大地限制共产党的代表在议会中对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发生影响。他们首先是操纵议会的表决机器,通过有利于他们的决定,而对于带有进步意义的提案,往往运用议会的常设机构加以搁置,或者玩弄烦琐的立法程序和多数表决等手段加以否决。

当资产阶级感到议会这个工具有些运用不灵时,他们还可以公开修改宪法,扩大行政机构的权力,以进一步削弱议会的作用。法国一九五八年通过的戴高乐的宪法就规



定，总统有权任免总理、政府其他成员和军事人员；在所谓非常时期，总统还有“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的全权。这样，大权实际上集于总统一身，议会立法权则削弱到仅限于对十几种事项作原则的讨论和规定，具体立法则由政府制定，而且政府还可以要求议会将这点有限的立法权的一部或全部委托政府代行。同时，议会通过的法律，还必须由政府操纵的宪法委员会审查后，才能公布生效。凡是宪法委员会认为不合宪法的法律，就可以不予公布。至于议会组织政府的权力，实际上也取消了，因为按照宪法规定，总统任命总理和政府其他成员，不需要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信任案。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即令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多的议席，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决策和活动，不仅不可能起任何决定性作用，甚至不可能起多大的牵制作用。

资产阶级为了限制共产党在议会中的作用，甚至连自己制定的宪法也不惜任意践踏。他们可以违反宪法，破坏议会的法定职权。资产阶级还往往运用暴力手段对反对党派议员的人身进行迫害，强制通过他们的法案。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日，日本岸信介内阁用七百名法西斯暴徒、五百名警察殴打反对党议员，并用三个到六个警察架一个议员的野蛮手段，把共产党和社会党议员赶走，然后由自由民主党议员单独通过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不但要利用议会这个工具进行政治欺骗，而且越来越凭借军事官僚机构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

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要想求得自身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就必须采取革命手段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以保障最广大的人民得到真正的民主。但是，在革命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仍有必要尽可能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讲坛开展斗争，揭露资产阶级的欺骗，并以具体事实来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共产党人如果不懂得或者否定利用一切机会在议会内加强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不对的。在开展议会斗争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进行过不少的工作，它们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捍卫劳动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等方面，迫使资产阶级作过某些让步，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的取得，也是同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议会外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议会中的斗争必须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而组织广泛的、深入的群众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议会斗争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唯一的斗争手段。列宁说得好：“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①

①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1页。



新的“挑战”和新的“选择”

· 向 阳 ·

“挑战”，这是目前美国当权派人物很爱用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义阵营的繁荣强大，说成是“超越一切挑战之上的挑战”。他们把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说成是今后十年或者几十年的“巨大的挑战”。美国原子垄断地位的丧失，苏美间导弹差距的扩大，等等，都被认为是对于美国的“挑战”。总之，他们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对于美国的“挑战”的年代。

当二十世纪进入六十年代之际，美国统治集团“选择”了民主党，据说，就是为了应付这些“挑战”。在洛克菲勒（这是目前美国最富侵略性和有影响的垄断集团之一）兄弟基金会的主持之下，腊斯克（现任美国国务卿）曾主撰了一个叫做《本世纪中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的研究报告，对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十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提出了纲领性的建议。同时，亨利·基辛格（现任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也写了一本书叫做《选择的必要》，为美国统治集团提供了应付这些“挑战”的许多“选择”。肯尼迪正是在荷包里夹着这些货色走进白宫的。

难道美国真的面临着如肯尼迪之流所经常喧嚷的什么外来的“侵略”、“干涉”和“武力威胁”之类的“挑战”吗？显然没有。真实的情况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最近若干年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股伟大历史潮流的日益高涨，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确已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不利于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变化。腐朽的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受到这种历史潮流的越来越沉重的冲击，而有“日薄西山，危在旦夕”之感。如果“挑战”指的是这个意思，那倒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根据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东西总是要向腐朽的东西挑战的，而且最后也必然是要取而代之的。

肯尼迪的一些代言人曾经说肯尼迪的所谓“总战略”的基本目的，概括起来说，就是想在当前面临的“发生了变化的局势”中能够作出“选择”。据说，肯尼迪是要能够“选择”如何应付“挑战”，而不是“让‘选择’加在我们（美国）头上”。他们甚至认为，在肯尼迪的“总战略”中，“选择”这个词儿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

肯尼迪上台以来，究竟是怎样进行“选



擇”的呢？時間雖然不長，花樣確實很多。但是，變來變去，政治上不外搞兩手策略，軍事上不外搞三種戰爭。這就是說，為了更加狡猾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肯尼迪政府既“選擇”戰爭的一手，也“選擇”“和平”的一手，而以“和平”的一手來掩護戰爭的一手。為了進攻和顛覆社會主義陣營，鎮壓和撲滅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肯尼迪政府既“選擇”大規模的先發制人的核武器戰爭，又“選擇”使用常規武器或者“戰術”原子武器的“有限戰爭”，並且已經“選擇”了南越等地作為“特種戰爭”的試驗場。這些所謂“選擇”，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沒有什麼新鮮可言了。

現在，美國當權派人物自己喧嚷，他們又面臨一個新的“挑戰”，因而要被迫作出一項新的“困難的選擇”。

這個“挑戰”來自“自由世界大家庭”的內部，來自美國在北大西洋集團中的西歐伙伴。肯尼迪在今年一月間提出的“國情咨文”中就發出第一次的緊急信號：“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提出了最大的挑戰”。緊接着，他在“貿易咨文”中又警告說，由於一個“短短時期中的”一些“基本上是新的、全面的事態發展”，美國需要應付“新的挑戰和機會”。到了今年五月間，美國財政部長狄龍更把西歐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作為三個“巨大的挑戰”之一，同社會主義陣營和民族獨立運動的“挑戰”相提並論。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美國統治集團這樣驚惶失措呢？簡單地回顧一下美國統治集團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情形，是頗有意思的。大家知道，在戰後的年代里，美國政府在反共反蘇的旗號下，從執行“復興”西歐的“馬歇爾計劃”，扶植西歐各國的反動勢力、尤其是西德的軍國主義勢力，策劃各種“西歐整體化”的方案，直到建立侵略性的北大西洋軍事集團，無一不是為了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全面控制西歐。這是美帝國主義的大西洋政策的基石，也是它的“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曾幾何時，形勢的發展完全出乎美國統治集團的意料之外。西歐主要國家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它們要聯合起來同美國爭一日之短長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

對於正“被另一次經濟衰退的陰影所吞噬”、並且一直以西歐國家的“盟主”和“保護人”自居的美帝國主義，這個新的“挑戰”確實具有十分嚴重的性質。因為它既是經濟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而且也是軍事戰略方面的。

一個排它性的西歐“共同市場”已經長起牙齒。今年七月一日起，“共同市場”六國內部的工業品關稅將再降低百分之十，總共將降低達百分之五十，某些農產品關稅也將減少達百分之三十五。如果英國也能參加進去，這樣一個處於單一對外關稅保護之下的西歐經濟集團，用肯尼迪的話來說，就將“擁有比我們多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他們共同工作，共同進行競爭，……他們的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將比我們快一倍”。如果美國被排斥在這個巨大的市場之外，美國就將失去



一个几达三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而无法保持它对西欧的每年六十多亿美元左右的出口贸易额，就将减少大量的外汇收入，增加大量的黄金外流，就会大大加深它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与此同时，这样一个西欧经济集团，也必然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广大中间地带的市场争夺战中，成为美国的日益强大的敌手。正如英国《泰晤士报》转弯抹角地说：“欧洲作为一支单独的经济力量的崛起，还会在争取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不结盟地区的战斗中成为又一个主角。”

不仅如此，一个排它性和竞争能力日益加强的西欧经济集团，必然在政治上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在军事上要求有更大的独立性。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毫不含糊地表示：“共同市场根据定义是一个欧洲体系。它必须确定并执行一个共同的对外政策。它必须有一个防务政策。它将一点一点地在大西洋联盟中变成一个同美国平等的伙伴。”这是最近几年来美国同西欧主要国家之间进行控制和反控制斗争的中心内容。法美矛盾的尖锐化，则是这个斗争的突出表现。雄心勃勃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俨然以西欧代言人的姿态，同大西洋彼岸的肯尼迪大唱对台戏。他坚持要建立一个“各祖国的欧洲”，一个“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军事上团结的欧洲”，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受美国支配的所谓“平衡力量”或“第三种力量”，同美国分庭抗礼，平起平坐。这当然是对于美帝国主义的“领导权”的露骨的“挑战”。怪不得若干时期以来，美国当权派

人物和代表性报刊歇斯底里地掀起了一个“孤立戴高乐”的运动。

在这个新的“挑战”面前，怎样办好呢？办法之一：钻进“共同市场”，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去捣乱一样，“让我们在法国、意大利或（西）德国建造工厂”（肯尼迪语）。但是，不行，因为这样美国“将会失去资本、黄金和就业机会”。办法之二：“攻心为上”，或者利用英国这匹“特洛伊木马”去破坏扩大的西欧经济集团，或者通过法国和西德内部的反对势力去削弱巴黎——波恩轴心。美国事实上也一直这样做。但是，看来一时难于收效。办法之三：“以退为进”，如果“共同市场”对美国不做开大门，美国“就出钱来承担它在西欧的军事义务”。华盛顿的政客们曾屡次以此相要挟。但是，这更不行，因为美国统治集团的决策人根本不愿、也不敢考虑退出西欧的问题。

显而易见，以上这些办法都不能“选择”。据说肯尼迪终于拟定了一个“宏伟的大西洋计划”，这大概可以说是他的一项最新的“选择”吧！

根据这个计划，第一步，美国将同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经济集团达成主要是有利于美国的互相减税或者免税的协议；第二步，将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包括“欧洲共同体”在内的“大西洋共同体”。不久以前，腊斯克对此特别作了阐明。他说：“我们期望同一个统一的欧洲合作，这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建立和保卫一个自由大家庭的其他必不可少的工作方面。这些工作不能单独由美国或者



单独由欧洲来完成。我们需要和我们紧密合作的强大的伙伴。这个强大的伙伴将是一个整体化的欧洲。进行密切合作的机构将是越来越团结的大西洋共同体，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和欧洲可以密切合作。”这位国务卿先生煞费苦心，企图用虚伪笼统的外交辞令，来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当然是瞒不过美国的“强大的伙伴”的。英国的《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就曾这样告诉美国，“如果欧洲人组织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就必须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意思是说，欧洲的事务不用美国指手划脚，越俎代庖。戴高乐更直截了当地给了美国一巴掌，他在法国中部和东部巡视时，冲着大西洋彼岸的肯尼迪说，法国“应该有它自己的人格，因而应该有它的武器、它的政策、它的影响”，“法国并不是由任何其他国家拖着走的”。

很明白，美国的“选择”，并不等于西欧国家的“选择”。“凡是对于美国好的，对于欧洲也是好的”这种愚人哲学显然早已过时了。究竟西欧是美国控制的“超国家的西欧”呢，还是以巴黎——波恩轴心为基础的“统一的西欧”呢？究竟北大西洋集团是美国的“一言堂”呢，还是成员国尤其是主要成员国的“合伙公司”？究竟由美国单独决定是否发动一场首先将毁灭西欧的核战争呢，还

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来“按电钮”？对于这些利害冲突的重大问题，美国有自己的“选择”，西欧国家也有自己的“选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本来就是帝国主义世界的铁则啊！

当然，在“选择”问题上，西欧国家也同样是各打各的算盘。譬如说，不论是在英国参加“共同市场”问题上，或者是在“欧洲政治统一”的形式问题上，还是在拥有核武器和对美国的态度问题上，戴高乐和阿登纳就不可能是真正一致的，而这两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老人”同惯于玩弄欧洲均势的英国绅士麦克米伦，更是难于完全合拍的。

西欧经济集团对美国的“挑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美国同西欧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重要标志。尽管肯尼迪可以发一百次誓：“我们不能让自己同它（西欧）分开”，“我们不能让它（西欧）离开我们，而要靠摧我们”。但是，帝国主义集团加速走向四分五裂的趋势，却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尽管肯尼迪还会被迫作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新的“选择”来应付这种或者那种新的“挑战”，但是，对于腐朽透顶的美帝国主义，可供“选择”的余地毕竟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有限了。



利 害 篇

关 鋒

清人梅曾亮的《記棚民事》（《柏硯山房文集》卷十），就开垦荒山一事說到利害关系的問題。其大意如下：

董教會在任安徽巡撫時，上了一封奏折，力主准許“棚民开山”。其理由是：反对开山的“皆溺于龙脉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亩之山保一棺之土”者；“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丛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閑民，地无遺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梅曾亮看过这封奏折，认为很有道理，表示贊成。可是，后来他到了宣城問及此事，乡人所說却大不相同，他們說：“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为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把山砍秃了），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污不可貯水，毕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繼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稅之僮而瘠有稅之戶也。”梅曾亮觉得这道理也是很对的。究竟是准許开山对还是禁止开山对呢？梅曾亮感慨地說：

“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后之說，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如董公之所忧，則吾盖未得其术也。故記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梅曾亮所說的利害“不能兩全”，包括着一个階級利害的問題。在階級社会里，到山上去开荒的无地貧民，同占有平壩沃土的富戶，确是不可調和的利害冲突。梅曾亮感到困惑的是，如果不准穷入开山，难免關事；讓他們开山，就会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山下耕地，难以兩全。現在，在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貧民和富戶間的矛盾是不存在了。但开垦荒山对于生产的利害問題，却仍然是一个問題。我們的办法是，既考虑到开山之利，又考虑到开山之害，权衡利害之輕重，得出的結論是：在有些山区，只能封山造林，不能开荒；有些山区则可以有限制的开荒，即根据当地情况限制在一定的坡度之內，同时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在土层較薄、坡度較大的地方开垦荒地，纵然一时可以得利，但必定遭致水土流失之害，那就一定要坚决保持水土，而不要乱开山荒。这叫做“利中取大”。如果只考虑到开山扩大播种



面积之利，而决定无限制的大片的开山，那就是贪小利而丢大利了。

在社会工作中，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利害相連的情形是很多的，例如：有些事情直接对当前有利，同时又直接对当前有害，其中有利大害小的，也有利小害大的；有些事情，在当时看来，虽然是有利无害；但经过一系列的中間环节，会生出长远的患害，甚至是很大的患害；也有些事情，对当前有小害，而对长远有大利；还有些事情，从某个局部看来有利，但从全局看来有害，或者相反，对某个局部有暂时之害，而对全局有利。总之，利害相連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古人就多少看到了这一点。战国墨家指出，辩的目的之一，即是“处利害”（《墨子·小取》）。

对于那种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或者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当然是很容易作出办与不办的决定的；但遇到既有某种利，又有某种害的事，那就必须十分慎重。如果只看到利的方面，看不到害的方面，冒冒失失地办起来，结果可能是贪小利而受大害；如果只看到害的方面，看不到利的方面，看到一点儿患处就不敢设法去办，那恐怕可办的事就很少了。

两千多年前的孙武说过：“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兵法·九变》）。用我们现在的話来说，就是要用“两点論”来看问题，也就是说，必须从客观过程固有的矛盾中，从事物错综复杂的各种联系中，从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中，弄清有利的方面和有害的方面。当然做到这一点是不

容易的，既需要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又需要有对所处理的问题的科学知識。但我们必须力求做到这一点。孙武说：“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得用兵之利也。”*（《孙子兵法·作战》）岂止用兵，做其他事情，也是不尽知其害，就不能获得其利。因为，不尽知其害就不懂得采取何种措施去防患，在沒有准备的情况下，患处还会扩大开来；这样，本来可能得到的利也会得不到。

弄清了利害两方面，就可以设法防患，或者使害縮减到最小限度，因而使利得到最大的保障。不过，也有这样的事情，看清了它的患处，但受着当前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不能防止。碰到这样的事情，只能是权衡利害的輕重大小，从而决定办还是不办。有患害较大，防患问题得不到解决，因而绝对不能动手的；有利大害小，需要忍受一点患害而必须兴办的，因为如果不忍受这点暂时的患害就会遭到更大的和长远的患害。墨家說得好：“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墨子·大取》）。

梅曾亮看到了开山这件事的利的方面，又看到了害的方面，但结果还是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办才好，这当然是因为他对开山这件事毕竟还没有深知。中国古来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看出了利害相連的情形，就宣布說：有一利必有一弊，因而遇事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这是懦夫的态度，当然是我們所

* 原作“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据《通典》校改。



不取的。

但是，人們在对一件事的利害关系还没有真正弄清楚，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处理办法的时候，暂时采取存疑态度，并积极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却是应该的。在某件事情的内部矛盾和它同各方面的复杂联系尚未充分暴露时，我們往往看不到或看不清它的某个方

面。这就要老实地承认，继续调查情况，参照历史经验进行研究，并且同时在典型试验中摸索，逐步地去把利害两个方面摸清楚，找出取利防害的方法。

要做好各种具体工作，需要各门具体的科学知识。梅曾亮说得对，“吾盖未得其术也”。弄清具体事物的利害，以取利防害，那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文艺随笔

朱

馮其庸

古往今来，偉大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风格总是有它的独特性的。这种独特性，也就是作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对于许多文艺作品，我們常常能够不看作者的名字就辨认出这是誰的创作，就是因为我們已經熟悉作者的独特风格的緣故。

我国的文学史、戏剧史和繪画史，呈現着绚烂多采的面貌，这证明我国历史上的作家和艺术家們，是善于創造独特的艺术风格，善于完滿地呈現自己的艺术个性的。从文学方面來說，我国先秦时代最偉大的詩人屈原，首先以他独创的艺术风格，照耀着我国的文学史。班固說他的风格“弘博丽雅，为辞賦宗”。刘勰說他的风格“气往轍古，辞来切今，惊采絕艳，难与并能”；又說：“不有屈原，岂見离騷。惊才風逸，壮志烟高。山

川无极，情理实旁。金相玉式，艳溢鎔毫。”他們对于屈原风格方面的評論，虽然有詳略的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司馬迁也是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的。唐代的韓愈說他的风格“雄深雅健”；宋代的苏轍說他的风格“疏蕩，頗有奇气”；明代的茅坤說他的风格“出風入騷”，“疏蕩適逸”；清代的刘熙載說他的风格“精思逸韵”，“逸气纵横”。这些評語說明，屈原和司馬迁风格的独特性是大家所公认的。在繪画方面，我們不必說得太远，就以近百年的画家來說，吳昌碩以篆法作画，喜用重色（大紅、大綠、赭、墨等），所作牡丹、菊花、紫藤、葫芦等等，具有一种古香冷艳、渾厚朴茂的独特风格。而白石老人，則又在青藤（徐渭）、八大（朱耷）、石濤和吳昌碩等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为



是需要有“术”的，也就是说，需要有关于那件事情的具体知识，关于处理那件事情的科学技术。

取利防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认识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的问题。正确地认识了客观规律，学会了以完备的知识利用客观规律，就能取利防害。当然，正确认识和利用

新冒出来的事物的规律，需要一个实践过程，要想一下子做到，那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这类事物的时候特别谨慎，逐步地探索着前进，在实践中取得经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及时地总结经验；这样，新冒出来的事物的规律，就能较早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利用。

自然景色传神写照，所作牡丹、紫藤、荷花、芭蕉等，独呈质朴浑厚，疏朗清新的风格。白石老人一样善用重色，但又独辟蹊径，不再走吴昌硕沉厚浓艳的路子，而出之以疏爽自然，特别是他所作的蝌蚪、青蛙、虾、大蟹、小鸡等小动物，生意盎然，神韵独造。

建立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于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别林斯基说，风格“就是思想本身”，就是“思想底浮雕性、可感触性”。没有自己的鲜明的风格，首先就意味着没有作者自己对于生活、对于现实的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感受，没有妙手匠心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手法，这在思想内容上往往容易流于肤浅，在艺术上则往往容易流于单调。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很好地打动人、感染人的。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不是艺术风格的单一性。我们常常说某位作家、艺术家的独特风格如何如何，这是就其全部作品风格的总的倾向、总的特色而言的，并不是说他的任何一个作品都是千篇一律地具有同一的风格特色。布封说过：“一个大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着同一的印章，这

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①。由于缺乏艺术才能而产生的艺术上的单调贫乏、千篇一律，与具有卓越的艺术才能的作家、艺术家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的情况，是应该严格区分的。任何一个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他一方面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他的风格又总是比较丰富多采、比较多样化的。

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丰富性，与驳杂不纯又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作家、艺术家艺术才能丰富和成熟的标志，后者则是作家、艺术家缺乏才能或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的表现。这种驳杂不纯表现在一个作品中，就说明这个作品在艺术风格上的不统一，不和谐；这种驳杂不纯表现在一个作家的身上，就说明这个作家的全部或大部分作品，缺少一种统一的共同风格特点，缺乏一种鲜明的、独特的艺术特色。

作家、艺术家的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并借以区别于别的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风格，乃是这个作家、艺术家大部分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共同特点，而风格的

^① 《布封文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页。



多样性，則是他的不同作品的艺术風格的各自的特点。它們的关系是，在各个作品的独特的風格中，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这个作家的艺术風格的总的特色，而这个作家的艺术風格的总的特色，又在不同程度上包含在各个作品的独特的風格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作家艺术風格的既多样又統一的辯证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們可以看一看李卜克內西对于馬克思的風格的分析。李卜克內西說：

如果布封底話对任何人都是对的，它对馬克思也如此：“風格即其人”——馬克思的風格就是馬克思自己。一个像他那样彻底忠实的人，一个就只知道崇拜真理的人，一个一当被說服某些道理并不正确，不管自己費了多少工夫才得到它們而又多么珍愛它們，便立刻把它們扔开的人，在他底作品中也必然会把他的本色显示出来。不会虛伪，不会假装和忸怩作态，他在著作中和在生活中一样，永远是本来面目。这是实在的，这样一个多方面的、广博的、多才多艺的人，他底風格是不能像資质較为简单狹窄的人那么統一，那么无变化甚至單調的。《資本論》的馬克思、《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的馬克思与《福格特先生》的馬克思，乃是三个不同的馬克思，可是在不同中他們还是同一的馬克思——在三位一体中仍然有一种統一——偉大人格的統一，这人格在不同的領域里不同地表现它自己，而又永远还是同一的人格。①

李卜克內西的这段話說明了馬克思的風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統一的关系。

我們如果只承认作家、艺术家風格的独特性而不承认他的風格的多样性，容易导致

阻塞艺术个性和艺术才能的充分發揮，是不利于艺术創作的。我們如果只要求作家、艺术家艺术風格的多样性而不注意風格的統一性，不注意努力建立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風格，也会使作品在艺术性上流于瑣碎平庸。無論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利于我們在文艺創作中探索和形成自己的風格。

我国历史上許多偉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不但各具自己独特的艺术風格，而且在不同的作品中又都具有丰富多采的風格特色，前面提到的屈原和司馬迁，就是这样的作家。优秀的文艺批評家刘勰，不仅看到了屈原艺术風格的独特性，而且还看到了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他在《文心雕龙·辨騷》篇里說：“騷經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伤情；远游天間，瓊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艳而深华。”* 这里所說的“朗丽”、“綺靡”、“瓊詭”、“耀艳”等等，就具体地指出了屈原不同作品的不同風格。刘勰对屈原作品風格的分析，未必都很恰当，但对我們認識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无疑是有好处的。司馬迁也是一位在風格上丰富多采的作家，他所作的許多人物傳記，几乎每一篇都有不同的風格。例如他写《項羽本記》，則雄勇猛健；写《孔子世家》，則典重温雅；写《屈原列傳》，則抑怨憤激；写《刺客列傳》，則激烈慷慨。

* 刘勰多有把不是屈原的作品，誤认为是屈原的。如《九辯》是宋玉的作品，《远游》不知为誰所作，《招隱》則是淮南王刘安的食客所作。

① 保尔·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內西：《回忆馬克思》，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頁。



司馬迁的作品的風格，确实是丰富多采的。

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風格为什么会具有多样性，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我认为：第一，杰出的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常常是丰富的，他們的个性和艺术兴趣，常常是多方面的，而且愈是偉大的作家、艺术家，他的艺术才能也一定愈丰富多采。思想、个性和艺术兴趣，是作家、艺术家艺术風格的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他的創作中也就必然会呈现出艺术風格的多样性来。当然，有些作家、艺术家，由于思想和艺术才能不够丰富，因之他的艺术風格没有什么变化；另外，有些作家、艺术家，虽然具有較高的才能，但是由于他的生活或其他条件的限制，因而也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丰富多采的艺术風格。这种情况，自然是存在的，需要作具体的分析。第二，作家、艺术家的生活和思想、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总是不断地在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和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艺术風格。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庾信，当他在侍梁昭明太子东宮讲讀的时期，出入禁闕，恩礼甚重，过着极其得意豪奢的生活，这时南朝又正在盛行着宫体詩，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写出了風格“綺艳”的作品来；但到他北去以后，故国淪亡了，自己从此开始过着羈旅北国的生活，在这样重大的变化下，他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之，他的艺术風格，也就随之而发生了变化。所以杜甫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絕句》）又說：“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杜甫在这

里称赞的，正是庾信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風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后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由于作家、艺术家思想前后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因而作品的風格也有所变化甚而至于有很大变化的情况，是屡見不鮮的。第三，作品的風格，一方面受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等的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作品本身的内容有密切的联系。作品的内容，对作品的風格也起着积极的作用。越是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就越是善于使自己的艺术描写手段，适应于描写的对象。这样，他們的艺术風格，也就显得丰富而多采。清代的吳見思曾經說：“史公（指司馬迁——引者）遇一种題，便成一种文字，所以独雄千古。”（《史記論文》）由于司馬迁善于根据不同的題材来进行具体描写，他的艺术風格，也就如姚祖恩所說的达到了“洗洋瑋丽，无奇不备”的程度。

可見，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風格的多样性，不仅是他們在探索自己的独特風格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而且也是他們在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風格之后也仍然孜孜不倦地着意追求的；不仅是作家、艺术家本身所追求的，而且是客观要求所决定的。今天，我們的作家、艺术家有的已經形成自己的艺术風格，有的仍在探索；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們丰富多采的生活，我們需要更多具有風格的独创性和多样性的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前人的經驗中有許多有益的东西，可以供我們吸取，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作家、艺术家要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創作实践进行創造性的工作。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14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四期 ★

目 录

論总结农业生产經驗 馬建猷 (1)

語言学习杂感 曹 昂 (8)

談談共产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苏 沛 刘家澤 (14)

現代资产阶级的邏輯实证主义哲学..... 任 华 (25)

关于詭辯論..... 邵铁真 (34)

——讀書札記

徒劳的“修漏补缺”..... 席林生 (38)

——从腊斯克波恩之行看美国西德之間的裂痕

漫画: 大西洋伙伴排座次 英 翰 (41)

☆ 七月十六日出版 ☆



論 总 結 农 业 生 产 經 驗

馬 建 猷

我国农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广大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經驗。对这些宝贵的經驗，全面地系統地加以总结和运用，是加速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总结經驗，是人們对客观事物从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上升，从现象观察到对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規律性認識的发展。人們在总结經驗的时候，由于思想方法和知識、經驗水平不同，对同一經驗，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和推断。人們所总结的經驗，如果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規律性，并且在推行这种經驗的时候，遵守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那就能够对生产起促进作用；如果不是这样，就会給生产带来不良影响，甚至造成損失。因此，在总结經驗的时候，应该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努力提高总结的科学性。

这里，根据近几年来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体会，談談在总结农业生产經驗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几个問題。

一、衡量一項經驗是否合理，应该看它是否有利于提高大面积的和长周期的总产量。

农业生产具有两种周期性总产量：一是一季作物短周期的大面积总产量；二是多种作物組合的复种輪作长周期的大面积总产量。农业生产的目的是提高总产量。在作物布局、复种輪作都合理，作物間不存在爭肥

料、爭劳动力、爭季节的矛盾的情况下，短周期产量变化与长周期总产量变化是一致的，这就是說，只要各种作物的短周期产量都高，长周期总产量也必然高。如果作物布局、复种輪作以及耕作措施不尽合理，例如过多地选用生育期过长的迟熟的丰产品种，或者过分扩大需肥需工过多、消耗地力过大的某些禾本科、薯类等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不去适当地与那些产量不是很高但能够培养地力的豆科作物实行輪作，这样虽然一季作物能够增产，或者当年总产量能够提高，但是，全年的或长周期的总产量，則不一定能够提高。

以近几年来四川省推广胜利油菜和拱宸桥油菜的情况为例。胜利油菜在試驗田里的产量比拱宸桥油菜高，但胜利油菜具有生育期长、需早播（九月播）迟收（五月始能收）、需肥多等生物学特性。早播产量才能高，而早播由于前作紅苕、水稻等未收获，地騰不出来，只能采取育苗移栽的办法，这就得多費工。迟收，后作水稻不能早栽，对水稻产量有一定影响。需肥多，在肥料有限的条件下，滿足了一部分农田对肥料的需要，則会减少另一部分农田的施肥数量，結果不利于提高总产量。拱宸桥油菜却具有适于迟播（十一月播）、收获早（四月上、中旬收）、需肥少等生



物學特性。遲播，就可以在前季作物收穫後，直接播種，不需要育苗移栽，因而省工。收穫早，水稻能夠早栽，有利於水稻增產。需肥少，有利於保證大面積平衡增產。從試驗田里勝利油菜的產量顯著高於拱宸橋油菜來看，似乎應該全面推廣勝利油菜。但是農民不是這樣作比較。他們是看在大面積一般條件下，哪一品種總產量高；兩種油菜分別與水稻組合，哪一種組合全年總產量高。比較的結果，農民僅將勝利油菜種在極少數的肥沃土壤上，大面積仍然種拱宸橋油菜。

由此可見，有些經驗，孤立地從單一作物短週期的產量來看，可能是增產措施，但從它對長週期總產量的影響來看，則可能是減產措施；同樣，有的作物布局雖然不能大幅度提高當年短週期總產量，有的栽培措施雖然不符合某一作物小面積高產的要求，却有利於大面積平衡增產，提高長週期總產量。所以，衡量一項經驗是否合理，應該看它是否有利於提高大面積、長週期總產量，而不應該片面地以一年總產量、一種作物總產量甚至一種作物的小面積產量來衡量。

農業科學工作者，為了深入掌握一門專業知識，對不同作物和不同耕作措施進行專業研究，以及按一定的專業分工總結生產經驗，是完全必要的。問題在於各專業工作者，在總結本專業的經驗的時候，不應該只局限於本專業，而必須樹立全面觀點，把本專業的作物產量視為總產量的一個組成部分，把自己研究的耕作措施和其他耕作措施聯繫起來進行分析，使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使單一作物短週期產量服從長週期總產量。如果小麥的研究工作者在總結南方地區小麥豐

產經驗的時候，片面地以一切服從小麥高產為指導思想，很可能只看到小麥產量高於蚕豆、豌豆，過分強調擴大小麥種植面積，忽視豆科綠肥等作物應有的種植面積；也可能不顧水稻的種植適期，不適當地肯定某些不利於水稻適期栽插的晚熟豐產小麥品種，忽視小麥與其他作物間的互利關係。這樣，就不能達到全面增產的目的。水稻的研究工作者在總結水稻增產經驗的時候，同樣應該避免只偏向水稻，不顧其他作物的片面性。在總結其他增產經驗的時候，也應該這樣。例如，在某些無霜期較短的地區，大春作物和小春作物都採用生育期較短的品種，可以一年兩熟；而如果大春作物和小春作物各按其高產要求的最適宜品種和栽培措施進行種植，但生育期過長，就不能兩熟，或者即使能兩熟，也會使其中一熟產量特別低，結果提高了一熟產量，卻降低了全年總產量。因此，農業科學工作者在總結經驗的時候，對任何一項經驗的增產效果，都不能孤立地來看，而要同其他經驗、同整個生產的總效果聯繫起來，進行全面的總結。只有這樣，才能總結出真正有利於生產的經驗，達到增加總產量的目的。

二、總結農業生產經驗，應該以“生物與其生活於其中的外界環境條件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生物學觀點為指導，研究農作物的生物學特性和外界自然環境條件之間的關係。

農作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長發育要求一定的外界環境條件。不同作物，各有一定的生物學特性。不同地區，由於氣候季節變化、地勢、土質等不同，各有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作物豐產，是人們在實踐中對農作



物的生物学特性和外界的自然环境条件的認識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措施,促使它們获得較好的統一的结果。总结农业生产經驗,也就是总结人們所采取的生产措施,哪些是能够促进和为什么会促进这两者达到較好的統一,哪些不利于和为什么不利于这两者的統一。只有这样,才可能正确理解生产措施在增产中所起的作用,因而在运用的时候,做到因地因时制宜。

从总结耕作制度方面的經驗来看:南方一些地区的冬水田、圩田、泡冬田耕作,东北地区的墾作耕作等,都是适应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而形成的向自然作斗争的措施。南方有些地区的群众,在长期向自然作斗争的實踐过程中,找到了适应于当地雨水、气候、丘陵地势等自然条件的耕作制度。他們認識到当地全年雨量大部分集中在六、七、八月,如果不在雨季蓄水保水,春秋季就要受干旱威胁;丘陵地形又很难以人工提水来保证作物对水的需要;同时,如果不以梯田方式拦流蓄水,丘陵地形的土壤冲刷、肥料流失均极严重,必然降低土壤生产力。群众根据对自然条件的这些特点的認識,逐步找到了坡土改梯土,梯土改梯田,蓄水种稻,以适应自然、战胜自然的冬水田耕作制度。这一耕作制度具有抗旱、防涝、抑制病虫、緩冲自然灾害、省工、省肥、高产稳产的优越性。当然,有的地方,由于具备了較好的水利条件,水源方便,劳动力又够用,适当地改冬水田为冬干田,以种綠肥或小春作物,实行水旱輪作,对增产也是有利的。东北地区的群众,根据当地的地势、土质、雨水等自然条件,以及当地緯度高、日照投射角度小影响地温

等特点,找到了适当的耕作制度。他們認識到,在地势平坦的地区,高墾比平作易防夏涝;墾的曲面大于平面,墾作可扩大土壤接受日照面,利用墾的土表曲面角度,可增大日光与墾面的照射角度,更有利于吸收日光热能,使春末夏初地温增高快,有利作物生长等等。从而,逐步形成了具有抗旱保墒、防涝、增温、增产作用的墾作耕作制度。因此,只有对南方的冬水田和东北的墾作所由形成的自然因素进行分析,才能理解这些耕作制度在稳产增产上所起的作用,才能很好地运用和发展这些經驗。

从总结选用良种方面的經驗来看: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地方良种,地方良种是在当地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期栽培选育出来的,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具有高度适应性。种子是生物有机体,它具有要求一定的外界生活条件、并对这些条件产生一定反映的遺傳性。如果良种不能获得其遺傳性所需要的外界生活条件,它的优良特性就不能表现出来,甚至不能抽穗结实;或者所引良种虽能勉强完成其生长发育过程,但生物經濟性状差,产量低,沒有实用价值。这就是說,只有适应一定地区自然条件的相对良种,沒有适应任何地区、任何自然条件的绝对良种。因此,总结选用良种經驗,就应该联系当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及其与良种遺傳性、适应性的內在关系,指出良种达到丰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如果缺少某些条件,就不可能丰产。对于良种有了这样的認識,才能因地制宜地选用良种,避免不恰当的引种而造成的损失。

再从作物种植适期、不違农时方面来看:地球繞日运轉形成地面季节嬗替,按春夏秋



冬一定不移的順序出現各季节特定的溫度、日照、雨水等綜合条件。屬於某一季节固有的气候条件，一般只能在該季节出現。气象条件出現的这种順序性和周期性，就在农作物的历史系統发育中，形成其各生育阶段对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与季节气候交替变化一致的遺傳性，即作物各生育阶段所分別要求的气象条件，正与按季节順序出現的温光等自然条件基本一致。这就决定了一切作物品种各有一定的种植适期，各有其最早、最适和最迟的种植時間。只有在作物的最适种植期进行种植，作物才能获得其各个生育阶段按順序所需要的特定的外界自然条件，产量才能高而穩定。相反地，如果播种時間早于最早种植期或迟于最迟种植期，产量就要减低，甚至无收。

地区不同，緯度不同，地形不同，海拔高度不同，又决定着地区間相同季节的气候差别，因而同一作物品种在不同地区又有各自的种植适期。例如，水稻在海南島一月播种已能滿足其所需要的温光条件，而四川省南部則須三月初播种，四川省西北部更須迟至四月初播种，始能滿足其发芽、分蘖、孕穗、开花、結实各生育阶段所需要的温光条件。这就是說，不同地区各有为其具体的气候条件所决定的农事活动适期，不能不顾条件地硬性規定，或者机械搬用其他地区的經驗。

在大多数情况下，适期种植还具有避过一定自然灾害的重要作用。如在四川省，小麦适期播种就可以減輕冬涝、春旱和早春低温为害麦穗花器官发育；水稻适期播栽就可以避免烂秧、五月低温影响稻穗发育、七月底迟抽穗遭三化螟为害。由此可見，适时种

植、不違农时，是根据作物的生长发育規律，充分利用自然的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争取高产的重要措施。

綜上所述，总结农业生产經驗，應該密切联系当地的自然条件，找出生产措施与自然条件之間的內在联系，深刻認識增产措施在促进作物的生物学特性与外界自然环境条件的統一方面的作用。这样，才能正确地运用和推广增产經驗。

三、总结农业生产經驗應該紧密結合当地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既要总结小面积优越条件下的高产經驗，更要重视总结大面积一般条件下的增产經驗。

农业生产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在某种範圍內决定着一定的产量水平，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措施和耕作經驗。解放以来，由于大力兴修水利，增产化肥和农业机械等，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經有了提高。但是，要根本改变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落后状况，达到全面机械化、水利化、高施肥水平等，不是短時間可以實現的。我国耕地广闊而复杂，具有机械化、水利化、土质肥沃和高施肥水平等条件的耕地面积，目前还很少。因此，作为指导当前大面积生产的經驗总结，就不應該以小面积优越条件下創造的高产經驗为主，而應該从实际出发，以当地大面积的一般条件下获得的增产經驗为主。如果把特殊条件下小面积上取得的高产經驗，运用于一般条件下的大面积生产，不仅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相反地还可能造成减产。例如粳稻在肥料充足的条件下一般比秈稻耐肥、抗倒伏、产量高，在小部分肥力較高的稻田实行



种稻改粳稻是增产措施，但是，如果不考虑粳稻需肥多的特点，不分地区土质、肥料条件，全面改种粳稻，尽管小面积可能增产，大面积却势必减产。同样，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单季稻改双季稻是一项增产措施，但是，改种的面积究竟占多少，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这样，才能收到应有的增产效果。

这并不是说，在目前大面积耕地的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大面积的产量就不可能提高。前面所说的一定物质条件在某种范围内决定着一定产量水平，是指运用一定物质条件下的成功经验达到所能达到的最高产量以后，要使产量继续提高，有赖于增加新的物质条件。当前生产的物质条件虽然比较差，但是，是否大面积耕地已全面发挥了这种条件下的增产潜力，达到了应有的最高产量水平呢？可以肯定地说还没有。有的农业劳动模范说：“同样的土，同样的水、肥，各人的做法不同，庄稼收成好坏大不同。”这也正如四川省有句俗话所说的：“膏药一种，各人熬炼不同。”物质条件只是决定产量的因素之一，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采用不同的耕作技术和种植方法，产量会有很大差别。例如有些经验特别丰富的农民，他们的许多增产经验，并不是靠特殊优越的物质条件获得的，而是在现有的一般物质条件下，由于采用较好的耕作技术和种植方法所取得的，他们取得的增产成就远高于同他们条件相同的其他农民。有的农业劳动模范说：水稻增产有穷办法和富办法。根据目前大面积耕地的物质条件，需要着重总结他们的穷办法。如果全国各个地区的大面积产量，都从当地

现有水平提高到当地劳动模范用穷办法取得的先进水平，那末全国农业产量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强调总结大面积一般物质条件下取得的增产经验，并不是说，就可以忽视总结小面积特殊条件下取得的高产经验。应该看到，各个地区或多或少都有一部分土质肥沃和水、肥条件优越的耕地，这类耕地面积虽然不大，但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潜力较大，充分发挥这类耕地的增产潜力，对于提高总产量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大面积耕地的生产条件虽然比较差，但毕竟是暂时的。在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随着工业不断为农业提供更多的物质条件，随着农业本身的发展，同比较优越的物质条件相适应的能够达到更高产量水平的农业技术措施，将不断扩大其应用范围和作用。因此，对于特殊条件下的高产经验，也不应该忽视。

四、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应该是继承与发展相结合，在继承的基础上总结出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方向和途径。

农业生产是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的复杂斗争。要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就必须认识自然、熟悉自然，就必须继承祖先世代积累下来的向自然作斗争的经验。自然的变化规律复杂，周期时间长。自然条件，不仅在不同地区间存在着千差万别，而且同一地区在不同年度间也存在着多样性的变化。要掌握年度间气候变化规律，认识生物在不同年度气候条件下的不同反映，单靠直接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某些有利的或不利的的气候因素，不是年年都出现，而是有一定的周期性，要几年或十几年才出现一次。气候变化方向要



更長時期才能看出。某些特大自然災害要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出現一次，一個人的畢生閱歷有限，很可能一次都遇不上。例如，四川省在六十年前發生過一次大旱，當時群眾在抗旱中採取的一些有效的應變措施，只有八十歲左右的老農才有閱歷經驗。我們曾經拜訪過四川省瀘縣石洞區的一位八十歲的老農徐華山，他就詳盡介紹了那次天旱的情況及當時抗災遲種早稻的種種成功經驗。又如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這樣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是近百年來少有的，人們對災害會連續發生的可能性沒有足夠的認識，有的生產隊在遭遇一年災害之後，抱着災害不會連續出現的僥倖思想，而忽略了第二年、第三年繼續防災抗災的準備和措施。但也有的生產隊在第三年連續發生旱災的情況下，取得等雨遲栽的保產經驗。如四川省瀘州新民公社新民大隊第六生產隊，一九六一年全隊八十六點八四畝稻田僅有三畝有水栽了中稻，其餘均無水。有的主張仍改種紅苕，但經過全隊討論，還是決定等雨栽種水稻。根據是：（一）栽水稻比種紅苕省工、省肥、產量高，如果繼續改種紅苕，以後雨水來了又不能關水，一九六二年將仍不能恢復水稻生產；（二）任何大旱年份也不會一年干到底，六、七月總有雨；（三）往年種雙季晚稻大暑遲栽，也收過四百多斤；（四）南特號品種生育期短，遲栽也不會在抽穗時遇低溫為害。他們這樣決定，是做對了，七月初果然降了大雨，栽上了四十二點三畝水稻，共收稻穀一萬七千三百四十斤，獲得平均每畝四百零九點九斤的較高產量。一九六一年這些田也就關上了水，恢復了冬水田耕作制，取得一

九六二年的生產主動權。類似這樣的抗災保產經驗，應該很好地總結和繼承。

繼承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還在於它是經受了相當長時期的自然的嚴峻考驗，並在長期實踐過程中，通過廣大勞動人民的不斷檢驗修正而充實起來的，它是億萬勞動人民若干世代的集體智慧的結晶。繼承群眾的生產經驗，是認識自然戰勝自然的捷徑，是進一步提高農業科學水平以發展生產的不可缺少的條件。

繼承群眾已有的經驗，是總結農業生產經驗很重要的一方面，甚至可以說是主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群眾經驗有其歷史局限性。在總結經驗的時候，也要善於發現其中的缺點或不够完善的地方，研究出在現有條件下進一步改進的辦法，並儘可能預見到客觀條件的發展變化，指出今後具備某些新的條件後，實現更高生產水平所應採取的相應措施。這樣要求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因為現代農業科學各個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為群眾生產經驗的不斷發展，創造了和繼續創造着新的條件。例如，選種方面，不斷選育出具有更好地利用自然因素的遺傳性的新品種；氣象工作方面，對大自然氣象因素循環規律和各個地區的小氣候規律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能夠作出準確性很高的氣象預報；植物生理研究工作，不僅從作物的營養生理和發育生理方面探索生物規律有了比前人更多的認識，最近更提出群體概念；進一步研究作物豐產的群體生理；土壤肥料工作，從過去如何因地施肥獲得一季一年高產的研究，提高到用地與養地結合，以保證土壤肥力不斷上升、作物長期持續高產



的研究，并取得了許多新成果；植物保护工作方面，研究出不少有效的积极防治病虫害的办法。另外，随着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工业支援农业工作的加强，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将会不断改善，随之，农业技术措施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由于上述原因，完整的經驗总结必須包含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这样的經驗总结，才能对生产起更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总结經驗中提出的一切推論和新的措施，都必须經過試驗证明确实有效以后，再运用于大面积生产。

五、总结农业生产經驗，既要总结成功的正面經驗，又要总结失败的反面經驗。

成功的經驗固然可贵，失败的經驗是付出了一定代价换来的，尤应珍惜。有时候，只有成功的經驗，沒有失败經驗的对比印证，很难证实成功經驗的正确程度。例如，各种作物如果没有不同种植期的对比，不經過許多不适宜种植期的生产結果的印证，就不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時間是最适宜的种植期。又例如，在深耕的問題上，如果不經過許多不同深度的效果的对比，也就不能印证哪种深度是最成功的深度。其他如施肥、密植等也是如此。

我們說，有时候成功經驗的正确程度需要反面的失败的經驗来印证，并不是說，可以随意以大面积生产来作各种对比試驗。同样一种經驗教訓，既可以在大面积生产中取得，也可以在小面积試驗地上取得。失败的經驗，如果从大面积生产中取得，要付出巨大的损失作代价；但是，从小面积試驗地上取得，則只需要付出較小的研究代价。我們所以強調一切要經過試驗，目的也就是在获得各种宝贵的經驗教訓的过程中，只付出較

小的代价，避免造成大的損失。

当然，無論是大面积生产或小面积試驗，都应该尽量避免失败而造成損失。在进行各种試驗，特别是將試驗的成果推广到大面积生产的时候，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受着大自然的强烈影响，生产条件的可变因素較多，同时，农业工作者的經驗和技术水平也不一致，因此，有时候发生某些失败的事故，也是难免的。发生了失败的事故，造成某些損失，当然是坏事；但是，只要认真地总结經驗教訓，找到失败的原因，这种坏事就能够变成好事，代价就不会是白白地付出。因此，在总结农业生产經驗的时候，不能只看成功的經驗，而是既要总结成功的經驗又要总结失败的教訓。应该看到，总结成功的正面經驗，对指导生产有现实意义；总结失败的教訓，对于更深刻地認識正面經驗，对于避免以后再遭同样性质的失败，对于促进农业增产，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总结农业生产經驗，是摆在我們面前的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这需要广泛地收集現阶段农业生产中的各种事实材料和大量的历史資料。詳細地有了資料，还要以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現代的农业科学理論为指导，做科学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加深和丰富我們对农业生产的內部联系和規律性的認識。已經总结出来的經驗，也还需要在實踐中反复加以驗證。做好这一工作，需要农业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农村干部共同作长期的努力，虛心学习农业科学知识，认真地走群众路綫，特别是要认真听取有丰富的生产經驗的老农的意見。



語言學習雜感

· 曹 禺 ·

什么样的人會說出什么样的話。人不能脫離了自己的階級、生活、思想、感情與語言的教養，抽象地、超然地說出一套話來。語言是人用來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是人的鏡子，有革命感情的人，才能說出感人的革命語言。

羅學瓚烈士(1893—1930)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便寫了這樣的語言：

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剛；
惟剛斯不惧，惟剛斯有為。
將肩挑日月，天地等塵埃。
何言乎富貴，赤胆為將來。

這是多么激勵志氣的詩句！它說明一個真誠的革命戰士的肺腑語言只有這樣，不會是別的。

明末清初有一個錢謙益，一生醉心功名利祿，奴顏婢骨，老而不知耻。連後來的新朝統治者乾隆都罵他：“大節有亏，實不足齒於人類”。他晚年受盡奚落。在八十歲的時候，回顧腐朽的一生，老境淒涼，他不禁流露心裏的話：“……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死不死，偷生得生。”看看自己，想

想轰轰烈烈，一代完人的師友，他在詩里也只好這樣懺悔：“故鬼視今真恨晚，余生較死不爭多”。錢謙益是個文人，他是懂得用文字來裝飾自己的，但是在嚴肅的歷史面前，他不可能用語言來打扮自己。他的詩文告訴我們，他不過是一個齒落骨枯，連乞憐的尾巴都搖不動的老狗而已。

再讀一下楊匏安烈士(1896—1931)的獄中詩：

慷慨登車去，臨難節獨全。
余生無足戀，大敵正當前。
投止窮張儉，退行笑褚淵。
者番成永別，相視莫潸然。

哪種語言充滿了天地間的正氣，那種語言才是真正的人的語言，這是用不着說的了。

“言為心聲”，又說“情見乎詞”，沒有感人的思想內容，就不會有感人的語言。所以古來有人直截了當地說，詩是人的情性。一個學習語言的人若不首先認為好的、美的、真實的語言是從自己的好的、美的、真實的生活與思想來的，相反，以為只是關在屋裏雕琢文章，苦下功夫就可以把語



言炼好，这是妄想。

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语言。要把语言写好，使人信服，首先就要老实；老实的语言便是“心声”，“心声”是骗不得人的。

学习掌握语言，我知道要下艰苦的功夫。后来，感到仅下功夫还不够，要学习前人的经验，懂得一些窍门和方法。近来，又觉得这些还是不够，逐渐明白，要学好语言，首先要对语言发生强烈的兴趣。不能以为自己是个作者，应该意新语工，高人一等，才要学一套造词造句的本领。如果我不爱语言，不感到文学语言的魅惑力量，不能沉醉在丰富深刻的人民语言的奇妙世界里，那便是“缘木求鱼”，空有一个决心，是学不好如何使用语言的奥妙的。要爱语言，要着迷，语言的妙境才能领会得到；之后，才能谈到学着掌握语言，学着使笔下生花，创造同样真实、生动、迷人的语言境界。

为什么我们读到一篇好文字，往往要流连反复，一唱三叹，要背诵，要传抄，要找个好朋友同声欣赏？这不只是因为文章的思想感情吸引我们，还因为这思想感情表达得那样感人，那样恰当，那样传神，使我们不由得发生强烈的兴趣。这强烈的兴趣是学习语言的重要条件。

我们学习语言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作者的革命责任感和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同样重要

的，两者都是推动我们学习语言的力量。我们知道语言是武器，学好了，可以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因此，要苦学苦练，却不常记得，语言本身是十分迷人的艺术，爱上它，就丢不下的这个事实。对语言的兴趣，并不是每个有志于学习语言的人都有的。苦学可以使人发生兴趣，但往往有人不知，有了强烈的兴趣，才更容易领略语言的妙境，才更能摸索语言的精微。人的头脑在未学习之前是闭塞的。苦学可以使人“通”，但得到学习之乐，就更容易使人“通”。然而也有人苦学一生，还是看不出他对语言发生什么真正的兴趣。他很辛苦，但他总像是徘徊在语言艺术的门外。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因为他的兴趣与才能另有所在，但也很有可能因为他没有体验到学习语言之乐，没有打开这个乐园之门。

幼年读《三字经》，塾师说：“‘头悬梁，锥刺股’，古人就是那样读书的。”听了，我便怕读书。如今我只看出其中有一种刻苦发愤的道理，还是不喜欢那一幅森然可畏的受难的图画。我是不赞成皱着眉头，口含黄莲那样地读书、写文章的。写文章、读书自然不能轻而易举，要付出艰巨的劳动，但这并不是说，这就不是乐事。我赞成用心读书，勤奋学习语言，但我还是十分欣赏陶渊明读书时“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态度，这是懂得读书的真味道的人的精神状态。

写文、写诗、写剧本，锻炼语言的乐



趣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为了一句话，一个字用得精确，用得传神，用上一夜一夜的功夫，千挑万选，塗抹滿紙，而終夜不成，这难道不苦嗎？然而回头一想，如果其中没有乐趣，望着眼前的語言难题，如对枯柴败木，不发生一絲真正的兴趣，誰又能长此投进这样多的苦功夫呢？学习語言总得要苦练才成，有人談起吟詩之苦說：“……句句夜深得，心自天外归。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一句五言詩，要用破一生心，可謂真苦了，然而乐也在其中。

没有对語言創造发生极浓烈的兴趣，一个作者便难成其为作者。辛辛苦苦，琢磨語言，同时又兴味无穷，感到語言創造的快乐，这就是作者一生的工作。寻觅那“唯一的、完美的一句话”，用阿·托尔斯泰的話說，要找寻那“金剛石似的語言”，这就要有如饥如渴的愿望和兴趣。

我們不是为兴趣而写作的。我們写詩歌，写小說，写剧本，是为革命，为人民的利益。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主張以“文”来載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的。語言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正因为我們写作怀着这样崇高的目的，我們就更要把語言这个手段练得更有力，更高明。我們有这样一個強烈的愿望。

然而这里，兴趣还是发生作用的。对語言研究发生兴趣，懂得語言研究的真味道，語言的进步便如水之就下那样順当，反之，只有鍛炼語言的愿望而无兴趣，語

言的进步就如激水上山那样的困难。古来有一句話：“以道为飲，以文为食。”过去許多大文章家廢寢忘餐，在語言、文章中看見了深厚的乐趣，都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情感。比如讀韓愈、柳宗元的文章，不但使我們感到作者对于自己的时代的強烈責任感，而且如果用心誦讀起来，也会使我們感到这些大文章家对于語言的深切喜愛。

我們有些初学語言的人不免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真誠的決心要提高語言的修养，却对語言不愛好，或者不十分愛好，或者仅仅是口头上的“愛好”。然而热爱語言，肯定是会幫助我們掌握語言的。“文章千古事”，作詩，在杜甫看，是不朽的事业。他說“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他是如何重視創作，又如何热爱語言啊！

兴趣不是生来就有的，生活与劳动会使我們对某些活动发生兴趣。一辈子种菜蔬的农民就会对种菜蔬发生兴趣。要培养对語言的兴趣就要不断接触語言。工、农、兵群众的語言，各階級的活生生的語言，古今中外的文学語言，如果认真学习，都可以提高我們对語言的兴趣。熟讀好文章，好剧本，好詩，背誦它，揣摩它，一边讀，一边想作者的用心处，一遍两遍，乃至无数遍地熟讀，久而久之，便心領神会，理解了它的好处，那才会发生真正的兴趣。杜甫竭力称赞他的一个朋友說：“群书万卷常暗誦”，他自己又何尝不如是呢。馬雅可夫斯基对古今大詩人的作品也是成



本成本地背誦的。这样认真地研究語言，才能理解語言，对語言有兴趣。

对文学的語言既然应该发生兴趣，对实际生活中間的、无限丰富的人民的語言，就更应该发生兴趣了。对于生活中間的語言要下深厚的基本功夫，我是主張用笔記錄的。少数一直在生活中打滾，生活經驗极其丰富，记忆力又好的人，他們也許可以不記，但他們还是需要研究語言，要培养对語言的敏感。至于我們呢，便需要記。当着人記也好，后来追記也好。要对人民的語言，生活的語言发生強烈的兴趣，揣摩它，寻味它，看它妙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使人感到它真实，准确，生动，傳神，美，有思想，有味道。这种筆記不是毫无选择的記錄，应该看得出記錄者的目的和修养。（比如，不是要我們記下所有的諺語、歇后語、俏皮話等等。）一个人真要記下一箱子一箱子的人民生活中的語言、人物和故事，而且小本上的每一句話都是用了心思才記下的，反复看过，想过，不是記完了便擱在脑后，埋在箱子里，从此不見面了，那他才逐渐体会語言的妙处，对語言发生兴趣了。

一天我們对于語言“着了魔”，那才算是进了大門，以后才有可能登堂入室，从事語言的創造。由有兴趣学习語言，到能称心如意运用語言，使它成为艺术品，这又是进了一大步，要費更大的苦功夫。作者对語言应如魚之于水，人之于空气，有一

种离不开的感觉才成。离开了語言，作者就仿佛失了魂，喪了魄，这样才是真正的喜愛。革命的語言艺术家視語言如戈如矛，如枪如劍，就更应该喜愛他的武器。

我最近和一位語言艺术的前輩一同旅行，几乎日夜在一处，我看他兴致勃勃，白日作詩，晚間写文，有空便讀新的旧的文章，愛和各种人物长談。他喜欢孩子，甚至在长途汽車上他也对孩子讲說自己即興編的妙不可言的童話。他很忙，他几乎沉浸在終日不停的語言創造里，或者如他平日謙虛地說的“語言练习”里，他興味盎然，沒有一絲疲倦的神色。他一点不使我联想到那些“头悬梁，錐刺股”的人們，然而他一天的劳动是何等惊人，他写出的作品是何等有魅力啊！我又想起七十六岁的盖叫天老先生，他热爱表演艺术，他一开口，一抬手，便是最美、最好的戏的語言和动作，見了朋友，便滔滔不絕，談起林冲、武松这些人物的塑造，仿佛这便是他最好的休息。他开玩笑說，自己是“戏迷”。我看，“迷”真是极好的事情。为什么我們不多出一些“語言迷”呢？

学习語言是要有些方法，有些窍門的。知道了这些，可以事半功倍，可以比較順当地升堂入室；然而很少有人把兴趣当作一个窍門看。学习語言这些年，我才明白，还是要培养自己对語言的兴趣，把假兴趣变成真兴趣，把肤淺的兴趣变成深刻的兴趣，这才是一个极大的窍門。对語言的兴



趣、喜爱，这是源头活水，可以取不尽，用不完。有了它，我们再讲究学习语言的方法，语言便易为己用了。

对怎样一种语言应该有兴趣呢？语言是有美丑、高卑、精粗的区别的。我们要有兴趣研究一切美的、高的、精的语言，要分辨得出那丑的、粗的、卑下的语言。

有这样一种观念：仿佛我们对美的高的精的语言必然一见生情，天生就会喜爱的。以我看，这不尽然。我小时候不能领会屈原、杜甫的诗。长大一些，懂得他们一些词句的意义了，仍然不算喜欢。直到后来，看见人民的丧乱流离，重重苦难，才开始喜欢，但对他们语言的精微还是说不上能领略的。我有一个小时候的朋友，看了一辈子《济公传》，却始终不爱看《红楼梦》和《水浒》。对美的语言不是生来就有兴趣，就有认识能力的。对于美的语言有兴趣，就是对美的语言有理解、欣赏的能力。这是需要用功培养，才能得到的。

一个学习语言的人，总应该锻炼自己对语言的敏锐的感觉。语言在他面前，哪一个字是准确的，美的，哪一个字是不准确的，使他“反胃口”的，他应该感觉得到。他应该这样灵敏，甚至于不用什么理由，凭直感便能断定他的选择就是精确的。一个语言的艺术家用选择每一个字，都有用心，有理由。我们学习语言，就是要寻觅，体会，找到“语”与“意”之间的最精微的关系，探索语言艺术家们以及人民生

活里最美、最好的语言，是如何用最恰当的言辞，表达难以表达的思想 and 感情的。苏东坡说：“求物之妙”，是很难的，使“物之妙”了然于心，千万人中难遇见一个；用口说出来，用笔写下来这“物之妙”，就更难了。更早谈文章的人说，要“意能称物，辞能逮意”。复杂微妙的“意”，常常不能一下子用语言捕捉得到的。因此，一个学习语言的人，要不断磨砺他对语言的敏锐的感觉，才能够使他比较完美地传达心中的“意”，眼中的“物”，才能使他已经了然于心的“意”或“物”，不至于为拙劣或浮华的言辞所累。对语言的敏锐感觉是无止境的，因此要不断磨砺，这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一生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过去那样厌恶“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呢？这不只是因为它的思想感情不能使人接受，那种陈词滥调，虚有其表的感伤辞句，就使人经受不起。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屈原、杜甫、鲁迅和一切伟大文学家的语言的美的，首先要能够对好的，美的，真实的语言看得出，体会得到。常常一个字的妙处，便看得出作者语言的感觉如何。能否看得出那一个字的妙处，也衡量了我们自己语言的感觉如何。有一旧本杜甫集，文多脱落。在《送蔡希鲁都尉》诗中，有一句“身轻一鸟×”，写一个志雄气猛的武将，驰马战斗，说他轻得像一只鸟那样“×”。“×”字脱落，有些文人便揣测，原来是什么字。有



說“疾”(即“身輕一鳥疾”)；有說“落”；有說“起”；有說“下”；却都感觉不怎样恰当。后来，得到一个善本，才知道是“身輕一鳥过”。大家叹服了。“过”字为什么比“疾”、“落”、“起”、“下”都好呢？用“疾”字，露了；用“下”字，拙了；用“起”，用“落”，似乎仅限于鳥的状态，有些“执”了；都病在着痕迹，不自然，不贴切。恰是用了一个“过”字，“身輕一鳥过”，叫人想起碧空晴日，一鳥瞥然掠过，那样地輕灵活潑，道出枪急将勇，馳馬追敌，一閃而去的感觉。这样一句“身輕一鳥过”，才呼应得起下面的一句“枪急万人呼”。只有伟大的詩人才有这样极其敏銳的語言感觉。

这样的敏銳的語言感觉，是詩人多少年来对好的、美的、真实的語言发生了強烈的兴趣、“苦用心”的結果，是必須做到“毫发无遺憾”的“苦吟”的結果。尽管杜甫說他“下笔若有神”，但那还是从苦学、苦思、不断鍛炼中取得的敏銳感觉，才使他有这种称心如意的創作境界。必須要从苦学中寻找引起人創作欲望的乐趣。不是愈苦学，創作之火愈暗了。要对美的、好的、真实的語言有兴趣，这才进了学习語言的大門。进一步，鍛炼、培养自己对好的、美的、真实的語言的敏銳感觉，这才进入了用語言来創作的大門。

說回头，語言是一种从屬的东西，語言总是以“意”为主的，而“意”便是为一个人的思想、感情、階級立場所决定的。古人

說，要有“怀霜之心”、“临云之志”，也就是怀抱高洁心情的人才写得出好文章，便是这个意思。什么人，就写出什么話。要文章写得好，就要求修辞立誠，表里如一。写文章要辞意双美，不能重辞輕情，更不能有辞无情。好的民歌是朴素的、自然的，它应感而来，思若風发，言若泉流，却总是充滿了深厚的思想，不可抑止的感情。伟大的革命詩詞便是这样。苦学苦练才能提高語言艺术，这是真理。但另一个真理是，伟大的語言总是从伟大的心灵中来的。讀下面張錦輝烈士(1915—1930)的就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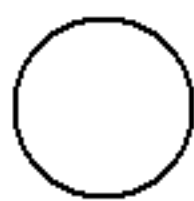
唔(不)怕死来唔怕生，天大事情
妹敢当；

一心革命为穷人，阿妹敢去上刀山。

打起紅旗呼呼响，工农紅軍有力量；
共产党万年走天下，反动派总是不
久长。

穷苦工农并士兵，希望大家要齐心；
打倒軍閥国民党，何愁天下唔太平。

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就义时写的。这里，燃燒着火热的革命时代，火热的革命心胸。明若日月的道理，風雷震怒的精神，短短几句心里話，它激动过去、今天和将来的战士，要我們警惕，催我們向前，战斗、再战斗。这是不朽的声音，不朽的語言。



談談共產黨員的義務和權利

蘇 沛 劉家澤

中國共產黨的一千七百多萬黨員，分布在全國各地和各種崗位上，有許多黨員還擔任了一定的領導工作。他們同人民群眾有着密切的聯繫，和人民群眾一起，擔負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任務。執政黨的地位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向每一個共產黨員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人民群眾對於我們黨的信任，也督促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嚴格地要求自己，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在我們黨的章程中，規定了黨員的義務和權利。黨章關於黨員義務的十項規定，是黨對於我們每一個黨員的基本要求，是每一個黨員對黨應盡的責任。黨章關於黨員權利的七項規定，是提高黨員的積極性，發揮黨員的創造性，活躍黨內的民主生活，保證黨內生活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劉少奇同志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對黨章規定黨員的義務和權利的意義，以及黨員如何履行義務和行使權利，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論述。這裡僅就若干方面來談談我們學習中的體會。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章規定的黨

員義務和權利的根本出發點。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這就是說，為黨工作就是為人民服務。作為人民的勤務員，共產黨員對人民只有忠心耿耿、努力工作的義務，沒有任何特殊的權利。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是黨給予黨員在黨內行使的民主權利。黨員行使這些權利，是為了更好地履行義務，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關於黨員的義務，黨章首先規定，黨員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

共產黨員的覺悟，表現在認識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確信共產主義事業必將勝利，並且用堅強的決心和毅力，奮不顧身地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而鬥爭；表現在能夠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用正確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問題、處理問題；表現在對於黨和人民所委託的工作具有高度的責任心，不怕困難，不辭勞苦，不嫌麻煩，盡力地做好工作。共產黨員的這種覺悟，是怎樣產生和怎樣提高的呢？親身參加革命和建設

^① 《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03頁。



的实践斗争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巨大的熔炉，从这个熔炉中锻炼出来了許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同样是锻炼共产党员的熔炉。如果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斗争，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就只是空谈。但是，只靠实际斗争，也还不能保证觉悟程度的不断提高。从斗争实践中取得的经验，需要提高和系统化，这就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而且无产阶级觉悟程度提高的过程，同时就是不断地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过程；人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才能真正识别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有效地加以克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具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正确的原则。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了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问题；是为了正确地、系统地总结实践斗争中的经验，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再用以指导实践。只有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可能真正懂得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根据和实践根据，因而也才可能坚决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党章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为党员的义务，具有深刻的意义。一个党员越是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就越能做好工作，越能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他的任务。相反，一个党员如果缺乏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在政治上不能辨别大是大非，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不懂得正确的工作方法，就很难设想能够把工作做好。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私人事务，而是对党和人民应尽的一项义务。有的同志认为“学习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不学习也可以工作”，这是错误的。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抱这种态度，就很难期望他在工作中正确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很难期望他在工作中避免盲目性。有的同志强调“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这也是不对的。事实证明，只要工作方法对头，善于安排工作，总是可以挤出时间来学习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党章规定，党员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必须“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地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党章关于党员义务的这几项规定，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员维护党的团



結，巩固党的統一，是自觉地遵守党的紀律的表現。毛澤东同志曾經把党的紀律概括为如下四条：个人服从組織，少数服从多数，下級服从上級，全党服从中央。他說：“誰破坏了这些紀律，誰就破坏了党的統一。”^① 全党服从中央是四条紀律中最核心的一条。我們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正是由于全党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統一行動，使全党成为一个由无产階級的铁的紀律联結起来的統一的战斗組織。所有的黨員都必須在党中央的統一领导下，加强紀律性，維護和巩固党的团結和統一，才能团結广大群众，去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取得建設社会主义的胜利。

党的政策是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結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它集中地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反映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間的关系。当党的领导机关对某一项政策还没有做出决定以前，每个黨員都有权利在党的會議上或者党的报刊上，自由地、切实地参加討論，发表自己的意見；每个黨員也应该以对党对人民負責的精神，积极提供意見，帮助党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当党的领导机关对某一项政策做出决定以后，每个黨員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黨員无权修改党的政策，不允許借口“情况特殊”，不执行党的政策，或者采取和党的政策相抵触的行動。如果对党的政策还有意見，应该一方面坚决执行，一方面按照組織原則，积极向上級反映自己的意見，听候上級解决，不能因为个人对党的

政策有不同的意見就不去执行。

党章規定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党的最根本的組織原則，規定了黨員的義務和权利，規定了党的組織机构和組織制度等。它是党的法規，是党的生活的准則。一切黨員，不論他党齡长短、功劳大小和职位高低，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遵守党章。一切違反党章的行動都是党性不純的表現。严重違反党章的行動，应该受到党的紀律处分。

共產黨員遵守国家法律和遵守党的紀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每一个黨員既要具有严格遵守党的紀律的观念，又要具有恪守国家法律的观念。无产階級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階級专政，必須摧毀反动統治階級的法統，建立起革命的法制，用以巩固革命秩序和革命成果。国家法律体现了无产階級和广大人民的意志，也体现了党的意志。共產黨員維護国家法律，也就是維護革命秩序和保卫革命果实。革命者在反动統治时期，向反动法統进行斗争，是革命精神的表現；在革命胜利以后，遵守国家法律，維護革命法制，同样是革命精神的表現。每一个黨員必須了解，任何黨員，对于国家來說，只是一个公民，只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而沒有任何权利違反国家法律。

共產黨員必須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們行動的共同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6頁。



的规范和准则。共产党员作为国家的公民，自然应该以身作则地遵守这种规范和准则，在人民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列宁说：“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①“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②在这里列宁揭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最本质的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剥削者的自觉斗争和巩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仅要同旧社会的剥削者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要同一切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贪污、盗窃、浪费国家财产、破坏公共财物、损害集体经济利益的行为，不管它是否达到违法的程度，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反映，都是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行为。共产党员有责任不倦地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并且和人民群众一起，造成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舆论力量，来抵制各种损公利己的行为。

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把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在两种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坚决地服从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个党员是否认真履行这一项义务，是判断他的觉悟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无产阶级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③这就是说，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每一个共产党员从入党的第

一天起，就必须认定，他不是自己个人利益的代表者，而是党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他应该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毫无利己之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④

几十年来，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按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要求做的。在革命斗争中，他们不计名利，不图享受，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共产党员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热爱。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十分珍视人民群众的信心和热爱，在革命胜利以后，继续保持这种崇高的品质，谦虚谨慎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如果一个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骄傲自满起来，把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看作是个人的功劳；把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热爱，看作是自己向党 and 人民索取名利的凭借，他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也就

①②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81、282页。

③ 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页。

④ 《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9页。



不可能继续取得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任。

有人认为，在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员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生命去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必要的。在和平建设时期，未必还需要这样做。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曲折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克服巨大的困难；企图不付代价，不作牺牲，就取得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建设的过程中，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仍然可能发生矛盾。共产党员必须在工作中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根据党和国家的需要，自己带头并且说服群众，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共产党员必须识大局，顾大体，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工作中精打细算，节省国家资财，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带动群众。在革命烈火中，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或者离开家庭走上前线，忍受艰苦毫无怨言，人们容易理解，这是一种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的优秀品质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和平的环境中，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考虑如何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如何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埋头苦干，公而忘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和待

遇，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勇于牺牲个人的利益，这同样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

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向人民群众学习，虚心听取并且及时地向党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

为人民群众服务，必须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必须代表他们的利益，使我们的工作符合群众的要求，符合群众的利益。为了正确地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和广大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信任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求教。这样，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把自己的真实意见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党员不信任群众，自以为比群众聪明，不虚心向群众求教，那末，群众也就不会信任他，不愿意向他反映自己的真实意见，他也就不能很好地为群众办事。在为群众办事的时候，必须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凡是应该办、可能办而大多数群众又认为需要办的事情，就应该积极领导群众去办；凡是大多数群众认为不应该办的事情，就不要勉强去办。如果一个党员以自己的觉悟程度去衡量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以为自己所了解的东西，人民群众也都了解了，以为少数先进分子所同意的事情，广大群众也都同意了，在为群众办事的时候，只凭自己主观上的良好愿望，提出过高的要求，操之过急，超过了群众的实际需要和觉悟程度，办了那些还不应该办



的事情，就会脱离群众。相反，如果一个党员的認識水平落后于大多数群众的認識水平，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不能站在群众的前面去领导群众，也会脱离群众。

为人民群众服务，还要担负起教育人民群众的责任。党的政策和决议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見和要求、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要使群众認識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在人民群众中进行艰苦的說服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党的政策必须交给群众，依靠群众自觉地去执行。那种认为“政策只要干部知道就行了”的看法是错误的。党员必须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向群众說清楚，并且結合当地情况，結合群众的思想，耐心地向群众解釋党的政策，使群众完全懂得党的政策。经过党员在群众中的耐心工作，大多数群众都同意了党的政策和决议，党就可以和群众一起行动，使党的政策和决议付诸实现。当群众还不懂得党的政策和决议的时候，在群众中可能有某些不同意的意見，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党员应该首先检查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及时对群众加强思想工作，不能因为群众还不懂得党的政策而得出群众落后的結論，更不能因此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党的政策和决议在大多数群众同意下付诸实现，并不等于說，可以不重视少数群众的意見，可以放松对少数群众的教育工作。如果一个党员对少数群众的意見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企图以多数群众的意見去压服少数群众的意見，这既不利于說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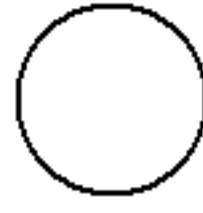
少数群众，使他們觉悟过来，和多数群众一起行动，也不利于多数群众扩大他們的队伍，办好自己的事业。

从群众中来，正确地反映群众的意見和要求，到群众中去，正确地向群众解釋党的政策和决议，是共产党员不可推諉的双重责任，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在工作中起模范作用，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

建設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偉大的艰巨的任务。在这个任务面前，每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具有百折不撓的雄心壮志，敢于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而且必须切实地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任务。只有建設社会主义的愿望，而缺乏必要的本领，就不能够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有切实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做好各自崗位上的业务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有所贡献。各种专业都是实现党的偉大的政治目标的有力武器。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在农村中工作，就应该努力钻研党的有关政策，学习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就应该通过科学实践和生产实践，努力为国家經濟建設和国防建設解决问题；如果是教育工作者，就应该通过教学实践，努力为国家培养出优秀人材。我們党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各种业务机关专门負責



思想政治工作，他們就必須努力通曉思想政治工作的規律，並且努力學習和自己工作有關的專業知識，更好地保證業務工作的開展。總之，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懂得專業工作的重要作用，重視專業工作，勤勤懇懇地、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本崗位的專業工作，以最好的專業工作的成果，發揮最大的政治作用。

共產黨員在工作中起模範作用，不斷地提高生產技術和業務能力，還應該表現在具有虛心學習的態度和刻苦鑽研的精神，老老實實地向一切有專長的人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必須看到，黨外有許多人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共產黨員虛心地向他們學習，和他們密切合作，團結共事，既有利於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也有利於發揮黨外人士的積極性，共同做好工作。

當然，強調一個黨員必須努力提高生產技術和業務能力，並不等於說他就可以忽視政治修養了。在政治上加強鍛煉，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經常要注意的。一個無產階級戰士，任何時候都不會對自己放鬆思想改造。

黨章規定，“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揭露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糾正；向黨的領導機關直到黨的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同黨內外一切危害黨和人民的利益的現象進行鬥爭”，是每一個黨員都必須履行的義務。

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再無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能夠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能夠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掃除沾染在黨的肌體上的塵埃。毛澤東同志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① 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根據毛澤東同志這個指示，在真理和錯誤之間，堅持鮮明的是非標準，以符合於人民利益的為是，以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為非。自己有了缺點和錯誤，堅決改正。一個黨員在自己的活動中，如果是非標準不明，就不可能發現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一個黨員如果為了個人得失，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就會給黨的事業造成損失。黨員自己不能堅持真理，就不可能幫助別人修正錯誤。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必須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克服一切個人主義思想。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在真理和個人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往往會為了個人利益，拋棄真理。只有那些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真正大公無私的人，才可能具有最大的勇敢，為真理而鬥爭。

共產黨員要善於實事求是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毛澤東同志說：“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② 這就是共產黨人進行批

①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6頁。

②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95頁。



評和自我批評的实事求是的態度。在開展批評時，對待同志的缺點和錯誤，必須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恰如其分地提出批評，不能把思想錯誤說成是政治錯誤，把非原則性的錯誤說成是原則性的錯誤，把偶然的個別的錯誤說成是一貫的系統的錯誤。在黨內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主要是解決是非問題。批評不恰如其分，就不能分清是非，使問題得到真正的解決。同時，有些問題並不是一眼可以看得清楚的。如果在開展批評時採取簡單粗暴的態度，不容許被批評者聲辯和解釋，或者沒有進行認真的、反復的討論，就輕率地作出結論，都不可能達到分清是非、團結同志的目的。

黨章規定，每一個黨員必須“對黨忠誠老實，不隱瞞和歪曲事實真相”。黨的正確領導決定於正確地反映客觀情況，正確地分析客觀情況。共產黨員對黨忠誠老實，如實地反映工作中的真實情況，能夠幫助黨作出正確的決定，同時也有利於幫助黨及時發現和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內外的敵人並沒有睡覺，他們時時刻刻都在企圖破壞我們的建設事業。窮凶極惡的美帝國主義還霸占着我國領土台灣，不斷侵犯我國的領海、領空。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縱容下，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匪幫正在陰謀侵犯我國大陸沿海地區，妄想恢復反革命統治。每一個黨員必須履行黨章關於黨員義務的規定：“時刻警惕敵人的陰謀活動，保守黨和國家

的機密。”

黨在要求黨員履行義務的同時，還規定了黨員有如下七項權利：“在黨的會議上或者在黨的報刊上參加關於黨的政策的理論和實際問題的自由的、切實的討論”，“對於黨的工作提出建議；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創造性”，“黨內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工作人員”，“在黨組織對自己作出處分或者鑑定性的決議的時候，要求親自參加”，“對於黨的決議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無條件地執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向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到中央委員會提出聲明、申訴和控訴。”

黨章關於黨員權利的規定，反映了我們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特點。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最根本的組織原則。黨的戰鬥力是以全體黨員在黨的集中領導下的思想一致和行動一致為基礎的。黨給予黨員民主權利，正是為了提高黨員的自覺性和主動精神，從思想上鞏固黨的行動的統一。嚴格的集中同廣泛的民主相結合，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的最大優點。黨按照民主集中制所給予黨員的民主權利，正確地反映了在黨的生活中，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黨員正確地行使這些民主權利，就能活躍黨的生活，使黨的組織經常處于一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生活中。



党员在党内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党的政策，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是实行党内广泛的民主的关键所在。在党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员对党的政策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有利于从各个方面提供意见，从各个角度反映情况，集思广益，使党组织正确地、全面地判断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决议；有利于使党员提高思想认识，取得意见一致，行动一致。党内的一致意见，是在不同意见充分开展讨论的基础上取得的。真理只有一个，但是只有通过认真的讨论，才能使人们对真理的认识逐渐明朗起来。在讨论中有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有错误的意见。错误的意见可以通过集体讨论和党员认识的提高而得到改正。党员只要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发表意见，他的发言权就应该受到尊重。任何党的组织和党员都不能对发表错误意见的党员采取歧视的态度，更不能认为他违反了党的纪律。对真理的认识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在一般的情况下，多数党员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有的时候，少数党员或者某一个党员的意见同多数党员的意见不一致，并不能证明真理就在多数这一边。因此，尊重少数人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这对于党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可以有某种益处。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真理最后被证明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①

按照党章规定，党员在遵守组织原则的

前提下，有权对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必要条件。党员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是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领导人做出榜样是十分重要的。领导人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且积极地支持和接受自下而上的批评，就能使党员群众敢于开展批评，充分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对待党员群众，采取“言者无罪”的态度，才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

按照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这样，党员如果对党组织的决议持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提出了批评意见，得不到合理处理时，就能够得到充分申诉的机会。各级党组织对党员的这种申诉当然要给予应有的重视，作出慎重的处理。党章的这项规定，对党员行使自己的权利，给予了有力的保障。任何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人，都应该把党员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看作是党内民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不能认为党员的这些行为是对党的组织或党的领导人的不尊重。

党员能否正确地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重要的关键还在于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是

^①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66页。



否能够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工作，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章办事，向一切违反党章的现象作斗争。

一切党的组织，都应该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使党员能够充分地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党的组织如果限制党员行使应有的权利，就会妨碍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对党的事业是不利的，是违反党章的错误行为，是党所不允许的。尊重党员的权利，也就是尊重党章。各级党组织必须积极地、为党员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创造良好条件。如果对党员行使权利采取漠不关心或者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错误的。各级党组织应该经常注意克服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的因素，提高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积极性；应该经常对党员进行教育，启发他们正确地、积极地行使权利。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①

党组织的领导人在党内的民主生活中起模范作用，对活跃党内民主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领导人的思想和工作如何，对党员是否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党组织的领导人不仅要和其他党员一样，行使党员的权利，而且要尊重每一个党员的权利，努力保证每一个党员积极地、顺利地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任何党员都不能不尊重其他党员的权利，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其他党员，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违反党

的纪律，侵害党员的权利。如果某个党组织的领导人这样做，就会损害这个党组织的民主生活，损害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就会涣散党的组织，削弱党的战斗力，这显然是错误的。

党员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是对党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是对党的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标志。政治上的权利不同于物质上的享受，党员绝不能放弃党所给予的权利。如果党员对党所给予的权利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的表现。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这种对革命事业采取漠不关心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人，是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②因此，党员必须充分地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从政治上关心党的事业。如果有人压制民主，侵犯党员的权利，就应该起来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控诉。

党员义务的实质，就是要求广大党员以最大的毅力、最高的智慧，为实现党的纲领而斗争。党员就是为了履行义务而参加党的，不履行义务就不成其为党员，不很好地履行义务，就不是一个好的党员。一个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自觉地、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7页。

^② 参阅《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8页。



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我们党是一个有着远大目标的党，党的纲领表明，它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且要领导全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向困难作斗争的过程。列宁说过：“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慌张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①“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末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树林里去。”^②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决不能怕任务困难、环境复杂而不努力工作。恰恰相反，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我们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去克服困难，认真地履行党员的义务。

党员权利的实质，就是在集中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在党内生活中，集中和民主是一致的。高度集中，是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概括和提高广大党员的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实现的，它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结果。一个党组织如果不能保障党员行使权利，就不能保障这个党组织有健全的民主生活，而没有民主，也就没有集中，这个党组织就会由于处于涣散状态而失去战斗力。党在组织原则上的高度集中和领导人的独断专行有原则上的区别。高度集中是以高度民主为基础的，是实行广泛民主的结果，而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却只会窒息党内民主。在党内生活中，纪律和民主也是一致的。党内缺乏铁的纪律，固然会瓦解党的战斗力；党内缺乏民主，不能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也会影响党组织发挥战斗作用。党的纪律表现在党员的行动一致。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有自觉的行动起来。发扬民主，是加强党的纪律的前提。削弱党内民主，其结果必然会削弱党的纪律，降低党的战斗力。党的正确领导，有赖于党员行使党章给予的权利，发挥集体智慧；党具有永不枯竭的活力，也有赖于党员行使权利，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党员，应该自觉地、认真地、毫不含糊地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在一切党组织中，党员行使党章所规定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

党员履行义务，是党员对党应尽的神圣职责，而党员的权利则给予了每一个党员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可能，使他们更好地履行义务。每一个党员必须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必须维护党的利益，必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因此，忽略了党员义务和权利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党的事业。把两者统一起来，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认真地履行党员的义务，勇于在政治上对党担责任，正确地行使党员的权利，这样才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①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5—476页。

^②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0页。



現代資產階級的邏輯實証主義哲學

任 華

邏輯實証主義是現代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它直接繼承了以孔德(1798—1857)、穆勒(1806—1873)等人為代表的實証主義哲學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廣泛流行的馬赫主義哲學。整個這條實証主義的路綫，實際上是由貝克萊和休謨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哲學開始的，因此，邏輯實証主義也叫作邏輯經驗主義。

實証主義實質上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但是它並不公開暴露自己的本來面目，而是在尊重經驗和科學的幌子下，偽裝成凌駕于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上的哲學。實証主義的特點，就在於標榜一種超階級的中間路綫，要求用“實証的”或“科學的”精神來解決一切問題，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說成是違背“科學”精神的“形而上學”而加以反對，實際上是維護唯心主義的路綫而反對唯物主義的路綫。

實証主義哲學在帝國

主義時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帝國主義時代的實証主義，首先表現為馬赫主義即經驗批判主義，也表現為差不多同時出現於英美等國的實用主義和新實在論。在這裡，特別應當提一下新實在論。這個學派在歪曲利用現代物理學的同時，也利用隨着現代數學發展起來的數理邏輯，來偷運柏拉圖的客觀唯心主義和貝克萊、休謨的主觀唯心主義。他們主張用所謂“邏輯分析法”來研究哲學，宣稱“邏輯就是哲學的本質”，進而把哲學問題說成是邏輯問題。於是出現了以摩爾(G. E. Moore)和羅素等人為代表的所謂“劍橋分析哲學”潮流。這種思想對於邏輯實証主義的形成起了促進的作用，因此，羅素等人被認為是邏輯實証主義的重要先驅之一。

就其嚴格意義來說，邏輯實証主義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它的開始是二十年代在以奧國維也納為中心的西歐大陸上形成發展起來的維也納學派。其代表人物是石里克、卡爾納普、弗蘭克、奈拉特以及維特根什坦等。他們在為科學提供“穩固的基礎”、取消“形而上學”的口號下，企圖用邏輯分析方法來發揚從貝克萊到馬赫的這一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傳統，給它改頭換面，把它的真相更加隱蔽起來，卻自命是哲學上的“革命”。三十年代希特勒上台以後，維也納學派由於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傾向，和法西斯主義發生了一定的矛盾，因此逐漸從歐洲大陸轉移到以保衛資產階級民主自命的英美兩國，主要是轉移到開始成為世界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的美國。他們的邏輯實証主義思想，很



自然地在这两个国家原有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論和分析哲学等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結合起来。因而很快地在英美两个国家生根发芽，并且日益扩大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影响，成为最近三十年来支配这两个国家和其他許多资本主义国家哲学界的一个主要流派。

邏輯实证主义出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完全不是偶然的事情。大家知道，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成为现实，并且逐渐扩大其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已經进入了总危机并且不断在发展，使帝国主义进一步走向死亡的道路。面临着这种情况，反动的资产阶级更要加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馬克思主义。他們所采取的一种办法，就是企图否认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更加尖銳化，宣傳所謂中間階級的成长及其所起的日益巨大的作用。邏輯实证主义者正好反映了这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傾向，他們企图掩盖自己的阶级本性，以一种超阶级的姿态出現，在一种新的形式下繼續宣揚实证主义的“中間路綫”的哲学。

同时，这个时期也是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时期。这种情况，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哲学家不采取公开的方式而用隱蔽的方式来宣傳唯心主义。自命为忠实于科学的邏輯实证主义者，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傾向。他們歪曲利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相对論和量子力学，来給实证主义作进一步的論证，特别是他們看中了这个时期已經系統化了的数理邏輯，企图利用它来改造实

证主义，使之取得一种新的形式。

* * *

从上面所讲的，可以看出，邏輯实证主义者不同于旧实证主义者的主要之点，就在于他們是在“邏輯分析”的幌子下宣傳实证主义，反对所謂“形而上学”。实际上，这正是他們宣傳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新方法。邏輯实证主义者以尊重經驗科学为口实，赋予旧实证主义的經驗主义原則以更多的科学外观，从而提出他們的所謂“证实理論”和“证实原則”，宣称“一个命題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表面上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是要求把一切知識放在科学证实的基础上，好像是很科学的，其实不然。因为邏輯实证主义者是把“证实原則”作为决定一个命題是否有意义的最后标准而提出来的，并且根据它来反对“形而上学”。根据这条原則，他們认为，只有局限于感觉經驗范围内的認識，才能够得到证实，才能够有意义。凡是超出感觉經驗范围的認識，都不能得到证实，都是沒有意义的。他們认为，一切肯定經驗以外的实在的命題都是“形而上学”。卡尔納普說：“我将把所有那些要求表达关于某种在一切經驗之上或之外的东西的命題称为形而上学命題”^①。根据他所举的例子，这种命題包括肯定一切本质上都是物质的唯物主义命題和肯定一切都是精神的唯心主义命題，他要求根据“证实原則”来考察这种命題，从而宣布“很容易看到这种命題是不能

^① 《哲学与邏輯語法》，1935年英文版，第15頁。



证实的”^①。因此，“所有这些哲学主张（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主张——引者注）都是沒有經驗內容的，沒有理論上的意义，它們都是假論題”^②。

不难看出，邏輯实证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同旧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实际上是一样的。他們的“证实原則”并不是什么真正科学的原則，而仍旧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原則。根据这条原則，他們把經驗科学看成是人的感觉經驗的描述，把認識对象归結为这种經驗本身。如果我們肯定有独立于感觉經驗而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并且肯定人們可以通过經驗而認識这个世界，照他們看来，这就是超出了經驗的范围，因此，是不能够得到证实的，是沒有意义的。可見邏輯实证主义者表面上虽然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指斥为“形而上学”，实际上他們所反对的“形而上学”主要就是唯物主义。

如果說邏輯实证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和旧实证主义者有所不同，这就在于他們是在“邏輯分析”的掩飾下提出这种观点的。旧实证主义者着重从人的心理和認識能力的局限性立論，直截了当地肯定人的認識不能越出感觉經驗的范围。在他們看来，一切越出这个范围的企图都是錯誤的。邏輯实证主义者則从“邏輯分析”的观点出发，把他們的“证实原則”說成是決定我們說話有沒有意义的邏輯原則，从而肯定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題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根本沒有意义的。卡尔納普說：“邏輯分析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給一个給定的命題找出它的证实方法”^③。这样把

“证实原則”納入邏輯分析之后，他企图把邏輯实证主义者反对“形而上学”的立場同旧实证主义区别开来。他說：“有时維也納小組的观点曾經被誤认为是否认物理世界的实在性，但是我們沒有作这种否定。的确，我們否定关于物理世界的实在性的論点，但是我們不是把它作为錯誤的而是把它作为沒有意义的予以否定。它的唯心主义命題也恰恰遭到同样的否定。我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些論点，我們否定整个問題。”^④用不着多說，邏輯实证主义和旧实证主义的这种不同，并不是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是一种手法上的差别。邏輯实证主义者比旧实证主义者更狡猾，他們玩弄邏輯分析的把戏，企图进一步把他們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和反对唯物主义的真正意图掩盖起来。

邏輯实证主义者用他們在“邏輯分析”的名义下提出来的“证实原則”反对了“形而上学”之后，进而企图利用“邏輯分析”来調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逃避哲学上的根本問題。在这里更可以看到，他們用来偷运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和旧实证主义者很不相同，因而也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到了邏輯实证主义的特点。

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經出現过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数学和邏輯的知識是一种先驗的知識。邏輯实证主义者利用現代数学和数理邏輯的高度抽象性和精确性，把这种

①②③④ 《哲学与邏輯語法》，第16、21、10、21頁。



对于数学和邏輯的唯心主义观点繼續加以发展。他們企图把数学和邏輯跟客观世界完全割裂开来，从而制造了两种命題的对立：一方面是数学和邏輯的命題，他們认为，这种命題对于事实完全无所肯定，也就是說并不反映任何客观事物的性质，它們只是一种分析命題或者同語反复命題，因此是先驗的，必然的；另一方面是經驗命題或事实命題，他們认为，这种命題对于事实有所肯定，因此是綜合的，没有什么必然性，只有不同程度的或然性。

在割裂这两种命題的基础上，邏輯实证主义者把哲学和科学也割裂开来。他們說，科学命題是經驗命題，因此沒有必然性，只能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或然性的假設；于是科学就不是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規律性和必然性的了，变成了只是对感觉經驗过程的描述和預測。邏輯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研究看成与事实无关的邏輯分析活动，于是哲学的任务也就不是反映自然、社会及思維的最一般的运动規律，而只在于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重要概念和科学的概念进行邏輯的分析。对于哲学的这种看法，英国的所謂分析哲学家已經在邏輯实证主义者之前提出来了。他們认为，哲学不能和科学一样要求发现事实的真理，只能就已有的事实命題和科学命題进行邏輯的分析，以便彻底弄清楚它們的意义。但是英国分析哲学家的这种看法，照邏輯实证主义者看来，还不够彻底，还没有把邏輯的分析同事实的研究完全划清界限。为了作到这一点，他們要求把邏輯分析明确規定为一种

完全不涉及命題内容的純粹形式的、語言的分析。于是和邏輯分析等同起来的哲学也就随之而变成一种語言的分析了。所以，維特根什坦宣称，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我們的語言的邏輯。卡尔納普則进一步明确規定，哲学就是“語言的邏輯語法”。他說：“我們要用科学的邏輯来代替哲学。——这就是說，要用对科学概念和語句的邏輯分析来代替哲学，因为科学的邏輯不是别的而就是科学語言的邏輯語法”^①。

这样把哲学归結为一种語言的分析，邏輯实证主义者就从这里找到了反对“形而上学”和逃避哲学根本問題的一种新方法。他們在根据“证实原則”断定“形而上学”問題是沒有意义的“假問題”的同时，宣称一切哲学上的爭論，首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爭論，实际上都不是关于事实的爭論，而只是語言上的爭論，因此这种爭論并不带有根本对立的性质，而是完全可以調和的。

我們可以用卡尔納普提出来的“两种說話方式”的理論为例來說明这一点。卡尔納普认为，应当区别两种不同的說話方式，即所謂“形式的說話方式”和“实质的說話方式”。根据这种理論，科学的命題对事实有所肯定，必須用“实质的說話方式”来表达。但是哲学的命題并不涉及事实，因此不能用“实质的說話方式”来表达，而应当用“形式的說話方式”来表达。傳統的哲学之所以长期陷于“形而上学”的爭論，就是因为本来只应

^① 《語言的邏輯語法》，1937年英文版序，第13頁。



当用“形式的說話方式”表达的哲学命题被哲学家用“实质的說話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引起了无穷的爭論。卡尔納普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爭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照他看来，如果把两方面的看法都翻譯成它們本来的語法形式，那就可以看到双方并不存在着什么事实上的分歧。他說：“假定一个实证主义者（即唯心主义者——引者注）主張这个論点：‘一事物是一种感觉材料的复合’，而一个实在論者（即唯物主义者——引者注）主張：‘一事物是一种原子的复合’。于是关于事物究竟实际是什么这样一个假問題就将引起无穷的爭論。如果我們把它們翻譯成形式的說話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論点是可能調和的。……实证主义和实在論之間的冲突是一种对于假論点的无謂爭論，它的根源完全是由于用了实质的說話方式”①。

英国的邏輯实证主义者艾耶尔也根据类似的观点，来处理現代英国哲学家所喜欢討論的知觉問題。他认为，关于知觉的各种不同的理論，从事实上来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們之間的分歧，只是由于語言选择上的不同。艾耶尔以对于一块銀币的知觉为例，來說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爭論就是这种性质的爭論。例如，唯物主义者认为銀币有其不以人的感觉为轉移的客观实际形状，唯心主义者则认为它沒有独立于人的感觉的客观实际形状，它的形状是随着人的感觉而改变的。艾耶尔表示，如果把这两种不同的观点看成是事实上的問題，唯物主义者是无法否定唯

心主义者的观点的。因为就事实來說，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間并没有爭論。他說：“我們（指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引者注）的不一致究竟何在呢？这就在于他（指唯心主义者——引者注）拒絕用我們描写这些現象的方式去描写这些現象这一事实。我們（指唯物主义者——引者注）說銀币的真正形状是不变的，而他則宁願說它的形状是在經歷着某种周期的变化过程。……但是这些說法所指的事实在两种情形下都是一样的。換言之，我們不是在爭論两套互相冲突的假設哪一个正确，而是在爭論两种語言的选择”②。

从这种观点出发，艾耶尔公然否认哲学上的党派性原則。他說：“在哲学的本质中沒有东西可以保证有互相对抗着的哲学党派或‘学派’存在。……因此，关心哲学底情况的我們，再也不能默許哲学家們之間有党派分歧存在。”③

从上面卡尔納普和艾耶尔的例子，可以大致看出，邏輯实证主义者怎样把邏輯分析說成是語言的分析，把哲学的爭論說成是語言上的爭論，从而企图抹煞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他們的这种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不可否认，随着現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日益精密化，数学的語言和邏輯的分析在科学研究中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它們所以能够起这种作用，是因为它們

① 《語言的邏輯語法》，轉引自康福斯：《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65頁。

② 《經驗知識基础》，1940年英文版，第18頁。

③ 《語言、真理及邏輯》，轉引自康福斯：《保卫哲学》，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9頁。



更抽象地更深刻地反映了客观实际，从而能够成为处理复杂細微的物质世界現象和解决与此有关的实际問題的有力工具。作为现代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哲学，正应当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数学和邏輯的分析，給它們以恰如其分的估价。但是，邏輯实证主义者却不是这样，他們歪曲利用现代数学和邏輯分析的成果，把它們的作用片面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以至把它們完全同客观世界割裂开来，变成一个同外界絕緣的独立王国。这样，邏輯分析就被他們說成是一种可以完全不顾事实的純粹語言分析，这显然是对邏輯分析的一种歪曲。邏輯实证主义者之所以不顾一切坚持这种观点，归根到底，无非是企图掩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斗争的阶级实质及其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对立，但这是絕對作不到的事情。哲学上的根本問題是迴避不了的。邏輯实证主义者的語言分析哲学，实际上也不是什么超然的純粹語言分析，而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点可以从艾耶尔的例子清楚地看到。他之所以认为在对于銀币的形状的看法上唯物主义者不能駁倒唯心主义者，是因为他认为两者所面对的乃是同样的事实。但果真是这样嗎？显然不是这样。认为銀币的形状就是感觉形状，和认为它的形状是独立于感觉而存在的，感觉形状只不过是其反映，显然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实。艾耶尔恰恰是要抹煞这一点，硬把两件事實說成是一件事實，其結果就是只承认感觉是事实，感觉以外的东西不是事实。这不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嗎？自己已經站在主观唯心主义

的立場上，再要来反駁主观唯心主义，那当然是駁不倒的了。

* * *

邏輯实证主义傳入美国以后，在美国的实用主义影响之下，有了某些改变和发展。这种发展的表現是五花八門的。它和实用主义的直接結合产生了以路易斯 (C. I. Lewis) 为代表的“概念实用主义”。这种哲学可以說 是利用邏輯实证主义的邏輯分析观点来改进实用主义的一种企图。此外，某些服膺邏輯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家如布里治曼 (Bridgman)、弗兰克 (P. Frank) 及倫日恩 (V. Lenzen) 等，把邏輯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結合起来，提出所謂“操作論” (Operationalism)。他們断言，自然科学上的基本概念不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而是代表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現象时所进行的一系列观察实验的操作活动，从而对自然科学作出了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解釋。

邏輯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合流的一种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所謂“語义哲学”的形成。当然，“語义哲学”的产生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实用主义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莫里斯 (C. W. Morris) 企图用实用主义来补充邏輯实证主义，提出所謂“符号学”，并且主張把語义学作为它的一个組成部分。卡尔納普接受了这种主張，把邏輯实证主义从所謂“語法学”的研究推广到所謂“語义学”的研究，从而把“語义哲学”发展起来。“語义哲学”要求不再把哲学局限于語言的邏輯語法，而认为哲学也应当涉及語



言及其“所指”的关系問題，也就是語言的意義問題。但是这样作的結果，不过是使邏輯实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旧实证主义的老路上去，因而更加暴露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卡尔納普所提出来的“統一科学”和“物理主义”的理論可以說明这一点。简单說来，这种理論主張用所謂“物理的語言”来达到把各門科学統一起来的目的，其本身已經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我們在这里特別需要指出來的是：卡尔納普所謂“物理語言”的基础乃是他所謂的“观察語句”或“記錄語句”，而这种語句实际上是物理学家的感觉經驗与观测活动的記錄和描述。因此，他的“統一科学”和“物理主义”理論，归根到底还是实证主义者把認識限制于感觉經驗，把客观物质世界归结为这种經驗的老一套。如果說“語义哲学”要讲語言符号的“所指”，其“所指”正就是这种經驗。如果說，它还没有完全回复到旧的实证主义，那仍然是因为它蒙上了一层語言分析的烟幕，充滿了貌似高深的語言符号运算罢了。

卡尔納普的这种“語义哲学”，和差不多同时在美国流行的所謂“通俗語义学”是孿生的兄弟，可以說都是邏輯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合流的結果。以切斯 (chase)、哈雅卡瓦 (Hayakawa) 及弗格特 (Vogt) 等人为代表的“通俗語义学”，直接使“語义哲学”为帝国主义服务。他們根据“語义哲学”的原则，认为实在就是感觉，人們所使用的名詞或概念的“所指”也只能是感觉。因此，他們断定“社会主义”、“資本主义”、“階級”和“階級斗争”

等等概念，都只是空洞的名詞，不反映任何客观实际情况。于是他們得出結論說，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和无产階級革命的学說是没有根据的，是濫用語言的結果。他們宣称，当前社会政治上的根本問題，归根到底是由于語言上的混乱引起的。在他們看来，如果我們認識到語言对于人的情感的支配作用，努力澄清这种語言上的混乱現象，把“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空洞的但是容易激动人的情感的名詞从詞汇上划掉，似乎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 * *

邏輯实证主义者把哲学变成語言的分析，形成一种新的煩瑣哲学的恶劣風气，使哲学日益走上脱离实际的道路，充分表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資產階級哲学的腐朽墮落的性质。这种情况，在与邏輯实证主义結合以后的英国“分析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近三十年来，标志着英国資產階級哲学发展主流的“分析哲学”，不但愈加陷于煩瑣空洞的語言分析活动，而且簡直把长时期以来哲学上的爭論問題整个說成是一連串的語言混乱，把哲学的作用降低到治疗这种語言病症的医疗术的地位，使哲学走上了絕路。最近十多年来，在英国哲学界声望很高的分析哲学家莱尔 (G. Ryle) 就明白宣称，一切哲学問題都是語言混乱的結果。因此，今后哲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語言成語中不断出現的錯誤构造与荒謬理論的来源”。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風行一时的《心的概念》一书中，莱尔把傳統哲学中对“心灵”的看法以及



与此相联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都說成是一种“范畴的錯誤”，而这种錯誤是“由于不能使用英文詞汇中某些詞目而产生的”^①。維特根什坦在其死后出版的《哲学研究》一书中，把他自己早期的邏輯实证主义观点也否定了，公然宣称：“当我们研究哲学的时候，我們就像野蛮人，原始人一样，听到文明人的話，給这些話加上錯誤的解釋，然后由之得出最奇怪的結論”^②。他认为，語言的形式和作用这样复杂，使我們陷于混乱，找不到出路。因此他說：“我不知道我該往哪里走？”^③而研究哲学的目的仿佛“就在于給蒼蠅指点飞出蒼蠅罐的道路”^④。这就等于給邏輯实证主义敲了丧钟，宣布它已到了穷途末路和瀕于死亡了。

* * *

邏輯实证主义者的煩瑣的“語言分析”哲学，有它的社会阶级基础，它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企图逃避现实和麻痹人民的阶级意識的一面。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腐朽的资产阶级还有它的倒行逆施和垂死掙扎的一面，而这一面在邏輯实证主义者当中也不可能是毫无反映的。有一种看法，以为邏輯实证主义者是一批完全脱离实际的哲学家，把自己关在抽象的概念分析的象牙之塔內，不关心社会政治問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想法，頂多也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現象。邏輯实证主义者不可能沒有他們的社会政治观点，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他們的这种观点是隱蔽的，沒有明白地表述出来，但是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他們就不能够再保持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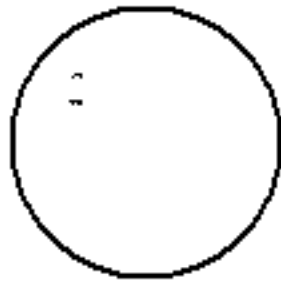
默，而把他們的这种观点全盘托出了。

邏輯实证主义的一个著名代表波普耳(K. Popper)，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受到普遍贊揚的《敞开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充分地說明了这一点。波普耳在这本书里，恶毒地把社会主义社会誣蔑为“封闭的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贊揚为“敞开的社会”。他把馬克思主义說成是柏拉图和黑格尔的集权主义思想的繼續，进而系統地攻击馬克思主义。他从邏輯实证主义的观点出发，采取所謂“方法論的唯名論”和“事实与决定的批判二元論”，作为他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則。波普耳把所謂“方法論的唯名論”和所謂“方法論的本质論”对立起来，宣称后者认为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性质”^⑤，这是一种柏拉图主义，一种經院哲学。“方法論的唯名論”則是“現在自然科学中所一般接受的”，“它不以发现事物实在是什么为目的”，“而认为科学的目的只在于描述我們經驗的事物和事变”^⑥。可見，他所謂“方法論的唯名論”，实际上就是实证主义者所主張的科学只是描述感觉現象，而不过問事物的本质的主观唯心主义。波普耳所謂“事实与决定的批判二元論”，則是邏輯实证主义者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社会学及倫理学的表現。根据这种观点，他要求把自然規律和所謂“规范規律”严格区别开来，

① 《心的概念》，1949年英文版，第17頁。

②③④ 《哲学研究》，1953年英文版，第194、123、309条。

⑤⑥ 《敞开的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1952年英文版第2版，第31、32頁。



后者只是一种人为的“約定”，“并不描述事实”，因此只能有好坏、对錯、可以接受或不能接受之分，不能有真假之別^①。在这两种观点指导下，波普耳企图反对历史主义，反对社会历史的規律性。他說：“历史主义者不承认是我們选择安排历史事实，而相信历史本身或人类的历史以其固有的規律决定我們自己，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未来，甚至我們的观点”^②，他认为这是完全沒有根据的。他直截了当地宣布：“不可能有‘如实发生的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釋”^③，“不可能有历史的規律”^④，“历史沒有意义”。不过，他說，“虽然历史沒有意义，我們可以給它一种意义”^⑤。他还說，“事实本身沒有意义，它們只能通过我們的决定得到意义”^⑥。

波普耳根据邏輯实证主义观点进而攻击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說，宣揚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改良主义思想。他把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說說成是一种“空想的社会工程”。照他看来，既然根本沒有社会历史的規律，这种学說也就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空想。他认为这就是“历史主义的貧乏”的表现。

波普耳宣称，他要大力反对馬克思主义的这种“空想的社会工程”，坚持所謂“一点一滴的工程”。为什么他要反对这种“空想的社会工程”呢？因为照他看来，这种社会工程“主張把社会整个加以改造”，“要求为整个社会合理地作出計劃”^⑦，制定藍图，特别是因为馬克思主义者相信，资产阶级与无

产阶级的斗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他认为，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我們的經驗是有限的”，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更是他所深恶痛絕的。他說：“我願意讲得十分明确，就是这种对于一次可能的暴力革命的預言，我认为，从实际政治的观点来看，乃是馬克思主义中最有害的因素”^⑧。

那么，波普耳所推荐的“一点一滴的工程”又是什么呢？照他看来，这就是一种改进社会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的政治家在他的眼前可以有也可以沒有一幅社会的藍图，他可以希望也可以不希望人类将有一天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在地球上获致幸福与完善”^⑨。他可以用“发展技术来直接改进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提出一种方法来进行一点一滴的工程，进行民主的干涉”^⑩，使“无限制的资本主义让位于經济的干涉主义”^⑪。总而言之，照波普耳看来，就是不应当用革命的办法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民免于剝削和压迫，只应当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来对它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这就是他所津津乐道的“一点一滴的工程”的基本思想。这里并没有什么新鮮的东西，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

①⑦⑧ 《敞开的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58、161、158頁。

②③④⑤⑥⑨⑩⑪ 《敞开的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269、268、264、278、278—279、151、143、125頁。



家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又一次辩护罢了。

* * *

逻辑实证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它的一些中上层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家中，影响是比较广泛的。这首先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代，这种哲学的超阶级的外貌，对于这些人具有一种迷惑的作用。同时，也由于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这种哲学集中地歪曲利用了最新的科学成果，标榜感觉经验和科学证实的重要，自

命讲求推理的严格性和精确性，取得了一种科学的外观，因此它对于这些人就具有一种吸引力。正是由于这些缘故，所以这种哲学在旧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也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显然，和其他一些在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露骨的反科学、反理性的哲学流派比较起来，这种哲学的欺骗性是比较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全面深入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诡辩论

——读书札记

· 邵 铁 真 ·

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地方揭露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敌人所惯用的诡辩手法，划清了辩证法和诡辩论的界限。学习列宁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对于锻炼我们的思想批判能力十分有益。这里简略地记下几点。

什么叫诡辩？列宁曾简单明了地揭示了诡辩的特征，说诡辩的方法往往是“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①就是说，诡辩是抽掉了事物的本质的东西，而只抓住了事物的外表相似的东西，并以后者来否定前者。

玩弄诡辩术的人，从表面看来，似乎能

言善辩，道理很多，实际上只是主观主义地玩弄一些概念，做些歪曲的论证，为荒谬的理论和行为作辩护。诡辩论者看来好像应用了概念的灵活性，其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是主观地、任意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统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

^① 《俄国的林特古姆派》。《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9页。



正确反映。”^① 诡辩论者不是客观地应用了概念的灵活性，相反地是对概念的应用“灵活”到荒谬的程度，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而成为主观上任意变幻的“思想魔术”。

诡辩论者为了达到诡辩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来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那里找到很多事例。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中，曾揭露了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本质和种种诡辩手法，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偷换概念，混淆界限，这是修正主义者最经常采用的诡辩术。例如，关于国家学说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论述到的有两种“过渡”：一种是从资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另一种是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向无国家“过渡”，即国家消亡问题。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过渡”。前一种“过渡”，是要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统治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新的国家机器；不这样，就不可能实现什么“过渡”。后一种“过渡”，则是按照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各种内外条件，使国家的职能逐渐自行消亡下去，根本不是什么破坏国家机器的问题。可是，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却抓住上述两种“过渡”的表面相似之处，把两者的界限混淆起来，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企图用后一种“过渡”来代替前一种“过渡”，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由资产阶级国家向无产阶级国家“过渡”，不需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

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列宁指出，这种混淆“过渡”的界限，就是用“诡辩术代替辩证法”，是一种“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②！

转移论点，将一个問題偷换成另外的問題，这也是修正主义者常用的诡辩术之一。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自己发动战争的罪恶，欺骗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说这次战争的爆发他们没有责任，是由别国发动的。这时，摆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面前的问题是：参与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宣传，还是揭露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罪恶？但是，当时德国的考茨基和俄国的波特列索夫等人避而不回答这一问题，却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来讨论，这就是：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在战争双方中哪一方面的胜利最有利或最有害？这样就把原来的问题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问题的意思是，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该支持帝国主义之间的强盗战争；而考茨基和波特列索夫等人所提的问题，则是避开上述尖锐的根本的问题，把问题换成帝国主义战争的双方，哪一方胜利最为有利，从而偷偷地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参加和支持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种荒谬的观点当作前提，来毒化人们的头脑。考茨基和波特列索夫等人玩弄这样的诡辩术，是企图使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战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12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304、305页。



爭，使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严厉地痛責道：这班“坏到极点的詭辯家”，“都是在用詭辯替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辯护，根本背棄了馬克思主义”^①。

抽象地談論問題，不作具体分析，这也是修正主义者常用的詭辯术之一。从辯证法的观点看来，人們对任何事物的認識，只能根据一定具体条件下的事实，并研究与該事实有关的一切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就是說，要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抽象地談論事情的好坏。例如，暴力是好还是坏？抽象地提出这种問題，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因为这里首先应当弄清楚的是哪一种暴力，是誰对誰以及为什么使用暴力。不作这种具体分析，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結論的。修正主义者每当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总是抽象地談論暴力問題，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坏的，要不得的。列宁說：“只談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不同的条件，就是背棄革命的市儈，或者简直是进行詭辯，自欺欺人。”^②

修正主义者在引证馬克思主义詞句方面的情形也是这样。他們总是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抽象地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合的例子来作证。例如，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认为英国和美国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根据当时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壟断的資本主义和官僚軍閥制度而提出来的。馬克思在当时也认为这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如果把馬克思的这一論断，任意加以夸大和搬用，把它說成是适用于当时所有資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也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一切資

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就完全歪曲和背棄了馬克思的原意。历来的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說，常常抽象地援引这个例子，而不分析自由資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同特点，不具体分析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企图从这里得出一个反馬克思主义的結論：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一切資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不采用革命的方式，不推翻資本主义制度，不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都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对于修正主义者的这种手法，列宁指出：“这是詭辯，通俗一点說，这是用引证来騙人。”^③

詭辯論者还常用这样一种手法，就是根据一事物能够轉化为他事物为理由，来抹煞这两种事物間的本质差別。例如，在战争問題上，詭辯論者根据一种战争能够轉化为他种战争为理由，来抹煞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間的本质差別。列宁指出，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着的，没有任何一种現象不在一定条件下轉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轉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轉化为民族战争。只有詭辯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轉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煞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間的差別。列宁說：“我們始終是辯证論者，我們同詭辯論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

①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詭辯》，《列宁全集》第21卷，第160、161頁。

②③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6—267、91頁。



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①

事物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类似的形式在不同条件下可以包含不同的内容，同样的内容在不同条件下也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有时，事物的形式变化了，内容并没有根本改变。诡辩论者却常常利用形式的变化来偷换为内容的变化。例如，在帝国主义之间，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相互斗争的形式是会发生变化的，今天可以采取战争或半战争的形式，明天又可以采取和平协商的形式。但是，他们的斗争的实质即分割世界和掠夺殖民地，是不会改变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曾把各国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形式的转换，说成是内容的改变，说成是帝国主义本性的改变。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各国财政资本集团之间可以达成协议，建立一个超出一国范围的世界财政资本的消除了竞争的垄断联合，即所谓“超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企图在群众中制造“在资本主义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②。列宁指出：“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而在实践上是一种诡辩，是一种用欺瞒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的手段。”“全资本家同盟互相斗争与妥协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不是和平的，后天又不是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妥协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③

列宁除了揭露诡辩论者的种种手法外，还分析了诡辩论的认识论根源。他指出，客观事物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任何事物都具有‘许多’——‘内容的规定、关系和见解’”，人们“可以提出赞同或反对的论据”，但“这

样的论据没有包括《事物的全貌》，没有《穷尽》事物”^④。人们在讨论和分析问题时，如果任意“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而作出结论来，这就成了诡辩。诡辩论的认识论基础是相对主义。在诡辩论者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一切是非都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是他们的真理观。列宁说：“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⑤修正主义者玩弄诡辩术，在认识论上必然陷入相对主义，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是片面的、歪曲的，在他们那里，客观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

诡辩论尽管被马克思主义者戳穿得体无完肤，已成为残破不堪的东西，但是由于诡辩论者是极其狡猾的，有时还用科学的外衣伪装起来，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冒充辩证法，往往就容易欺骗和迷惑一些人。现代修正主义者正是这样，他们每当修正马克思主义某一原理时，总是打着“科学”的旗帜，玩弄诡辩术，以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为了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嘴脸和手法，认真地学习列宁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非常必要的。

①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303页。

②③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9卷，第287、245、246页。

④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3页。

⑤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页。



徒劳的“修漏补缺”

——从腊斯克波恩之行看美国西德之间的裂痕

· 席 林 生 ·

六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十天的西欧旅行中访问了波恩。他一下飞机，立即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大加奉承，称他是“伟大的总理”、“垂名青史的人物”和“西方团结的缔造者”。据说，腊斯克这种肉麻的恭维，消除了最近波恩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取得了对西方联盟极其需要的修漏补缺的效果”。

美国国务卿的这种“奉承”和“恭维”，是否真的这样容易地消除了波恩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暂且不谈，问题是美国和西德之间究竟有什么漏洞和缺口需要这个美国国务卿特地横渡大西洋去修补一番呢？

美国和西德之间的漏洞和缺口是不难找到的。就在美国国务卿访问西欧前后，西方报刊和通讯社大量报道了华盛顿和波恩之间的“信任危机”。当时从这两个首都传出来的是不协调的声音。例如，美国企图在西柏林问题上结成西方对付苏联的统一战线，由美国代表西方同苏联谈判；但是阿登纳却公开说美国对西柏林通道问题的建议是“行不通的”，并且暗中支持法国抵制美国在东西方外交上的领导。肯尼迪政府竭力压迫西德、法国让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以便组成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大西洋经济共同体”；阿登纳却强调“共同市场的范围决不能延伸得太

远”，并且表示“应该赞同的是大西洋伙伴关系，而不是大西洋共同体”。尽管美国力图在欧洲孤立戴高乐以挫败法国建立“独立核打击力量”和“小欧洲”的计划，阿登纳却不断强调西德同法国的“十分亲密的友谊关系”，鼓吹法（西）德合作是西德对外政策的“基石”。美国和西德双方的调子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连美联社也说：“华盛顿和波恩之间的紧张关系看来是加剧了，这可能在盟国的队伍中造成危机。这种紧张关系反映出双方越来越缺乏信任。”据说，西德总理阿登纳私下表示：西德同美国政府的关系“比过去十三年中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西德，这个过去一向被美国报纸称为美国“最忠诚”“最坚定”的“盟国”，为什么现在同美国的关系却变得“糟糕”了呢？据西方通讯社说，这是因为阿登纳和肯尼迪“个人关系”的“恶化”。这当然是欺人之谈。人们只要看一看美国和西德关系的实际发展，就能发现华盛顿同波恩不和的原因，远比个人好恶深刻得多。

西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战败国，它的再起完全是美国一手扶植的。战后以来，美帝国主义为了把西德军国主义者从失败的废墟中拉起来，曾经花费了好几十亿



美元。美国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控制西德，以便在军事上利用它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突击力量，在经济上利用它的工业潜力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扩张谋利。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德在经济上成了美国和一个有力竞争者。西德的工业生产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增加了一倍半，而同期美国和英国都只增加百分之四十几。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一九六一年已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三；同期，英国从百分之十一二跌到百分之九；而西德却从百分之三点六猛升到百分之九。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出口方面，美国所占比重从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下降到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同期，英国从百分之九点八降至百分之九点一，而西德却从百分之零点五增加到百分之十点七。

帝国主义国家这种经济力量的变化，自然不能不在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中强烈地反映出来。随着西德实力的逐渐增强，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由于国际条约束缚而不得不居于二等国地位的情况，也越来越同它在经济上头等国地位相矛盾。因此，近年来西德一直力图冲破限制，改变现有的地位。西德的这种要求特别集中在夺取原子武器这一点上。西德军国主义者看到，目前同它争夺西欧领导权的对手——英国和法国都已掌握了原子武器，如果自己手里没有这种武器，它就不能摆脱屈居人下的局面。但是，由于西德是战败国，目前还受国际条约的限制，不能自己单独制造原子武器，它今天取得原子武器的

可能途径，就是通过美国和北大西洋集团的所谓“集体防务”。因此，西德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下台前所拟定的所谓北大西洋集团“第四核打击力量”方案是十分感兴趣的。

但是，肯尼迪政府为了保持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巩固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不仅收回了艾森豪威尔的“第四核打击力量”的计划，甚至比艾森豪威尔更严厉地逼迫“盟国”作出“牺牲”，放弃“独立核打击力量”，反而增加常规部队，为美国提供炮灰。美国这样做，显然还想借此加强帝国主义集团发动“有限战争”的能力，使西欧国家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西德对于肯尼迪政府驱使“盟国”增加常规军队的要求并不反对，因为这有助于加强西德的军事力量。肯尼迪压迫“盟国”放弃“独立核打击力量”也对西德有好处，因为这可以逼出英国和法国手上的原子武装，从而削弱它们同西德争夺西欧霸权的力量。但是对美国撤回北大西洋集团“第四核打击力量”的计划，西德是极为不满的。因为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西德掌握核武器的权利。针对肯尼迪的这种做法，西德当权人物不断发出“西德不能受歧视”、“必须装备原子武器”的叫嚷。在去年年底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西德一方面同英法一起力图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控制，另一方面又提出和美国共同掌握北大西洋集团核威慑力量的建议。当这一切没有成功之后，西德国防部长依然不死心，他又恶狠狠地叫嚷北大西洋集团必须在今后一年内解决核武器的问题。

美国和西德在西柏林问题的策略上也发生了公开的分歧。当然，在西柏林问题上，



美国和西德的立场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顽固地拒绝苏联的建议，继续坚持对西柏林的无理占领，把它作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基地。它们还拒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并且梦想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由于各自利害关系的不同，美国和西德在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方法和某些具体要求上也就存在不同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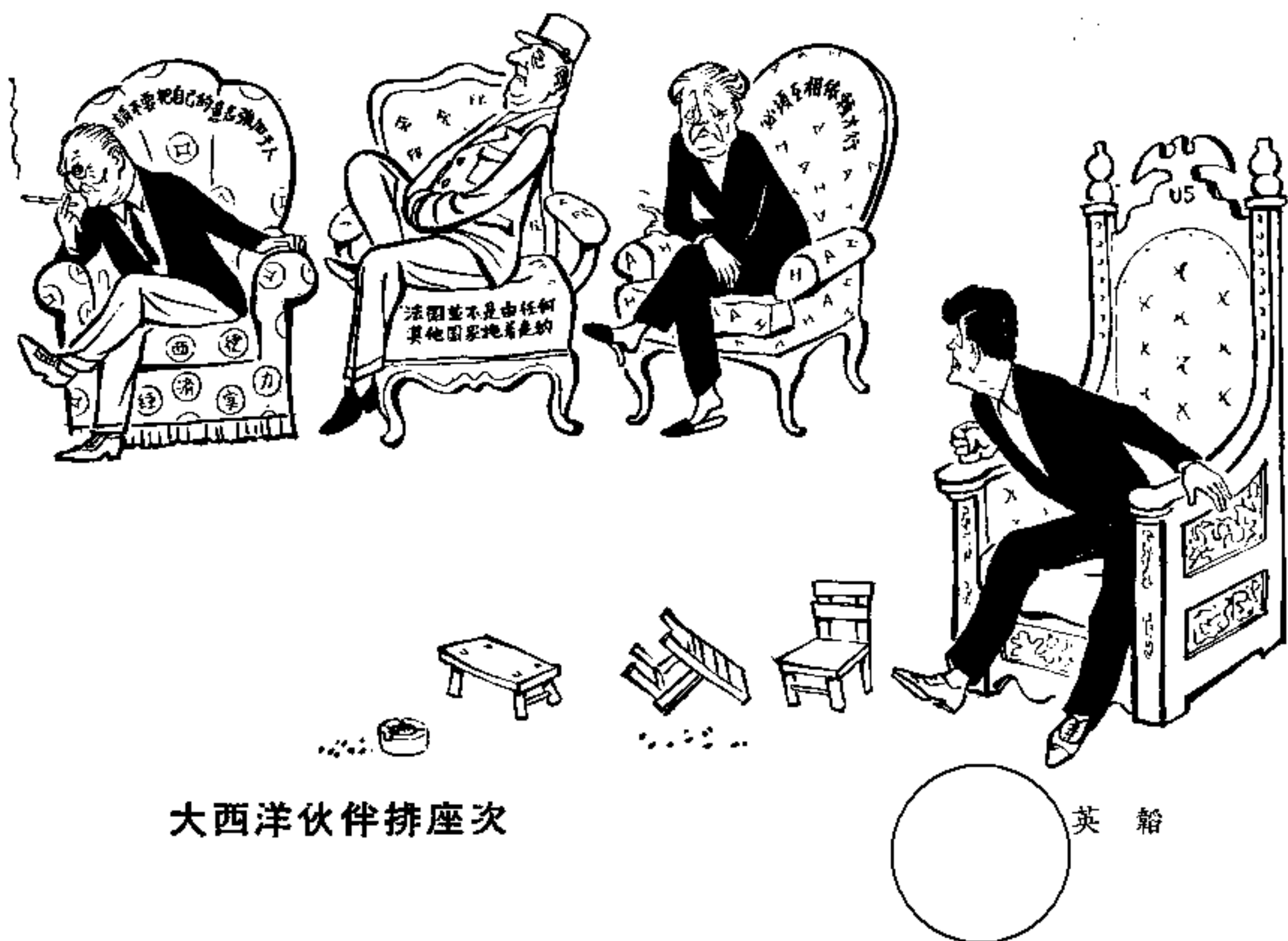
美国从它的战略利益出发，在西柏林问题上，一方面煽起“柏林危机”，加紧扩军备战，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威胁；另一方面又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接触和谈判，以便利用谈判来达到它长期霸占西柏林的目的。但是，西德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它的经济潜力，打破它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不平等地位，以便进一步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西德害怕西柏林问题的谈判妨碍它夺取西欧的军事霸权，特别担心英国会乘机利用西柏林问题的谈判来削弱它的政治地位和约束它在军事上的扩张。因此，西德对美国在西柏林问题上的谈判一直心怀疑虑。几个月以来，西德政府不时散布美苏会谈“没有成就”的空气，还故意事先泄漏了美国的“柏林方案”以引起“盟国”反对，来破坏美国的谈判计划，并且利用法国作为代言人来牵制美英。

肯尼迪政府在北大西洋集团的核武装问题和西柏林问题上，这种“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从盟邦的利益出发”的做法，使阿登纳“强烈怀疑西德的利益在盎格鲁—撒克逊手中是否安全”。阿登纳政府正在竭力摆

脱美国的控制，并且利用共同市场的力量来同美国对抗，以保障自身的利益，夺取西欧霸权。为了抵制美国，抬高西德的地位，阿登纳不断叫嚷美国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欧洲“必须要成为美国的有价值的伙伴”。在这方面，法国的戴高乐显然成了阿登纳的同盟军。法国是西德在共同市场中的主要伙伴，有着相互接近的经济基础。由于美国反对戴高乐的“独立核打击力量”和“小欧洲”计划而引起美法矛盾尖锐化，戴高乐竭力要借助西德的支持来逼使美国承认法国的大国地位。同时，西德在西柏林问题上也需要法国撑腰。正是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使得阿登纳和戴高乐特别亲热。两个人你吹我捧，说了“许多友好和和解的话”。七月初，阿登纳到法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戴高乐给予了“超过”常规的“隆重接待”。尽管美国不喜欢戴高乐的“统一欧洲”的计划，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访问波恩时还特地向阿登纳做工作，企图分化西德、法国轴心。但是，阿登纳到巴黎时却强调西欧政治统一“必须要毫无耽擱地向前进”，并且同戴高乐一起向美国示威性地大谈法（西）德的“团结”是欧洲政治的“基础”。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说，今天美国同西德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分道扬镳的程度。目前西德在原子武装和在北大西洋集团内进行军事扩张方面，还有赖于美国的帮助，西德对美国的反抗还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同时，在西柏林问题上，尽管双方存在着策略上的分歧，但是它们都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国家，





大西洋伙伴排座次

英 翰

在对待西柏林问题的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最近有消息说，西德为了取得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帮助，多少缓和了一些对西柏林问题进行谈判的反对态度。美国为了利用西德阻挠戴高乐的“小欧洲”计划，并且诱使西德同意美国在东西方外交上的领导地位，也在西柏林问题上迎合了西德的某些意见。在不久前的北大西洋集团雅典会议上和在腊斯克访欧时，美国提出了同“盟国”分享核武器分布情报及所谓“多边核力量”的建议，这些虽然是为了诱骗英、法放弃“独立核打击力量”而设计的方案，但是它对西德进行原子武装却多少有点好处。

西德和法国的关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诸如欧洲统一、核武器等问题上，巴黎和波恩的矛盾也十分显著。更重要的是，法国和西德都想把对方作为自己争取大国地位的垫脚石，因此，它们彼此对于对方超越自己之上都是不乐意的。针对戴高乐组织以法国为领导的“小欧洲”活动，西德报纸不断警告法国不要做得太过分，以免西德“同美国站在一起而反对法国”。很明显，阿登纳政府正在利用它一方面同法国、一方面同美国的那种又勾结又矛盾的关系两面渔利。

腊斯克正是在这种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匆匆地在波恩走了一个过场。如果说经过美国国务卿一番游说，这些复杂的矛盾就会烟消云散，那又有谁能够相信呢！

